M. Aurel Stein

[英] 奥里尔·斯坦因/著 巫新华 伏霄汉/译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卷一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巫新华 伏霄汉 / 译

卷一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英〕奥里尔·斯坦因著；巫新华 伏霄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6
ISBN 7-5313-2584-5

Ⅰ. 斯… Ⅱ. ①奥… ②巫… Ⅲ. 帕米尔高原—探险 Ⅳ.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75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90 购书热线：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主页：xuanti.chinachunfeng.net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160mm×215mm 印张：34.625 插页：8
字数：942 千字 印数：1—6 000 册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臧永清 温去非 整体设计：马寄萍
责任校对：潘晓春

定价：100.00 元（全四卷）



译者说明

本书译自奥雷尔·斯坦因的著作《沙埋契丹废墟记》，其著述、出版均早于印度独立和印巴分立，因而书中的"印度"地域和行政方面包括现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全境。另外，翻译过程中针对个别于理解文意无任何影响，且极为生僻、难以准确汉译的词语，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做了保留原词的处理。

《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

斯坦因探险的性质与如何看待其著作问题

巫新华同志主持翻译的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付梓之际，约我写序。因时间紧迫，仓促秉笔，这个序如何写？难以仔细斟酌。仅在动手之前凭直觉，认为该序应以避免与《沙埋契丹废墟记》的内容和斯坦因所写前言重复，摆脱泛泛而言和老生常谈的怪圈，不落入恭维（作者和译者）的俗套为原则。在此前提下，急就之时，思不出位，最后还是觉得针对目前情况，就大家所关心的如何认识斯坦因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如何看待斯坦因著作的问题谈点看法，或许对读者是有益的。

斯坦因在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1930年先后4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其中1930年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反对而夭折。所谓探险，一般是指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的艰险之地，就某些未知和不清楚的领域进行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列强诸国学者在新疆的种种活动，大都冠以“探险”之名。这种“探险”表面上与前述一般的探险相近，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探险”是在列强垂涎并妄图染指新疆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均肩负各自政府机构的使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其所谓的探险不仅深入沙漠腹地，而且还流窜于各有关绿洲和敏感地区，干了许多违背探险宗旨，偏离探险轨道，践踏我国主权的非法勾当。如此者流，斯坦因首当其冲。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结合《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档案馆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有关斯坦因的档案史料在1899年5月至1931年5月，主要是当

时新疆各级官方机构有关斯坦因探险活动的来往公文和信函等。以下正文中凡加引号者均引自该书)，对斯坦因在考古学和地理学探险名义下的所作所为略作披露，以还其本来面目。

第一，斯坦因是肩负英印政府使命的御用学者。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1913年8月28日公文)。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斯坦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闯入新疆的。

斯坦因“奉印度政府之使命”（1930年12月公文，时印度政府受英国政府控制)，在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在新疆进行4次探险活动，对此斯坦因在其著作中从不讳言。那么，斯坦因领受英印政府什么使命呢？答曰：“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1913年12月17日公文)，“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1930年12月20日公文)。此外，还有一条就是搜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中，曾提到他到新疆和河西地区探险的目标和性质，但却未将上述3条包括在内。其实这缄口不言的3条，才是他探险的真实目标和性质，并在历次探险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坚决贯彻执行之。正因为如此，斯坦因才被英国和印度政府奉为“英雄”，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骑士勋位。正是以此为基础，其学术成果才被褒奖有加，他才有机会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所以斯坦因到新疆探险绝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执行英印政府使命的政府行为，他是地地道道披着学术外衣为英印政府帝国主义政策

服务的御用学者。所以"命运之神"才对他"格外垂青"(《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斯坦因其他著作中也经常有类似的话)。

第二，为完成英印政府赋予的使命，斯坦因靠强权、流言和骗术，辅以行贿官员、收买走卒等伎俩，不择手段以求一逞。对于上面提到的3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早有察觉。因此，诸如对斯坦因的活动要"随时侦察"(1913年8月28日公文)，"应即查明禁阻"、"遵照部令严行禁阻通行"(1913年11月12日公文)，"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到处勾留"(1930年9月27日公文)，"请饬属防范，严加监视"(1930年11月10日公文)等饬令，不绝于书。但是，斯坦因仍然我行我素，到处横行。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弱，吏政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斯坦因之流正是乘此，利用强权政治开路，由英国外交机构出面打压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详见档案史料)；并以探险是"为发扬中国古时威名"(1930年10月16日公文)等鬼话进行欺骗。同时还用钱物贿赂各级有关官员，收买走卒为其张目(斯坦因著作中每有流露。以第四次考察为例，斯坦因就拿出6000美元"为运动新省官员费用"，斯坦因甚至明说"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以上见1930年12月公文)。所以负有监视之责的一些官员，往往以斯坦因"并无测绘及违约情事"(1914年10月16日公文)等不实之词谎报平安无事。有的官员甚至以斯坦因有"英、印两政府后援"，不能用"无关实际之考古问题徒伤国际感情"，准斯坦因考察"毫无不妥"、"务请当机立断"，"免误事机"(1930年10月23日公文)；如若不准"何以对国人"(1930年10月29日公文，此公文与23日公文说的是一回事)等内奸式的言辞要挟上级政府。这些丧失民族尊严和国格

的腐败官员为虎作伥，又何以对国人！真是可恶之极！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虽然已认识到斯坦因探险的目的，明知斯坦因以“多谋善窃著闻世界”，“惯于巧取豪夺”，其人“老猾”、“行踪诡秘”，他的话“全系谎言，不足置信”（1930年12月公文），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惧外、媚外，加之这些腐败官员和一些走卒与斯坦因沆瀣一气，从中作梗，致使斯坦因的上述使命和阴谋仍然得逞。如此这般，着实令人痛心疾首！

第三，到处搜集情报，散布攻击和分裂中国的谬论。斯坦因利用考古和地理考察的名义，深入到新疆各地。在其著作中反映出，他所到之处广泛搜集当地政府、驻军、民政、民族构成、民情、民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报，对敏感地区还进行体质人类学考察与测量；广泛搜集各地气候、水文、物产（包括矿物标本，甚至采集石头、沙子和土壤标本）等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下文将要谈到的与偷绘军事地图有关的种种情况。凡此所为，有的可以与考古和地理考察挂钩。但是，上述资料早已大大超出学术需要的范畴。所以斯坦因的行径显然别有他图，其司马昭之心，不言而喻。

除上所述，斯坦因在著作中还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不承认新疆是中国领土，宣扬新疆古代是白人的家园，新疆古代文化西来说，汉人是外来民族，并极力贬低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当时中国官方机构也早已知晓，指出斯坦因侮辱中国，“轻薄中华民族之议论，尤堪发指”；对斯坦因“谓我只知有旧中国”，“外国人应不理会”中国，“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中国民族的生命已临最后之一日……”（以上见1930年12

月公文）等种种狂言，无不愤慨。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为英帝国主义染指新疆到处搜集情报、肆意诽谤攻击中国，为英国和列强诸国妄图分裂中国充当吹鼓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第四，以偷绘军事地图为己任。斯坦因的历次探险均由印度勘探局出资、出先进设备，配备精通测绘人员，对所到之处偷绘详细地图。从斯坦因著作中可明确看出，他对测绘地图竭尽全力，比考古探察还要上心。为测绘地图他本人或派员均实地勘察，凡山川等各种地貌，山口险隘、古今军事要地和要塞、古今交通线（包括古今军事道路和小路）、交通枢纽、烽燧（烽燧线即是古代军事警戒线）、驿站，古今城镇和居民点，各种水源的位置，水草分布状况等等，地图上无不应有尽有。斯坦因所绘地图囊括地域之广、涉及腹地之深、其详细和精确程度之高、地图数量之多，远远超出考古和地理学术考察之需要（在《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等著作中刊布的地图，仅是其所绘地图的一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地图。据说有人曾作过对比，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府有关这些地区的军事地图，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斯坦因的地图。在列强诸国探险队中，大规模偷绘军事地图者只此一家，这大概就是“大英帝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的真实含义吧！由此可见，斯坦因到底是何许人也？意欲何为？通过其致力于大量偷绘军事地图一事，已昭然若揭。

对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当时中国政府也非常敏感。在有关斯坦因新疆探险的档案史料中，涉及其偷绘地图的公文最多。档案史料中明确指出，斯坦因到新疆的目的是“偷绘我国地图”（1913年12月17日公文），他的活动“当不离军事范围”（1930年12月公文）。斯坦因所到之处，“窃

伺关系军务要险地段”（1914年1月30日公文），“察看险要地方暨照绘地图”（1913年8月28日公文），“派人分往各处测绘”（1913年11月22日公文），“测绘险要”（1913年12月18日公文）。“其受印度政府命令来华测量”，“自印度入新、甘之军路详细测绘以去”；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1930年12月公文）。所以当时中国政府一再发出“注重国防”（1930年9月27日公文），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1930年11月10日公文），“禁止测绘在案”（1913年10月11日公文），“严行禁阻”测绘（1913年11月12日公文）之类的禁令，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前面第二条所述原因，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有禁不止，“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1930年12月公文，原公文“损失”所指，还包括下文提到的盗掘遗址，劫掠古物等项）。

第五，大肆盗掘破坏古遗址，疯狂劫掠大批文物。斯坦因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斯坦因几乎盗掘了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和遗迹，使遗址和遗迹造成严重破坏，所出遗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全部劫往印度和英国。对此，当时中国政府的有关当局指出：“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盗取我国先民遗迹，蹂躏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1930年11月10日公文），“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1930年12月公文）。因而一再下令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测量地形，用副中枢，注意国防，保卫文化之至意外”（1930年9月27日公文），并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之事发生（1930年9月21日公文）。

最后，由于屡禁不止，故在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时，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只能采取“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1930年12月公文）之策。但是，斯坦因究竟劫掠多少古物出境，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清楚。有的官员也只能笼统地报告“惟查该游历（请注意，“游历”也是斯坦因编造的谎言）需用车辆、驼只、马匹甚多。询悉每考察一处，举凡一草一木，石块片瓦之属莫不装载而归，是以需用如此甚多”（1914年11月7日公文）。此类报告虽然语焉不详，但也反映出斯坦因在明目张胆地进行洗劫。关于斯坦因劫往印度和英国的中国新疆古代文物，至今尚无完整的统计。仅从他在著作中披露的情况看，就已触目惊心。

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等地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大肆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石室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十二章《藏经洞的发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第六十五至六十九章中，详细描述了他及其帮凶（实为内奸）蒋师爷如何巧施阴谋诡计，编撰故事，鼓动如簧之舌，欺哄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以几个小钱步步紧逼王道士上钩，诱骗宝藏；并津津乐道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在夜色中一次次偷走大量精品。最后装满24箱（一箱的重量相当于一匹马的负荷）写卷、5箱绘画等艺术珍品，全部劫往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说此后法国伯希和到藏经洞时，藏经尚有15 000余卷，绝大部分被其劫往法国。后来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又从敦煌石室盗走部分精品）。斯坦因开盗窃敦煌石室宝藏之先，他与伯希和所盗走的敦煌石室宝藏，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震撼了中国，也使世界为之震惊！

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在英印政府对我国新疆等地阴险图谋的

"棋盘"中，显然是一颗无可替代的重要"棋子"。事实证明，斯坦因所谓的探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考察性质，而是假考古学和地理学探险之名，以执行英印政府使命为宗旨，行偷绘军事地图、劫掠文物与搜集情报之实。仅就其"考古探险"而言，斯坦因劫余之后，新疆汉唐时期的遗址大都遭到破坏，遗物已绝无仅有，敦煌石室宝藏国内也只剩少许。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坦因乃是中国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最大劫掠者。其劣迹斑斑，铁证如山。对于此类恶劣行径，西方有良知的学者亦嗤之以鼻，并将斯坦因之流贬称为"魔鬼"（参见英国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然而，另一方面，时至今日，西方却仍有为之招魂者，声称他们拿走新疆和中国内地的文物是保护文物，不然留在当地也被破坏了。这种颠倒是非的胡搅蛮缠，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偷了东西还要立牌坊的强盗逻辑，是对中国人民极大的侮蔑。因此，我们必须对这种谬论予以严正谴责，彻底批驳，清算斯坦因之流欠下的孽债，扯去他们的遮羞布，讨还公理！

除上所述，再谈谈如何看待斯坦因的著作问题。斯坦因的著作与其上述行径既密切相关（其著作植根于探险之中），又有很大区别。斯坦因的上述行径肮脏龌龊，完全是反派面目。但是，他的著作则不然。一是他的著作属学术范畴，以资料和研究为主，长期以来广为流传，并已经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某种"较好的定式"。二是他的著作有意掩饰上述行径，其有问题的言论又湮没于大量资料和一些研究之中。因而泛读斯坦因的著作，看资料和成果易，发现问题难，所以这些著作就成为斯坦因遮盖劣行和欺世钓誉的"护身符"。三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看斯坦因的著作主要是查资

料，寻觅有关研究成果，很少去注意此外的问题。四是斯坦因的著作量很大，涉及的学术及其他方面问题多而复杂，不像他的上述行径，一抓就准，一点就破。因此，对斯坦因著作的全面评价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种评价应包括主要成果、成绩的定位，主要缺欠、不足和存在问题的定位，及其在该领域学术发展史中的定位。而欲达此目的，则要求评价者必须有广博精深的学术功底，较高的考古学造诣，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政治头脑，同时尚需长期研究其著作，认真梳理，所以评价本身就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和一项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即使试图评价，其能否准确到位姑且不论，仅就篇幅而言，评价文章短了说不清楚，长篇评论须下大功力，又受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难产，故对此大都视为畏途，望而却步。上述四点便是长期以来对斯坦因的著作说好话者多，批评者寡的主要原因。由此进而造成了目前对斯坦因著作只看成果，不顾问题；突出赞扬，不作批评的认识误区。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出了本文提出如何看待斯坦因著作的问题，所谓“看待”即不等于也不是全面而具体的评价。仅仅是针对上述认识误区，对斯坦因著作的成就，特别是其成就之外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一些粗线条的看法或“标准”，以供读者读斯坦因著作时参考。下面即分成就和问题两方面简述之。

斯坦因的著作较多，举其要者，他第一次探险出版了《古和阗考》（考古报告，二卷，1907年。现在已完成中文译稿），《沙埋和阗废墟记》（通俗本，1904年。1994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二次探险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考古报告，五卷，1921年。中译本于199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沙埋契丹废墟记》（通俗本，二卷，

1912年，中译本即将出版）。第三次探险出版了《亚洲腹地》（考古报告，四卷，1928年，中译本即将出版）。最后他又综合3次探险写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通俗本，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1987年中华书局和上海书店联合再版）。此外，斯坦因还出版了一些其他著作。

在上述论著中，《古和阗考》《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3部正式考古报告是斯坦因的代表作；《沙埋和阗废墟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则是通俗性的著作。这两部通俗性著作，以较短的篇幅（相对正式报告而言），分别陈述了第一、第二次探险的经历和情况、主要发现和重要收获，并将探险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给普通的读者"，书中不乏正式考古报告中未载的一些细节和轶事。在上述的两部书中，以即将出版的《沙埋契丹废墟记》部帙最大，内容最丰富。该书近80万字，有300余幅图版和地图，详细地介绍了他第二次中国西部考古探险的全过程（斯坦因4次探险中，以第二次最为重要），书中将资料性、学术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应当指出，《沙埋和阗废墟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成书均早于相对应的正式考古报告，后来出版的正式考古报告对这两部书中记载的一些内容多有订正或改动，所以这两部著作若作为资料使用，必须参照正式的考古报告。此外，《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则是对他3次探险的概括和总结，言简意赅，在通俗之中寓有较强的学术性。总之，上述3部通俗性著作与斯坦因3部代表作既是相辅相成，又是互查互证，彼此勘误（也存在3部通俗性著作资料正确，而3部代表作记错的情况）的姊妹篇。同时这3部通俗性著作也是读者了解斯坦因的探险生涯，主要发现和收获，以及其人其事的捷径。

斯坦因的3部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室宝藏、千佛洞佛教艺术与河西地区汉长城遗迹等。书中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版将上述地区的各种有关遗址及其丰富而精美的遗物展现于世人面前，从而揭示出该地区汉唐时期的文化概貌（涵盖了西域史和佛教等诸多领域），揭开了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再现了汉长城的分布态势，保存状况，结构特点，论证了玉门关和阳关的位置；并在客观上又使敦煌宝藏重见天日。此外，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种种奇妙的景观；探讨了该地区地理学、历史学及古代交通线等一系列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在这个基础上，他进而又转入考古学和地理学的动态研究。对该地区古代遗址的分布态势、兴废和迁徙（包括个别遗址废弃后又重新兴起）与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某些地域历史时期河流的水量、流向、流程、流域范围，河水泛滥、退缩、改道和回流等现象变迁的实态和规律；一些地域遗址废弃并荒漠化的原因和进程，个别荒废地域重新开发利用的可能性等方面，均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总之，斯坦因用他的鸿篇巨著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因而轰动了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于是那些馋涎欲滴的列强学者们和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也紧随其后，纷至沓来。

其次，斯坦因在编写3部代表作过程中，还邀请了当时欧洲与此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对各种难度较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专题和综合研究。然后斯坦因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基础，总其大成，编纂成书。因此，这3部代表作既是斯坦因的专著，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

时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从学术角度来看，虽然现在不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和瑕疵，但其主要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所以斯坦因的3部代表作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斯坦因的著作盛名之下也存在一些不足和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

第一，总的来看，斯坦因的著作（特别是3部代表作）以考古资料整理为重头戏，资料整理属学术范畴，但其所获考古资料的途径和方式又是政治问题（参见前述情况）。此外，斯坦因著作依托于考古资料的研究部分，绝大多数是学术问题，研究成果占主导地位。然而这种研究是受斯坦因的立场和观点制约的（参见前述情况），所以也有一些谬论和政治性的问题。因此，对斯坦因的著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学术标准和政治标准，并将其放到当时的学术和政治环境中予以衡量和评说。

第二，如前所述，斯坦因的3部代表作，其实就是对他盗掘的遗址，劫掠的遗物之整理与研究；他的3部通俗读物则是这种模式简化和变化后的通俗性作品。因此，斯坦因的著作以资料为主体，其价值以资料取胜（资料报道也不规范，见第三点）。在斯坦因的著作中资料与研究，是皮和毛的关系，资料是斯坦因学术成就的基础。所以是中国新疆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敦煌石室宝藏给斯坦因带来了崇高的声誉，造就了斯坦因的学术地位。斯坦因的学术研究成果，说穿了就是以上述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为底蕴而谈的一些看法，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古代遗迹和遗物本身价值所致，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因此，不能不顾这些事实，把金都贴在斯坦因的脸上。

第三，说到斯坦因考古报告中的资料，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斯坦因对遗址是盗掘，对遗物是劫掠，在做贼心虚的情况下，往往抢时间，赶"任务"，大都以"挖宝"的方式放纵民工乱抠滥挖（这是遗址遭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意处理复杂现象或根本未观察到重要现象；加之斯坦因又经常离开现场（大多与测绘有关），使"发掘"处于失控状态，因而其所获资料大都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即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以自己在现场所做的记录、日记和工人口述情况为线索，按流水账的方式报道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情况。所以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很不规范（与现在真正科学的考古报告相去甚远），重要遗址的完整形制布局及其各部位间的关系（包括平面打破关系，剖面叠压关系）；遗物出土的层位、坐标、遗物与遗迹的准确对应关系，遗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组合构成情况；遗迹之间、遗物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大多数未交代清楚。所以斯坦因的断代，大都是以出土的钱币、文字资料和少数他能够掌握时代特征的遗物进行猜测。斯坦因在学术上的许多误判和错误结论，大都与上述诸种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斯坦因考古报告的资料很难进行深层的有效利用。总之，在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中，各种资料大都以盗掘时的情况，呈无内在关联的"自然状况"单独存在，其价值主要表现在遗迹的局部或某个方面和单个遗物上，很难全面反映遗址的本来面貌（大都不能进行遗址的复原研究），因而其资料价值又大打折扣。所以若没有认真研读斯坦因的著作，则不宜盲目地对其著作的考古资料部分给予过高的评价。

第四，斯坦因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前已说明，不赘述），是斯坦因坚决贯彻执行英印政府所赋予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的"敬业"和"献身"

精神与其个人学术素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许多欧洲学者集体智慧的总汇。从斯坦因的著作来看，他的研究成果，大多与资料夹叙夹议（其中单独的专题研究除外），研究成果不太醒目，但仔细阅读仍能看得清楚。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应当从学术角度予以审视。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眼光进行分析，该肯定的肯定（其成果不乏精辟之见），该商榷的商榷，该否定的否定（有的是受前述所获资料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制约，有的是限于当时的学术研究总体水平，有的是斯坦因个人研究水平所致），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斯坦因著作中资料之外的言论并非全是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言论中也不乏夹杂着渗透其帝国主义者心声的借题发挥和杜撰的谬论（主要是斯坦因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的。参见前述情况）。对此，必须用政治标准予以透析，扬弃其糟粕。特别是他利用遗迹遗物别有用心地攻击污蔑中国的种种胡诌的谬论，则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第五，斯坦因的著作，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国主权为前提，以疯狂盗掘中国古代遗址并劫掠中国古代文物为基础的。因此，斯坦因的著作既是其卑劣行径的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读斯坦因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教训，勿忘国耻。

第六，经斯坦因盗掘和劫掠之后，凡其所涉及的遗址均遭严重破坏，遗物也没有了。所以记录这些遗址和遗物的斯坦因著作，就成为今天研究新疆汉唐考古学的基础资料（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其有关敦煌石室宝藏的记录又是研究敦煌学的基础资料之一。这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假斯坦因之手造成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历史事实。但

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前述情况（探险的性质和目的及其种种劣行）来面对这个事实，绝不能因其所起的基础资料作用就无保留地全面肯定斯坦因，并对他进行无原则的赞扬。

综上所述，应当指出，斯坦因的著作虽然有前面提到的不足和问题，但其著作中的资料价值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不要以问题抹杀成果，也不能用成果掩盖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研究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以及一些研究与之相关学科的人，或那些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读。毋庸讳言，斯坦因的著作对上述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充实青年朋友自身的知识宝库，无疑都是有重要作用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用较长篇幅揭露斯坦因探险的目的和性质，谈对斯坦因著作的看法呢？原因有三，第一目前存在对斯坦因著作的认识误区（参见前述情况）。第二其成果越大，欺骗性越大，不了解真相的人越容易受到蒙蔽。致使一些人将斯坦因的著作与其探险活动等同起来（如此，既抹杀了斯坦因探险的目的和性质，又将其探险完全学术化了），并以著作为标准评价其人（人的评价与著作的评价并不等同）。这样不仅掩盖了其探险的卑劣行径，而且还突出了斯坦因的正面形象，使对斯坦因其人的评价走向偏颇（对斯坦因其人的评价应包括探险活动和著作两大部分，以及其他有关部分）。第三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无原则地全面肯定斯坦因（包括探险活动在内），甚至大加吹捧。以此结合前述情况，又使对斯坦因著作认识的误区发展到对他探险活动的认识误区，并已经造成误导之势。针对上述时弊，我们认为必须及时敲响警钟，揭露斯坦因探险的目的和性质，分清他著作中的良莠，

指出其著作中的不足和问题。从而提醒读者，特别是不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读者，在读斯坦因著作时，一定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结合历史背景，以爱国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予以认真的审视。在事关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着别人随便给斯坦因唱赞歌。我们希望读者朋友们，要以史为鉴，了解斯坦因在探险活动中的所作所为，深入研究和分析斯坦因的著作，并以这两者所表现的不同层面和两重性，如实地、恰当地评价斯坦因。这是认清斯坦因本来面目和读斯坦因著作时必备的主要基本功之一。

孟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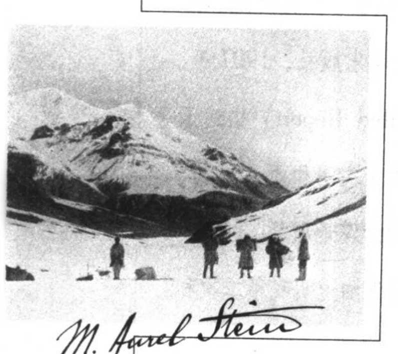
2004年2月7日

前言

1906—1908年，受印度政府之约，我在中亚和中国的最西部地区进行了考古和地理考察，编纂这套书的目的就是将我这次考察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读者。这次考察的计划是根据我1900—1901年中国之行的经验和成果而制定的。我把那次中国之行写成了一本书——《沙埋和阗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该书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内容通俗易懂。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也正是这些古迹吸引我来到这个地区进行古物研究，那个时候，这儿还近乎一片处女地。随后，我出版了《古代和阗》(Ancient Khot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07年，两卷四开本)，该书中的科研成果"详细报告"(Detailed Report)描述了这里所独有的迷人古迹，这个地方曾经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相互交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描述了奇妙的沙漠地理环境，沙漠的这些地理条件有益于古迹的保存。因此，再详细说明我第二次和田之行的基本目的就好像显得没有必要了。

命运之神对我格外垂青，我才得以能够善始善终地完成这次考察活动，而且收获颇丰。我们的旅行和野外工作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行程近10 000英里，足见这次考察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回国不久，即1909年初，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便给我颁发了学会的最高奖——"奠基人金奖"(Founder's Gold Medal)，这次考察活动所取得成果的重要意义从中可见一斑。也正是因为引人入胜的发现实在太多，尽管有大量的协助人员，我仍然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科研成果的出版工作。即使现在，编写一部内容如此丰富和耗资巨大的"细节报告"亦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我也完全意识到了赢得更多人兴趣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地区还有很多未曾发现的东西，古印度的文明、宗教和艺术还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我们大英帝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我十分感谢英国驻印度总督阁下允许我独立出版这套书。在这套书中，我尽力做到不仅仅要记述个人的经历以及对最险恶的沙漠和亚洲最高山区的观察，而且要涵盖那些被掩埋沙漠地下长达几个世纪而又重见天日的许多重大考古成果。我希望，书中的照片和全景图（其中许多由我拍摄）、古代艺术品的彩色插图和有关我与印度助手行走路线的绘制精良的地图，能有助于读者对我们的考察成果和考察时的恶劣自然条件有个直观的了解。



1900—1901年，我在和田周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 Desert）里发掘的废墟充分反映了这里古代文化的重大史学价值。这种文化融合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绿洲中盛极一时。这些废墟也向人们展示了保存遗迹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已经消失了近几个世纪的最简陋的遗迹，也能在沙漠的覆盖下保存下来，这个地区的气候可以和埃及相媲美。在第二次系统性的考察中，我继续向东行进，行程的直线距离近1000英里。自上个世纪以来，这条路线连接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王国及西方古典文明世界，沿途上有零零散散的废墟，这为研究本地区的早期历史、艺术和宗教的日常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而在过去，除了中国史籍（Chinese Annals）中的少量记载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资料。

我之所以对现在的事物和掩埋的历史古迹给予同样的关注，有很多原因。在亚洲，可能没有其他地方像亚洲腹地的荒凉盆地这样，其历史的发展如此地依赖于自然条件，而且，这些自然条件导致的世俗变化在考古上又有踪迹可寻。关注其气候环境对广泛讨论的气候逐渐变旱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穿越所经地区的典型自然环境特征及其对散落的居民点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就成了这次考察的重要内容。

本书从印度和阿富汗交界的河谷写起，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曾在此地第一次用古典形式来描绘印度教崇拜的神灵和场景。然后，本书把读者从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带到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Pamirs）上阿姆河（River Oxus）的发源地，后到塔里木河（Tarim River）流经的大盆地，塔里木河最终消失在罗布泊的沼泽里。昆仑山脉（Kun-lun Range）包围了这个盆地以及和田的南部和西部。在该地区的考察活动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冰川覆盖的山脉的险恶环境。接着，我在书中记述了在远离现代和田绿洲的沙漠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古代遗迹，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何等的恶劣。在那里，缺水常常阻碍了考察的正常进行，甚至危及生命，只有冬天是唯一可能进行探险活动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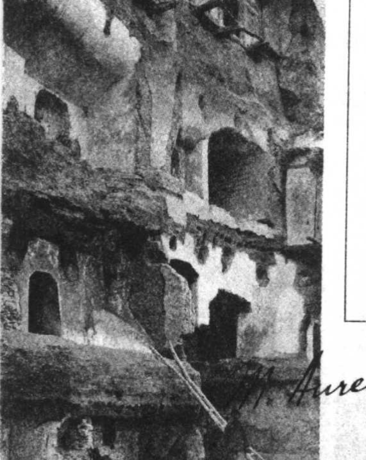
尼雅（Niya）遗址的废墟令人着迷，这里的古代民居自公元3世纪起便被遗弃不用，但残破的梁架至今仍然竖立在这些居住遗址上，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成百上千的用古代印度文字书写的木简、简牍，这种木质文书的封泥上常常留有古希腊罗马风格印章的痕迹。向东北方向前



进，到达一片古代河床，古河床风化得很厉害，罗布泊周围的土地结了硬硬的一层盐壳。这里与世隔绝，条件极端艰苦，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发现了大量资料。写到这儿，我只想提两点。在距离饮用水源足有100英里的废墟里，发现的文书表明，印度语在这里曾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同时期和田官府也曾使用印度语，这足以证明印度语的这种作用会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中亚地区最偏僻的地区。希腊风格的佛教木刻和美丽的古典希腊风格壁画（这种壁画曾用来装饰佛教庙堂）证明了古希腊艺术的重大影响，远至中国的边缘地区。

马可·波罗（Marco Polo）像生活在他以前的中国朝圣者那样，到达中国，我们则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穿越了大沙漠，我这次根据个人的意愿所进行的、庞大而又令人神往的探险活动得到了回报。我发现了古代中国长城（Limes，也译作“边墙”——译者）城墙的最西段部分，中华帝国就是利用这些长城来保护其向中亚政治和商业扩张的主要通道，西方国家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则利用它防御匈奴人（Huns）的突袭，但现代人已经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些军事设施。长城大部分保存完好，只是烽火台上没有岗哨，我们沿城墙考察了200多英里。由于地处戈壁腹地，没有遭受人类的破坏，大量有关早期中国人活动和其他记录的历史遗迹才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了这片最贫瘠的地方人类曾经活动过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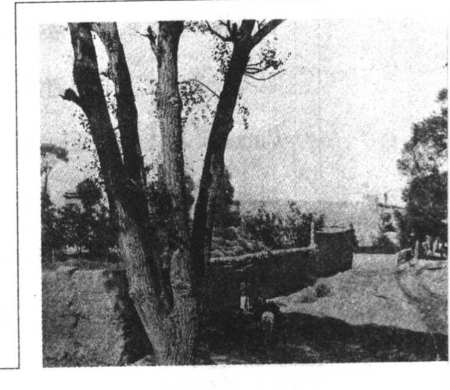
离敦煌（Tun-huang）不远，在古长城（Great Wall）的西端，有一块大绿洲，千佛洞（Thous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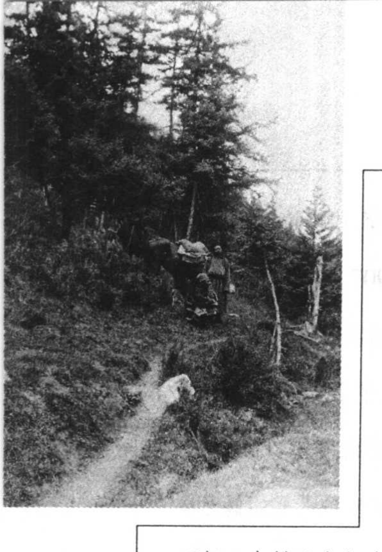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Buddhas）就坐落在此。沙质崖壁上凿有成百上千个石窟（Thebais），饰有大量的壁画和灰泥雕塑，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1907年春天，我有幸接触到大量的古代手稿和艺术遗迹，这些东西在一个用石头封闭起来的小石窟寺内藏匿了900年左右，且保存的完好无损。我收集了24箱从这种奇异的藏匿处拯救出来的珍贵手稿和满满5箱子刺绣以及类似的佛教艺术品，一位资深评论家将我的经历说成是考古史上富有戏剧性且硕果累累的偶然事件。根据大量保存完整的原画和部分修复较好的临摹本，人们得以欣赏其艺术价值和了解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对远东地区的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为东方艺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阐明其中的问题尚需时日，若要从这些用汉语、梵语（Sanscrit）、回鹘语（Uigur）、吐蕃语（Tibetan）及其他未知的中亚地区的语言写成的手稿中摘选出具有历史和文献价值的所有东西则需更长的时间。

在冰雪覆盖的南山山脉（Nan-shan ranges），我们向西藏方向前进，并在大约20 000平方英里的地方进行考察，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却不为外人所知。之后，探险队去了塔里木盆地开展第二次考古活动（1907—1908年）。这次考古活动中，我们不仅仅发现了价值重大的古迹，而且在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后，成功地横穿了号称“沙漠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并且是在最宽处穿越的。在返回印度之前，也就是190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对位于和田和克里雅（Keriya，今于田县——译者）南





部的昆仑山脉进行了地理考察，这片山脉地势高峻，以前几乎还没有人来此地探险。山路崎岖不平，冰川（和田河的水源）高耸，但我们还是成功地进行勘测。随后，我们穿过西藏西北的不毛高原，到达喀拉喀什河（Kara–kash）的上游。

这段旅程途经之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一路上困难不断。在攀登上坚冰覆盖的昆仑主峰时（海拔约20 000英尺），我患上了严重的冻疮，右脚的脚趾失去了知觉，而此时恰逢探险活动即将结束。我不能继续带队考察，不得不让人抬着，沿着喀拉库拉木（Kara–koram）路线跋涉了300多英里，山路险恶，路上最高的山口海拔超过了18 000英尺。最后，我们终于到达列城（Leh），接受医生的治疗。康复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但一想到我的计划成功实现了，我意外受伤的插曲也没有影响文物的运输，近100箱的文物已经安全运抵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我心中仍是倍感欣慰。

没有各位助手的帮助，我就不可能克服重重困难，像摘要中所说的，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探险活动也不可能完成。很多人都给予我支持，在这里也难以充分表达我衷心的谢意。首先，要感谢印度政府。在总督柯曾勋爵（Lord Curzon）的支持和激励之下，以及总督先生对地理研究、印度历史和印度文明的浓厚兴趣，经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同意，印度政府于1905年批准了我的有关探险活动的建议，并提供了执行计划的大量物资装备，我也得以从行政事务中脱身。我的赞助人和朋友，比如我已去世的上司哈罗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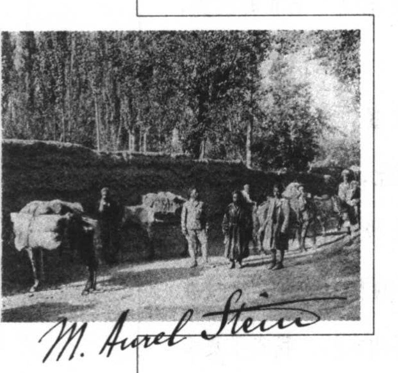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狄恩上校、爵士（Colonel Sir Harold Deane），故去的邓泽尔·伊伯斯顿爵士（Sir Denzil Ibbeston），以及现在的詹姆斯·威尔逊爵士（Sir James Wilson, K.C.S.I.）和麦克拉干先生（Mr. E.D. Maclagan C.S.I），印度政府的前任和现任税务部长（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Revenue Department）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使得印度政府能及时考虑并同意我的建议，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董事会慷慨解囊，提供了预算费用的2/5，同时董事会要求相应地得到考古成果的2/5。鉴于大英博物馆过去曾经为东方研究提供资助，能把这2/5的文物带回大英博物馆是笔收入不菲的投资，即使从经济收入的角度也是如此。

1906年，我们启程开始这次探险活动，时任印度总督的明顿勋爵（Lord Minto）对此也很支持，这对我们是莫大鼓舞。不仅如此，总督阁下对整个探险过程都给予了关注和支持，我的老朋友邓洛普上校（Colonel Dunlop Smith）即现在的詹姆斯爵士（Sir James）是总督阁下的私人秘书，上校在他的书信中就表述了总督对我们的关心。由于明顿勋爵的支持，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整理考察的成果。对此，我铭刻在心，没齿不忘。

如同以往一样，印度勘探局（Survey of India Department）对这次探险活动的地理考察给予了最有价值的帮助。在朗格上校（Colonel F.B. Longe，R.E.）的支持下，勘探局爽快地答应拨给我当地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并承担雇用此人的费用。时任“三角法测量局”指挥（Superintendent of Trigono-metrical Surveys）、现任印度勘探局局长的伯拉德上校（Colonel S. Burrard，R.E.，F.R.S.），利用每一个机会，支持我们的探险

活动，并为我们使用他领导下的勘探局的地图资料提供方便。正是由于伯拉德上校不懈地帮助，我们的地理考察成果才得以整理出来，并将94幅地图结集出版，比例尺是4英里等于1英寸，该地图集将和“细节报告”一起出版。优秀的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Rai Ram Singh）曾参加了我的第一次探险活动。后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拉依·拉姆·辛格返回印度，他的同事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Rai Bahadur Lal Singh）代替了他的工作。和拉依·拉姆·辛格一样，拉尔·辛格经验丰富，工作勤奋，他不仅是地理测量方面的得力助手，而且能依靠他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有关考察的这几卷书所记述的内容，充分证明了他们工作的巨大价值与面对恶劣自然条件所表现出的乐观态度。



精神上的支持对探险活动同样重要。在这个方面，皇家地理学会除了借给我器械设备，还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必须为实现科学研究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皇家地理学会肯定了我两次中亚之行的成果，使我深受鼓舞，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科学家都会因学会的这种鼓舞感激不已。不论是在穿越茫茫戈壁，翻越亚洲腹地的崇山峻岭，还是回来以后整理科考成果，或是在与他人相处不太融洽时，我总能感受到学会秘书斯科特·凯尔逖博士（Dr. J. Scott Keltie）的关注和同情。通过地理学会，我和地理学助手们的测量成果才能被更多的人所利用，地理学会《会刊》（Journal）已经刊载了《地图集》微缩的三幅主要地图（《地图集》由 Indian Togonometrical，Dehra Dun 整理）。



在此，我向地理学会特致谢意。幸得地理学会的同意和出版社的合作，本书将再次刊载这些地图。

一过印度的政治边界，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任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当局对这次探险活动的重视程度和支持意愿。就这方面而言，开始我绝对没想过结果如此鼓舞人心——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赫（H.M. Habibullah）很乐意地允许我经过阿姆河上游前往帕米尔高原，并为我通过这段引人入胜的古代通道做了有效的安排，而在当时，这条通道是不对欧洲人开放的，因此这一帮助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在此，我想向这位亲切、体贴、热情的国王表示深切的感谢，是他帮我实现了我的学术夙愿，让我有机会亲临这些我年轻时就梦寐以求的地区。

穿越帕米尔高原的中国边界以后，我所考察的地区几乎全是沙漠和荒山。但是，就是在那里，我最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行政官员的积极配合对我计划的实施是何等的、绝对的重要。没有他们的得力帮助，交通工具和民工就无法得到保证，这两项对令人生畏的沙漠探险之行，即寻找沙漠中的“古代城镇”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没有这些官员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在这荒无人烟的贫瘠山区得到牲口和考察队成员所需的食物，不可能得到漫长的考察亟须的供给。从这本书中，读者会看到我是多么的幸运，绿洲的各级官员都给予我们以关注和支持，一块块绿洲成了我们探险的大本营，为探险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服务。在很多的衙门（Ya-mên），我很快找到了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学者，他们对我的考古活动和考古取得的成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有许多人需要感谢，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以下几个人：和田按办车大人（Ch'ê Da-rên，Amban of Khotan）；廖大老爷（Liao Da-lao-ye），他在罗布泊（Lop-nor）附近凄凉的流放之地为我提供帮助，后死在那里；博学的县吏汪大老爷（Wang Da-lao-ye）和敦煌的军事指挥官林大人（Lin Da-rên），他们两人竭尽全力为我沿"长城"的考察排除困难。但是最重要的，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老朋友潘大人（Pan Da-rên，以前我称他为Pan-Darin），时任阿克苏(Ak-su)道台(Dao T'ai)，他还记得上次探险和参加探险的人员，即使远在他方，他也会竭尽全力运用其职位的影响为我排除障碍。

从一开始，我的老朋友马继业先生（G. Macartney，C.I.E.，中文名字为马继业——译者）代表我与新疆行政当局进行交涉。马继业先生曾在喀什(Kashgar)担任多年印度政府的代表，现在是阿富汗驻新疆的总领事。他的名声和品德不但在政府官员中，而且在民间广受推崇，他的帮助和影响保证了我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他也时刻为我提供最有用的帮助，对他我感激不尽。马继业先生在他喀什噶尔的寓所热情地招待了我，而当我远在1000多英里之外时，他特别关照考古的成果和信件能得到顺利的寄送。我在最后才谈及这件事，绝对不是说它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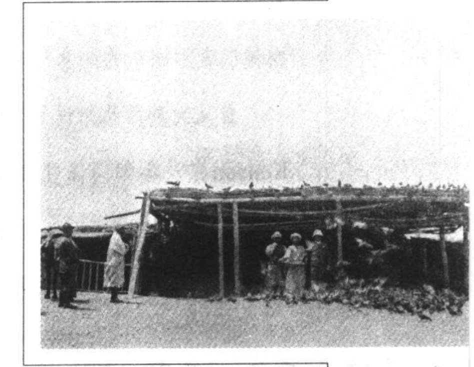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马继业先生还向我推荐了一位出色的中文秘书——蒋师爷(Chiang-ssû-yeh)，我对此尤为感激。由于我一直没能够认真地学习汉语，一位称职的中国学者对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蒋师爷不仅是位热心的老师和秘书，更是位好学的同伴。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他总是与我共同工作，同舟共济。从我的叙述中，您将会体会到他对我所取得的成绩发挥了多么重大的

M. Aurel Stein

作用。自从与这位机敏而诚挚的中国同伴分别以后，我仍然经常思念他！

上文对探险的目标、范围和性质作了简要论述，读者可能不知道回来以后，整理科考成果的任务有多么繁重。许多细节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借助新的材料，还需要多年积累的学术素养，我必须要把由亲身观察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付诸于文字，而且越快越好。从开始，我就意识到出版这本书能把早期的记录保存下来。所以说，这两卷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不仅仅是考察日记的简单出版，或者是一个旅行者的第一印象记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可以说是“详细学术报告”（Detailed Scientific Report）的补充。

因此，这本书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就我而言，我也有义务记录下方方面面对我的帮助，哪怕只是一笔带过，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探险活动就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收获。首先，我要感谢印度政府，经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同意，印度政府批准我回英格兰工作两年零三个月，执行特殊使命，以完成对发掘古物的整理工作。我希望这些古物能公之于众，更希望在四卷本的“详细报告”完成以后，国务秘书能够批准出版。如果这都能实现，我将对官方的配合和协助感激不尽。



由于我的老朋友和主要助手、拉合尔梅奥艺术学校（Mayo School of Art, Lahore）已故校长安德鲁斯先生（F.H. Andrews）再一次鼎力相助，

我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这些古代艺术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安德鲁斯先生曾经长期实地对印度艺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加上他自己非凡的艺术天赋和对东方艺术品的广泛阅历，使他成为英国在古代中亚艺术和手工艺品问题方面独一无二的专家。安德鲁斯先生为了我们共同的任务，牺牲了自己教学之余的休息时间，为此我永远都会感激他。

除了在艺术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外，安德鲁斯先生还悉心为本书绘制插图，为本书增色不少。扉页上黑白色的章头尾花饰就出自安德鲁斯先生之手，系仿制沙漠里黏土上的古代印章 Pallas Promados 所作。除感谢安德鲁斯先生的指导性工作外，我还要感谢以下几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德鲁普先生（J.P. Droop）、洛里默女士（F. Lorimer）、伊夫林·怀特先生（H.G. Evelyn-White）和伍利先生（L.C. Woolley），他们对考古成果的整理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或一起或相继担任我的助手。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自从大英博物馆保管我收集的文物那天起，馆长凯尼恩博士（Dr. F.G. Kenyon）及各部门保管员（Keeper），比如巴尼特博士（Dr. L. Barnett）、克洛文爵士（Sir Sidney Clovin）和里德先生（C. H. Read），竭尽所能，提供支持，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为了满足我研究的特别需要，助理保管员和博物馆馆员阿伦（Messrs. J. Allan）、比尼恩（R.L. Binyon）、贾尔斯（L.Giles）、霍布森（R.L. Hobson）、乔伊斯



(T.A. Joyce)、史密斯（R.A. Smith）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在这里，我也要向他们深表感谢。

许多著名学者为这本书的面世提供了帮助，他们与我一起，共同整理带回的资料。在美术和技术方面，我首先要诚挚地感谢我的老朋友、巴黎大学教授（Paris University）福彻先生（A. Foucher），他是希腊风格佛教艺术方面的权威。正是福彻先生对佛教图饰的广博学识，我才得以对其中最有意义的壁画和绘画做出正确的阐释。珀西·格兰德纳教授（Percy Grandner）不吝赐教，他以其丰富的考古知识，对我阐释古典艺术帮助颇多。维也纳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 of Vienna）的史特罗兹高夫斯基（J. Strzygowski）教授也在亚洲腹地和西方后期古典艺术之间的联系方面提供了类似的指导。在西藏艺术遗迹方面，我的朋友沃德尔上校（Colonel L.A. Waddell，C.B.，C.I.E.）以其对西藏佛教的丰富阅历，给了我有益的协助。亚瑟·丘奇爵士（Sir Arthur Church，F.D.S.）毕生研究古代绘画、壁画和浮雕，他慷慨地允许我直接参考、借鉴其科研成果。维也纳帝国学会（Imperial Academy of Vienna）冯·魏斯纳（J. von Wiesner）教授是植物生理学（plant-physiology）的权威，他为我研究古代纸张和纺织品的质地和特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我的老朋友、匈牙利地质测量局（Hungarian Geological Survey）局长罗兹（L. de Lóczy）教授，竭尽全力，为我在沙漠考察中遇到的地质方面问题答疑释惑。

文献研究的合作者当中，我首先应该感谢沙畹（Ed. Chavnnes）先生。他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早期关系方面的权威。我归来之



后，他立即投身于我所发现的中国古代文献的细节研究和出版工作，并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学术成果供我使用。本书得以出版，沙畹先生功不可没。回头看看有关古代遗迹的几乎任何一个章节，我都能体会到沙畹先生提供的资料对我阐释古代遗迹的历史具有多么重大的作用。听说沙畹先生有关这些古代中国文物的学术著作即将在我的“详细报告”之前出版，我心中甚感欣慰。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是法国中亚考古队的负责人，他已经要求我负责把从千佛洞里发现的大量古代中国文献编成目录。

鲁道夫·霍恩雷（A.F. Rudolf Hoernle，C.I.E）博士是我国中亚研究的先驱，他对印度婆罗谜（India Brahmi）文字（新疆地区的未知语言之一）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的分析对我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另外3名同样老资格的学者、教授——拉普森（E.J. Rapson）、森奈特（M.E. Senart）、博耶（Abbe Boyer），曾对我的第一次探险取得的成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提出批评性的意见，现在他们又对这次考古发现的佉卢文（Kharoshthi）古代简牍、木简文书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不仅要感谢他对古代佉卢文文书的解读，还要感谢他为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在梵文的原始资料研究方面，我的朋友巴尼特博士（L. Barnett）、伯森（L. de la Poussin）教授给了我有力的帮助。

在解读大量的吐蕃古文献方面，瑞丁女士（C.M. Ridding）、印度办公室资料收藏管理员托马斯博士（F.W. Thomas，Librarian of the India Office），先期开始西藏佛教经文的编纂目录的工作，后来，我有幸得到了资深

专家弗兰克博士（A.H. Francke）的协助。著名的东方学专家、鄂尔浑（Orkhon）铭文破译者汤姆森教授（V. Thomsen）核查和释读了我早期发现的突厥如尼（Runic Turki）文文书。柏林皇家人种学博物馆（Royal Ethnographic Museum, Berlin）的勒柯克（A. von Lecoq）博士，曾在吐鲁番（Turfan）进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要感谢他在研究古代突厥语摩尼教（Manichaean）写卷方面的帮助；我也要感谢印度政府助理秘书（Assistant Secretary）丹尼森·罗斯博士（E. Denison Ross），他对回鹘语佛教（Uigur Buddhist）文书进行了初步研究。柏林的皇家人种学博物馆馆长米勒教授（F.W.K. Muller）是释读粟特（Sogdian）文书之第一人，他对粟特文书进行了分析。这种伊朗语更早时期的遗迹中的某些无法破解的文书与阿拉姆语（Aramaic）相似，在这方面，我的朋友考利博士（A. Cowley）和果肖特（R. Gauthiot）先生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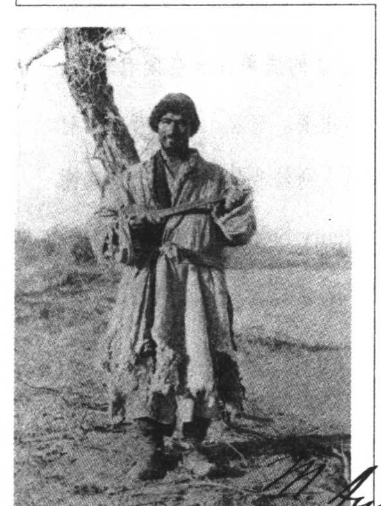
以上，我不惜花费较长的篇幅，来感谢各界朋友为我在学术方面所做的各种帮助。就出版这本书的目的而言，是要把考察的成果展现在读者眼前，确定其科学意义，不过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更为重要。有鉴于此，书中附有大量的插图，在此我特别感谢出版社在书的编排上所给我的自由。尤其感谢班伯里的梅瑟斯亨利·斯通父子公司（Messrs Henry Stone and Son of Bambury），他们以高超的技艺和热心，成功地把古代艺术品复制成彩色插图，并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这套书的方方面



面的朋友们。学会（Academy）已故的编辑科顿先生（J.S. Cotton）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帮我对本书进行了修改。他也应出版社之约，愉快地为本书编写了索引，作为东方学术语汇编，我相信索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tron College，Oxford）研究员艾伦先生（P.S. Allen），从繁忙的学术研究中抽出时间，在我的朋友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约翰森（J. de Johnson）先生的协助之下，对该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校订。艾伦先生寄给我的信笺，在旅途中一直伴我左右，成了我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动力之一。牛津大学气氛活跃，大家相处融洽，我有幸在这里完成这套书，这应归功于默顿学院的院长和诸位同行的热情支持和关怀。正是因为他们，我才有了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我会永远记住和感激他们。

无论是在爱色斯（Isis）的仓库，还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抑或在充满温情的伦敦，我都在怀念去过的沙漠和高山，我在那里度过最快乐的时光。若能忘却漫漫旅程的所有艰辛，只去感受我年轻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古代原野所给我的探险自由，那将是多么开心的事啊！不过，那终归是个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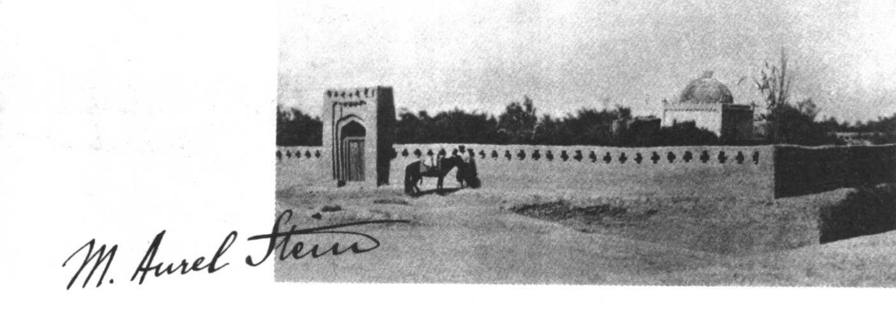


奥里尔·斯坦因

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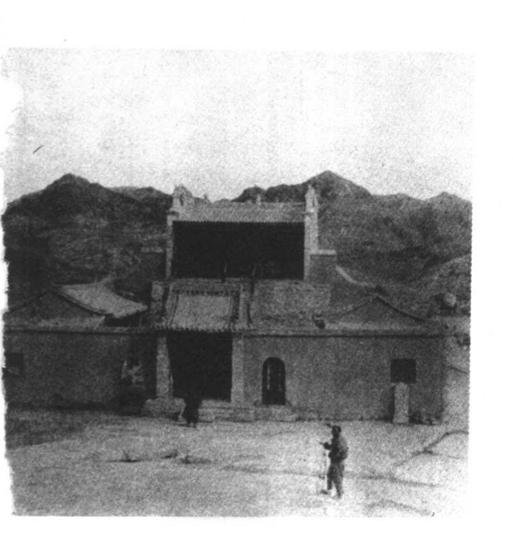
1911年11月3日

M. Aurel Stein



目 录

卷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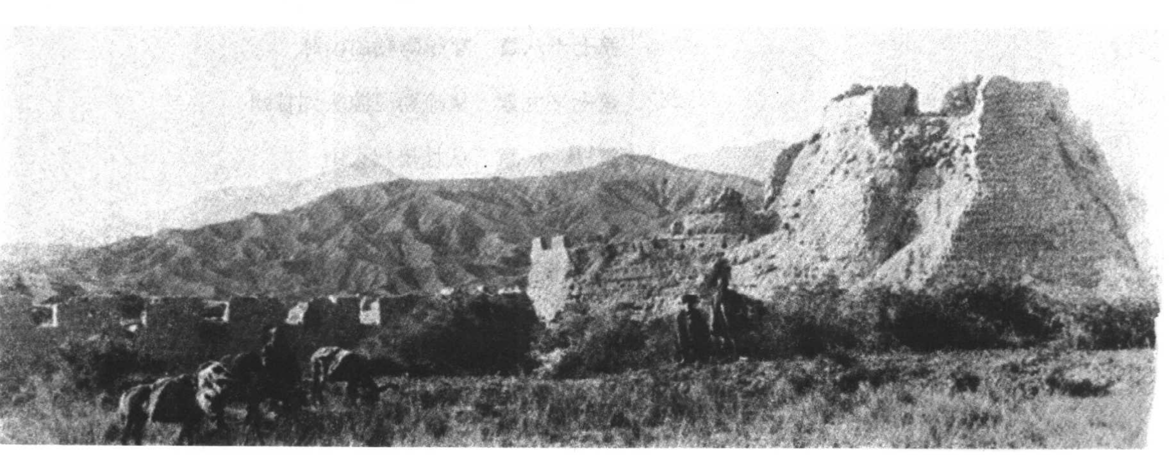
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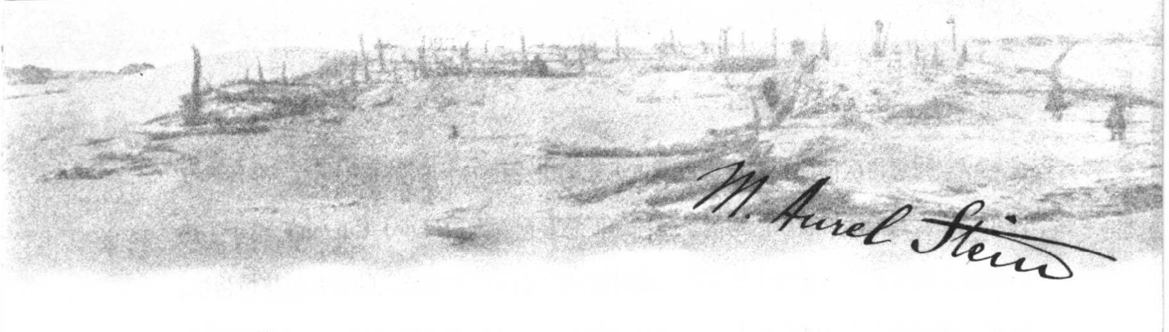




卷四







第一章

从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s）到印度河（Indus）

1901年，我完成了第一次在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归国。从那时起，每当愉快地回忆起那次在沙漠和山区进行的探险活动，我就希望再次前往进行新的探险活动。非常幸运，通过发掘，是我首次发现了这里古代文明的原始遗迹。这种文明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融合的产物，并受到了希腊古典文明的影响，曾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中盛极一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探险，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手段，取得的成果将也同样丰硕。然而，正因为第一次探险活动取得的成果极为丰富，这也就阻碍了我急切想得到的第二次探险机会。若要使科学研究更进一步，确保这种研究有利于在新的领域做出开拓性的工作、完成极其艰难的任务，新的探险活动势在必行。仅仅记录和详细举例说明大量而又富于变化的发现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新的发现都居于遥远的穷乡僻壤，所以，我必须对其中的历史和地理因素加以阐释。

由于公务繁忙，我必须抽时间来参与这种工作，要实现上述任务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直到1904年，我出任西北边省（the North-West Frontier）总督学（Inspector-General of Education），我才得以向印度政府递交了有关再次探险的详

细建议。我想再次前往我曾进行过考古工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准备继续向东，深入到中国长城以内地区。时任印度总督柯森勋爵(Lord Curzon）给予了热心关注，很多意识到建议中的探险活动对探索印度历史古迹意义的朋友也热情帮忙；所以，我的建议在1905年春天便获得了印度政府和国务大臣的同意。大英博物馆董事会答应为这次探险活动提供5000英镑的资金，占预算的2/5。作为交换，大英博物馆要索取相应的“考古受益”（官方语言如是说）。虽然如此，这些资金还是对探险活动有所裨益。

起初，我竭尽全力，想使这次探险能在1905年夏成行。但是，我一时忙于完成关于上次探险活动的《报告》，难于抽出时间，我的愿望未能实现。最后，直到1905年10月1日，我才得以从公务中脱身。那天，我从在喀罕（Kaghan，位于边区省最北端）阿尔卑斯式的帐篷里走出来，出发前往克什米尔，浑身有一种几乎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这6个月的“特殊使命”使我能在无外界打扰的情况下，完成了我的《报告》，并为即将进行的探险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

这次行程就像是个假日，又好像是适应性训练。路途大多是山路，很可能从没有较重的交通工具经过，我又携带有大量的书籍，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才终于翻过了从吉申格尔（Kishanganga）到克什米尔路上的一个个山口。又回到了久违了5年之久的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美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这个地方的文物古迹深深吸引了我，我曾在此度过许多个春秋，进行考古活动，但那些愉快的夏日转瞬即逝。

我居住在斯利那加（Srinagar）附近达尔（Dal）湖上的一个小屋里。从早到晚，我都要忙于文案工作；对我而言，这比任何艰苦的长途跋涉和发掘工作都要劳累。如果不是傍晚独自出去散步，恐怕我都没有觉察到克什米尔色彩绚丽的秋季已经过去，阴霾连天、风雪晦暗的冬天已经来临了。这段时间，我终日劳累，压力很大，因为我必须考虑各种实际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最担心是否能趁春天北面的

M. Aurel Stein

山口还可以通过的这段时间，向新疆进发。6个月不懈怠的努力最终还是取得了结果。时近3月末，太阳终于适时地露出了笑脸，照耀在这片具有阿尔卑斯山风光一样的大地，它在印度人的神话故事里是喜马拉雅最喜欢的女儿，我的《古代和阗》也将近完稿。多亏了远方朋友无私的帮助，两大卷四开本书稿的绝大部分得以安全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

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忽视对即将开始的、漫长而又困难重重的探险活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书信往来，有关雇用两名当地人作为助手的所有细节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印度测量局和国防部调拨给我两个人，任由我调遣。我及时地从伦敦、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订购了所需的物品、科学仪器及其他设备。在斯利那加，忠实的克什米尔雇员甘心情愿地做着工作，忙于准备毛皮、毛毡靴和其他个人用品，这些物资将用来抵御中亚山区和沙漠的恶劣天气。卡温堡尔·埃尔金工厂（Cawnpore Elgin Mills）曾为我1900年的第一次探险提供了一个喀布尔（Kabul）帐篷。从那时起，它实际上成了我的家，现在他们帮我把这顶小帐篷修葺一新，还能够再用3年。

我非常想开辟一条进入中国新疆的新路线。早期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曾对这样一条路线怀有浓厚的兴趣，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不对欧洲人开放的，他们的愿望也因此未能实现。这条路线始于白沙瓦（Peshawar）附近的印度行政边界，经过斯瓦特（Swat）的帕坦人（Pathan）部落，然后横穿过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到达最高的阿姆山谷和阿富汗所属的帕米尔地区。我逝去的故友哈罗德·狄恩爵士（Sir Harold A. Deane, K.C.S.I.——卓越的边区旅行家）时任西北边省的首席执行官（the Chief Commissioner），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计划。一直以来，他对我关照有加，从未拒绝过为我提供帮助。我原以为政治问题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可它很容易地得到解决，比我希望的还要好。通过印度外事局（the Indian Foreign Office）从中做工作，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H.M. Habibullah）爽

快地允许我可以穿越其领土。自从帕米尔边界委员会（the Pamir Boundary Commission）建立以来，至今还没有欧洲人到过这个地区。所以，我一直对哈比布拉国王深怀感激。

在到达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的阿富汗国土以前，我们应该首先去吉德拉尔（Chitral）。那时，由迪尔（Dir）到吉德拉尔的洛瓦里山口（Lowarai Pass）积雪很深，我们又要携带着行李，能否安全穿过这恶劣的山口还是个未知数，我对此忧心忡忡。如果不能及时穿过，则极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因为若是不能在5月末抵达吉德拉尔河上游，春天的积雪就会融化，交通工具将无法通过，我们就要冒着极大危险，寻找马斯图吉（Mastuj）上最高的狭窄山谷，这个山谷通往巴罗吉尔（Baroghil）上的阿姆河分水岭。几个月以来，官方有关此事的信函越来越多，最终积了一堆，这些信函还都是用最薄的纸发来的电报！马上就要4月份了，我仍不能确保在早些时间穿越洛瓦里山口，所以，我觉得现在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排除障碍，争取早日动身，离开克什米尔去西北边省。

1906年4月2日，夏季伊始，天气格外晴朗，我们早早便从斯利那加出发。一路上，树木和田野仍是一片凄凉，到达了阿富汗的天然屏障——伯勒穆拉（Baramula）。我想看到花期的第一簇蝴蝶花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坐的双轮马车哗啦哗啦响个不停，杰拉木（Jhelam）的狭窄的峡谷里树木众多，不少桥梁坍塌，还有其他各类障碍，这些都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因而，我几乎无法辨认出希达斯皮斯那里才有的春天景色，只是在路边偶然发现了一点春意，便匆匆忙忙过去了。

克什米尔阴晦的冬天已经过去，旁遮普平原上一派温暖的气息，好像在欢迎我的到来。最初几天，我住在拉合尔（Lahore），我曾在此地任职11年之久。在去荒山野岭进行漫长的探险之前，我希望能与老朋友说声再见，再检查一下让人心烦的牙痛。在时任旁遮普（Punjab）政府秘书长（Chief Secretary）、我的朋友马克拉甘

M. Aurel Stein

(E.D. Maclagan) 先生热情招待下，我安静地休息了几天，恐怕这种放松在以后很长时间里不会再有。愉快的时光过得太快，但我还是抽出时间拜访了思念已久的朋友，看了看周围的风景。我参观了拉合尔平原的老花园，过去很多年，在紧张工作之余，我最喜欢来此忙里偷闲。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善良的房东，我本应该向他们辞行，是他们给我在印度的这段时光带来了不少快乐。

4月10日，我从白沙瓦启程，有很多事情使我不得不思前想后。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当我计划开始从白沙瓦边界启程时，新任总督明顿勋爵（Lord Minto）要来第一次访问西北边省的首府，总督对我的探险活动的支持对我很重要。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R.）当时任总督阁下的私人秘书，那时他还不是爵士，而是邓洛普·史密斯上校（Dunlop-Smith，K.C.I.E.，C.S.I.）。他是我的老朋友，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这次，他保证让我见到总督。我的心情十分高兴，重访了我原来在西北边省的总部。白沙瓦气候凉爽宜人，春意浓浓，玫瑰花和蝴蝶花正在绽放。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新。横卧在边境上的半圆状山脉轮廓分明，童山濯濯，其主脉塔尔塔拉（Tartara）山高耸入云，山峰耸立，令人心驰神往，山下的白沙瓦河谷广阔无垠。由于总督来访，全省各地的官员齐聚白沙瓦，故旧相见，甚是高兴。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过这次不再是处理论文和文件，而是忙于把我收藏的大量图书装入铁皮镶边的箱子，以防止书在长途旅行期间被白蚁咬坏或遭遇其他危险。

4月12日，边省“政府”要员在白沙瓦火车站集合，迎接总督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明顿勋爵。路易斯·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K.C.S.I.）时任印度外务秘书（Indian Foreign Secretary）兼旁遮普代理州长，他愉快地接见了我，从他那里得到这么一个令人兴奋的印象——国王H.M.埃米尔在他的政府训令中传达了他将要允许我通过上瓦罕(Upper Wakhan)的信息。这件事情在印度外交界让人羡慕不已。

两天以后，我荣幸地受到了总督的接见。我向他汇报了上次中亚之行取得的成

果，以及如何克服了来自官方的阻力，还告诉他这次探险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刚谈了不长时间，我便相信，这位印度总督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将会给我们以支持和同情。听我谈了这次探险考察计划，他表示了赞赏之意，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在以后漫长而又孤寂的探险活动中，我时常担心是否能有时间整理科考成果、是否还有机会和时间再次进行探险，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总督先生，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贵族绅士！

哈罗德·狄恩爵士（Sir Harold Deane）陪总督住在市政厅，有许多有关边省的重要事务需要处理。可是他还是抽出时间，在我临行的那天早上，和我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能够有机会向他——我最真诚的朋友和赞助人——当面表示谢意，我至今依然觉得十分高兴。哈罗德爵士是位行伍出身的行政官员，他对西北边省境内的所有历史遗迹了如指掌。他一直支持和保护我，给我一切在境内外考古的机会。我现在要离开他了，不仅在探险过程中、甚至回来以后也难以再见到他，我心情倍感沉重。他生就具有贵族气质，身强力壮，意志坚强，连很多生活在部落里的人也叹为观止。我因此相信，虽然他要为维护边省的一方平安而不辞劳苦，两年以后，他依然会威风不减。

我把大本营扎在了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赫泽拉行政区（Hazara District）漂亮的总部就坐落在此地。这里地势相当高，天气凉爽。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忙着做最后的准备工作。4月17日上午，我们到达了阿伯塔巴德，一排装有设备的骡子皮皮箱已从克什米尔安全运到，我对此感到满意。从英国和印度各邦订购的货物和探险用具也已运到，被放置在新建的舒适的巡视营房（Circuit House）里。然而，我们何时才能带着这些东西向北出发呢？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要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西北边省启程，但是，当还在白沙瓦的时候，我就为能否适时地得到地方上的帮助而焦虑不安；而若没有这些帮助，我们就难以穿越冰雪覆盖的洛瓦里山口。

负责斯瓦特–吉德拉尔路线的政务官 (Political Agent) 不断发来报告，说今年降雪量异常之大，很可能发生雪崩，而我们的行李又多，需要大量的搬运工，此时穿越山口则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我告诉大家，我有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经验，我会采取一切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可这无济于事。于是，我把最后一招使了出来——把困难告知了邓洛普·史密斯上校。他给山口守备军写了一封措辞恰当的短信。不知是因为这封来自总督方面人士的友好短信，还仅仅是幸运的巧合，我刚在阿伯塔巴德待了12个小时，便收到了一封长电报，通知我们吉德拉尔那边有了好消息。他们不仅奇迹般地清除了洛瓦里山口上难以逾越的积雪，还解决了更麻烦的责任问题。

这时候，我抓紧机会放松绷得过紧的神经，因为在阿伯塔巴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检查所有的仪器、设备和物品，并将之安全地分装在骡子皮皮箱内，使其重量适合于难走的路；列出准确清单；书写各类报告——这是任何驻印度官员都不能逃避的工作，哪怕是在中亚沙漠工作也是如此。虽然有了几名印度助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先前的压力有所减轻。第一个到来的是可敬的奈克·拉姆·辛格 (Naik Ram Singh)，仪表堂堂的孟加拉皇家工兵大队第一队锡克人下士(K.G.O. First Bengal Sappers and Miners)。我的朋友迪基上校(J.E. Dickie，R.E.)是皇家工程局驻西北边省的指挥（Commanding Royal Engineers on the N.W. Frontier)，通过他的努力，国防部允许奈克·拉姆·辛格志愿参加这次探险活动。去年夏天，他参观了我在喀罕 (Kaghan) 的营地。他身强力壮，性情乐观，还有祖上传下来的木工技能，所有迹象都好像表明他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能工巧匠，这恰是我所需要的。我认真地向他解释清楚他所要从事的工作，以及他可以得到的丰厚报酬，我所要支付的数目是他在印度境外地区野外工作所得的工资和津贴的5倍之多，我还告诉他此次探险的重重困难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听后，他仍然很兴奋，坚持参加这次探险活动。随后，他所属的精锐兵团对他进行了特殊培训，成效不错。这样，

他又可以帮我冲洗照片、绘制图表以及类似的技术性工作。

一两天后，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Rai Sahib Ram Singh）也加入了进来。他是本地一位技巧娴熟的测量员，曾和我一起完成了上次探险。印度勘探局现在归由朗格上校(F.B. Longe）领导，勘探局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地理考察工作，欣然同意把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调拨给我，并支付他的薪金。自从1901年我们分别以后，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有幸参加了罗林中校（Rawling）和赖德少校（Ryder）率领的西藏探险。这次探险获得了成功，他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高原测量经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忠诚老实的贾斯旺·辛格（Jasvant Singh），这个精瘦矮小的拉杰普特人（Rajput）在我的第一次新疆之行中就是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的厨师。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印度仆人，他人品老实可靠，举止文雅，乐观地面对各种艰难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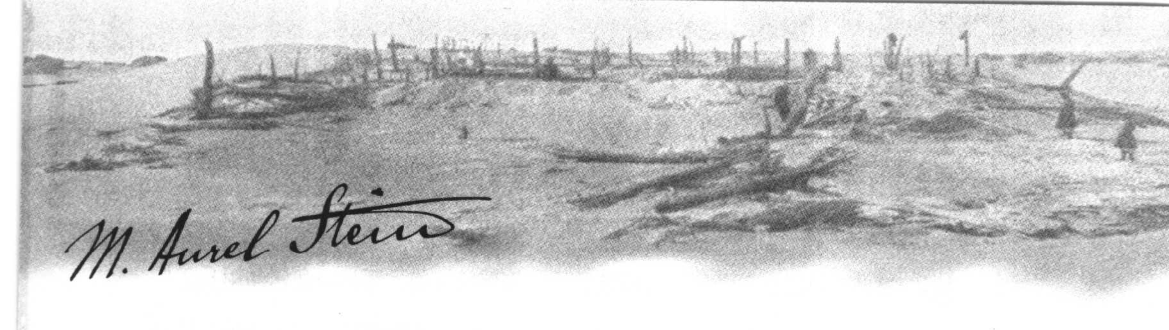
贾斯旺·辛格是米安拉杰普特人（Mian Rajput），拥有最高贵的血统，等级地位甚高，所以他不能给我提供服务，我打开始就为此遗憾不已。没费多大力气，我在白沙瓦雇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厨子；但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他不仅烹艺不精，而且还偷偷地喝酒、抽鸦片，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无法承受漫长旅程的艰苦。我曾让一个友好的传教士帮我物色一个经验丰富又能忍受艰苦旅行的厨子，传教士在秋天从列城（Leh）派来了一位，这就是年轻的艾则孜（Aziz，拉达克人）。这位所谓的厨师对欧洲烹调技术一无所知。随后，根据我的要求对他进行了专业培训，他虽然谦虚好学，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学不会。他在上一个雇主那里被训练过如何照看骡马，所以他愿意照料骡马。和他的大多数夏尔贡（Shalgun）同胞一样，他也是克什米尔人和藏族人的混血儿，勇敢，机智。所以，我还是把他给带上了，心里却希望他只作为“候补厨子”，不会常常派上用场。参加这次探险的人不多，除上面提到过的人以外，还有忠厚的来自新疆莎车的穆哈默德朱（Muhanmudaju），他负

责料理篷车。为了能参加这次探险，他勇敢地穿过山口，时至3月末，路上遇上了雪崩，和他同来的6个人被埋在了布尔孜勒（Burzil），他死里逃生。

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从测量局带来了一些测量仪器，还从拉瓦尔品第兵工厂（Rawalpindi Arsenal）带来了几支卡宾枪、左轮连发手枪和弹药，以防意外。器材都是孟加拉皇家工兵第一大队（the First Sappers and Miners at Roorkee）精心制作的，但其所占的空间仍然很大，这包括给奈克·拉姆·辛格制作的各种工具、羊皮特制的救生艇（在沙漠里可用作水袋）。该拿的拿，该扔的扔，我最终把全部行李压缩到15骡子皮皮箱，比第一次探险的行李少。其中3箱到秋天才能派得上用场，它们由喀拉库拉木(Kara-koram）到和田的贸易路线来运。经过两年半的周密计划，带齐了各种应带之物，带好了近2000张易碎的玻璃感光片，我心里甚是高兴。

幸运的是，阿伯塔巴德不仅是我们的运输和给养基地，而且我们又在此遇见了许多朋友。山坡上春意盎然，车站漂亮的花园里万千朵白色和蓝色的蝴蝶花正在绽放，有些花是“满园春色关不住”，把脑袋探出了花园外。英国建筑风格的平房上种满了玫瑰，其中有西北边省引以为荣的大花瓣的马尔丹玫瑰（Mardan rose）。军营规模不大，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树上花团锦簇，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禁不住想起了英国，想起了亲爱的汉普郡（Hampshire）。

人际环境也同样令人高兴。一天的劳累之后，我晚上在喀罕的山上营地招待朋友，大家玩得痛快欢畅。令我们大家振奋的是，和善的神父康普柏尔（G.A. Campbell）陪我在这里，他以前居住在巡视营房。他热切地询问我能否带他去新疆，而在此之前我们几乎还没在一起吃过饭。我想，即使他能以布道这种古老虔诚的方式满足我的精神需求，可是沙漠对他这样一个牛津培养出的喜好交际的牧师可能就太寂寞了。在进入荒蛮世界以前的最后几天，虽然很忙，可过得挺快活。我庆幸这一切也行将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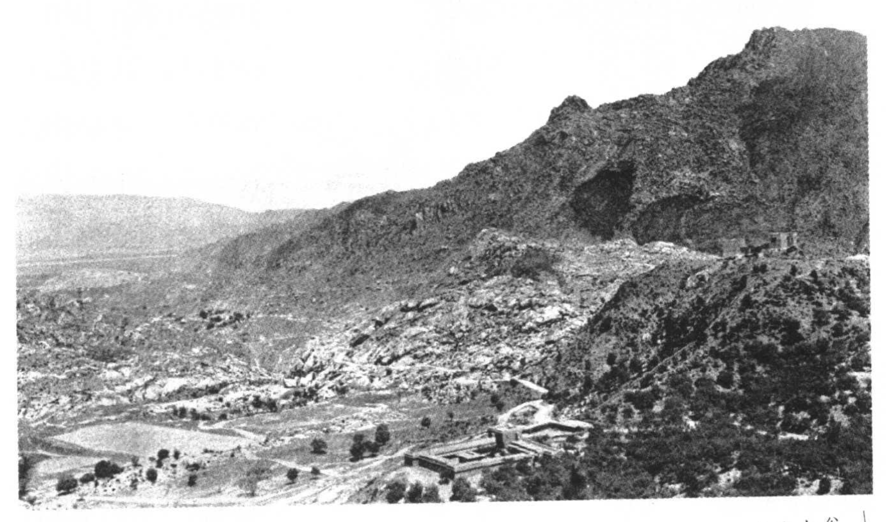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横越斯瓦特和迪尔

1906年4月24日，两个拉姆·辛格负责所有的大宗行李，先行一步，向查克达拉堡垒（Fort Chakdara）进发，我们将在那里真正开始这次探险。两天后，也就是26日晚，拜别了送行的朋友后，我乘轻便双轮马车离开阿伯塔巴德。在我们还没完全走出丘陵地带之前，突然天降暴雨，我的衣服和轻便行李全给浇透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比较顺利地穿过发水的哈罗河（Haro River），准时在哈桑—阿卜杜勒（Hassan Abdal）赶上了午夜的火车。我让火车晚点开，希望我的白沙瓦厨子也能坐上这班车，可他最后还是没有赶上。他比我早4个小时出发，但途中遇上了滂沱大雨（这当然可算作充分的理由）。于是，我不得不把帕特汉老人留下，等候迟到的厨子，也许这厨子不太愿意参加这次探险。我还命那个帕特汉老人把他安全送到查克达拉，越快越好。

我们穿过印度河，到了阿托克（Attock），离天亮还很早。火车在宽阔古老的犍陀罗（Gandhara）土地上缓慢行驶。清早，我们望见了荒凉的山峦，山朝向斯瓦特和布内尔（Buner）。太阳渐渐升起，东边高耸的马哈班（Mahaban）山脉离我们越来越远，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奥诺斯堡垒（Alexander's Aornos）就在此山中。我在



①从马拉根德堡垒北眺斯瓦特山谷，左边山下开阔地为克热特尔营地

1904年曾登临此山考察这个传说，是登上这座山的第一个欧洲人，因此我熟悉眼前的景象，还像当初那样壮观。夜间下了场雨，灰尘都落到了广袤肥沃的山谷中，参差交错山脉的轮廓更加明晰，阻挡住了域外的来客。

火车在达尔盖（Dargai）小站停了下来，火车轨道恰好就铺设到达尔盖设防的外垒以内。我坐上双轮马车，迅速登上马拉根德山口（Malakand Pass），山顶有年久失修的炮台和城墙。戈弗雷少校(S.H. Godfrey，C.I.S.）在政务专员的平房官邸(Political Agent's Bungalow）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最后一次部落大起义的前后，我曾来此拜访过狄恩上校，这里至今珍藏有狄恩上校当时的遗留物品。戈弗雷少校很友善，已经预先为我们安排好了运输工具和护送人员，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便有充裕的时间去欣赏绝妙的景色。从陡峭赤裸的山坡，到马拉根德北部岩

石交错的隘道，再到肥沃的斯瓦特山谷内外，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天空晴朗，我又望见了那曾被鲜血浸透的峡谷和山坡，这里巨石林立。1897 年夏天是帕特汉人生命攸关的季节，那年夏天，帕特汉部落夜夜发动猛烈的进攻。环形堡垒内的守军临危不惧，英雄般地坚守了下来。然而，这座军营很久以前便被遗弃了，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个“死亡陷阱”。山顶上有很多岩石，可爱的中世纪风格的教堂如今还在，仍能见到当年的枪眼，后来重新修复了防御设施，以抵挡部族的进攻。也正是这些设施的存在，即使斯瓦特和广阔的山区发生同样的骚乱事件，过去那样剧烈的猛攻已不可能重演。

戈弗雷夫人把可爱的孩子也带到了马拉根德，这颇引人注目。孩子的到来使“文明”在这里迅速扎根发芽，这些孩子才是取得西北边省真正的“先锋”。戈弗雷这些官员家的孩子在阳台上自由的玩耍，我听说，现在马拉根德的普通孩子都可以举行派对，而在 1897 年以前，妇女和孩子是不能在正式场合出现的，其他的清规戒律也业已弱化。戈弗雷夫妇费了好大工夫，在政务专员的平房官邸附近的山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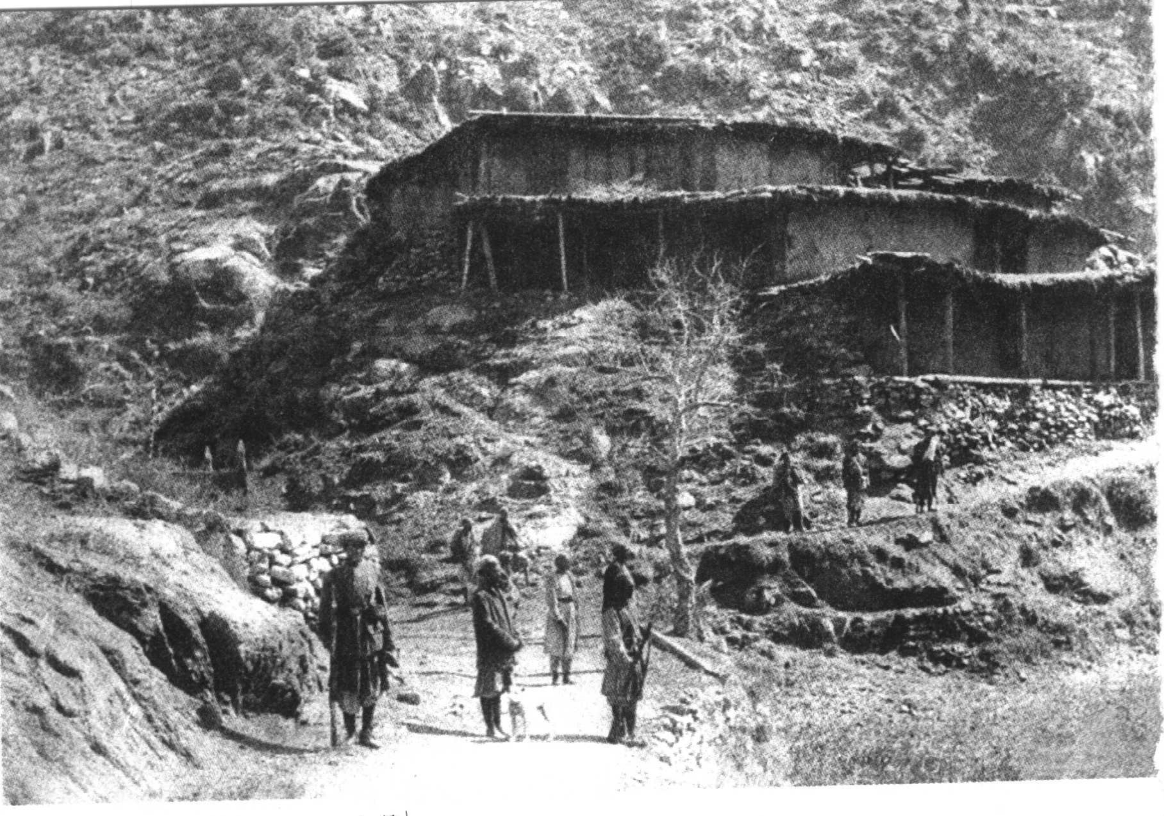
②斯瓦特山谷查克德拉堡垒



从石缝中开凿出几处小花坛，好看的玫瑰和甜甜的豌豆正在成长。戈弗雷夫妇用可口的草莓招待我，这可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马拉根德花园长出来的！

我最后一次咨询了穿越洛瓦里山口的有关事以后，拜别了好客的戈弗雷少校，离开马拉根德。这里距查克德拉（Chakdara）9英里，我们走的是极好的军用路，路面宽阔坚固，1个小时就走完了全程。我所能看见的净是1895—1897年在哈尔（Khar）、巴特合勒（Batkhela）、阿曼德拉（Amandara）那场鏖战的遗迹与夏合阔特（Shahkot）、查尔阔特里（Charkotli）侧面漂亮的山谷，以前我曾来过这里探索古迹。查克德拉（Chakdara）城堡建在坚固的石头上，斯瓦特河绕城流过，易守难攻。在那场围攻之后不久，我曾经来到这个城堡考察，城堡现在和过去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年，阿夫里迪人（Afridis）和锡克人英勇地保卫了这个城堡，而如今，换成了来自奥德（Oudh）强壮的拉杰普特人（Rajputs）。尽管才得到消息不久，又要挤出本已十分紧张的房子，他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白沙瓦师的指挥官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将军爵士也刚刚到达此地，视察工作。我们非常愉快地在集体宿舍里度过了一晚，这间宿舍虽然设备简陋，但却挂满了从北京掠取的艺术品，煞是华丽漂亮。如果说谁有权利炫耀这些艺术品，那肯定是勇敢的拉杰普特人，因为是他们先去解救了公使馆。我正是要去中国，这些艺术品好似遥远的中国送来的请柬。而且，能有机会在前哨阵地见到远道而来的将军，我打心眼里高兴。他是个杰出的将领，多次关照过我的探险活动。他还是《兴都库什地名词典》（Hindukush Gazetteer）的原作者，这是一本优秀的指南手册，涵盖了从阿姆河到印度河所有的山脉。这本书属机密类书籍，藏在印度情报局（Indian Intelligence Department）。巴罗将军的这本著作对我很有用处，在此深表谢意。

4月28日，天一亮，我就开始忙着写信，接着监督整理行李，并装入12个骡子皮皮箱里。到上午11点，征粮队（Levy escort）终于把那个浑蛋厨师从达尔盖送



③迪尔之上的希卡来伊村，路边为迪尔哨所

到了。这家伙不仅活着，而且还挺滋润，不过看上去却很沮丧。半个小时后，探险队列队整齐，走出城堡大门。一会儿，我翻身上马，紧随其后。听着大家的良好祝愿，我心里振作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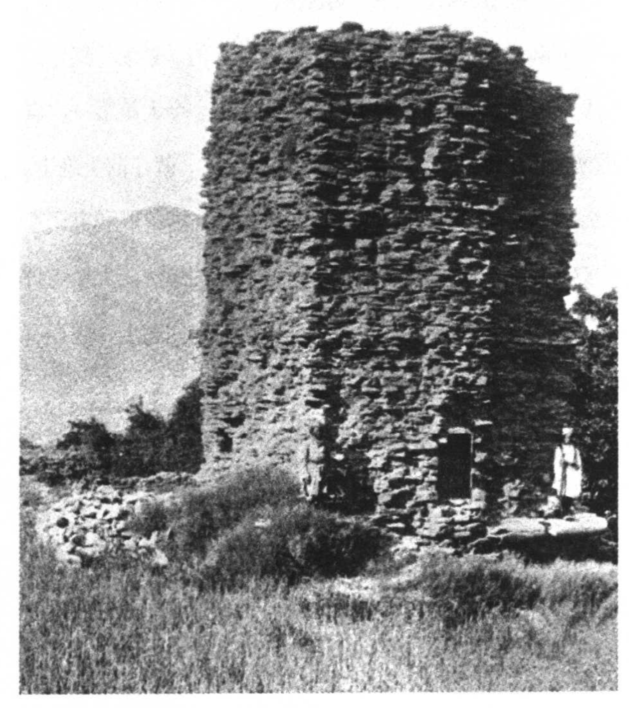
在这次探险中，我不仅要到达遥远的地区，而且要探索遥远的年代。所以，第一阶段路程应是古迹丰富的地区，这样才能达到上述的两个目的。我在开阔肥沃乌齐（Uch）骑马北行，如同斯瓦特河河边众多的乌迪亚纳（Udyana，即乌仗那——译者）一样，我想在这片低谷中也会有很多废弃的佛教遗迹和寺院，可是我没时间再次参观这里。

走了不久，公路向西拐，走向喀特戛拉山口（Katgala Pass）方向，斯瓦特河与

本杰阔拉（Panjkora）河也在喀特戛拉山口分开。这时，我又欣喜地看见了左边山坡上风景如画的古塔和房屋的遗迹，山坡上长满了灌木丛。在午后烈日的映射下，当地人把它们称作帕斯图（Pashtu）。这名字是根据砂岩的颜色起的，意为“红色的房子”。可以肯定，这些乌迪亚纳佛教遗迹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今天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热的天气，阳光耀眼炫目。我急着向前走，景色更加迷人。就在前天晚上，我还和巴罗将军讨论过亚历山大大帝由库纳尔（Kunar）山谷进入犍陀罗和奥诺斯（Aornos），他一定走的也是这条路线，我现在又忆起了这个有趣的想法。大量地理学方面的事实了证明我这一想法的正确。然而，在寻找奥诺斯这个问题上，现存有关马其顿远征印度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亚历山大走了这条路线。

翻越喀特戛拉山口，穿过广阔的塔拉什（Talash）山谷，又踏上本杰阔拉陡峭的山路，一路上风光秀美，这减轻了恶劣自然条件带给我们的疑惧不安。西边巴焦尔（Bajaur）和帕夏特（Pashat）上冰雪覆盖的山峦远远地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在山脉和塔拉什的绿色田野之间，有一块风景如画的低矮丘陵，地面平整。过去，巴焦尔常常派出玩命的土匪在这里发动突然袭击，这确实是迪尔—吉德拉尔路线的一个危险地段，现在依然如此。迪尔人士兵（Dir Levies）沿路建了大量的哨所，这表明零星的攻击事件仍时常发生。今天下午，当地的亚马达尔（Jamadar，当地土语，意为军队头领——译者）陪我们骑马前行，路上不断遇见巡逻队和哨兵，这可能是杰格德拉的亚马达尔为我们主动采取的特别保护措施。

这些士兵机警灵敏，证明在过去8年里，这个颇有用处的本地军事组织取得了进步。当初组建军队的部分原因是为占领这个地区的巴德马夏人（Bad-mashes），不再让他们性如烈火的年轻人为所欲为。他们参加了1895—1897年在马拉根德和杰格德拉周围的战争，不过，却是站在敌人一边。军队的组成几乎和原来一样，他们现在配上了马帝尼枪（Martinis），这说明我们英国更加信任他们。陪我去吉德拉



④塔拉什山谷古穆巴特印度教寺庙遗址

尔边界，迪尔本地政务官（the Native Assistant）曾骄傲地对我说，从大约两年前配备新武器以来，就连一支步枪也从未失窃。这些士兵看上去还像生活在部落里，可我在表面上仍装作高兴。他们身穿红色和黄褐色的普格里（Pugrees，一种当地服装——译者），白衬衫随风飘动，显然是为了迎接我们特地漂洗过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军服了。

从杰格德拉出发，人们通常在沙拉依（Sarai）做第一次停顿，休息1天。考虑到我们从杰格德拉出发的较晚，还鉴于其他原因，我们加速向洛瓦里出发。我们到达沙拉依的哨所，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但我仍利用余下的时间进行第一次考古考



⑤小帕米尔博扎伊拱拜孜附近的喀尔万巴拉斯寺庙遗址

察。古木巴特（Gumbat）村距沙拉依西南大约2英里，1897年，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印度教寺庙。虽经岁月的洗礼，仍可看出它在设计和建筑风格上和我在本杰特（Punjat）发现的寺庙非常相似。没有时间进行彻底地考察，上帝也想让我早点收工。所幸的是，奈克·拉姆·辛格骑马和我一同前来，能给我做帮手。

我们的马沿着阶梯状的山坡向上走，路旁是欢快的小溪，小溪把这里的肥料送到了加拉尔·巴巴布哈里圣墓（Jalal Baba Bukhari's Ziarat）的果园。这时，我不禁想起了正统的伊斯兰教圣徒在这里受到了如何的崇拜，不过这是遭受毁坏的印度教寺庙吸引了伊斯兰教虔诚的教徒后兴起的。核桃树、葡萄树、悬铃木枝繁叶茂，树丛里是零零散散的房子。快要走进美丽的村庄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犍陀罗建筑的大量城墙，高达15英尺。一些好像是古代民居的一部分，但大多数是用来维护可耕梯田的。现在定居在这儿的帕特汉人已经没有能力再建造这样结构的城墙，但他们却坐享梯田的成果。他们拆了古代的民居，用拆得的石块垒小屋、建城墙。

村民把寺庙称作“古木巴特”（Gumbat），意即圆顶寺，这座寺院已遭到了严重破坏。到1897年为止，砌在墙壁上的砂岩已被人拆掉，村民现在把砂岩拆卸得一干二净。墙上写有奇怪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一种方式吧。所幸的是，内殿内部上方的圆顶，高约27英尺，又大又重，圆顶寺建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与圆顶的重压不无关系。三叶形拱门的设计方式和遗留下的外部装饰表明它与克什米尔公元7~9世纪的寺庙遗迹的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基本上是古典风格，其中克什米尔废弃的寺庙是最好的例证。

在奈克·拉姆·辛格的得力帮助之下，测量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日落前完成了地面绘图和海拔测量。尽管如此，我们只得匆忙穿过果园和稻田，直奔公路，护卫队正在那里等候。我们运气真的不错，前面的路很平坦，很容易地走完了这段路程。月亮刚刚升起，趁着月光，我们沿着通向喀木拉尼（Kamrani）山口的弯曲马道小

心前进。越过山口，我们就可以到达本杰阔拉山谷，目的地沙铎（Saddo）就在山谷附近。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时常有拦路的劫匪出没，我们在这里碰见了一队从沙铎军营来的强壮士兵，他们是军队头领亚马达尔预先安排来接我们的。到晚上9点30分，我们安全抵达了一个用泥土垛成的小据点，行李晚些时候也运到。

接下来两天，我们快速前进，越过本杰阔拉山谷，到了迪尔可汗（the Khan of Dir）的首府。可汗的权威在塔拉什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质疑，他和班杰奈尔（Bajaner）的关系较为密切，现在他在沙铎很好地建立了政权。所以，这里没有塔楼，路上也没有了维护斯瓦特——吉德拉尔道路畅通的巡逻兵。然而，沿途经过哨所，士兵们告诉我们这些欧洲人要特别小心自身的安全。门外的士兵好像并无大碍，但站在窗外的卫兵却很可能非但保护不了我们，没准晚上还会招来持枪的盗贼。一出防护墙，两个士兵就紧跟着我，形影不离，这样我做起事来很不方便。这些哨所是夜间驻军或中途短暂休息之用，反映了这个地区的政治进程所达到的阶段，不过这种反映的方式却让人好生奇怪。为了抵御来自可汗领土之外的进攻，这些哨所可作躲避之所；但若遇到了部族大起义，它们的防御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了。这些士兵全都是可汗的人，抵挡不住暴乱，因此，把守卫西北边省公路的任务交给他们，显然是危险之举，应把这项任务交给更可依赖的人。

我们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路上，我们不时碰到秀美的城堡式村庄，阿斯马尔（Asmar）、斯瓦特方向的山脉冰雪覆盖，显得美丽壮观。但是在走近迪尔之前，我们并没有看见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到了迪尔，广阔的冲积扇和可灌溉的梯田上种了绿油油的棉花，看上去赏心悦目。高处横岭的山坡上是赤裸裸的岩石，一直延伸到河中。再往上走，海拔由3000英尺逐渐上升到4000英尺，春季早已过去，红红的罂粟花开遍了田野。

4月29日，从罗巴特（Robat）军营出发，路上我们仍然能看到层层积雪从拉

腊木（Laram）长满松树的山顶上飞泻下来。我们在瓦拉伊（Warai）逗留了一晚。望着积雪覆盖的山顶上乌云越聚越多，我心中焦急万分。要知道，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我们是不可能翻越洛瓦里山口的，若现在天气真的变坏，我们的行程将被延误。支好了水银气压计，焦急地观测着。上午，气压计显示气压没有下降，太阳光芒万丈，因此我想还能趁机再走 22 英里，但实现这个任务相当困难。下午，我们来到楚提亚坦（Chutiatan）堡垒之下，穿越斯瓦特高原上本杰阔拉东山的主脉。这时，天空中乌云密布，随着海拔升高，空气却没有变得稀薄。

又走了大约 5 英里，看到迪尔首府出现在视线里，我们看见了可汗的城堡和一群阶梯状排列的村庄。就在这时，雨开始下了起来。走了半英里，我们到了一处哨所，雨正好下大。迪尔山谷在此处变得狭窄，成了个峡谷地带。我一心盼望雨停，别的什么也不想，不过避雨的地方却让我感到沮丧。这个四方形院子用泥土垛成，

⑥在库兰迪（位于迪尔之上）召集的帕坦和古加尔搬运工，两侧为迪尔哨所



M. Aurel Stein

在高高的悬崖和一条湍急的河流左岸之间显得拥挤不堪，40名左右的守备士兵和来往于洛瓦里山口的邮差就已经拥挤不堪，再加上我们队员和本地政务官，小院子更是人满为患。我的那间房子比四周的环境还让人郁闷，虽是间新盖的房子，但显露出迅速衰败的痕迹，砾石墙上才涂上几周的灰泥已经脱落，岩屑堆满了墙角。格栅的窗子安装在墙的高处，一丝微弱的光线透了进来。雨水从门前和东墙外流过，浸透了屋内低洼的地面。

躲在这里，我感觉就像蹲班房一般。倾盆大雨足足下了两天两夜，不时听到巨声惊雷。屋顶漏雨，泥土地面又潮又湿，由于不知道要在这鬼地方滞留多久，更令人感到沮丧。向山上迈出一两步根本是徒劳无益，在这样的雨天或雨一停就立即登山，都会面临雪崩的危险。所以，我现在还不如趁这点时间，写写报告、处理余下的大量公务和收集地方资料。我还就真的从噶尔维（Garwi）找到了几个科希斯坦人(Kohistans)，他们讲的是一种很少人能听懂的达尔德（Dard）方言，这种方言现在只在本杰阔拉上游的深谷中仍在使用，在普什图人（Pashtun）占领那里以前，这种方言就已经开始迅速消亡。为了弄清其中的人类学意义，我碰到了些困难。我还从一个印度商人那里购得了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n）时代的货币。

尽管我身在此处，但我的思绪已经飞过了洛瓦里，飞向了吉德拉尔。5月2日晚，雨终于停了一会儿，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沿山谷散散步。卫兵并没有因下雨放松警惕，我刚一走出房门，两个士兵就紧紧跟上我。山谷里的云层仍然很厚，看不见山口和道路。大约午夜前后，我回到了讨厌的院子。这时，雾已经完全散去，天空中星星闪烁，我喜出望外。驮运行李的膘壮小骡子紧紧地拴在一起，明天早早上路不成问题了。

M. Aurel Stein

第三章

翻越洛瓦里山口

5月3日，晴空万里，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牢狱般的屋子。古加尔（Gujar）是洛瓦里山口山脚下最后一个夏季牧场，离古加尔越来越近，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村落以下，果树和树篱正在开花；村庄以上，雪崩滚下的积雪旁，小草才刚刚发芽。米尔噶（Mirga）是通向山口路上的最后一个村庄。去年12月，吉德拉尔政务专员助理（Assistant Political Agent）诺利斯上校（Knollys）就是在这个村子遇上雪崩。他勇敢地去救同伴，自己却几乎给埋在雪下。至今，逃难的村民仍没有返回来。但是，我们却碰上了从喀什噶尔（Kashkar）、阔兰迪（Kolandi）、米亚纳（Miana）来的一大队人马，他们愿意帮忙把行李运过山口。

之前，曾有人警告我说，6月以前这个地方的山民是不会翻越山口的。但事实表明，尽管英国人对帕特汉人遭受各种雪灾的处境漠然处之或置之不理，但只要我自己做好充分准备，而并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钱财，他们就愿意提前几天过山。不知是某些人的亲身实践，还是以此要求官方多拨经费，于是便有了在西北边省流行的上述“地方主义”的观点。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说明，山民们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古加尔仅有一个小哨所，几间简陋的小屋，常年的积雪快要把小屋压塌了。山民都说这次雪下得特别大，但他们有信心把行李安全运过山口。虽然如此，我还是采取了所能想到的一切预防措施。减轻行李重量，每箱不超过40磅，两人轮流搬一箱。为了减少风险，我把队员分成3组，分别由我和两个拉姆·辛格负责。每组特派4个人，他们不搬行李，而是拿着铁铲和绳索，一旦有人遇上麻烦，他们就去帮忙。每个小组相隔约步行15分钟的路程，以防被前面的重物从雪坡上滑下来砸伤。最后，确定登山行动在夜间进行，在上午雪松动以前，越过山北坡雪崩隐患区。

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安排这次行动，准备凌晨1点钟出发。黄昏时，我还有点时间小睡一会儿。夜里十一点半，我起了床，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我草草吃了乔塔哈孜里（Chota Hazri，一种当地食品——译者），厨师硬要说这是顿“晚餐”。随后，我动员各个小组整装待发。多亏了昨晚的安排，所有人很快各就其位。皓月当空，光线很亮，这样各小组比较容易保持适当的距离。凌晨1点钟刚过，我便带领第一小组一行20人出发，忠心耿耿的穆哈默德朱断后。看到后边的灯笼在动，我知道奈克·拉姆·辛格率领第二小组准时出发了。15分钟后，测量员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那一组也上路了。从古加尔启程不久，大雪掩盖的河谷谷底就消失在视野之外。倾斜快桥上积满了厚厚的雪，走在桥上听不见流水的声音，可见雪有多深。几个月来，巨型雪崩不断从两侧陡峭的山峦和峡谷上滚下来，至今仍留有像冰碛样坚硬的雪堆。为了给后面的搬运工开道，前面不运行李的人把道路凿成梯状。队伍前进得很慢，这样我却有时间看一看洛瓦里山口，看它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我们在狭窄的山谷中行进，两边山势陡峭，巨大的雪团可以从一边山坡滚到对面的山坡上。一旦发生雪崩，我们将无处藏身，所幸春天大雪崩的频发期在半个月前。晚上气温很低，雪地表面被冻固了，因此刚下的雪不会滑落下来。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向东延伸的山峰之上时，我们已经望见了山口上狭长的鞍状山脊了。

差不多清晨5点，我们登上了山顶，海拔10 200英尺。

如上文所述，我对北坡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已经有所准备。但是，当发现我们就在高达80 100英尺的雪墙边缘时，我还是吃了一惊。上面是极其陡峭的山坡，任何物品一旦滑落，就会毫无阻碍地滚下来。在雪墙与西南边两侧山峰相接的地方，邮差留下的路线突然变成了窄窄的"之"形，雪地上的三个或四个脚印通常呈垂直排列。

我们能否安全下山就全靠这些冻瓷实的脚印了。尽管还没有形成雪檐的迹象，但任何一块崩裂都有可能引起相连部分随之滑落，况且过去这上面没有运过较重的货物。看着搬运工往下走，我心里焦急万分。我一方面自己要小心翼翼，另一方面要不停喊叫，以防因拥挤而发生事故。当我们终于逃离了寒风刺骨的山顶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受诺利斯上校派遣，吉德拉尔本地政务官汉穆哈默德·库里汉（Khan Muhammad Kuli Khan）从北坡的清真寺（也即北坡的第一个哨所）出发，登上山口来迎接我们。由于没带行李，所以他们比我们先登上了山顶。搬运工能够顺利下山，他带领的吉德拉尔人帮了大忙。

没有人愿意在山顶的斜坡滞留太久，再往下走1200英尺就到了较好走的坡道。他们知道，不幸被大雪卷走的24个人就埋在下面。那是去年12月，吉德拉尔的穆合塔尔（Mehtar，地方首领——译者）参加完威尔士亲王在白沙瓦举行的招待会，返回吉德拉尔。天正降大雪，但穆合塔尔仍坚持要过山口，结果酿成那场惨剧。另有17匹马死亡，这或许更能激起吉德拉尔人的记忆，因为人命在这个地方并不珍贵。走到半路，山坡变得异常陡峭，我们几乎快要滑下去了，刚刚发生过雪崩的痕迹依然可见。本地政务官说，雪崩就发生在昨天下午，这果不出我所料，在迪尔饱受煎熬的那两天，我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⑦从古加尔堡垒遥望洛瓦里山口|

峡谷较为狭窄，加之从山口滑下来的雪块，雪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障碍物。于是，我停了下来，召集大家集合。在初夏，这里是个“危险区”（吉德拉尔人如是说）。不过，现在这里和峡谷较低地带的地表面已经凝固，这说明雪崩实际发生地以下地区的地面很瓷实。我一面喝几口凉茶、草草吃些早点，一面饶有兴致地看着后面零零散散的队伍。真可惜，峡谷出口处太狭窄，光线太暗，没能给新雇的厨子拍张快照。他活像根木头，需要3个敏捷的吉德拉尔人搀扶着他，简直没有了人样儿。

尽管深深的积雪阻塞了谷底，但接着到清真寺的这段路并没有遇到困难。面前出现了一座高耸的山脉，冰雪覆盖，光彩夺目，山脉把吉德拉尔河的主体山谷和卡菲尔斯坦（Kafiristan）的巴什噶勒（Bashgal）分离开来。峡谷两边的树木越来越



⑧圣墓之下的峡谷，位于洛瓦里山口之下

多，雪地上有很多雪崩冲倒的冷杉和松树，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气味。在克什米尔和喀罕，高山草地上树木林立，峡谷里经常弥漫着雪崩留下的气味。快到清真寺时，吉德拉尔向导把4个星期前发生的雪崩指给我们看。这场雪崩荡平了陡峭的凹槽，快把哨所的营房压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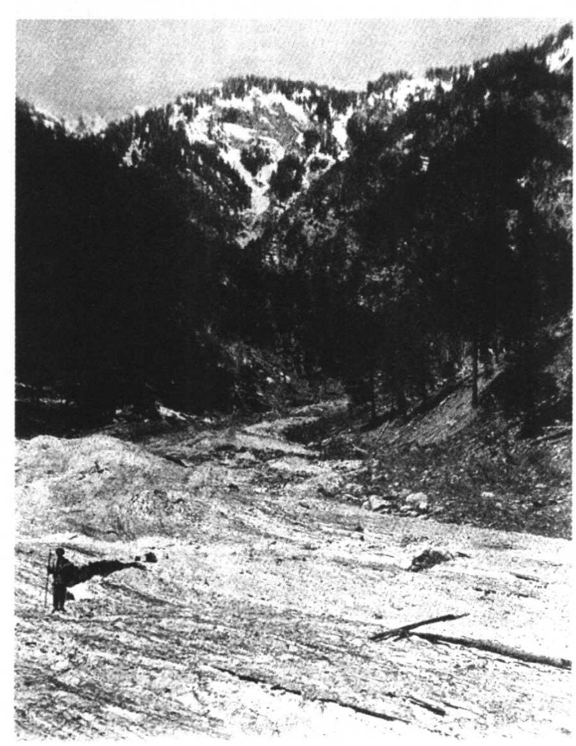
看着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想起了古时阿尔卑斯山地图如长龙般弯弯的曲线，示意冰河。我们现在不会再遭遇此类危险了，我心里宽慰了许多。更令我宽慰的是，在用熏黑的木头扎成的城墙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人没少，一物未丢。经过大量的书信往来和其他努力，这些行李才经由吉德拉尔运来。没有冒没必要的风险，经克服了巨大障碍，终于翻越了山口，现在再回头看看，心中有种成就感。我急忙让信差把电报送到德罗什（Drosh）堡垒的发报处，从那里把这个消息发送给西北边省的朋友。

上午8点过后不久，举行了一场丰盛巴合希什（Bakhshish，地方聚会——译者）。经过讨价还价，支付了迪尔来的帕特汉人的费用，把行李转给了已等候在此的吉德拉尔搬运工。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感觉良好。吉德拉尔人看上去很淳朴，从他们跟我打招呼那刻起，我就觉得没有带手枪的必要了。我们迅速下山，向阿尔谢特（Arshet）前进，它是吉德拉尔这边的第一个村庄，雪地不时露出修得很好的通向山口的道路。在海拔6000英尺的地方，灌木丛长得很茂盛，路上终于再也没有积雪了。奇怪的是，这儿发生事故的几率更大。连接清真寺和德罗什堡垒的电话线在雪季中断，散落在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缠作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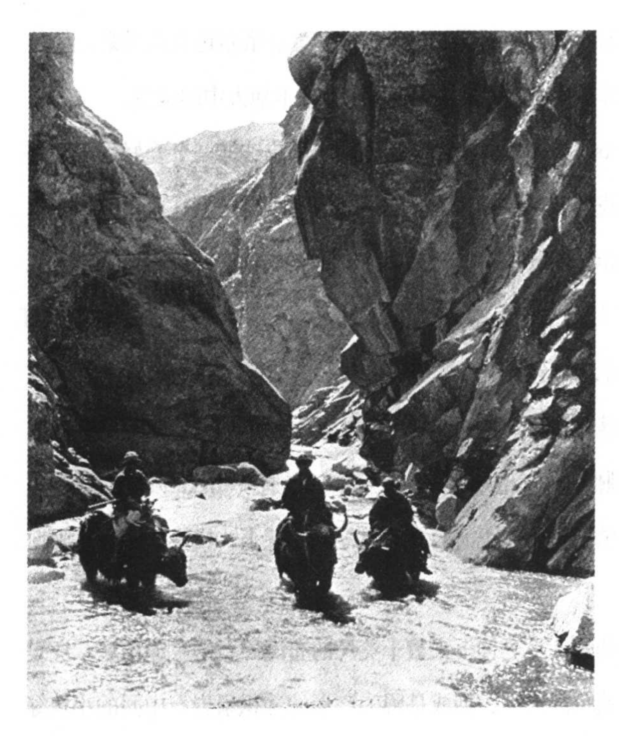
阿尔谢特村海拔4800英尺，这里已经相当暖和。瘦骡子、瘦马各色各样，花了约摸1个小时才给这些牲畜装好行李，大家累得够呛。本地政务官竭尽全力饲养好这些牲畜，但草料只够养活军需处（Commissariat）大约200头骡子。在夏季牧草长出来之前，私家的家畜不得不忍饥挨饿。与前几天的或沉闷不乐或神气十足的帕

特汉人相比，吉德拉尔人非常听话，也很有礼貌。看着箱子在马背上摇摇晃晃，每根绳子都好像要断的样子，他们也奈何不得。如果不是穆合塔尔派官员来帮忙，单就到德罗什这16英里，即使不把马给累垮也得把箱子放在胡德（Khud）。

这个地方在种族和政治上与其他地方不同，我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新雇来的仆人饶有兴致地给我介绍起他们的家乡，这其中有德罗什地方长官的儿子，他看上去像个不错的凯尔特（Celt）小伙子，敏捷活泼，精力充沛，为人谦逊虔敬，天生乐于接受压力与挑战。德罗什人都戴达尔德毡帽，他也头戴这种帽檐上卷的毡帽，身穿欧洲式服装，不过是土布料子做的。库尔班（Kurban）老人总给欧洲人做向导和勤杂工，他这次奉命带领我们到吉德拉尔。他戴着吉德拉尔上等人士戴的



⑨从布扎果勒小山谷滚下来的雪崩



⑩坦吉塔尔峡谷，位于塔尔巴什之下

棕色宽檐帽——乔噶（Choga），脚穿本地产的红色皮制高筒靴。在吉德拉尔之围中，他曾和罗伯逊爵士（Sir G. Robertson）的护卫队协同作战。长久以来，他和斯尔喀尔人（Sirkar）待在一起，养成了斯尔喀尔人的生活习惯，他不接受形形色色的印度舶来品，比如，山姆·布朗腰带（Sam Browne belt）。库尔班老人还会说欧洲式印度斯坦语（Sahibs' Hindustani），虽讲得不太流利，但这一点对我特别有用处。他不仅可以做翻译，而且能给我讲述本地的信息，所以我十分乐意地把他留在我身边。

自从有了印度历史，达尔德部落就住在吉德拉尔周围的山区小邦。尽管我对吉德拉尔和这些小邦非常感兴趣，但始终没有时间学吉德拉尔土话霍瓦尔（Khowar）或类似方言，即使是为了实用目的也没有去学。所以，从一开始库尔班就帮了我大

忙。他好像对路边的每块岩石和田地都了如指掌。他和穆合塔尔还有点关系，他的妻子是穆合塔尔长子的养母，他引以为荣，这确保了他在本地人中的威信。

阿希热特—奴拉合（Ashret Nullah）天气闷热。对于我这样一个爱好历史遗迹的人来说，库尔班原以为我会充分注意到这里陡峭的山峰。历史上，血腥的卡菲尔人（Kafirs）穿过吉德拉尔河，来到这里抢劫来往于迪尔的行人。我就在迪尔地方几次领教过恐怖的卡菲尔人，最近一次发生在吉德拉尔换防军（Chitral Relief Expedition）驻扎的几年前，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一走进吉德拉尔大山谷，闷热和困倦的感觉立即消失了。山谷两边是崇山峻岭，山顶上白雪皑皑，地势宽广，景色宜人，山脉蜿蜒向北方延伸。来到米尔干迪（Mirkandi）北坡这边的第一个前方哨所。这个哨所坐落在距河面200英尺的峭壁上，风景如画，是阿斯马尔的门户，易守难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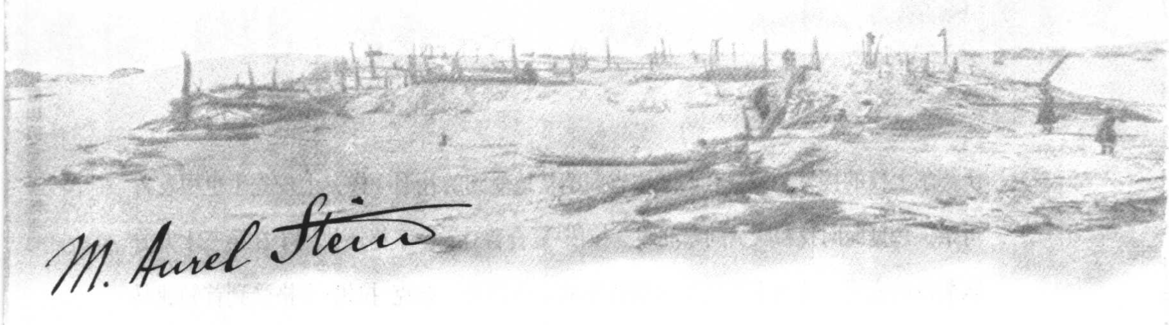
不知是因为又见到了两边山上延伸下来数千英尺的布满碎石的荒凉山坡，还是因为与印度那里不同的淡蓝色的天空，抑或是因为广袤的冲积扇岩石中间的小块绿洲，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中亚地区。路旁石头较少的地方长着一簇簇百草香之类的灌木丛，闻着熟悉的香味，我兴奋不已，好像回到了萨里库勒（Sarikol，今塔什库尔干地区——译者）和天山（T'ien Shan）荒芜山谷中考察的那段时光。午夜以后，我骑的那匹老马疲惫不堪，行走缓慢。我不住地向四周张望，寻找德罗什堡垒，最后终于看见了突出出来的小山冈后的堡垒。由于空气非常透明，所以我觉得堡垒离得不远了，可结果我却走了足足6英里。

噶勒喀塔克（Galkatak）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村庄，大片的悬铃木林，墓地里有很多奇异的土墓，经幡迎风招展，一派新疆的景色。我骑马到了德罗什堡垒整齐的西墙，驻军首长沃德尔上校（Captain Wordell，Station Staff Officer）给我留下一份语气亲切的便条，上面说吉德拉尔营地的将官们要款待我们。一会儿，我受到

沃德尔上校的接见，像我在西北边省前哨基地受到的礼遇一样，上校先生也很友善可亲，一见面向我和队员问寒问暖。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还找到了在第三十九分队服役的表兄，这支手枪队是这里驻军的主体部分。奈克·拉姆·辛格受到首领亚马达尔朋友般的拥抱。最后，我去食堂喝了点茶，回到了在长官区内给我预备好的房子。长官们的住处都建在城堡内陡坡的最高处，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行李驮了上来。所以，直到很晚，我才算痛痛快快地泡了个澡。

手枪队指挥官特威格上校(R. H. Twigg）及其军官对我格外关照。集体食堂是他们的活动中心，看上去既舒适又文明。8个月以前，该团开赴到这里，除了少数几个住在吉德拉尔的军官外，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客人。我有点受宠若惊，主人对我的探险活动及规划十分感兴趣。这些英国军官奉命来驻守西北边省这个边远的营地，望着山那边的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其他地区，他们肯定也是心驰神往。在食堂进餐时，很多官兵说他们感到非常遗憾，不能参加我们的探险队。这里有野山羊、捻角山羊等野生珍味，他们可以尽情地打猎，这里实际上是个军官专属打猎区，也算是对他们心中的遗憾补偿。

热心的士兵表演了精彩的体育节目，围着餐桌吹起高原风格的笛子进行曲，这快乐的时光我决不会忘记。周围都是快乐的空气，疲惫马上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谢天谢地，我终于能够在午夜时分回房休息，昨晚上我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从古加尔算起，现在我们走完了通常需3天行军才能走完的路程，其中一大部分山路被冰雪覆盖，异常难走。



第四章

在吉德拉尔

尽管官兵再三挽留，我还是于5月5日上午离开了德罗什（Drosh），加速赶往吉德拉尔首府。我盼望尽快见到政务专员助理（Assistant Political Agent）诺利斯上校，以启动考古活动和人类学考察。我骑马骑了一天，公路行程约26英里，其间我又拐上盖拉特（Gairat）左岸，参观了一个刻有铭文的岩石，所以实际行程应该多于26英里。天气晴朗，天空清澈碧透，太阳火辣辣地照了一整天，这是因为喀拉德罗什（Kala Drosh）海拔仅4300英尺，吉德拉尔却有4900英尺之高。虽然天气炎热，但一走入吉德拉尔这片土地，领略了这里风景和人民，心里感到甚是愉快。

在喀拉德罗什，我们路过一个较大的驻军营地。营地有自己的军需处、自己巴扎，有点像在印度，而在1895年以前，这个广阔的冲积高地上只不过有几个零零散散小村庄而已。从营地往下走，有一片繁茂的悬铃木林，果园有一所粉刷成白色的维多利亚阅览室（Victoria Reading Room），这个奇特的建筑物证明可敬的巴布斯（Babus）的力量是何等强大；然而，印度军队中主张“非暴力”的人却要把他们赶到最偏远的地区。步枪射击场坐落在西西库夫（Shishikuf）山谷的一块平地上，东北边山峰高耸，来到这里，我觉得才算真正到了吉德拉尔。射击场两边是光秃秃

的山峦，山峦上是宽阔的岩石斜坡。一旦下雨或下雪，滑落下来的岩石经常会造成危险。当我们绕过了克斯（Kes）村附近的峭壁时，我意识到，在马道修好以前，吉德拉尔的这条主要干道是何等难走。马道5英尺宽，有的地段凿在岩石里，有的则用建设精良的廊柱和城墙支撑。马道300英尺以下是湍急的河水，从马道往下看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我心里正在琢磨10年前这条路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前面出现了洪扎拉菲克（Hunza "Rafiks"）及其享乐之处的遗迹。一旦河水涨过了巨石上狭隘的通道，淹没了河岸的沙地，马即使不驮东西也几乎不可能走过此地。

向上走1英里左右，盖拉特山冈突兀险峻，形成抵御南方进攻的天然屏障。在1895年那几个漫长而又紧张的星期里，吉德拉尔使团（Chitral Mission）的护卫军就是在此地全力阻止了帕特汉人的侵略，吉德拉尔不忠分子亦从中作梗。那场波澜壮阔的事件留下的唯一痕迹是那时用来建造桑迦尔（Sangars）的小石头堆。走过山冈后的小炮台，我快速向北前进，据说那里有石刻碑铭。我果然不虚此行，亲眼看到了吉德拉尔诸峰中最高的蒂里杰米尔（Tirich-mir）山峰。蒂里杰米尔山海拔25 400英尺之高，如剑削一般，气势磅礴，“金鸡独立”于众峰之上。从辽阔的吉德拉尔山谷向北望，除了蒂里杰米尔山峰再无他物。蒂里杰米尔山峰上的冰川互相对称，高高在上，蔚为壮观。在我看来，这座锯齿状的冰山可以和拉科普希（Rakiposhi）山峰相媲美，吉德拉尔传说中有许许多多关于它的故事。

我找的碑铭刻在一个陡峭的大岩石面上，高出河面至少100英尺，堪称碑铭中的“王中王”，与伯赫斯顿（Behistun）岩石上的大流士（Darius）铭文相似。上面的文字显然是模仿大莫卧尔（Great Moghul）德里（Dheli）王宫耶罕迦尔（Jehangir）的名句，但在17世纪或18世纪，吉德拉尔统治者怎么会想到在此镌刻几句用词华丽的波斯语对句呢？这真是不可思议！铭文吸引了更多现在的人在岩石上乱涂几笔，上面画了大量的湿婆教（Siva）三叉戟，这是朴实的廓尔喀人（Gurkh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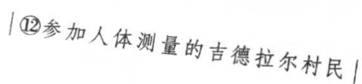
⑪吉德拉尔阿云的卡菲尔人

的宗教习俗，吉德拉尔军营里又以廓尔喀人为最。我匆匆忙忙骑马回到盖拉特。天快要黑时，穿过两个几乎垂直的山冈之间的铁索桥后，顺着狭窄的“之”字形小道，我快马加鞭，向吉德拉尔疾驰而去。

在如此陡峭的山路上骑马奔跑，几百英尺之下就是河水，要在别的地方，这不啻于是对胆量的一种考验。但你若亲临此地，你很快就会跟吉德拉尔人一样，对他们的马匹充满绝对的信心。在对过靠近碑铭的地方，一个吉德拉尔士兵摔得人仰马翻，可相机却完好无损。庆幸的是那个士兵摔出去仅仅五六英尺远，他仅只是几分钟神志不清。现在，再看到士兵背着相机颠簸而行时，我就不再那么担心了。从巴木巴热特（Bambareth）和喀拉什贡木（Kalashgum）流出的河水形成巨大的冲积扇，一座座被称作阿云（Ayun）的美丽村庄在核桃和悬铃木园里若隐若现。但因时

间有限，只能走马观花地看看村庄之间可爱的绿油油的草地。

我们碰见了成群结队的村民，有的懒洋洋地坐在树下，有的正从田里归来。他们生来无忧无虑，举止礼貌。英国统治这个地方已经10年之久，这里的年轻人和老人把军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些吉德拉尔人体格健壮，步伐轻盈。在达尔德语族人中，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五官分明，皮肤白皙，头发金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阿尔卑斯山意大利境内山脚下的居民。鉴于吉德拉尔人和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的噶勒查（Galcha）部族（亚洲“阿尔卑斯人”的典型代表）在语言和种族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吉德拉尔人和意大利的阿尔卑斯人有相似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吉德拉尔人身穿长袍（通常用棕色羊毛织成），头戴帽檐上卷的圆帽，脖子上挂着幸运锁，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南欧的人。


⑫参加人体测量的吉德拉尔村民



人们常常认为吉德拉尔人残酷无情，天生诡计多端，这个山邦充满阴谋、谋杀和叛乱的现代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些叛乱、篡位之类的事件仅发生在统治者之间，吉德拉尔人并没有因此而恣意放纵。因为经常发生不幸事件，他们理所当然地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做事小心谨慎。每次宫廷革命都会危及到少数贵族（Adam-zadas）的财产和生命，或出于仇恨或为经济收入，统治者把贵族原来拥有的诸如奴隶之类的财物卖到附近的山区各邦。结果，这给极端贫穷的山邦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他们要为生存而挣扎，这或许有利于吉德拉尔人保持其天生的幽默感和享受人生的乐趣。

再走8英里就要到吉德拉尔了，这段路程几乎全是荒芜的岩石坡和碎石坡。站在Atani山冈之上，蒂里杰米尔又映入眼帘，在金红色落日的映射下，蒂里杰米尔显得绚丽多彩，壮观多姿。天快黑时，我们绕过了础马尔洪（Chumarkhon）对面的大砾石山冈，走进广阔的谷地，吉德拉尔的“首府”就坐落在这个谷地之中。我们继续在田野里骑着马慢跑，正好遇见了前来迎接的政务专员助理诺利斯上校。我们俩以前见过一次面，那是在遥远的班奴（Bannu）边境。我们骑着马慢行，边走边聊。他言谈热诚恳挚，下马时我感觉我们就像熟人一样了。他带我到了一个古老漂亮的花园，园子里是阶梯状的地面，中心是吉德拉尔风格的房子，在1895年起义以前，这些房子曾做政务专员的寓所。我被领进了一套房子，面积很大，简直算得上大厅了，配备了西方人的安乐设施，但却是完全按照本地的建筑风格来设计的。支撑房顶的喜马拉雅雪杉木柱子排成了长方形，雕刻精美，普通吉德拉尔式房子的通光、通气用的孔被天窗所取代，但这并不显得突兀。大房间里铺有很多好看的地毯，房子显得更加漂亮，其中几条地毯产自和田，我感到既好奇又高兴。过去，我曾长时间在和田停留，并一直希望能故地重游。更加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柱子上的很多木刻饰物竟和早期的印度图形极其相似，像是从我在和田沙漠里发掘的木刻柱

子及其他木制建筑碎片中复制过来的一样。

诺利斯上校邀请了另外两名军官，我们4个人一起共进晚餐。这一天充满了新奇之感，让人迷恋不舍。恰好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可在吉德拉尔休息3天，这样，自从晦气的迪尔出发以来，我终于可以第一次安心地休息一下了。诺利斯上校和蔼可亲，为我提供宽敞舒服的住处，设施齐全。吉德拉尔代办处所处的其尼巴格(Chini-bagh，喀什噶尔的英国领事馆与之同名，意为中国花园——译者）山色秀美，看了第一眼，我就被吸引住了，我不禁想起了美丽的新疆。一切安排得人微周到，我可以收集到所需的信息和资料。

第二天一大早，许多吉德拉尔人就聚集在园子里的草坪上，等着进行人类学测量。他们是穆合塔尔派来的，尽管测量程序对这些来自小山村的淳朴山民来说显得奇怪，但包括前邦参事 (State Councilor) 在内的要人出来强调了纪律，给山民强调

⑬蒂里杰米尔峰，自吉德拉尔代办处远望



这次测量的重要性。经过几个小时的演示、示范，测量员拉姆·辛格开始拍照，以供人类学测量之用。他继续对几个特别挑选的人进行测量，我时不时回来巡视检查一下。奈克·拉姆·辛格在暗室里冲洗照片，我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

3天来，我忙得不亦乐乎，记录本地习俗，整理报告，维修设备。在这里，我只能简要叙述几个插曲。到达的第二天早上，吉德拉尔长官第一次接见了我，并邀我到代办处官署下面的平地上打马球，周围风景如画。几个世纪以来，马球一直是本地贵族们的消遣娱乐方式，观看骑手的勇敢表演是种享受。

更为有趣的是，我有机会和现在的穆合塔尔——苏加穆勒·乌勒·穆尔克（Shuja-ul-Mulk）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是1895年起义后，继承此位的。在吉德拉尔之围时，他才10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他举止优雅，颇具年轻头领的风范，虽然他穿着欧洲式服装，但却比其先辈更具东方人的气质和风度。我们用波斯语谈起了他的国家的过去以及其与宗主国可汗·伊·秦吉（Khahan-i-Chinj）即契丹大汗（Great Khan of Cathay）的关系，直到18世纪吉德拉尔人才确立了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山谷的统治地位。然而，吉德拉尔至今还没有自己编写的历史，穆罕默德时期的传统风俗只保留住了个大概轮廓。中国正史记载多有涉及吉德拉尔自7世纪以来的历史，我曾经有过涉猎，他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比赛在激烈地进行着，恐怕只有这些生活在山区的精壮的马才能忍受如此剧烈的运动。尽管阿富汗禁止出口这种马，但吉德拉尔人依然能够从邻近的巴达克山（Badakhshan）弄到这种马。他们按照真正的欧洲方式，端上来茶和蛋糕，我们边吃边看，首府的一半人口聚集后面绿色的山坡上观看比赛。最后，乐队吹起造型奇特的长号角，敲着水壶状的鼓，一阵嘈杂声过后，比赛宣告结束。接下来，负方为胜方和观众跳舞。不用说，胜负双方都不看重这种按传统习俗进行的表演，只是几个人敷衍地跳来跳去。然后，选拔出的年轻小伙子跳起了吉德拉尔舞蹈，节奏感强，



⑭吉德拉尔代办处附近齐纳尔林中的寺庙

活力四射，非常好看。这种舞蹈看起来有点像匈牙利 Csārdās 的舞步，又有点像哈塔克（Khattak）剑舞的回旋动作。娱乐活动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帕特汉舞，这清楚地表明南方地区对吉德拉尔消遣娱乐的重大影响。

穆合塔尔的茶桌旁站着一些人，我想在很久以来，来吉德拉尔的人可能就遇见过这种场面。所有吉德拉尔人皆信仰飞仙，在诺利斯上校到来的两天以前也举行了一场比赛，据说那场比赛中很多飞仙围着马球场轻快地飞来飞去。飞仙的出现成了吉德拉尔的热门话题，人们借此来预测穆合塔尔城堡内的祸福。由于家族间有世仇，这总会引起家族的摩擦。年轻的穆合塔尔谈及最近的飞仙时，面色沉着冷静，并不羞怯拘谨。如果这真的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祸，站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也会因此遭殃吗？他们最不应该受到牵连呀！

同一天晚上，年轻的穆合塔尔出席了诺利斯上校举行的晚餐，他对欧洲式的社交方式非常娴熟。我们轻松愉快地聊起了吉德拉尔悠久的历史。我们表面上亲密无间，但我并不能仅据此就对影响该国政治命运的力量进行评估，也不能预测出发展的趋势。我意识到，近来完全由穆合塔尔操纵权力会引起问题，或许穆合塔尔本人没有出现问题，但别的执掌权力的人肯定会发生问题。

10年以来，吉德拉尔实际上一直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这必然引起吉德拉尔发生深刻的变化，哪怕是最保守的山民。由于英国守备军的有效管理，过去随便就对竞争对手泄私愤、搞谋杀、篡权夺位的现象已经杜绝，如有人胆敢复辟以前穆合塔尔的族长专制制度，那他将遭受到巨大的风险。过度的大不列颠式和平迟早肯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不再有奴隶贩卖和封建混乱的破坏，人口必定会迅速增长，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尚未开发的可耕地就可能开发完毕。问题是首领如何在事实上和名义上得到合适的法律权力范围，同时，人民又不会对间接导致所有这些变化的权力不满。我希望这个问题谨慎地而不是以对任何一方造成痛苦的方式得到解决。

我回访了穆合塔尔，并参观了他的城堡，难忘的“1895年之围”就发生在这里。城堡里还保存着当年的方形塔楼和防御工事的主体部分，古老的悬铃木树林环绕在工事周围。当年，阿富汗神枪手就是利用这片林子来袭击城堡。现在，这座用瓦砾和树木建成的城堡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新的建筑，因此不易找到那场战争的各个细节。城堡的外围地区是清真寺和开阔的走廊，有大量年代久远的精美木刻。大门是铁制的，可不止一个篡权谋位者越过了这沾满鲜血的塔赫特（Takht)。门外有一座小型建筑物，紧挨着掩映在高大悬铃木之中的诵经台。建筑物完全模仿了印度“公众作品”（Public Works）的风格，尽管模仿得非常蹩脚，但用作穆合塔尔新的诵经台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一鼓劲地把城堡看了个遍。



⑮在吉德拉尔代办处做人体测量的巴什噶里卡菲尔人

在吉德拉尔的大部分时间，天空阴沉，乌云绵绵。虽然如此，在一天的忙碌奔波之后，我总会抽出时间，到附近据说有古迹的地方看看。古迹倒是没看多少，但沿途所见所闻使我获益良多。城堡和官署附近上下几英里都是精耕细作的绿洲，村子之间的果园和林阴道几乎连在了一起。在达瓦维什（Dawawish），有人带我到了一处老房子，据说建于“卡菲尔人”时代。繁茂的核桃树罩着房子，房子看上去很粗糙。从外面看，它像一大堆石头；到了内部，却像一间大堂房，光线很暗，喜马拉雅雪杉木板积了层很久很久以前的灰尘。显然，这种装饰让人联想到犍陀罗雕刻工艺，尽管它远比犍陀罗工艺的年代更加久远。老屋的主人是一个毛拉（Mullah），他还是个木匠。他骄傲地说，建造这座房子的卡菲尔人也是个木匠。居果尔（Jughor）和乌楚斯特（Uchust）古城堡城墙保存下来的不多，我从中几乎没有获得什么信息。这座城堡是用不经切割的石头垒成，与现在该地区常见的城墙在外观等

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山谷一片绿色，对面风光宜人，光秃秃的山头突兀而起，高达数千英尺。

在吉德拉尔的最后一天，我有幸能对许多巴士噶里（Bashgali）的卡菲尔人进行了测量和拍照。阿富汗人占领了他们的老家，并进行了强制性的宗教改造，卡菲尔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吉德拉尔避难。据说，大约有200户卡菲尔人被安顿在巴木布尔特（Bambureth）和上阿云的其他地方。热心的穆合塔尔派一组有代表性的卡菲尔人前来测量。过去在独立时，卡菲尔人落下了野蛮凶残的名声，但这些人看上去文文静静，并非一脸凶相。他们已经净过面，长长的头发，表明还未完全开化。我收集的人类学资料具有重要意义，证明了卡菲尔人和东部文明更为发达的达尔德部落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语言学上业已得到证实，但这里的古老习俗和民间传说更为丰富多彩。到这里逃难的大部分卡菲尔人仍然信仰"异教"（heathen，意思是异教，即专指非伊斯兰教——译者），可能从达尔德部落离开伊朗、被驱赶到兴都库什的闭塞山谷中那时开始，他们就信仰"异教"了。

尽管眼前就是这么丰富的人类学宝藏，由于所剩时间有限，又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我没能深入考察。临行前一天晚上，殷勤的诺利斯上校给我举行了一场卡菲尔舞蹈，这场舞蹈在一些方面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奇怪的舞蹈。舞蹈在官署附近的一个果园里举行，天色已晚，燃着一堆篝火。大约有50个男人和年轻人表演，其中一些人身披深红色长袍，另一些人却仍然穿着穆合塔尔传唤时所穿的衣服。每个人手中拿着把斧头，最基本的动作是旋转和摇摆，动作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可惜我舞蹈方面的知识有限，无法将之记录下来。不论是排成几行，站成大圈前后移动，围着篝火摇摆，还是像枪骑兵那样，连续地站成对，这些人动作都能保持一致，甚是精彩。

然而，伴奏音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总是那一组最简单奇异的音调，让人联想

起野鸡的叫声，好几天我耳边还一再萦绕着这种音调；可惜我对音律知之甚少，不能更细致地描绘给大家。若是在卡菲尔人老家，用特制的乐器演奏，我想音乐的效果肯定会更好。舞蹈持续了近1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间歇。从他们闪亮的眼睛里和越发放任的情绪中，观众可以体会到这种舞蹈是如何让人激动，可没有人告诉我舞蹈动作各自有何象征意义、表达了舞者什么样的感情。当年，卡菲尔人攻击邻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凯旋归来时，他们是否就是用这种舞蹈欢庆胜利呢？我从以前看到过类似舞蹈的人那里了解了这么一点：参加舞蹈的著名舞者越多，杀的人也就越多。若杀死的人数在42以上，他就会受到赞扬，满脸快活的表情。卡菲尔侵略军从不对妇女儿童有任何仁慈，每个箱子里装的人头都有妇女和儿童，人头数量之多，简直不可计数，这些杀人“英雄”几乎个个不讲人性，手段非常卑劣。

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阿富汗最终征服了卡菲尔人；这样，卡菲尔人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屠杀其南北相邻伊斯兰教信徒的历史也许要永远地结束了。这些残酷野蛮的战争带来的痛苦罄竹难书，一想到这些，任何人都会对现在的结局感到庆幸。但是，我眼前的这番景象在一两代人之后也许会永远消失，卡菲尔这个种族注定将被人合并，这个古老种族的传统正在消失，任何再有学问的人也无法把它复原，这样的后果使人焦虑不安。趁现在还不为时已晚，但愿能有学者对卡菲尔人的这个最后一个居住之所进行研究！

M. Aurel Stein

第五章

穿越马斯图吉

我对吉德拉尔恋恋不舍，这里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人和事物。诺利斯上校学识渊博，通晓本地风俗人情，他正好可以为我解释这里的趣人趣事。之所以要离开吉德拉尔，除了想尽早到达新疆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一到达吉德拉尔，先期到达的4个瓦罕信使就告诉我说，沙赫特（Sarhad）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我的一切安排。据说，根据巴达赫商（Badakhshan）总司令的命令，一名阿富汗上校率领步兵和骑兵，正在等候我的到来，将负责护送我安全穿过阿富汗。尽管埃米尔4月份授权我使用穿越阿富汗的路线，但我并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友好的接待。显然，他们对我们翻越洛瓦里山口会遇到的困难毫不知晓，以为我们会早些到达。上校及其军队所驻的村庄本来就很贫困，如果让他们在那里等的时间过长，这只会给他们添麻烦。于是，5月9日，我离开了热情友好的吉德拉尔代办处。昨天晚上下了场雷阵雨，空气变得清新，蒂里杰米尔又出现在视野之内，蔚为壮观，我趁机给宏伟的蒂里杰米尔拍了照片。

经过漫长的3个阶段行军，翻越重重障碍，到达了吉德拉尔河上游重镇马斯图吉，这段河叫做雅尔浑（Yarkhun）。这一段路程有67英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山谷里隘道连绵不断，异常难走，路上难得遇见几块可耕的冲积扇。通往吉尔吉特（Gilgit）重要联络线的新马道由军队维护，但石笋突出的岩角和陡坡还是给行李运输带来不少危险。友善的特威格上校批准我租用军需部能干的骡子，由训练有素的车夫驾驭。即使这样，每走一段都有行李掉下来，所幸滚下去不远，损失的也都是些吉德拉尔的补给品。在幽暗的山谷里走了一整天，到了摩罗伊（Moroi），我们做了第一次停顿。摩罗伊隐匿在果园之中，环境宜人。从那里，我和一小队人马穿过一条河，到右岸考察位于乔姆湿利（Jomshili）村对面的石刻铭文；与此同时，运送行李的队伍沿左岸的大道继续前进。

我们足足走了30英里，花了1天时间，才完成这次考察。难走的山路蜿蜒曲折，我们在陡峭的山嘴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有的地段连骑马都困难。不过，辛苦终究没有白费，我们找到了石刻铭文。一条窄道环绕着陡峭的帕赫图日尼迪尼（Pakhturinidini）山冈，铭文就刻在窄道边一尊花岗岩巨石上，字刻得很整齐。经证实，铭文刻于大约公元6~8世纪，内容包括梵语题献词，系用笈多（Gupta）字体刻成。在铭文以上，我欣喜地发现了雕刻精美的佛塔，它跟我在喀什噶尔与和田两地屡次见到废墟的建筑比例结构一模一样，毫厘不差。3个柱基、鼓状物和圆顶完全与新疆佛教徒所遵循的传统规则相符合。

海拔虽然有6000多英尺，但在我们用纸制作铭文的塑件和给石刻拍照的几个小时里，太阳的光线依然十分强烈。我们首先要从巨石的黑色表面上分辨出铭文。手头除了小圆石之外别无他物，这项工作进行的十分缓慢，加之岩石坡与碎石坡非常陡峭，上面的小道弯弯曲曲，这又延缓了这项工作的进程。出了帕尔皮什（Parpish）村，是片宽阔的塌磊，塌磊表面的岩屑很松散，寸草不生，脚下数百英尺就是河水，令人望而生畏。从这个地方看，对岸的热逊（Reshun）村的冲积扇郁郁葱葱，山谷入口处山势险峻，山峰上冰川熠熠，景色非常迷人。鸟瞰山谷，马球

场的绿色草皮清晰可见，旁边是用砾石垒成的房子，甚至可以分辨出马球场城墙的空隙。1895 年，爱德沃得斯（Edwardes）、福勒（Fowler）两位年轻的军官及几个士兵以那些砾石房屋为依托，通过城墙的孔隙观察敌情，英勇抗击敌军。结果，他们被俘叛变，士兵们被屠杀。

热逊的果园和田野风光明媚，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悲剧。从热逊上行几英里，到了库拉克（Kuragh）隘道，这里一片荒芜，好像是个天造地设的血腥战场。黄昏时分，天色变得昏暗，我们又走了四五英里。一路上，除了幽暗陡峭的山冈及山冈间险峻的山洞之外，找不到一棵树、一片灌木。第三十六分队罗斯支队（Ross' detachment）在库拉克隘道顶端不远处全部被歼，这是 1895 年战争中最残酷的事件。河水流得很急，我们看见了对岸水边浅浅的山洞，洞里的人已经在里面躲避几天了，身体蜷缩成一团。再往高处一点，石笋从悬崖峭壁上垂直而下。悬崖几乎是陡不可攀，但身如猿猴那样敏捷的吉德拉尔人竟还能爬上去，以将外来进攻阻挡在库拉克村相对开阔的平地之外。

我幻想能找出当年那些人是爬哪条陡坡逃出去的。他们几天没有吃东西，却在一夜之间翻越了难以逾越的山峰，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可是，也正是这些山峰阻挡了从曼吉哈（Manjha）平原来的人的去路。锡克人不幸走错，不得不忍受饥饿，最终冒险翻越险恶的石笋。吉德拉尔人和盟友则据守着对岸的桑噶尔（Sangar），占领了咽喉要道，居高临下，杀死锡克人易如反掌。

我们的宿营地设在了查隆（Charrun），在地图上看上去离库拉克很近；但是，我们必须穿过德拉桑（Drasan）河的一条大支流，才能返回左岸，所以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路程又远又累。库什特（Kosht）附近有一座悬桥，走上去摇摇晃晃，还没来得及走到这座桥，天已经黑了。除了吉德拉尔马外，很少有别的马敢在这种桥上走。德拉桑和雅尔浑的交界处是平地，布满了大的鹅卵石，我们在这里骑马慢跑

M. Aurel Stein

了2英里，然后涉水渡过雅尔浑。一些村民送来了火把，给我们引路，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随着冰雪的消融，雅尔浑河水上涨，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进程。直到晚上10点钟，我们才回到快乐的宿营地。

沿雅尔浑向上走，属于马斯图吉的领土。依然像过去那样，一条山路在政治上把马斯图吉和吉德拉尔分割开来。在查隆，可敬的吉德拉尔代理处汗夏合普·皮尔·巴赫斯（Khan Sahib Pir Bakhsh）接待了我。他是马斯图吉慈善组织负责人，扮演着州长顾问和指导的双重角色。他是个旁遮普人（Punjabi），连续在这里居住了12年之久，几乎认识上千的各色人等，这些人构成了马斯图吉或者说胡斯瓦克特（Khushwakte）统治阶级的主体部分，这一点从世袭统治者所属的民族就可以看得出来。

5月11日，我骑马去马斯图吉，于是有机会收集本地的资料。上午，我为一副梵语铭文和佛塔石刻制作拓片和拍照，铭文和石刻与帕赫图日尼迪尼的非常相似，这些铭文和石刻大约在8年以前才在查隆附近被发现。几个世纪以来，村民都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可他们一直都很想保存早期的崇拜信物。于是，他们对这些“异教”的石刻怀有一种敬畏感，而且还搭了间简陋的小屋来看管。

山谷里岩石林立，路上不时碰到冲积扇，冲积扇上的村庄景色迷人，因此并不觉得乏累。其中以布尼（Buni）村最大，它有100多间房屋。时值杏树和其他果树的花期，景色异常美丽。一位长着灰白胡子的老者在第一块田地里迎接我，给我吃保存得很好的梨子。在这个季节，梨子很稀罕，哪怕只是摸一摸，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虽然刚离开营地不远，但我还是禁不住诱惑，买了些梨子，这可是几个月以来最难得的事情。

灰白色的布尼珠牟山峰（Buni-zom Peak）连绵不断，海拔均高于21 000英尺，冰川林立，条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来，把艾维（Avi）、蒙（Mem）、米拉格拉木



⑯萨尔哈德附近的阿姆河河谷和朝向大帕米尔的山脉

(Miragram) 各村围了起来。穿过这些村庄，我在下午到达萨诺噶尔 (Sanoghar)。萨诺噶尔村比较大，果树很多。尽管背靠冰川，硕大悬铃木树依然长得茂盛，装点着吉德拉尔侦察兵 (Chitral Scouts) 的夏季训练场。这支大有可为的地方军队系模仿西北边省珲钵尔 (Khyber)、库拉木 (Kurram) 和其他地方的军事组织而组建的。指挥官索耶 (Sawyer) 上尉在他的住处热情地用茶招待我。这座房子又兼做他的办公室，虽然简陋，却很舒服。我们谈论了很多有关这里山区的情况。这里的山势险恶，景色却像阿尔卑斯山那么漂亮，不愧为一个绝佳的训练地，在另一边阿姆河方向的风光更加引人入胜。

然后，我被领去参观新训练的马斯图吉部队，训练场就是宽阔的马球场。这些山民的身体柔韧性好，警觉性高，才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已经具备了军人的敏锐感。

M. Aurel Stein

他们虽然生来就善于攀缘和射击，但最初两个月的训练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后每年一次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足以确保其水平不断提高。在这里，我企盼了许多年的愿望实现了。造物主好像特地把他们塑造成这样，让他们来保卫兴都库什山脉；因此，我在当年穿越罕萨时，就想到把他们编成雇佣军。他们很想为我表演他们新的训练项目，但我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继续进行考古活动。我沿着崎岖的山脊而行，俯视着下面的河水。这个山脊以萨诺噶尔的古城堡——萨诺噶罗（Sanogharo）而著名。这里发现了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质地坚硬，表明很早以前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居住。另外，站在这里，人们可以一览对面尼萨尔果勒（Nisar-gol，gol 意为山间谷地——译者）高地的全景。1895 年，凯利（Kelly）上校在尼萨尔果勒高地成功

⑰马斯图吉村民：汗萨合普·皮尔·巴合斯和库尔班，以及布尼



地抗击了敌军，为解除对吉德拉尔守备军的包围扫清了道路。

从萨诺噶尔村向上 1 英里，一场大雪崩沿河而下，我在这个地方拜别了索耶上尉。山谷两侧悬崖峭壁，光线暗淡。穿过山谷，我继续快速赶往马斯图吉。当这座首府出现在视野之中时，天快要黑了。此地石头多，几个小村庄横卧在荒凉的高地之上，雅尔浑河与其主要支流拉斯普尔（Laspur）河在此地汇合。马斯图吉的实际掌权者巴哈杜尔汗（Bahadur Khan）在河左岸的桥头等候我的到来，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堂兄和两个孩子。虽然年龄已经有 80 岁，满头白发，可这位首领依然是威风凛凛，充满了活力，享受着生活的真正乐趣。吉德拉尔人和乌姆拉汗（Umra Khan）领导的帕特汉人包围马斯图吉城堡时，他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作为州长，他立场坚定，忠诚可靠，实际上已独立于吉德拉尔之外。他性情直率，不拘小节，却又遵循传统礼节，在吉德拉尔的所有欧洲人都喜欢他。

巴哈杜尔汗坚持领我去宿营地，帐篷搭在一个不大的果园里，不过，马斯图吉可以拿得出手也就几个这样的果园。白色的李子花散落一地，草坪上懦弱但是耐寒的蝴蝶花绽放着淡蓝色的花朵，香味扑鼻，从克什米尔到突厥斯坦地区的山谷，我一直不断地遇见这种花。虽然只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却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多亏果园地处偏僻，宁静安谧，我深感欣喜。马斯图吉有印度北部的最后一个电报局，我早就盼望着到这个电报局，现在必须充分加以利用。通过电报，我把近两周发生的见闻发送到万里之外的欧洲。在印度边疆，人们还可以享受通过孟买（Bombay）发送的挂号电报的好处，不过，其实印度各地的电报普遍都便宜。

在马斯图吉，我让从沙尔哈德（Sarhad）来的两个瓦罕人先行一步，去通知当地我们即将到达阿姆河的消息。5 月 13 日上午，在殷勤的沙合普汗（Khan Sahib）护送之下，我们启程北行。时值夏天，雅尔浑山谷的积雪融化，河边的道路变得很危险。好在现在是初夏，山谷的最狭窄处仍可以通过。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第一

M. Aurel Stein



⑱马斯图吉统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汗萨合普·皮尔·巴合斯和马斯图吉侍从

天就翻越过了一座座荒凉的山坡。这里的最高峰约有17 000英尺，米拉格拉木就坐落在山脚下。离开马斯图吉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悬铃木树和熠熠生辉的蒂里杰米尔山峰。沿途崎岖的岩石和碎石之上散落着零星的村庄，一小块一小块田野里有不少的石头，村子里的果树正在开花，这时正值果树的第一个花期。

在布热普（Brep），我考察了一座古城堡废墟。这座城堡建在小溪出口处碎石滩上的巨砾之上，为梯形建筑，长180英尺，宽130英尺，用土坯砌成。据本地传说，这座城堡可能建于卡尔梅克（Kalmak，中亚各地对蒙古人的称呼——译者）时期或中国统治时期。根据土坯的大小、构造以及混杂在其中的陶器碎片的坚硬程

度判断，它很可能建于18世纪以前的中国占领时期。这里的山民几年前才停止使用铸币，他们连制作艺术饰品所需的铁及其他硬材料都没有，他们怎么能够复原如此古老的遗迹呢？另据说，这里曾发现了箭头状物，但我没能找到一个样本。

米拉格拉木位于雅尔浑山谷最高处，这个小村庄就像它的名字那样美丽。苏布哈克木（Sub-Hakim）有一处大果园，是个宿营的好地方。欧拜杜拉（Obaidullah）家的林阴之中有一个诵经台，旁边的草地上落满了李子花，看上去宛如片片白雪，我就把帐篷搭在了草地上。晚上，空气温和，没有风，我感觉仿佛回到了新疆沙漠边缘上那些可爱的小绿洲。欧拜杜拉家的房屋用砾石建成，外面看上去很简陋；可在内部，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饰物和家用艺术品琳琅满目，简直就是一座博物馆。走廊的墙上画着奇异而优雅的壁画，有赤褐、黑和白3种颜色，壁画镶有荷莲和四

⑲欧拜杜拉和他的儿子以及村民，在米拉格拉木



M. Aurel Stein



⑳欧拜杜拉家的大厅，在米拉格拉木

瓣花的花边，这些壁画和我1901年在尼雅（Niya）发现古建筑大厅墙上的壁画看上去完全一样。客厅和起居室的墙壁镶着板条，柱子上刻有图案，做工十分精良，陈列着精美的地毯和做工精细的日用铜器及其他家用器具。房子外表简陋，我真没有想到内部还有这么多好东西。

地上铺着吉德拉尔和巴达哈商地毯，门上挂着用燧石制的镶花锁，加上其他陈设，这间屋子仿佛就是古代荷兰画家的画。我又是拍照，又是记笔记，竭尽所能要把屋里的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奈克·拉姆·辛格则忙于绘制古代木刻的图案。然而，可惜的是我仍没能把屋内的豪华陈设全部都记录下来。我特别希望有办法将之整体移至别处，再建造出一所这样的房子来。仔细端瞧雕刻精致的木壁龛（Mihrabs），我心中敬佩不已。见我如此喜欢这些壁龛，欧拜杜拉欲把它们从墙上摘下来送给我，

我怎敢接受这样的礼物，那样无异于破坏文物。显然受到躲在幕后的夫人们的怂恿，欧拜杜拉端出了他家的珠宝箱给我看，里边有护身符、耳坠、项链等，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偏远的山谷里，银匠忠实地保留了古印度的品位和装潢设计风格。你瞧，做好事总会得好报吧，我不收人家的壁龛，却因此大开了眼界。

从米拉格拉木出发，经过漫长的旅程之后，5月14日到达了苏伊斯特(Shuyist)，我们要在这里为进入瓦罕做最后的准备。赤裸裸的岩石坡和碎石坡一座挨一座，路上碰见几个夭普（Jhopu）小村庄。这儿的田野一片荒凉，几乎没有一棵果树，表明雅尔浑山谷海拔高的地方，气候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我们沿达尔班德(Darband) 幽暗的小道继续向前走，小道山峰高耸，陡不可攀。烽火台楼腐朽不堪，这个天然屏障对马斯图吉的防御作用从中可见一斑。再往上走，山谷变得开阔起来，谷地出现了丛林和灌木丛，表明这里的可耕地没有海拔低的谷地开发充分。山谷的村庄中数苏伊斯特最高，它是个资源贫乏的山村，我已经为将要见到的荒凉景色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在灌木丛生的沙地河岸上搭下帐篷。果然不出所料，所能看到的只有几处梯田和低矮的石头房。但最令我吃惊的是见到了成队的马匹和民工，那是尊敬的汗皮尔·巴赫斯带随从迎接我的到来。

5月15日早上，还没有来得及寒暄几句，这位谦逊却很有能力的英国政府在马斯图吉的代表就离开了。把邮件寄走后——这是在印度境内发送的最后一批邮件，我跟随行李继续往前走。不多久，我就发现这里的马和民工都很能干，于是心中稍微放宽松了些。道路不再像以前岩石坡和碎石坡上的小道那样走起来让人郁闷，穿过了一个个广阔的冲击扇，见到了大量的可耕地。被开垦的丛林，零零散散的田园，没有墙篱的土地，一派耕种劳作的气息。在苏伊斯特集合的马匹和民工大都来自这些地方，如伊木克普（Imkip），齐提萨尔（Chitisar），阿不杜拉·拉什提(Abdullah-lasht)。已经耕种了的土地只占可耕地的一小部分，也许只有1/10。

M. Aurel Stein

不久，我就意识到在整个雅尔浑山谷，数这里的可耕地最多，其提供的垦殖空间即使不如吉德拉尔多，但不会比吉德拉尔少。我从米拉格拉木睿智的哈克木(Hakim)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新来的垦荒者已经占有了前期开垦的土地，在肥沃田野之上是由新定居者首先开垦的梯田。梯田的现状完全证明我所了解到的信息确凿无疑。骑马行了几英里，我发现废弃的田地逐渐有人耕种了。我不禁记起了中国史书的一段话，其中提及阿赊旭师多（A-shê-yü-shih-to，应是《唐书》的记载——译者）在公元8世纪还是商弥（Shang-mi，即马斯图吉）这个小山国的重镇。毫无疑问，商弥这个名字在更早以前就是苏伊斯特（Shuyist）的别称。我曾试图确定商弥的位置，但却没有成功。苏伊斯特（Shuyist）现在仍然在使用，包括这一可耕地的全部地区。

㉑雅尔浑山谷达尔班德隘路，以及烽火台废墟



我的向导，包括库尔班在内，都倾向于认为过去之所以废弃田地，是因为冰川的扩张导致天气愈来愈冷。从这个地方往前，冰川确实成了风景的主体部分。一条巨大的冰河与阿不杜拉拉什提相对，阴暗的河水一片冰封，那就是萨约斯（Shayos）河。假使没有了冰川，海拔约10 500英尺的舒伊斯特也照样会很冷，可这儿的大麦和燕麦长得不错。在过去1200年里，无论这个地方是否受到了重大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下面这个有趣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即已经休耕了几个世纪的田地现在之所以重新耕种了起来，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和平统治直接引起了人口增长的初期压力。

我们在灌木丛的一小块草地上安营扎寨，南面是海拔在21 000英尺以上的冰川，与以前见到的冰川同样的高大。就在要到了这座冰川的时候，我看见了兴都库什山脉主脉闪闪发光的冠状山脊，那就是兴都库什和阿姆河的分水岭。想到帕米尔就近在咫尺，我心中兴奋不已。



第六章

德尔果德

从康洪库齐（Kankhun-kuch）到巴罗吉尔（Baroghil）山口只需两次行军。巴罗吉尔山口海拔仅12 400英尺，是兴都库什山脉中的重要鞍状山脉，穿过了山口，我们就到了阿姆河的最高点。但在穿越山口之前，还有一项任务需要完成，而我已经作好了面对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德尔果德山口（Darkot Pass）海拔约15 400英尺，位于雅尔浑山谷最高部分南边的冰川之上，其实它并不在我们的路线上。然而，从一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德尔果德山口。根据《唐书》（T'ang Annals）的记载，公元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Kao Hsien-Chih）曾经率军途经那里，并成功占领了亚辛（Yasin）和吉尔吉特（Gilgit），这是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很早以前，我就对德尔果德山口的地质产生了兴趣。山口的北坡是长六七英里的冰川斜坡，人和不驮行李的牲口只有在夏天才能上去，而这里的夏季短暂，所以要越过山口必然会困难重重。现在登山还为时尚早，马斯图吉人以前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登过山口，况且今年的雪又很大，此时登山更不可能。好天气是登山的必备条件，可我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到达康洪库齐以后不久，山上的乌云越聚越多，我心中万分焦急。

5月15日晚，雨下了起来，持续到了16日。由于所处海拔较低，仅有10 700英尺，所以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可我们由此对这么早就登山的想法产生了疑问，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积雪会变得松软，登山的进程将因此受到极大的阻碍。维丁阔特（Vedinkot）位于德尔果德山脚下，它是一个夏季牧场，我们就从维丁阔特启程登山，到达维丁阔特花费的时间并不长。雨在早上就停止了，我们则晚些时候出发，天空依然阴沉沉的。我们沿着狭隘幽暗的山谷向上走，穿过一条条浅浅的河流，我盼望着能吹来一阵清爽的微风，为明天送来清新的空气，但这都是徒劳的。

幸运的是，沿途风景秀美，我们暂且忘记了艰辛和疲劳。从北部的大山脉往南，大大小小的山峰高度从21 000~22 000英尺不等，冰川绵绵延伸到每个山涧和小山谷。其中一个叫阔塔尔喀什（Kotal-kash）的冰川仿佛高高的鼻子，一角延伸到了河的左岸，它还在持续延长，恐怕不久便会阻塞住河道。右岸的山坡上岩石参差交错，悬崖峭壁拔地而起，阻断了道路。我们不得不把行李给牲畜卸下来，换由人来扛。所幸，这些天大都是阴云寒冷的天气，河水也不深。我们不断涉水而行，不必再去艰难地攀登石坡了，况且夏天驮行李的马匹也不能走这条路。然而，即使在南部几个山谷的入口处，在从冰河上端流下来的层层废石中间，仍然可以辨认出早期的梯田来。

当南面的查提博依（Chatiboi）大冰川映入眼帘时，我惊奇地发现左岸有一小河堤，地势平整，还有人耕种。苏伊斯特向导告诉我，这些地属于4户瓦罕人家所有。他们六七年前来此地居住，艰苦劳作。这儿周围的环境非常美丽，宛如艺术家设计的一般。维丁阔特正对着冰川的山脚，它广阔的谷肩上长满了草，我们在翻越谷肩时，看见了其他可耕的田地，现在这些地归属这些强壮的移民。谷肩之后是个荒凉却可以掩蔽的小山谷，适合做宿营地。然而，我想把营地扎的离德尔果德越近越好。于是，我们接着穿过查提博依冰川上狭窄山谷中的河流。由于受到巨石和峭

壁的阻挡，河水在这里形成狂暴的急流。我欣喜地发现河上还有一座桥，比冰川稍高，这样就可以从河上运过去。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近些年冰川在不断增大，在1903年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去巴罗吉尔路过此地时，其终端就在河边，而现在它已经越过河干，延伸到了右岸，河水只能从冰川下的隧道里流过。

我在一小块高地上扎下帐篷，下面的峡谷被冰覆盖，小溪弯弯曲曲地流向河流，冰川的右侧尽收眼底。峡谷间景色凄凉，虽然春天快要到了，但这里仍还没有春天的迹象，地上覆盖着大堆大堆的积雪。山涧里刮着冰冷的大风，可是空中低沉的乌云却岿然不动。汝康（Rukang）山口海拔约12 000英尺的（这里有一条路通往巴罗吉尔）冰川的融水流入低处的小冰斗湖，冰斗湖在遍地积雪的映衬之下显得孤零零。登上山口，除了冰川和冰斗湖之外，什么东西也看不到。我之所以不辞劳苦，就是为了勘测德尔果德。

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登山需要某种乐观主义精神。参与这次攀登的人以前从未在这么早的季节登这座山，他们并不掩饰对此次冒险的担忧。从这里到山口是冰川道路，今年的积雪又特别深，而近些天的天气使积雪的表面变得松动。所以，库尔班和苏伊斯特头领极力劝阻我不要登山时，我并不感到任何惊异。不过，我并不打算让他们参与这次行动，再说，继续在山脚下等待下去只能徒增困难。无奈，最后他们也认为立即登山才是上策，他们也许意识到了我决不会让人去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为了应付恶劣天气可能引起的各种事故，我决定只携带两天用的给养，其他任何所需物资只能带一个或两个晚上之用，且以不会导致危险为前提。考虑到每个人所携带食品、毯子、燃料越轻越好，我决定带12个人登山，其中包括两个健壮的瓦罕人，这两个人在维丁阔特加入进来，懂得波斯语，这一点对我特别有用。

选好人员，检查完装备和食品，检验了攀登冰川用的绳索，这时天色已很晚，我只能休息几个小时。凌晨零点半，我起了床，天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下雪或下

雨，可云彩依旧很低，空气憋闷，前景仍不容乐观。在这不同寻常的环境之下，我的兴都斯坦厨师不辞辛劳，坚持让我吃了晚饭再出发。正在这时，刮起了一阵微风，不一会儿，云缝里闪出了星星来，出发的担忧解决了。凌晨3点钟，队伍向汝康山冈进发。我们发现山顶仍然被大雪覆盖，雪的表面松散。不久，我便意识到这将大大延缓行动进程，由于海拔较低，夜间温度还不足以冻实表面，三四英尺厚的积雪又松又软，不时还会掉入埋在雪下的小河里，因此走起来又慢又累。

尽管除了用水银气压计测量山高之外，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可测量员拉姆·辛格乐意陪我登山。愿望归愿望，这个可靠的家伙的身体状况注定引起麻烦。上次去西藏，他从江孜（Gyantse）到了芒萨罗瓦（Mansarowar）湖，身体变得很胖，在测绘局指挥部（Survey headquarters）不景气时期，这必然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从杰格德拉，他一直坚持自己骑马，现在又要涉水过河，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使他落得不至于太远，我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一等。

我知道，在继续攀登冰川以前，德尔果德冰川（Darkot Glacier）以北积雪覆盖的斜坡是必经之地，而且还有可能发生雪崩，因此必须尽快翻越这些山坡，越快越好。可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愿望仍没有实现。这里留下雪崩发生的很多痕迹，测量员拉姆·辛格见到这种情形，也加快了速度。直到下午7点，我们才走过了危险区。积雪覆盖着冰碛，攀登起来速度不快，若距离埋在下面的巨石太近，就会掉进深深的积雪中，但这个地段已相当安全了。

1个小时之后，我们抵达了这个广阔的冰川之上。即使没有智慧的瓦罕向导的提醒，我们也能正确无误地辨别出裂缝来，因为裂缝处都有皱纹。冰在此处形成了一座桥，上面盖满了积雪，冰桥还很坚固，足以承载我们的重量，但绳索仍是必需的预防措施。我把队员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用一根绳。马斯图吉人和瓦罕人以前经常攀登结冰的山坡，完全明白其中的危险，但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绳索。让人高

兴的是，这些人天生是登山的材料，他们很快掌握如何使用这具有阿尔卑斯山特色的登山用具及其保护作用。一路上，绳索拉得绷直。不久，我发现他们把绳子系成了圈，比我们前进的还快。

我们正在攀登的斜坡看起来并不难走，几乎就像一块平地。雾霭之中，两侧高高的雪墙出现在视野之内。阳光透过薄云，光线越来越强，可雪面依然很瓷实。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走起来仍很艰苦，花了将近 5 个小时，才走完到山顶约摸 6 英里的路程。过了最险恶的地区，我们不再等待测量员而继续前进。我很多次都以为是已经到达了冰川林立的峡谷的顶部，其实不过是谷肩而已。斜坡看上去容易爬过去，可实际上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我逐渐理解了高仙芝翻越此山的故事。当年，高仙芝率领中国军队登上山顶，面对着笔直陡峭的南坡（亚辛方向）时，军队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惧之中，他们这才意识到已经攀登到了何等的高度。天空放晴，西边的德尔果德山口两边冰川高耸，冰川的顶峰洁白无瑕，风光异常美丽，令我们终身难忘。山口中心的山峰高近 23 000 英尺，俯瞰着查提博依冰川（Chatiboi Glacier）的西侧面。在巴罗吉尔，人们仍能欣赏到这座山峰的壮丽景观。

炙热的太阳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光线越来越弱。面前的山坡上形成了白色的雾霭，离冰川最近的山冈也只能模糊地看到其轮廓。从山口上吹来一阵强风，不一会儿，飘起来小雪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高兴有这么一股凉爽的风，谁知道这场雪让我吃尽了苦头。尽管我们戴了护目镜，抹了护肤膏，但太阳的反射光仍刺得眼睛和皮肤发痛。寒风刺骨，穿透了裹在头上的围巾，不久，我冻得直想找个地方避避风。第二天晚上，一觉醒来，我的脸浮肿得厉害，起了水疱，我这算领教了雪地和雪花反射的光线是何等的强烈。我们越登越高，队员开始抱怨头痛，说“空气里有毒”。他们身上扛的东西并不重，但松散的积雪累得他们筋疲力尽。

午后不久，圆形状山脉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夏威塔赫（Shawitakh）冰

山和东北的德尔果德在它附近分离开来。快要到达山顶时，宽阔的雪地变得几乎是水平的了。向导找到阔塔尔（Kotal），我们就地休息。这时，东南方升起了烟雾，一会儿又消失了。亚辛山谷最高处两山相对而立，水蒸气久久没有散去，山谷显得一片荒凉。脚下的山谷高深莫测，风从山口北面吹过来，水蒸气出现了一条裂缝，我们这才看清这山谷是多么深。德尔果德小村海拔6000多英尺，山口的南山脚就在小村附近，但裂缝持续的时间太短，我们还没望见山脚，裂缝又消失了。然而，即使这短暂的一瞥，就能看出山南和山北有明显的不同，南坡陡峭，积雪掩盖下的北坡宽广辽阔。

我又想起了中国史书中有关高仙芝勇敢翻越坦驹岭（Mount T'an-chü）的故事，高将军设计使他的3000军队成功穿过了此山，我已在别的章节提及这个故事。令我欣喜的是，我亲眼所见的德尔果德实际状况和高仙芝所见的很相似。这位高丽裔（Corea）将军率军横跨帕米尔高原，翻越了亚辛和吉尔吉特北部关口的高山屏障，他是这项壮举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人。我们堆起圆锥形的石堆，以表达我对高将军的敬意，但这还不足以表达敬畏之感。这里几英尺深都是雪和冰，再无他物，更显示出高将军是如何之伟大。于是，我立即给巴黎著名汉学家我的朋友沙畹（他是叙述高仙芝远征的第一人）写了封短信，告诉他我的所思所想，我还在这里拜祭了高仙芝的伟大创举。

我并没只顾回想这些历史事件，而忘记了卑微却很忠诚的队员。由于"空气中有毒"，他们的行李全由我来搬，队员们则累倒在雪地里。一些人头疼得厉害，还伴有其他高山反应的症状。我带了一大水瓶的茶，每个人喝上几口，精神好了起来。茶虽苦，却不失为一种药力十足的达瓦依（Dawai，瓦罕地区的一种药茶——译者）。测量员拉姆·辛格赶上时，我们席地而坐，尽管寒风刺骨，不时吹来阵阵小雪，可我们心满意足。水银温度计被安置稳妥，显示17 450英尺，44华氏度，据此测

算出了山口的准确高度。过去，我们估计山口的高度在15 400英尺左右。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实现了目标，我们对此很满意。下午3点钟，我们开始下山。虽然比预期提前几个小时走出了山顶的雪地，但直到下午5点才走完了冰川险恶的裂缝区。不过，速度从这里慢了下来，令人心情沮丧。罅隙又宽又深，没有了以往雪形成的坚固的桥，所以走起路来必须小心翼翼。在几个地方，队员陷入腋窝深的松软积雪里，借助绳索很快爬了出来。冰碛上盖满了积雪，坡顶溜滑，下山变得更加困难，况且还有尖削的巨石。由于害怕雪崩，积雪松散，前进缓慢，所以同行的瓦罕人不愿再走像上午那样绕斜坡而行，而是领我们径直沿面积巨大的、赤裸裸的冰碛下山。我们爬山爬了一天，现在累得筋疲力尽，再在这凌乱的岩石中

㉒自德尔果德山口顶部西北眺望德尔果德冰川（朝向印度河—阿姆河分水岭）





㉓自巴罗吉尔鞍状山脊眺望阿姆河谷地

行走还能不慢？我感觉脚下的阿尔卑斯山鞋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不禁妒忌起了马斯图吉人的粗大却不失灵巧的软皮平底鞋。

就在我们到达靠近冰川山鼻处海拔最低的冰碛，准备再次登汝康山冈时，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不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所幸库尔班考虑到了我们快要下山，准确判断出了我们的行进路线，因此赶着马来迎接我和拉姆·辛格。再说拉姆·辛格，他休整了1年后，首次登山累得他疲惫不堪，身上满是雪花，冰川上的雪泥和雪水快把衣服湿透了，晚上8点才回到驻地，我喜出望外。今年的雪特别大，出发时时节尚早，天气状况恶劣，时间有限，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登上了德尔果德山口，并且没有发生任何可以避免的危险，我现在可以安心地休息一下了。我们为参

加登山的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烤了一只全羊，备好了充足的茶水，放上优质糖。大雪下个不停，极冷的冰川就在附近，但大家今晚却觉得心满意足，篝火边飘起一串串歌声。

5月18日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就起了床，面部严重浮肿，长满了水疱，恐怕我最好的朋友也认不出我来了，可天气总算晴好，弥补了这些不快。虽经不断清扫，我帐篷上的积雪仍冻得结结实实。所以，直到上午8点，太阳把冻硬的表面融化以后，我们才把行李运往巴罗吉尔。前天，我们雇用了民工和马匹，在汝康山口三四尺深的雪地里扫出一条路来。虽然如此，我们却花费了3个多小时才翻过本来很易走的山坡，这些山坡把我们的维丁阔特营地和开阔的迈丹（Maidan，意为宽阔的平地——译者）分开，此地即巴罗吉尔亚依拉克（Baroghil-yailak，意思是巴罗吉尔草原——译者），通向瓦罕的路线也在此处和马斯图吉河的主要山谷分道扬镳。由于海拔较高，约有11 000英尺，现在这个具有帕米尔色彩的山谷大部分依旧白雪皑皑，但在夏季这里却成了萨尔哈特（Sarhad）牧羊人的首选牧场。

我们继续向齐克马尔罗巴特（Chikmar-robat，人们通常在此地扎营）前进，距巴罗吉尔的鞍状山脊不足4英里，山谷很开阔。巴罗吉尔鞍状山脊是印度河和阿姆河的分水岭，海拔仅12 400英尺。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在今天登上山脊的希望渺茫。天气晴朗，气温温和，积雪变得松软。刚走1英里，再继续行走就极端困难，驮行李的马则无助地一动不动。于是，我们只能在齐克马尔罗巴特扎下营来，给马卸下行李，连同所有能腾出手的人员先行一步，开辟一条道路来。

宿营地之上是个山坡，环境较为舒适，在那里德尔果德山口两侧的壮美山峰尽在眼前，巨大的冰溪从峰上流下来。我还看到查提博依冰川的全貌，阔约祖木皮亚克（Koyo-zum Peak）像钢针一般从最高处的冰原上拔地而起，冰川的最高部分叫卡兰达尔胡木（Kalandar-ghum），冰川陡峭，从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大瀑布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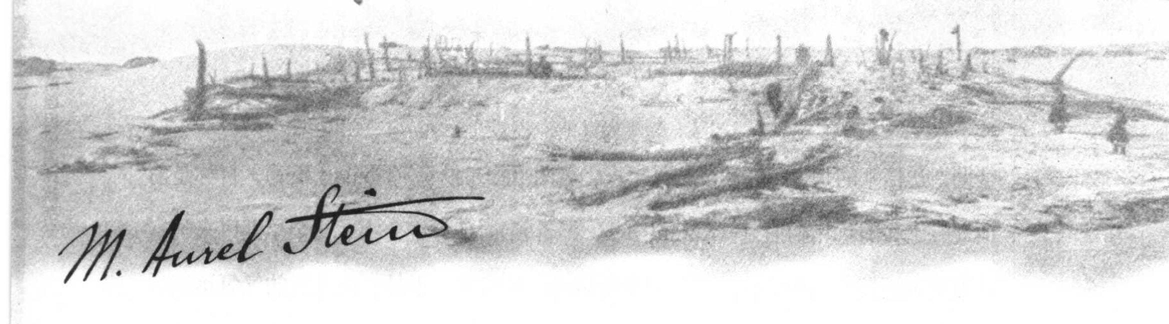
冰。通往德尔果德的道路大都为冰雪所掩盖，即使没有昨天的经历，单从两旁闪光的雪壁和冰墙，我们就能从中明白穿过此山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如此。像罕萨一样，这里亦不是主要的分水岭，南面和其相连的山脉构成了抵御北方入侵的真正堡垒。

还在马斯图吉时，我就派人送出信来，可至今仍没有阿富汗人和运输工具迎接我们的迹象。夜幕降临，在通往阔塔尔的积雪上跋涉，马匹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没有力气沿着瓦罕这侧的山坡上继续走下去了，况且这边的积雪也很深。第二天早上，这些马恐怕难以驮行李再走下去了。随行的民工实在太少，没有额外的人去扛行李，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山口待上几天，前景显得悲观无望。一位阿富汗上校差人送了一封信，我在吉德拉尔就听说由他迎接我们。信中允诺提供好马和一切所需的

㉔巴罗吉尔鞍状山脊西南方向的风景



帮助。送信来的是个年轻活泼的瓦罕人，名叫哈加布伯克（Ghajab Beg），自称是前面地方士兵的喀热勒伯克（Karaul Beg，即首领）。他详细介绍了几个星期以来阿富汗方面为迎接我们和给我们提供帮助所做的各种安排。于是，帐篷里的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我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感激友善的哈比布·乌拉国王，是他允许给我开放最东边通往阿姆河的路线。如果没有国王的许可，我将不得不选择另外一条路线，那条路上有更高的霍拉伯尔特（Khora-bhort）山口，山口和雅尔浑山谷之间冰川林立，累得要命的吉德拉尔民工和马匹怎还能有力气翻越山口和冰川呢？若没有这样格外的关照，何年何月才能越过巴罗吉尔呢？



第七章

阿富汗之瓦罕

在动身去阿姆河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温度计显示的最低值为5华氏度。5月19日早上6点，我们出发前往山口，天空这时没有一丝云彩，雪冻得结结实实。看着一长队马匹在闪亮的雪面上前进，而不必顺着前天费尽力气铲出的道路，我的心情愉快极了。太阳的光线越来越强，我在德尔果德已经领教了它的厉害，脸上起了水疱，这警示我们要加速前进。上午7点半，我们到达了巴罗吉尔鞍状山脊的地势平坦地区。夏季，这里的水无声无息地流向印度河和阿姆河，但现在到处仍是至少五六英尺的积雪。下山时，头两三英里没遇到什么困难，只不过驮行李较多的一两匹马跌倒在被雪覆盖的水道里。到上午9点，雪面已经变得很软，马队跌跌撞撞地前进，前来迎接我们的15匹强壮的驮马终于来了，接我们回去。积雪阻塞了道路，覆盖了河道，若是瓦罕人不来，即使给马卸下行李，它们也无法走过去。克服了重重困难，马匹被牵到了山冈的顶部，这里是页岩表面，部分雪已经融化，天生淳朴的瓦罕人则扛起一个又一个行李箱。

终于，侧面小山谷的谷地出现在视野内，我们看见了第一块相对干燥的地方，上面还有植物生长的痕迹。那是一片梯田状的草皮，归扎尔提哈尔（Zartighar）村

所有。我决定在草地上停一会儿，等候行李被零零星星地运下山。我刚要简单吃些早点，库尔班和我的印度随行人员慌慌张张跑来，说两位阿富汗官员马上就到。经过昨天的长途跋涉，我的外表十分糟糕，令我颇感难堪。一旦走出印度边境，我就要遵循东方的礼仪观念。我急忙穿好我的最后一套旅行套装，其实事先我已经把套装放在了马褡子里。尊敬的日萨勒达尔·阿布杜拉汗（Risaldar Abdullah Khan）率领上校的护卫队，携快活的瓦罕长老（Wakhi Ak-sakal,“Aksakal”，意思是白胡子，专指年长有威望之人）穆巴拉克·沙赫（Mubarak Shah），代表军政显贵热烈欢迎我到阿姆河。在阿富汗这个东方最后一个王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是过去我不敢奢望的。他们邀请我去2公里以外大山谷里的托普哈纳（Top-Khana，即扎尔提哈尔的烽火台）去达斯塔尔汗（Dastarkhan，意思是餐布，这里指休息、吃饭——译者）。

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我和主人及其瓦罕仆人坐在一条破旧的毯子上，毯子就铺在废弃的烽火台下。满眼的五颜六色，蓝天白云，欢快的中亚随行人员。风光沧桑荒凉，衬托之下，色彩显得更加鲜明，我的心情也振奋了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好似久违了多年的新疆风光。我们最终越过了阿姆河谷地，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期望能有朝一日，来阿姆河谷地考察，我以前只是在瓦合吉尔（Wakhjir）的冰川上瞥上一眼，未能身临其境。食物其实很简单：淡淡的绿茶，燕麦馒头和几块嚼不动的排骨。可是，若不是主人流露出歉疚的神情，我还觉察不到这一点呢！上瓦罕属于贫困地区，迎接我们的阿富汗卫队的到来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物资雪上加霜。随行的两个印度人礼貌地拒绝了这些食品，我心里好像塞上了一块石头。我当然知道印度教规不允许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皈依印度教的廓尔喀人）和奈克·拉姆·辛格（锡克教教徒）吃这些“不洁”的穆勒恰斯（Mlecchas）食物。在即将进入中亚的时候，通过这件普通的小事，我意识到，与印度相比，欧洲与中

亚更为接近，印度虽然对欧洲人来说较为熟悉，可无法让欧洲人理解。

在库尔班老人的照管之下，行李到达了。我们骑上马，浩浩荡荡，顺着越来越宽的山谷，向与阿姆河的交界处出发。在皮特哈尔（Pitkhar）零星的田地附近，我欣喜地在西边出口处陡峭的山冈上第一次发现了古长城。根据中国古书中有关高仙芝远征军的记载，我在这里找到了那条防御阵线。公元747年，吐蕃人就是在这条阵线上阻挡高仙芝军队从阿姆河挺进巴罗吉尔。

不一会儿，我就要和西仁·迪尔汗（Shirin-dil Khan）上校会面，没有时间做进一步的考察。老上校果然英勇果敢，全身戎装，骑着一匹良种巴达赫什（Badakhshi）马，疾跑在队伍的前头，热烈欢迎我的到来。受埃米尔的弟弟、阿姆河省（Oxus Provinces）的总司令官纳斯如拉赫（Nasrullah）亲王的派遣，上校将负责护送我们安全通过阿富汗管辖的帕米尔地区。他们已经在萨尔哈特等候了4个多星期。他具有军人的气质，性情和蔼，身体粗壮，为人直率，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尽管征战多年，但这位阿富汗东北先锋营长官（Warden of the Afghan Marches）依然威风不减当年。上校大概快要60岁了，艰辛的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痕迹。在欢迎仪式上，他身穿俄罗斯式军服，头戴黑色毛皮高帽，文职官员如上瓦罕州的州长哈克尔·曼苏尔汗（Hakim Mansur Khan）也穿着类似的衣服，但他们看上去都不如上校显得合身。以后，这位州长给予我一切可能的照顾，他的出身和行为方式是典型的阿富汗喀布尔（Kabuli Afghan）式，他流亡印度多年，讲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对欧洲人的礼仪风俗了解甚多。不过，同直率的老上校相比，我们仍能在他身上找到亚洲人的气质。

沿着萨尔哈特的一个大村庄对面的平地，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我们骑马慢跑在队伍的前面。路面是沙质的，骑兵（近200人）过去，留下两行马蹄印，煞是壮观。这些士兵所受的操练显然不够规范，军服和装备杂乱无章，但看上去都很粗壮，组

织严明。上校解释说，他们都是从巴达哈商山谷和瓦罕招募的民兵，编入俄阿边境阿姆河段的专职兵团。除了军官之外，真正的帕特汉人所占的比例很少。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如果加以合理的指导和供给，这些强壮的伊朗裔山民可以成为一支优秀的军队。马可·波罗（Marco Polo）不是把巴达哈商族人比喻成“战争勇士”、把瓦罕人比作“英勇军人”吗？

山谷开阔宽敞，阿姆河在谷底分成几支宽阔的支流。检查完队伍后，我们开始涉水过河，虽然阿姆河冰雪渐渐消融，但河水依然很浅，我想让河水冲刷我的手，以此作为我向这条大河的虔诚的敬礼，我骑在马背上，手勉勉强强够着水面。许多年的等待后，我终于回来了！抵达了阿姆河上游，我欣喜不已，感觉距离下面那些迷人的地方又近了一步，那里是我在年少时就心驰神往的地方呀！很多年以来，那里一直不对欧洲人开放，对我也不例外。可现在，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我坐在上校整洁的帐篷里，行李在好几个小时以后才运了过来。我喝点茶，提提神，吃些美味的瓦罕食品，听着上校用洪亮的波斯语讲述他那美丽可爱的家乡巴达哈商以及他在阿姆河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多谢上帝，西仁·迪尔汗7年前出任巴达哈商以北阿富汗边防军的总司令，我们今天才得以相见。在阿富汗偏远地区戎马多年之后，上校又回到了他一生所热爱和熟悉的土地！巴克特里亚（Bactria）历史悠久，地处偏僻一隅，我们俩对这个地方都感兴趣；于是，见面之后，他就滔滔不绝，满足我对古老的巴克特里亚的好奇心。

上校见识广博，虽然才刚跨入阿姆河的门槛，单是因为上校，我就想留在这里不走了。晚上，我把帐篷搭在比阿富汗“民兵”帐篷高的地方，间隔一段距离。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地方首领们的礼节拜会，静静地反思一下我们的处境。我意识到，除了我本人想急于迅速到达新疆进行考察外，一些现实的因素也促使我继续前进。可靠的信息表明，为了我向东到达中国边界，在贫瘠的上瓦罕非常有限的资源许可

条件下，任何帮助都是在埃米尔的命令之下进行的。同样肯定的是，执行护卫任务的军队驻扎在山谷的最高居住区，这儿恶劣天气，居住地方不足，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吃尽了苦头。

在我的帐篷里，几个温和的瓦罕村民代表私下里哀求我，这些天上校就是主要依靠这些村民供应粮食。我有太多的理由相信，他们贮存的粮食行将消耗殆尽，大雪封了山，春天遥遥无期，我自己也能看得出萨尔哈特今年丰收的希望渺茫。所以，在继续向帕米尔前进之前，我并不情愿多在这里滞留一天。

夜幕降临的时候，和蔼可亲的萨尔哈特长老和村里几个白胡子老人又来找我，他们说的波斯语带有浓重口音，听起来怪怪的，像威尔士人的口音。他们真诚地恳求我，问我能否允许村里几个可靠的村民晚上在帐篷附近为我放哨，这不是提防本村的村民，因为他们个个忠诚老实，而是防备我帐篷边的阿富汗士兵。当然，我不能确定瓦罕人的这种谨慎之举是否真正是为了我的安全，还是害怕不论谁伤害我，他们都难辞其咎。考虑到这是我在阿富汗的头几个晚上，拒绝这样的双重保险是不明智的。

5月20日，我们在萨尔哈特作了停留，我什么也没有做，只管休息。从马斯图吉来的交通工具和民工费用要由我来支付。由于政治局势不稳，货币比率复杂，我还希望根据个人表现另加额外奖金，所以账目弄得很复杂。整个探险活动所有的账目都是我自己做，这样的事对亚洲的旅行者来说就不必赘述了。印度财政部审计长(Comptroller of India Treasuries) 要求我各种支付都要有正式的收据，幸好我带了印好的收据条，这道工序就简化多了，只需要填上数据，写上名字，按上脏兮兮的手印即可。我让最后一位信差通过吉德拉尔，送走信函，安排以后帕米尔探险所需的给养和运输工具。我跟阿富汗主人相互拜访和交换了礼物。就这样，我一直忙活到晚上。然后，我才腾出时间，和健谈的喀热勒伯克骑马到最近的小村庄转了一圈。

M. Aurel Stein

这些村庄散落在阿姆河（当地人称之为 Ab-i-Panja）右岸的梯形冲积扇上，它们一起构成了现在的萨尔哈特，共计有 130 来户人家。

这些灰白色的房屋低矮不堪，与其说是房屋，还不如说是泥土和砾石砌成的窝棚。单从这些房屋来看，人们看不出很早以来萨尔哈特作为阿姆河——塔里木盆地最短路线上的制高点的重要作用。从巴克特里亚来的运送远东和印度物品的商旅队在这里进行最后补给，以穿越蛮荒的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曾说道："骑马行程 12 天，没有人烟，没有绿色，只有沙漠戈壁，所以旅行者必须携带一切所需物品。"这句话恰当地描述了穿越帕米尔情形。向南望去，看着我们走过的巴罗吉尔白雪皑皑的鞍状山脉，就不难理解当初高仙芝越过帕米尔之后，为什么分 3 路大军，集中兵力攻打萨尔哈特对面的连云（Lien-yün）要塞；因为连云可以作为入侵亚辛的基地，并能够把吐蕃人从直接通往印度河的路线上驱赶出去。

西仁·迪尔汗上校和哈克木·曼苏尔汗两人都说，他们奉命要亲自护送我穿越阿富汗边境，送到阿富汗和中国的交界地带。经过我一番劝说，上校同意让他带领的大部分士兵返回喀拉潘加（Kala Panja），只带一小部分骑兵，不过话也说回来，我想上帝心里也不想把士兵全部带上。他已经预先采取了措施，在前面适当的地方建造了几处给养点，但我们仍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第一阶段的行军将因此被推迟。西边的巴罗吉尔路线的出口处有一陡峭的山冈，站在山冈之上可以一览出口处的风光，据说山冈之上就有废弃的防御工事。于是，5 月 21 日上午，我去那里考察，上校则同意留下来料理行李等事宜。

我带上奈克·拉姆·辛格和几个瓦罕人一同前往。瓦罕人包括喀热勒伯克和塔勒米什（Talmish），塔勒米什心灵手巧，为我处理各种杂务，并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我们向南而行，穿过平坦的沙地，越过沼泽地（巴罗吉尔在此流向阿姆河），走了 3 英里的路程。山谷的入口处，峡谷异常狭窄，谷底的宽度仅有半英里左右，两侧岩

石嶙峋，这里是从兴都库什主分水岭延伸过来的山冈的终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符合中国史书中的有关描述，书中记载在公元747年，吐蕃人占领了这里，居此阻挡高仙芝军队向巴罗吉尔和德尔果德前进。吐蕃人在距河15华里（约合3英里）处屯兵八九千人，利用悬崖峭壁，阻挡高仙芝军队前进，可是吐蕃人最终仍失败了。1904年，在这同一个地方，上演了同样的故事。中国军队也利用这里的地势，居高临下，妄图在古鲁（Guru）和喀罗拉（Karo–la）抗击英军（British Mission），结果以防御的一方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和失败而告终。

周围峭壁林立，我对能发现已经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历史遗迹不抱太大希望。在陡峭的岩石坡和碎石坡上攀登了1个小时后，我登上了西边山冈的顶部，往南走不远，到了陡不可攀的岩壁，我这才明白高仙芝军队是如何打败吐蕃守军的。山顶的北端，在一坡度平缓的山坡之上有一座堡垒，知情的瓦罕人说那属坎斯尔(Kansir)。山冈东侧是狭长的山脊，上面还有古长城和棱堡，山冈则向西延伸，在东侧的山脊和西面的山冈之间，一条平缓宽阔的斜坡向阿姆河的喀尔喀特（Karkat）村延伸。

显而易见，在这么高的地方建筑城堡就是为了防卫通向喀尔喀特村的那条斜坡。山冈的北端和东端是无法攀援的悬崖峭壁，峭壁之下1600英尺就是阿姆和巴罗吉尔山谷，所以不再建什么防御措施。山脊上的斜坡和南面的狭长地带建了长约400英尺的城墙，墙上有1个棱堡，山冈西边还有3个棱堡，这4个棱堡保存得很好，有些部分高达30英尺。但是，由于城墙的基座地势太陡，基座已经毁坏，所以相比之下，城墙没有棱堡保存得好。城堡内部的面积很小，最宽处的长度不过200英尺，不知道这局促狭小的空间内是否建造了其他东西，如果有，那现在的岩石地表上当年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但我仍从城墙上得到了一些线索。墙上有一果核形的石堆，粗糙的石头被严密地堆砌在一起，表面为砖砌的，石堆的厚度在4~6英尺之间，土

坯之间被有规则地夹上树枝层隔开。

砖的长度约为8英寸，宽度约为7英寸，厚度约为4英寸，单从砖来看并不能找到明显的线索。但树枝层的使用与塔里木盆地中的古代中国遗迹颇为相似。可以肯定，古人之所以使用树枝，是为了增加墙的牢固程度，在随后继续向东的考察中，证据表明早在中国势力扩张到中亚之初，就有了这种使用树枝的方法。后来在罗布泊（Lop-nor）和其他地区的发现表明，在唐朝时期（T'ang period），吐蕃侵略军在建造城堡的同时，也占领了先前的中国人在那些地方建成的防御工事。因而，在缺乏其他遗址的情况下，我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建造了这些坎斯尔城墙，是中国人在控制从亚辛到吉尔吉特通道的几年时间当中建造的，还是在高仙芝军队撤走之后，吐蕃军队又卷土重来，为了防止再次遭到从侧翼的包围，于是建造了这些城墙和棱堡。

待到考察了废弃城堡并绘制其平面图后，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来欣赏"一览众山小"的壮丽景观。一座白雪皑皑的山脉横亘在广阔山谷的背面，像堵绵延不断的巨型城墙，将阿姆河跟维多利亚湖和大帕米尔分割开来。放眼望去，阿姆河的河床幅员辽阔，延伸到喀拉潘加（Kala-Panja）以至巴达哈商。无论情况是好是坏，我都要继续向东前进。在萨尔哈特以上不远的地方，河床便消失在狭窄的山谷中，这预示着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次艰苦的旅程。所以，午后，我迅速下山，去巴罗吉尔河，我们的马就拴在那里。下午2点，我们见到了等候的西仁·迪尔汗上校。他等候我们的地方正是阿姆河从狭窄山谷的出口处，在山谷和达里孜达拉（Daliz-darra）交界处附近。

由于洪水淹没了阿姆河河床的夏季路线，难以逾越的巨大的雪堆覆盖了海拔较高的山冈，只有通过这条夏季路线，越过一系列较高的山冈，我们才能避开笔直陡峭的峡谷。学着勇敢的老上校及其士兵的样子，我们顺着一条难走的隘道，在右岸

的峭壁和险峻的碎石坡走了大约4英里，我本应该想到这个地区大部分地方都是不适于骑马的。我们的巴达哈商马在陡峭的岩面上灵敏地爬上爬下，令人称奇。我骑的马是西仁·迪尔汗借给我的灰色好马，我竭尽全力，想向大家显示我对这匹马的信心，但我得承认，若没有杂技般的“表演”，这次行军会更加令人愉快。

接着，我们横穿波浪翻滚的河流，河水恰好湿到了马匹的肚皮，右岸同河左岸的道路一样难走。巨大的雪崩阻塞了小山谷的出口，河水冲刷着岩石，我不得不又穿越3条灰绿色的河流，最后我全身都湿透了。然后，我们沿着陡峭的“之”字形道路，来到一处山冈，在这里可以俯瞰绍尔（Shaor）河，离此地不远就是从达里孜(Daliz)山口延伸而来的夏季路线，这条路较为好走。眼睛敏锐的瓦罕向导看见左岸高处一块突出出来的岩石上有一群岩羊（Ovis Poli），老上校不顾黄昏微弱的灯光，趁着马丁尼酒的酒劲，朝对岸就是一枪。虽然他行动机警敏捷，但因距离太远，只能是白费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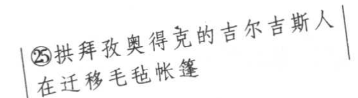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又穿过一条河，到了一个名叫巴哈拉克（Baharak）的地方，这里沙质河区上长着矮小的树木和灌木丛。在幽暗的隘道上，正愁没有宿营的地方，这块地方恰好为我们晚上宿营提供了方便。尽管瓦罕马吃苦耐劳，开局良好，又有足够的萨尔哈特人照看，但在最后几个小时，这些驮运行李的马匹也吃不消了。多亏了西仁·迪尔汗和热情好客的阿富汗仆从，还没等我的队员点着篝火，他们已经铺好了毛制毯子，沏好了茶，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等待的时间太长。

在我们一同行军和宿营的过程中，我很高兴听西仁·迪尔汗讲述他的各种经历。政治上的与世隔绝，有助于保护阿富汗过去的历史传统，他就在这种环境下过着积极的生活。他经历过艾米尔阿布杜拉赫曼（Abdurrahman）继位前后的多事之秋，在条件艰苦的地区工作之后，他才来到他喜爱的巴达哈商，得到了适合他的现在这个职位。在哈扎拉崎岖的山区，他参与了抵抗土库曼（Turkoman）叛军的战争。多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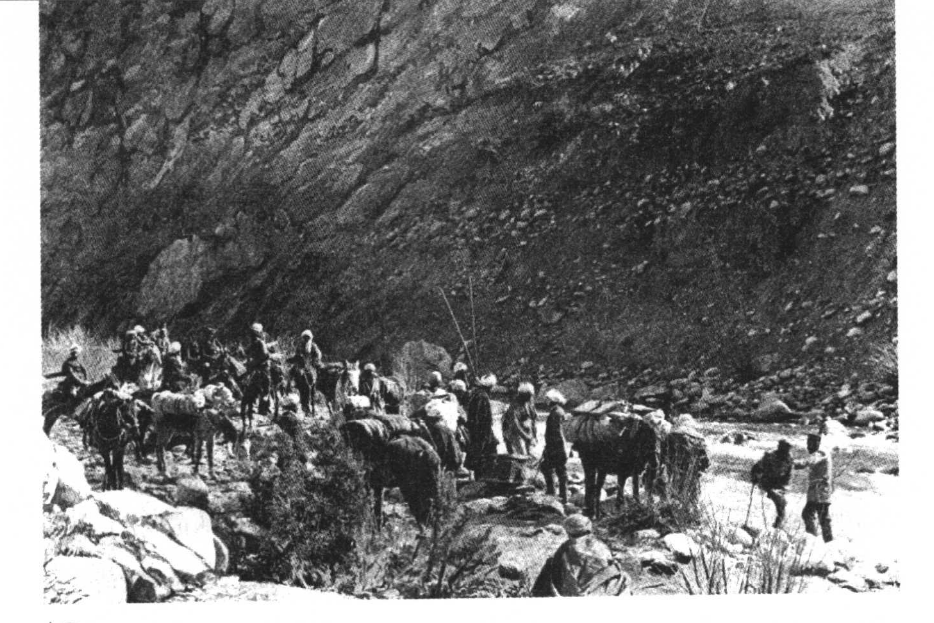
年以来，他一直和狡猾的瓦孜尔（Wazir）部落周旋，以维持霍斯特（Khost）和曼噶尔（Mangal）贫瘠的边界地区的秩序。

我发现，西仁·迪尔汗不仅对巴达哈商和巴克特里亚的古迹了解甚多，他本人就像一部迷人的历史遗迹。他体贴周到，举止文雅。在年轻时代，他参与建造了叛军首领的金字塔，帮助恢复了中亚地区的秩序。听他娓娓道来，我仿佛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当然，我们谈的大都是些陈年旧事，他曾有幸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对古迹进行细致的观察，由此真正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描绘了巴达哈商迷人的风光：山谷水草丰美，果园硕果累累，阿尔卑斯山一般的宽阔高原长满了牧草，是夏季消暑的好地方。虽然这里是一片冬日萧条的景色，展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克什米尔可爱的



㉕拱拜孜奥得克的吉尔吉斯人在迁移毛毡帐篷





㉖阿富汗护卫队装好行李，准备穿越巴哈拉克河

风景，我盼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去欣赏中亚的垂饰。到那时，但愿和善的西仁·迪尔汗老人还能再欢迎我的到来！

5月22日，我们继续前进，头一半路程比较难走。一条积雪给水的大河从巴哈拉克小山谷倾泻而下，这给行李运输带来了诸多麻烦和风险，向上走1500英尺，到达巴什噶孜（Bashgaz）山冈，再往下走，路上多处是陡峭溜滑的岩石表面。行李装了又卸，卸了又装，虽有从萨尔哈特雇来的瓦罕搬运工，但如果不是阿富汗护卫队的得力帮助，行李不可能运送过来。河谷无法通过，我们就沿着河谷上面陡坡上蜿蜒曲折的小道向前走，碰见了几处冲积扇，像是古时耕种的梯田。晚上，我们到达了兰干（Langar）营地，兰干这个名字源于这里一间小屋。这间屋子的圆顶用泥土砌成，条件很差，可当地人美其名曰兰干，突厥语里的意思是“客栈”。于是，我们在宽广的碎石坡地上扎下营地。通向河流的山坡坡度较小，预示着前方的路会更好走，这正是马匹所急切需要的。以前的行军快把马累垮了，这片平地海拔12 000英尺，四周一片荒凉，积雪刚刚融化，既无牧草充饥，又没有栖身之地。

M. Aurel Stein



第八章

阿姆河之源

夜晚极其寒冷，温度计显示最低温度达凝固点以下25度。第二天，我们开始穿越叫做达斯特·伊·米尔扎·穆拉德（Dasht–i–Mirza Murad）的鞍状山脉，这里多石，海拔较低，部分是沼泽地段，现在可以确信距离帕米尔不远了。穿过鞍状山脉，一条道路出现在阿姆河谷地南部的拐角处，谷地在此处变得十分开阔。冲积扇高地上依然是大堆的积雪。骑马慢跑了10英里后，到了一处低山冈，向东北望去，我第一次看见了绵延起伏的小帕米尔。在现在这个高度，空气清新，我们的目的地伯扎依拱拜孜（Bozaigumbaz）营地看上去距离很近，阿姆河上游与从小帕米尔恰克马克丁（Chakmaktin）湖流出的一条河流在那里交汇。在东面，远处的雪峰守卫着瓦罕吉尔山口和阿姆河的源头。

再次登临世界屋脊以前，此地一处古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过去就曾听说过有这么一处建筑，人们称它为“喀尔万巴拉什”（Karwan–balashi），保存得相当完好。本地传说它是给一个商人死去的儿子建造的坟墓。该建筑物内堂较小，外部长宽各是10英尺和9英尺，灰泥中放置了平直的厚板，以进一步加固。圆顶大约12英尺高，现已损坏。内堂门朝西南，即麦加（Mecca）方向，侧面有一门，这几乎

可以确定是穆罕默德时期的建筑。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它和托勒（Thol）小佛塔非常相似。那座小佛塔是 1900 年我从吉尔吉特和罕萨前往帕米尔时，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见到的最后一处佛塔。这座建筑物被分成 3 层，每层也用飞檐分开，就连大小也和托勒小佛塔相似。这处古迹清楚地表明了佛教的典型建筑风格被伊斯兰教所采用。

午后不久，我们到达了伯扎依拱拜孜。这里阳光灿烂，微风扑面。在毛皮制的帐篷里，穆罕默德·伊萨（Muhammad Isa）站起来迎接我们，他是阿富汗所属帕米尔地区的克尔格孜（Kirghiz）牧场主。自从我在世界屋脊上受到克尔克孜人的热情接待后，整整 6 年已经过去，但帐篷里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眼前依然是熟悉的情景：地面上铺着色彩绚丽的毛毯，帐篷壁的底部围着闪亮的手织丝布以及在历史和资源匮乏条件下形成的简易陈设（牧民家里普遍都有这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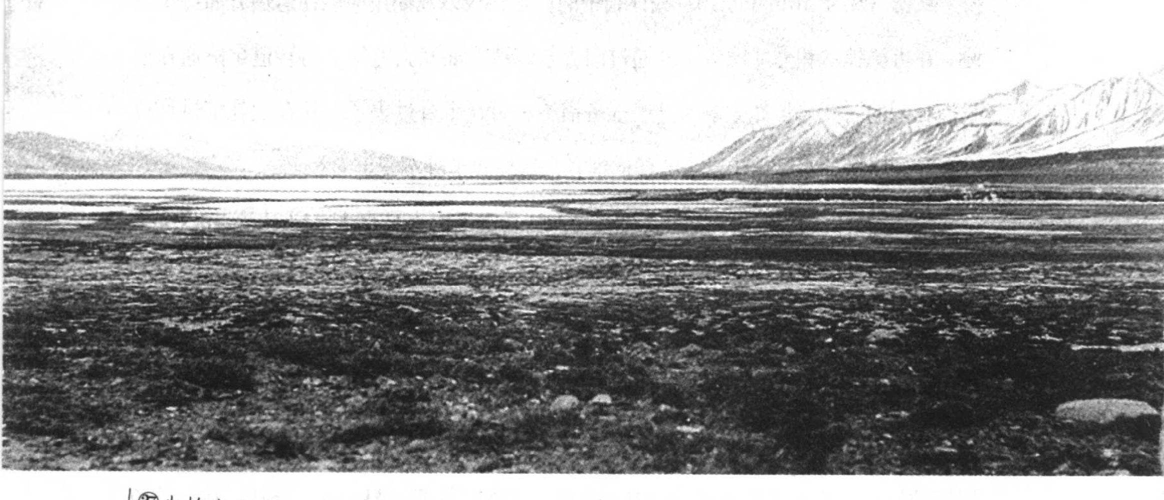
经常受到太阳暴晒，牧民们面部黝黑粗糙，像塔马尔（Tarnar）人一样，如同木头雕刻的一般。他们热情好客，再次听到克尔克孜人讲的沙哑高音的突厥语，对我的耳朵是种礼遇。他们端上茶，盛上一碗碗牛奶，可我们觉得难以下咽。今年冬天，雪下得异常之大，而且持续得时间长，在往年山谷里积雪最深可达 3 英尺厚，今年却深达 6 英尺。几个星期以来，牦牛都没能吃到草料了。这些牦牛是克尔克孜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可今年整个帕米尔地区损失都非常严重，绵羊也未能幸免于难。眼下又从瓦罕来了这么多官员，这无疑会给这里增加新的困难。

我想尽量减少滞留的时间，以减轻牧民的困难。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必须在博扎伊拱拜孜待上一天。首先，为了穿越山口，疲惫不堪的瓦罕人非常需要休息一下；再者，克尔克孜居民居住分散，搜集运输行李的牲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我先派遣一个克尔克孜人前往中国边境一侧，以确定我们到了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Taghdumbash Pamir，意思是帕米尔山巅——译者）之后运输工具能够到位。好

几个月以前，我就通知了大英帝国派驻萨尔库勒（塔什库尔干地区）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Shar Muhammad）我计划中的行走路线以及期望他能在运输方面提供方便。在吉德拉尔和马斯图吉，我通过向吉尔吉特方面发去电报，再转道罕萨通知他我们到达的时间。虽然采取了这些准备措施，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在伯扎依拱拜孜没有收到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任何消息，这使我坐卧不安。

5月24日，我利用停留的这段时间，骑马去了恰克马克丁（Chakmatin，突厥语，意思是如同闪电一般——译者）湖的西岸。这里位于博扎伊拱拜孜和小帕米尔之间，距两地皆为12英里左右。路上，我们在低处平地上碰到一座废弃的烽火台，它名叫喀热勒墩（Karaul-dong），塔下面的温泉放出硫磺燃烧的气味。还没有来得及观察，我们越过了鞍状山地，这片山地把阿布·伊·潘加（Ab-i-Panja）山谷和阿姆河的另一主要支流穆尔哈布（Murghab）或称阿科苏（Ak-su）分开。在一岔道处，我仔细观察了齐拉普吉勒尕（Chilap Jilga，Jilgha，意为山谷——译者）河，它在鞍状山地处流向北方，一部分水流向博扎伊拱拜孜和阿布·伊·潘加，另一部分流向穆尔哈布流域的源头—— 恰克马克丁。有意思的是齐拉普（Chilap）的河水两个小时就流到了阿姆河，而源于同一雪山的融水却要经过350英里，历经俄罗斯所属的帕米尔地区和罗珊（Roshan）山谷，最终才再次汇合。

我们到达了恰克马克丁湖的岸边，辽阔的小帕米尔流域向东北扩展，沼泽地部分结着冰，冰块覆盖了小山坡，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两岸白雪皑皑的山脉高达18 000英尺，但因为我们自身所处的海拔较高，山脉看上去并没其实际高度那样高，根据帕米尔边界委员会三角测量法测定，山脉只有13 000英尺高。不过，这仍令人觉得广袤无垠，我觉得如同几年前在慕士塔格阿塔（Muztagh-ata，突厥语，意思是冰山之父——译者）一般，看见了世界屋脊。顺着阿科苏向东北望去，将近50英里之内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视线，在更远处高耸着金字塔状的雪山，海拔近21 000



㉗小帕米尔哈克马克丁湖，向阿克塔什延伸

英尺，在那里可以俯瞰塔什库尔干（Tash-kurghan）和塔噶尔马（Tagharma）的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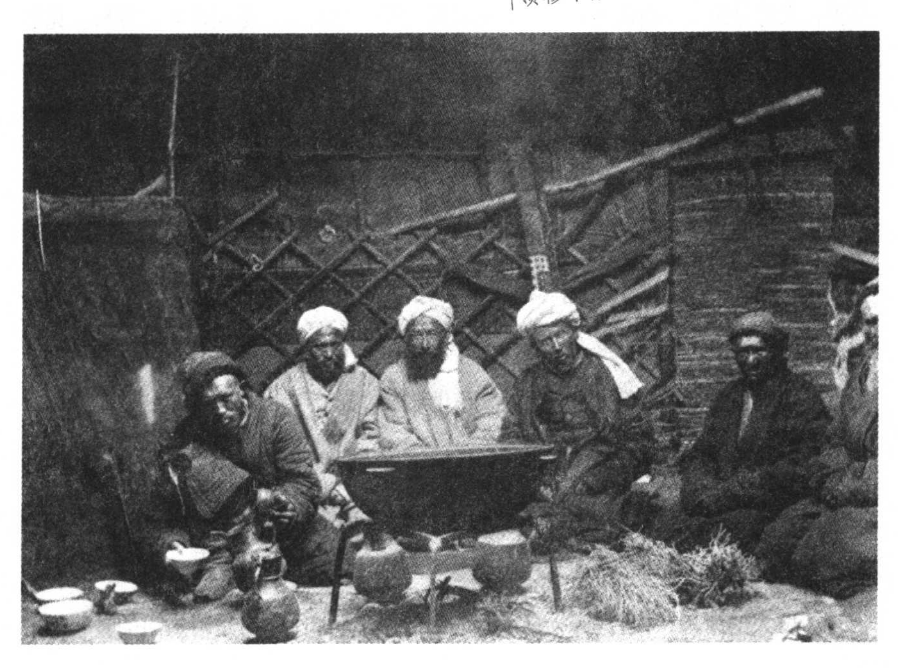
虽然天气晴朗，可西南风还是寒风刺骨。因此，返回时，我接受了穆罕默德的邀请，去他家做客。他家位于齐拉普吉勒尕出口处的一个小山洞里，铺着油亮的毛皮毯子，是个温暖舒适的吉勒尕。屋里许多绣边的坐垫和其他法尔哈纳（Farghana）华丽饰物，表明主人经济殷实，生活舒适。火上的大锅里煮着可口的牛奶，火是用铁列克（Tereken，意为白杨树——译者）树根烧的，而不是通常用的刺鼻的干牛粪。正房夫人从芦苇编成的华美的帷幔后走出来，端上珍藏的瓷器和油光发亮的铜茶壶来助兴，她想好好瞧瞧我这个陌生人。1895年，帕米尔边界委员会人员曾来过这里。从那以后，欧洲人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上百户克尔克孜人家从俄属帕米尔来到阿富汗所属的帕米尔地区放牧，穆罕默德·伊萨告诉我很多有关这些克尔克孜人

M. Aurel Stein

有用的信息。瓦罕的州长每年收一次税，每十头羊交纳一头，税收好像并不重。克尔克孜在自然条件上独立性强，加之去俄罗斯和中国较为便利，不知这是否有利于他们免受其他官方苛税。

我还了解到，沿阿姆河到巴达哈商到萨里库勒和莎车的古时贸易路线上，敬业的巴珠里（Bajauri）商人在夏天依然经常来来往往。每条路线一年运送的货物只有大约100匹马的运输量，鉴于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经济状况以及俄罗斯和印度商品的激烈竞争，所以我对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感到惊奇。哈克木·曼苏尔汗说艾米尔想要沿阿姆河到瓦罕吉尔建立不同层次的萨拉依（Sarai），以有助于商品交流。其实，如果免除帕米尔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及其他苛税，即使不修萨拉依，我认为这条古

㉘在阿富汗属帕米尔吉尔吉斯人首领穆罕默德·伊萨毛毡帐篷里



老的商贸路线的贸易也会振兴起来。印度商人要从克什米尔穿越喀拉库拉木和昆仑山脉，相比之下，这边的自然条件好多了。

夜里，我正忙着写东西，从中国一侧来的信使到达了。他带来了沙尔·穆罕默德的一封信，信中除问我行程的日期和路线外，再没有别的内容。我早就费尽周折，告诉了他我们的日期和路线，并按照这个日期和路线安排行程，即使现在再告诉他一次，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我仍想保持这种联系，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派出两个健壮的克尔克孜人，携带我的回信连夜穿越瓦罕吉尔，敦促对方及时给予援助。一直以来，我多么希望在条件不太恶劣的地方，身边也能有像游牧的克尔克孜人这样的骑马信差。

一夜间，雪下了两英寸厚，等到晒干了帐篷，时间已经是上午，我们不得不晚点出发。沿阿布·伊·潘加上行至下一站拱拜孜奥得克（Gumbaz-Ötek）仅仅有12英里，大部分路段是高出河面两三百英尺高的冲积扇高地，走起来非常容易。克尔克孜主人已经提前搭好了帐篷，为我们提供了急切需要的栖身之地。尽管行李已转由克尔克孜牦牛驮运，但阿富汗护卫队仍然坚持和瓦罕人一同前往，这点颇为明智。宿营地地处海拔约13 300英尺，比兴都库什山脉主峰上突出的鼻状冰川还要高。宿营地之下北向的山坡上是平整的积雪。四周天寒地冻，晚上又下起了雪，我和西仁·迪尔汗上校谈得仍是津津有味。他用生动的颜色，描绘着他挚爱的巴达哈商的春天美景，阔赫伊达芒（Koh-i-daman）长满鲜花的草地，果树果花盛开。在阿姆河上游，他所讲的一切好像近在身边，又仿佛那么遥远！

5月26日上午，我们向瓦罕吉尔山口下的最后一个营地出发，那里有一块无雪的平地，海拔在14 000英尺。启程时，阿布·伊·潘加山谷上空雾霭朦胧，阴云低沉。太阳慢慢地冲破乌云，当快要抵达这个阿富汗国土上的最后一个营地时，东面出现了巨大的冰川，柯曾勋爵（Lord Curzon）认为那座冰川是阿姆河的真正发源

M. Aurel Stein

地，我个人同意这种看法。凛冽的东风吹个不停，因此，我让阿富汗护卫队去寻找避风的地方，我自己继续攀登右岸的山坡。爬了500英里左右，周围的全景展现在我的眼前。南面是壮观的冰川绵延不断，冰川布满了山冈之间的峡谷中，这些山冈源于兴都库什山脉的分水岭，向新生的阿姆河方向延伸。1900年7月2日，在我快速穿越瓦罕吉尔时，我曾瞥了一眼阿姆河的最高处，第一次望见了这些冰川。我用经纬仪绘制了图片，并公开出版，我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但现在的冰川显得更加壮观，因为离它比上一次近的多。时光飞逝，一晃都快过去6年了。冰川之下是古老的冰碛和宽广的碎石坡，上面至今仍然被连绵不断的积雪覆盖着，看上去光秃秃的。

在寒冷的帐篷里，我一面忙着做事，心里又感到焦虑不安。克尔克孜和瓦罕人并不掩饰他们对搬运如此繁重的行李翻越山口的担心。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得不相信他们的话。我深知，若是没有阿富汗护卫队的强制命令，这些人是不会现在翻

㉙阿姆河源头的冰川，自瓦罕吉尔山谷谷口远望





㉚瓦罕首领和搬运工，摄于科克吐鲁克

越山口的。所以，西仁·迪尔汗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充足的牦牛外，我们必须利用每个可以利用的瓦罕人和克尔克孜人运输行李。可是，天气条件能否允许我们明天登山呢？整个下午，阵阵的疾雪下个不停，这些人的情绪更加低落。

在我的帐篷里，我忙着完成致哈比布·乌拉国王和纳斯如拉（Nasrullah）亲王信函的波斯语版本，以表达我对我在阿富汗所受的真诚帮助表示衷心的谢意。我对西仁·迪尔汗上校和瓦罕的哈克木出色工作表示了赞赏，他们俩为了交差起见，自然渴望拿到波斯语信函。我也要与瓦罕人和克尔克孜人的头领们算好账，支付给养和其他费用。虽然我们受到特别的保护，而且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但我仍然应该按照商业的方式来支付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切费用。除了在沙尔哈德赠送了官方的礼物外，作为个人礼物，我留给西仁·迪尔汗和州长一些我的仪器设备，双

M. Aurel Stein

方皆大欢喜。

我和老上校进行了分别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心主题是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在巴达哈商相见。稍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我们对能否实现这个希望都没有把握。我一直渴望能拥有一匹强壮的巴达哈商马，作为将来长途跋涉的坐骑。上校恰好多出一匹，从沙尔哈德起，我一路上骑的就是上校的这匹马，很喜欢它。另据可靠消息，上校也愿意跟我达成交易。但艾米尔严格禁止出口巴达哈商矮种马，不知道这个禁令何时才能够取消！我们俩都尊重这个规定，因而我没得到这匹马。后来，我一直遗憾当初怎么没碰到目无法纪的克尔克孜走私者，来为我们顶替罪责。

考虑到松软的积雪会给行程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我急于在5月27日早上启程。凌晨3点钟，我们给牦牛装上行李，山谷上这时雾霭阴沉，夹杂着飘浮的雪粒。我先遣了一班人马探路，在路上做出标记。刚下的积雪掩盖了岩石和浅浅的河道，牦牛行动起来异常缓慢。雾逐渐散去，直到天大亮才来到山脚下，这儿是现在登山的最佳路径。在这里，我向西仁·迪尔汗上校依依惜别，在场的还有哈克木和主要随从人员，他们坚持把我送到了山脚。分别之时，我又看了上校一眼，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已经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星期了！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相见！他一遍又一遍向运送行李的瓦罕人和克尔克孜人重复他的训令，如果他们不能把我写的有关行李安全过山的帖子带给他，他们就别想再回阿富汗，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口气里决不许半点的疏忽。为了确保成功登山和随时提供援助，上校说他要在最后的那个营地等待他们回来。

前面路上的积雪太深，一直骑在牦牛身上不肯下来的印度随从也不得不下来步行。那天早上，帐篷内的最低气温是凝固点以下25度，不过雪地只是表面冻固了，表面之下仍很松软，且到了上午7点钟，太阳通过东北部的山脉照射过来，连表面也变得松软了。没驮行李的牦牛被拉着走在前面，为后面的人和牲畜开道，但过了

不久，这些牦牛就挣扎着不愿前进，这种方法于是不能再奏效了。接下来半英里，人先排成一列，走一小段距离，然后回头来牵驮行李的牦牛，三四个人看管一头牦牛。

尽管牦牛步履稳健，但松软的积雪仍支撑不住这些庞然大物，身体不断向下陷，牦牛也无能为力。如此下去，牦牛和人都吃不消。根据地形和地图，估计到分水岭还有足足2英里。最后几头还有力气的牦牛必须留在后面，它们驮的行李都换由人来搬运，以备将来之用。这里海拔15 000英尺，雪地又松又软，较轻的行李不断换人，较重的则由三四个人来搬。没走多远就要停下来，然后回来搬剩下的行李。所以，搬运工虽有近30人，但这种工作进展得又慢又辛苦。根据瓦罕人的细心观察和莎车人穆罕默德朱的经验，若把行李落在后面，我们面临的风险将更严峻。

冒着可能发生雪崩的危险，我们沿着瓦罕吉尔河出口处南向的陡坡边行进。上午10点，我们到达了开阔的山谷，雪很深地势却很平坦，发生雪崩的危险减少了，从这里通向山口的山坡的坡度较为平缓。我派奈克·拉姆·辛格、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和两个瓦罕人携带着贵重的相机先行一步，我自己在齐腰深的雪地里继续前进。午后，升起了薄雾，减轻了剧烈的阳光照射。快到下午2点钟时，我们到达了瓦罕吉尔平坦开阔的山顶。1900年，我测量分水岭的海拔在16 2000英尺左右，但现在积雪太深，无法确定其高度。那次经过这里时，山口以北舌状的冰河上还有清纯的石乳，但现在却看不见了，只有一块巨石从雪地里露出一角。我们几个人高兴地蹲在上面，休息一会儿。在几个小时的攀登过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达什”(Dash)狺狺的叫声。这小家伙是只年幼的猎狐狗，顽皮好动，从斯瓦特边界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个月了，它和我形影不离，这1个月的艰苦旅程对它好像是次愉快的远程旅行。它对白雪皑皑的山坡并不陌生，两年前还是只狗崽的时候，它就在喀罕(Kaghan)的山上玩耍嬉戏，为此得了喀尔阿达希伯克（Kar-adash Beg，突厥语，意为喜欢雪的伯克——译者）的雅号。在即将到来的中亚之行中，我就叫它这个绰

号好了。现在，它蜷缩到我的毛皮衣旁，小睡一会儿，以忘记一天的劳累。

搬运行李的队伍终于有人赶上了，我们于是可以离开阿姆河和塔里木之间这个荒凉的分水岭，向中国新疆出发。情况比我预期的还要恶劣。下午，太阳穿破云雾，闪着炙热的光线，雪地变得更加松软，路不时被无数的小河阻断，有的雪地到腋窝深，所以行程一次又一次中止。必须寻找山坡上更硬的雪地或沿着被雪掩盖的旧冰碛前进，这意味着我们要绕道而行，还经常停下来，等等后面的队员。1900 年 7 月，我经过这个山谷时，曾见到几处小湖泊，但现在踪迹杳无。

从山口下行 4 英里许，山谷开始转向东方。落日照在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顶部，红色和紫色分外妖娆，令人为之一振。驮运行李的牦牛和搬运工落在山口，或许还没有登上山口，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但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见。到瓦罕吉尔的道路和西北的小山谷交会，离交会处附近有个山冈，还是数测量员拉姆·辛格目光敏锐，

㉛阿布伊潘加山谷源头，远处为瓦罕吉尔和阿姆河源头



看见主体山谷的白色雪地有小小的黑点正在缓慢移动，那是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和一些瓦罕牧民赶着一群牦牛，从塔格杜木巴什来搭救我们。几个星期前，我把战略重点放在行李运输上，我们已经在如此险恶的路线上走了这么远，这说明我的战略部署并非全盘皆输。

半个小时后，我高兴地和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再次握手。1900年，我在这里首次见到他，这位旁遮普人仍像当年那样仪表堂堂，身材魁伟。他说，他预料我会途经科克吐鲁克（Kok-torok）山口，所以把所有的给养和富余人员留在了科克吐鲁克山谷的入口处，然后迅速来瓦罕吉尔迎接我。听了他的话，我的担忧消失了。现在，他距离他的营地有将近一天的路程，可他说弄错了我的行程路线，这两件事情让人难以理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印度老兵的陋习，他们向来如此。科克吐鲁克是面向阿富汗所属帕卡尔的山谷，从吉尔吉特来的喜爱运动的欧洲人来到这里，总会爬上山谷打猎，这些人一贯把营地扎在山谷的出口处。印度人从不违背传统，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也不例外，他肯定预想我这个从阿富汗来的欧洲人也会取道科克吐鲁克山口，即使是欧洲人书信中明确表示要走另外一条道，他也会来这个山谷接我。

因为沙尔·穆罕默德牦牛没有驮来燃料，我们无法生火做饭和烘干衣服，不得不向科克吐鲁克山口继续前进。夜幕降临时，运送轻行李的瓦罕人赶到，我和印度随从立即出发了。沙尔·穆罕默德坚持要留下来，以监督行李在夜里或天亮前要全运下山。积雪融化，宽阔山谷里的道路上形成连绵不断的沼泽，虽然不深，但走起来又累又慢。要么在趟着刺骨的河水前进，要么冒着被冻伤的危险，骑着慢悠悠的牦牛，再没有其他选择。所幸牦牛性情温和，骑在身上的人可以活动活动麻木的筋骨。除了这种“运动”外，我还要照看跑在前面的“达什”，所以，虽然心情有点忧郁，我却没有睡着。

M. Aurel Stein

午夜后，我们听见了狗的叫声，沙尔·穆罕默德的随从人员和几个萨里库勒人也从睡梦中醒来，面前出现了3顶小帐篷，帐篷已经使用了一些年头，脏得要命，但对累得精疲力竭的人却好似“久旱逢甘霖”！几杯热茶，沙尔·穆罕默德的瓦罕人厨子好几周前烘焙的维拉耶提（Wilayeti）烧饼，我所能得到的食物只有这些。牦牛粪半湿半干，帐篷里充满了刺鼻的烟。在海拔14 000英尺高的地方冻了将近一夜，现在暖和一下，我高兴极了。我把身上唯一干净的东西——照相机调焦用的布铺在地上，舒展开身子，进入了梦乡。梦里听到行李运送到的嘈杂声，我不时被吵醒。

第二天上午，行李分拨运来，但装有给养和食品的箱子最后才运到，这有点美中不足。沙尔·穆罕默德对昨天我没能吃到饭略表歉意，这时已经过了正午。我等了一个上午，期间，我饱览了周围中国境内的景观。1900年，我曾从科里克山口来到这里，出口处那几顶帐篷在那时就早已破败不堪了，没准从柯曾勋爵访问帕米尔以后，这些帐篷就这样旧了，可能是因为帐篷的瓦罕主人觉得不值得再修了。从那时起，凡是从吉尔吉特来打岩羊的每个欧洲人都在同一处荒凉的碎石坡上扎营，好像成了个约定俗成的传统，他们或被诱使或被迫这样做。周围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层动物骨头和废弃物，动物或被剥皮或被屠宰，腐朽的毛皮帐篷成了害虫的聚集地。四周荒凉的环境所引起的好像只是“屠杀”。所有这一切，我确信这个达斯吐尔(Dastur)—— 这个法定的宿营之地，是全帕米尔地区最肮脏的地方。

因而，一俟所有行李运来，我就急于离开这里。我的瓦罕人老朋友穆罕默德·雅苏夫普（Muhammad Yasuf）现任塔格杜木巴什山谷的伯克接到我的信件后，已经赶着马和牦牛带人接应我来了。从阿富汗那边来的人克服了体困力乏的困难，人和行李皆完好无损，我付给他们可观的赏钱，把给老上校的信委托给瓦罕首领。拜别后，我们向穆罕默德·雅苏夫普的营地出发。很遗憾，我对阿姆河之行只写了短短的一章。令人高兴的是，通向东方遥远新土地的大路现在就在我们面前。



第九章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5月28日，我从科克吐鲁克去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地区。1900年，我到过此地，对这里较为熟悉，所以仅对其进行简略描述。穆罕默德·雅苏夫普伯克的帐篷搭在提噶尔马苏（Tigharman-su），干净舒适，嫉妒得我都想扔掉我的小帐篷。在这里休息了一夜后，我们骑马去远方的喀热勒（Karaul，意为哨所——译者）即巴依克（Bayik）哨所。一路上，我高兴地聆听着主人讲述的一切。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他过得不错，经济殷实，现在拥有1000只绵羊、几十头骆驼和牦牛。这位萨里库勒人，性情开朗，体形高大，头发金黄，蓝色的眼睛，是萨里库勒众多的阿尔卑斯人类型（Homo Alpinus type）中典型的一位。他刚升任伯克一职，其实就是从塔什库尔干按办那里（Chinese Amban of Tash-Kurghan）买来的。我想起了鄂本笃（Benedict Goëz）老人，他是个世俗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1603年，他由上阿姆河（Upper Oxus）去沙尔齐勒（Sarcil）即沙里库勒（Sarikol），那时他就注意到了这里的少量居民外表上和欧洲弗来明斯人（Flemings）相似。

通往罕萨的路线在明铁盖喀热勒（Mintaka Karaul）向南岔出一条小路，我有幸在此碰到了两个邮差，他们携有马继业先生（Mr. Macartney）大约10天前发出

的邮件。当然，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把快速写成的邮件寄往印度和欧洲，我就毫不客气地将哈比布·乌拉国王搬了出来，耽误了两个小时后，邮差出发了。以后，我又多次采用这种方式寄送邮件。这些罕萨山民吃苦耐劳，疾步如飞，每月要3次翻越冰天雪地的山口和穿过山口后面的河谷！

我们去巴依克的一路上，寒冷的南风一直不停。第二天上午，我们向塔格杜木巴什河突然北转的转弯处前进，风这时还没有停止。我要在那里考察一处古代堡垒的废墟，上次路过时，我错过了机会。玄奘（Hsun-tsang）曾经走过这条道路，再次踏上这条路，我心里感到很是兴奋。玄奘是位著名的中国旅行家，大约在公元642年，他从印度取得佛经，返回中国，从巴达哈商进入帕米尔，后到达萨里库勒。在其回忆录（Memoirs，即《大唐西域记》——译者）中，他提到充满传奇色彩的萨

㉜明铁盖山口脚下的驿站，图中是萨里库勒人





㉝罕萨邮差（左）和萨里库勒边防线上的士兵，摄于明铁盖喀热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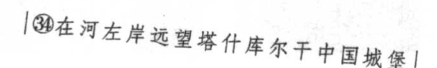
里库勒皇室。

根据古老传说，这个皇家可以追溯到汉朝的一位许配给波斯国王的公主。在她来到朅盘陀（Chieh-p'an-t'o)即萨里库勒时，东西方向的道路被强盗截断。为了安全起见，护送人员把她安置在一个孤立的山峰之上，四周是悬崖峭壁，守备森严，太阳神前来拜访公主。当路畅通时，发现公主已有身孕。护送人员劝说公主不要去波斯，而留在萨里库勒，建立自己的统治。她神奇般地生了一个儿子，从此以后，这个山区的皇位一代代传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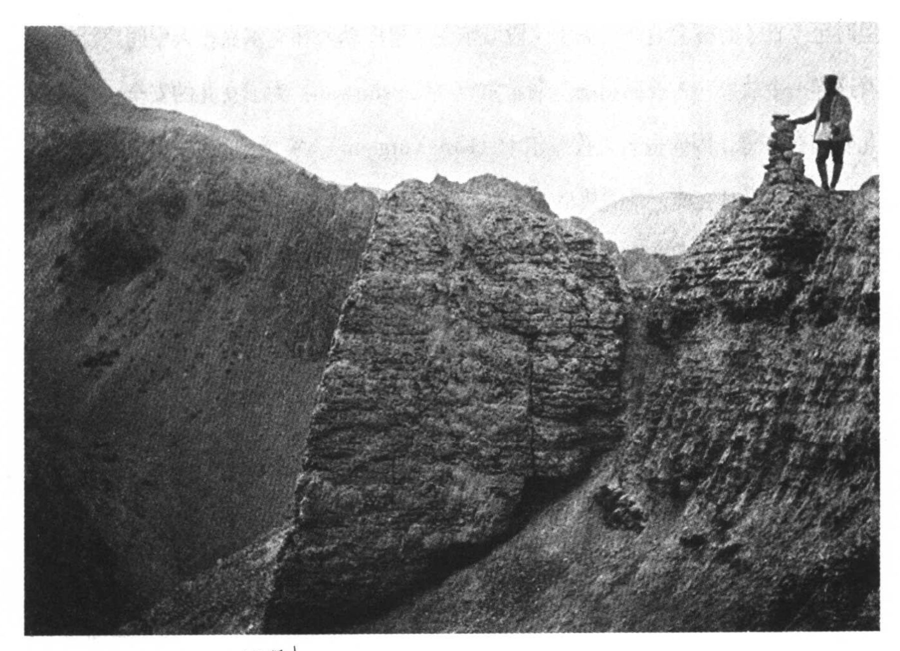
早在1900年，我就听说塔格杜木巴什河拐弯处左岸的峭壁上还有古城遗迹，

但时至今日才有机会造访。关于这段城墙在萨里库勒人和克尔克孜人中间广泛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古波斯国国王瑙希尔宛（Naushirwan）为了女儿的安全，他把女儿安顿在这里，因而得名克孜库尔干（Kiz-Kurghan），突厥语意为“公主堡”。显然，这个故事是玄奘记录的故事的翻版。我急切地想考察这一遗址和现存的废墟。

克孜库尔干坐落在高冈的最东端。这座山冈崎岖不平，从西北向下延伸，一直到河边，而这条河恰在由胡加克巴依（Ghujakbai）到达夫达尔（Dafdar）隘道的入口处。沿陡峭的河岸，爬上高冈的南端，这是个孤立的岬，其东部和南部是近乎垂直的峭壁，山脊最高处离塔格杜木巴什河约有700英尺。接下来的考察表明，高冈北部和西部的山壁也是无法攀登的，山壁下面是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克孜库尔干吉勒尕，即山谷。


㉞在河左岸远望塔什库尔干中国城堡





|㉟克孜库尔干残墙和城堡|

进入堡垒的唯一途径，是一个与后面的山冈相连的隘道，低矮而狭窄。我、测量员及奈克·拉姆·辛格克服重重困难，先爬过陡峭的山坡，再穿过更加险峻的碎石峡谷，才爬上了隘口。大部分萨里库勒人有些迷信，他们害怕前来这片废墟，陪同我们的年轻向导以前也从未来过这里。更高的斜坡上散布着大量的桧木碎片，木片看上去很古老，我从中可以了解到古长城建筑的只鳞片羽。隘口仅有15~20英尺宽，顺着狭窄陡峭的山脊，爬了大约150英尺，古长城就矗立在面前。它建在构成岬角山巅的一系列阶地中最高阶地的西边。果不出我所料，它结构独特，树枝和灌木枝层有规律地夹在土坯之间。一座棱堡挡住了隘口和狭窄山脊之间的通道，棱堡很大，大约有25英尺见方。但我们还是成功地越过棱堡倾颓的一边，接着沿着坍塌的城墙顶部向前走了大约60英尺，这段城墙把外围工事和主体防御工事连接了起来。城墙

已经破碎，下面就是悬崖，站在城墙上，心紧张得怦怦直跳。

如上文所述，我们所站的城墙是用来保卫山顶边缘的。开头约450英尺的城墙为东南——西北走向；然后在棱堡附近，转向北方。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方高度超过20英尺，其余地方几乎只剩下了墙基。孤立的山顶面朝西方，敌人可能而且只能在那里发动袭击，城墙曾经在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不必再提我们经过的隘口，单说这里极为陡峭的山坡，任何武装人员，无论数量有多少，也无法从这里攀上来。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悬崖峭壁，高达数百英尺，形成天然屏障，不可攀越。从西部边缘起，山脉向北部和东部倾斜下去，形成一系列阶地，为修建防御性建筑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现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堆堆腐败不堪的碎石，过去的防御工事可能是用粗糙的石块建造而成的。在其中两个地方，我发现了小蓄水池的遗迹，估计是用来贮存雪水和雨水的。

棱堡的墙壁建造得很坚固，可以算得上是遗迹中的大手笔了。除去墙基又大又粗糙的石板外，墙壁平均厚度为16英尺，系用土坯砌成，排列紧密而又规则。经过日晒，土坯变得很坚硬，平均规格为15英寸长，12英寸宽，厚约5英寸。土坯制作材料是种细黏土，里面夹杂着大量的小砾石。在这样的地方，这种材料以及制作所需要的水都难以获取，而把水和材料运输到如此高度无疑会大大增加建设的难度。无论在这里，还是坎斯尔（Kansir)，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猜测：薄薄的土坯层间夹杂的树枝和灌木层（邻近的一些侧面河谷中，有桧木属植物生长)，原本是用来替代本地缺乏的湿泥，以填充土坯层之间的空隙，因为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得到充足的水是很困难的。我以后在敦煌西部的古代中国边境城墙进行的考察活动，充分证明了上述观点。

无论形成这种特殊建筑结构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如何，我想可以肯定的是，此处遗址与玄奘曾经亲眼见过的或听说过的古堡是同一个。从他记载有关古堡的传说

可以看出，在玄奘来到这里以前，这座古堡肯定已经变成了废墟。他在当地听到的传说中，人们认为这城堡建于汉代，也就是中国势力达到塔里木谷地的最早时期。在踏上玄奘的中亚之路所遇到的第一处古迹，我的考古又一次证明了我这位中国守护神的记载是可靠的，我感到十二分的高兴，其实玄奘记录的可靠性已经常为人们所证实。这些山区气候以干燥性气候为主，这也是这些遗迹为什么能在一个如此暴露的地方保存这么长的时间，干燥性气候对古迹的保护作用从中可见一斑。

考察完废墟以后，我们安全下山，在微弱的暮光中继续前进。此时，克孜库尔干所表现出的大自然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河左岸狭窄的小道上净是岩石山壁，如高塔一般笔直陡峭，只要有根绳子，守卫人员就可以直接把河水打上来。克孜库尔干山谷两边陡峭的岩壁形成巨大的天然屏障，高达数百英尺，无论是从河上，还是从曲折幽暗的山谷，都不可能对城堡进行严密的包围。

继续又往下走，塔什库尔干河（Tash-Kurghan river）的隘道渐渐变得开阔起来，路过了一片古代的梯田，上面有喀拉吉勒尕小山谷引过来的沟渠的痕迹。我意识到，克孜库尔干不仅保卫了帕米尔的主要干道，而且守卫着萨里库勒最西边的耕地。在皮丝岭（Pisling），我们在两间土盖的小屋和萨里库勒人定居的皮制帐篷旁边过了一夜，我还发现这里的田地近来被犁过。河对岸的达夫达尔是瓦罕移民的小聚集地，他们抱怨说由于今年天气恶劣，燕麦的丰收得不到保证。

无论是大气中，还是地面上，都没有春天的影子。第二天（5月31日），我们顺着通向塔什库尔干的宽阔山谷，走了40英里。然后，沿着河左岸，走了8英里左右，到达塔尔德库勒（Taldeku）吉勒尕入口处，一路上是广阔的梯田，宽达半英里，正在准备灌溉，这证明萨里库勒中部的高地亦适农耕的，而且，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其成为必要。1900年，我是沿河右岸而行，注意到自1891年以来，罕萨的长期侵略造成这里田地荒芜。为了永久占领这个山谷，他们大量减少了山谷的人口，

M. Aurel Stein

所以，占领的土地一度被搁置不种了。

1900年以来，恢复繁荣的浪潮日渐高涨。现在开垦的土地，塔什库尔干人每隔2年或3年轮作播种一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在将来会每年耕犁一次，事实上，右岸也出现了耕作的迹象，一位当地伊斯兰教派很有权势的毛拉阿加汗（Aga Khan），不惜花大钱，在那里开凿一条新水道，目的是要把河水引到一处名叫“甘”（Ghan）的肥沃草地，而在1900年时，那片草地不过是一个夏季牧场。

西边的雪山上流下来一条条丰腴的小河，可走过这些小河后，河左岸的地面成了一片凄凉的砾石达斯特（Dasht），边缘上是小沙丘。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好似故意要与荒凉的风光相协调。我们顶着凛冽的北风，走完最后24英里路程。因此，虽然走出塔什库尔干约5英里就是可耕地，可我怎还有那份心思去观察呢。这些耕地是不稳定的，能否耕种则依赖于由中国官府赞助挖凿的新水渠。我找到了一座整洁的中国传统式客栈，我们进去避避风，暖和暖和，我心中的感激油然而生。

人困马乏，还要为去喀什噶尔的快速行军做准备，于是，我们就在萨里库勒的城镇中的一个小村庄滞留了两天，人们通常把这个城镇当作萨里库勒的首府。河左岸悬崖峭壁林立，形成一引人注目的高地，一座建有城墙的小城的遗迹就位于这个高地之上，其状与玄奘及更早时期的中国佛教徒宋云（Song Yun）所描述的完全一致。在小城一角，建有现代的中国城堡，和我6年前所见的没有什么变化。在日俄战争（Japanese War）爆发稍前，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在萨里库勒的这个要地驻扎了哥萨克守备队，以更好控制对俄属帕米尔的贸易和走私。中国地方行政当局对此举感到忧愁不安，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暂时召回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萨里库勒暂由文官“按办”（Anban）管理（至少书面上是这样）。此前，军队指挥官统领少量士兵，代表中国政府对其最西部地区进行统治。

这些山谷人口稀少，过去完全由地方首领管理事务和税收；况且气候恶劣，山

路险恶，缺乏财政来源，所以，按办和当地老百姓对上面这个变化都不感冒。尽管如此，中国城堡内还是开辟了一间小衙门（Ya-mên）。俄国的哨所则在破烂不堪的遗址的另一端，墙壁刷成了白色，显得很整洁，驻有新疆参谋部的一个上尉以及大约40名奥伦堡（Orenburg）哥萨克人。以前，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也是三国交界处唯一的政治代表，真有点"一枝独秀"。现在，各方都派遣了高官，这引起外交上的竞争，并形成某种社团意识，担负的责任则越来越重。

最近任命的萨里库勒按办说，他要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我们所住的客栈就是由他上任后新建的，我应对他表示感谢。从沙尔·穆罕默德居住的简朴的房子往下走，是一排泥土垛成的摊店，形成一个小巴扎，可见按办的良苦用心。但是，盖这些房子，加之在这样的地区工作付给按办的津贴，耗费了本已贫困的萨里库勒的不少钱财。为了谨慎起见，按办没有来喀什噶尔，以免因当地人在上司面前抱怨而难堪。因而，当到衙门拜访时，我见到是按办的秘书而不是按办本人。衙门里张贴图片、俄国彩色印刷品，摆放着留声机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在这狭隘的城堡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但可以看出按办的品位蛮能跟上时代。显然，世界在变化，帕米尔也在变化。

我和沙尔·穆罕默德一起去拜访了俄军哨所指挥官鲍布绍夫（Bobusheff）上尉，这里比中国衙门更为漂亮。哨所是一座小型的可防御的方形营房，内部空间非常狭小。上尉长得英俊潇洒，金黄色头发，他和夫人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环境很差，但夫妇俩好像对此并不在意。我和夫妇俩及助理军医愉快地共进了午餐。幸运的是，上尉也会突厥语，我俩能用突厥语进行流利的对话。他盼望几个月后能够更换岗位，离开这儿。没有了舒适的生活，脱离了上流社会的交往，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还要多，可他和妻子好像都不厌恶萨里库勒。只是当我引用本地的一句古老谚语时（谚语说萨里库勒一年9个月是冬天，3个月是夏天），他才露出无奈的微

笑，说他们的夏天已经开始了。山谷中北风刺骨，几株孤零零的白杨和柳树还未长出叶子，这实际已经是萨里库勒的夏天，让人难以置信。上尉夫妇育有两个男孩，虽然环境不好，但这两个家伙发育成长却很快。凭直觉观察，上尉夫人觉察到我们宿营安排的最大弱点，因此，在分别前夕，她送给我两大块精美的哥萨克面包；作为这一宝贵礼物的回报，我送给他们一罐压缩巧克力，我知道它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在塔什库尔干，我把队员分成两队。拉依·拉姆·辛格留在后面，就在塔什库尔干附近，启动用三角测量法进行系统地测量工作；然后，他将对至今尚未探索的塔什库尔干河谷的一段进行测量，接下来转向北行，越过庞大的慕士塔格阿塔（Muztagh-ata）山脉东部的扶壁。我则要尽快赶到喀什噶尔，以便在我的老朋友和资助人马继业先生（时任印度政府代表）动身去山里的夏季营地以前，我能组建好穿越沙漠的探险队。

慕士塔格阿塔向南方和东南方向辐射出巨大的山冈，通往喀什噶尔的商队所行路线恰好经过这些山冈，而且这条路线是到喀什噶尔最近的路线。过去没走过这条路线，这里还有几处古迹，所以，我十分高兴地选择了这条路线。尽管带有行李，但我下定决心，争取在6天之内走完通常要用10天才能走完的路程。6月3日一大早，在和测量员拉姆·辛格选定提孜那甫（Tiznaf）附近作为三角测量的基地之后，我从塔什库尔干出发，沿着名叫辛地（Shindi）的阴暗弯曲的隘道顺河而下。小山谷更加狭窄，道路在辛地村拐向北方。雪一融化，道路便无法通过，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克摩依那克（Kok-moinak）高高的山口上，找到通向其其克里克（Chichiklik）高地的出路。

据说，今年的大雪仍覆盖着科克摩依那克山口。6月4日，我们从夜营地喀拉喀帕（Kara-kapa）出发，沿着从其其克里克流出的小溪向上走，这样绕过了科克

摩依那克山口。但山谷中岩石凌乱，山坡陡峭，道路极端难走。在几个地方，不得不卸下行李，改由人来搬运。直到下午2点，我们才到达了坡度平缓的碎石坡，海拔约14 000英尺，正是通向其其克里克迈丹（Chichiklik Maidan），即其其克里克高地的那个斜坡。

让人称奇的是，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竟有一处几乎水平的平地，南北长约25英里，东西宽超过1英里，周围雪山环绕，这和玄奘描述的"地方百余顷"的平地非常相似。他从萨里库勒的首府出发，去喀什噶尔，行走了两天，见到"葱岭东岗，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他接着写道，此地"冬夏积雪，风寒飘劲"。他还记述了商旅队遇到的种种艰辛。另外，他提及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大商旅队，浩浩荡荡几千个人和骆驼，皆死于寒风冰雪之中，萨里库勒的一个圣人收拾好商队遗留的贵重物品，开设一旅店，为过往行人提供躲风避寒之地。

根据玄奘记载所隐含的地质学线索，我倾向认为故事中的那个地方就是其其克里克高地，另据经验丰富的驮工莎车人穆罕默德朱及萨里库勒随从人员所言，每年都会有动物死于这个凄凉高地的寒风大雪之中，时而会有人员伤亡。在高地中间存有一矮矮的圆形土墩和正方形城墙的墙基，墙基边长35码许，用粗糙的大石头砌成，它好像就是玄奘所讲的那个旅店的废墟。我在里面发现了坟墓，这证明了我的上述猜测，因为我在中亚其他地方，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坟墓——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把死者掩埋在佛教一直奉为圣地的地方，伊斯兰教徒以此来表达对本宗教的信仰。关于此处就是那个旅店的遗迹，这里有现成的证据——在大约200码处有两间中国建造的房屋；不过，从萨里库勒迎来按办那一天起，这两间房屋就已经几乎毁坏了。

天空阴沉，雪地相对坚固。虽然其其克里克高地海拔高，近15 000英尺，曾经给过路人带来无尽的困难，但我们已经经历了险恶的巴罗吉尔和瓦罕吉尔，所以，其其克里克高地的积雪可以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没有留给我太深的印象。我不

禁回忆起了鄂本笃（Benedict Goëz）时。他是个可敬的耶稣会修道院的杂役僧侣。1603年，受阿克巴（Akbar）朝廷的派遣，他受命寻找传说中的中国。为了安全，他和商人组成的大“喀非拉”（Kafila），一同前往。从萨西尔省（the province of Sarcil，即萨里库勒）所属的村庄出发，两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称作“西塞亚里特”（Ciecialith，即其其克里克）的山脚下。这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很多人在攀登时被冻死。在雪中困了6天之后，鄂本笃侥幸脱险。最后，他们到达了喀什噶尔（Cascar）王国的坦给塔尔（Tangi-tar，即坦吉塔尔）。

夜幕降临时分，我们下行了3000英尺，抵达塔尔巴什（Tar-bashi），一个克尔克孜伯克把他舒适的皮制帐篷供给我们作栖身之处。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向东延伸的陡峭隘道，称其为坦吉塔尔（意为“狭隘的山谷”）再也合适不过了，向东的冬季路线就经过这里。再走2英里多，隘道延伸到了小河河床。隘道两侧岩壁高悬，一旦发生洪水，人将无处逃生。所幸的是，今年雪融化得晚，克尔克孜人把行李安全地驮了过去。路上有一处地方极其狭窄，两边光滑的岩壁之间是一条翻滚的河水，难以继续前进。这时，我注意两边岩壁中有凿工精细的大洞孔，显然是为搭桥之用。洞孔看起来肯定开凿于古代。我记得，在古时，这条险恶的道路在春季和夏季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在受到强盗进攻的混乱之中，玄奘的宝贵大象（他从印度一直骑到这里）溺水而亡。玄奘在其传记中提及了此事。

在隘道变宽的地方，有一个托依勒布龙（Toile-bulung）的克尔克孜牧场，在牧场附近，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灌木和鲜花。又走过一座陡峭的山谷和黄土覆盖的托尔阿特（Tor-art）山冈之后，我们在其西尔拱拜孜（Chilhil-gumbaz）扎营过夜。除了许多废弃的克尔克孜坟墓外（故得名“四十墓”，“Forty Domes”），谷底还有几块燕麦地。通往莎车的道路在这里向东南岔出一条道。6月6日上午，我们开始攀登绵延的喀什喀苏达坂(Kashka-su Dawan)的山脉。虽然这些山脉可能近13 000



|㊱牦牛和马匹队穿越喀什卡苏达坂|

英尺高，但仍被厚厚的黄土所覆盖，某些地方很像完整的平台，不失为优良的牧场，它是我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见到的最广阔的牧场。白白的小水仙，克什米尔常见的耐寒蝴蝶花，见到这些熟悉的鲜花，我非常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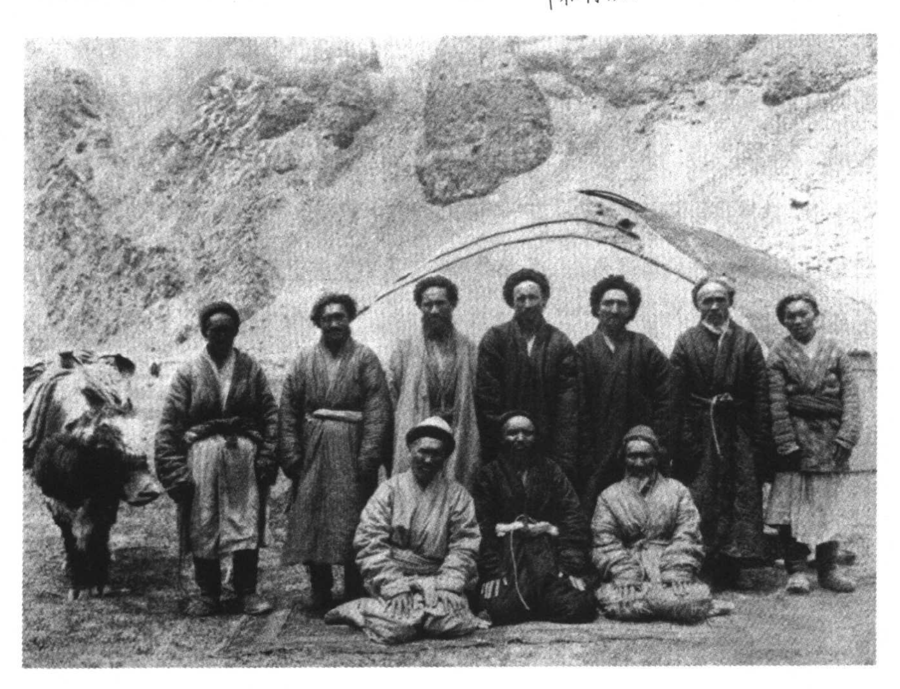
从这里往南，到塔什库尔干河与扎拉甫商（Zarafshan）河（塔里木的两条重要水源）之间高耸的雪山，地势开阔，景色秀美。东边和东北虽远不比这边壮观，但同样也很迷人。绵延的横断山脉参差交错，荒凉萧瑟，慢慢地消失在冥冥薄雾中。那个大漠平原最远的边缘地带一直在吸引我再次归来，而现在我马上就要到了。

喀什喀苏达坂是我们翻越的最后一座山口，通往平原的道路就在我们面前。山谷朝东北方向，两边赤裸裸的岩壁腐蚀得厉害，道路并不难走，我们到达了波合提阿格孜（Pokht-aghzi）侧面山谷附近的一个克尔克孜大营地。除了提供歇息的地方，这里的人还给我们饭吃。谷底水源充足，牧草丰美，所以，当听到好客的克尔克孜巴依（Bai，突厥语，意为富人、有钱人——译者）说，他有1000只羊，100

头牦羊和几十匹马时，我并不感到惊奇。帕米尔地区的克尔克孜人显得更为健壮，在体格和生活方式方面，这里的克尔克孜人也与帕米尔的克尔克孜人有所不同。

在波合提阿格孜，我们把牦牛换成了马匹，这样，第二天一下就走了35英里还多。第一段路上长着一片片野生的白杨，河岸上是连绵不断的灌木丛，河水浅浅的，山坡看上去不再那么荒凉。往下走，山谷变得宽阔，却只见零星的小块耕地显出嫩绿色。当脚踏在凸凹不平、淡黄色的山坡和开阔的砾石堆之上时，新疆夏天的阳光照在了我们头上。在阿克塔拉（Aktala）以下，发源于吉加克（Ghijak）山口的小河流入山谷，山谷两边出现了巨大的砂岩峭壁，其中一些已被腐蚀成奇异的城堡形状，高出河床达1500英尺许。这些峭壁是山区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沿着多石

㊲毛毡帐篷前的吉尔吉斯首领和侍从，摄于托依勒布隆



的河床，快马行了几英里，河床迅速变宽，宽达2英里，我们到了克其克喀热勒(Kichik-karaul，即"小哨所")的一个小定居点。

一两间突厥种田人简陋的土屋，四周环绕着高高白杨林和果园，灌溉过阶地上是绿色的田地：这便是这个定居点的所有家当。然而，在白雪、岩石、碎石上长时间奔跑之后，再在林阴中小憩一会儿，欣赏一下熟悉的新疆小绿洲的景色，甚是惬意。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如果想寻觅到它的迷人之处，那你就要沿一条新的路线到达这个地方，且这个地方必须被前人所喜爱，而且现在还有许多古迹。去年夏天，在喀什噶尔最炎热的几周里，马继业夫妇曾来克其克喀热勒消夏。因此，最近一处房屋的仁慈的女主人好客地让孩子给我送来一碗凉奶，询问有关马继业夫妇的消息，我自己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大喀热勒在4英里以下，我在那里见到了一处年代久远的遗迹。城墙顺着山谷两边低矮的碎石山脊延伸开来，上面有城垛，身后的落日发出万丈光芒，好一派美丽的风光！新疆叛军的最后一位首领阿古柏（Yakub Beg）原本打算利用这些城墙拒敌。我们对一段"中国城墙"（Chinese Wall）进行了有趣的考察，城墙建成不到4年，这使我相信旧世界的所有学问和传统在中亚腹地仍然没有消失。关口很大，已是裂痕斑斑，我骑马进去。一个卑微的突厥人书吏端上茶，友好地迎接了我，他受命监视来往行人。这时，一队人骑马疾驰而来，其中有依格孜亚尔（Ighiz-yar）的玉孜巴什（Yuz-bashi，突厥语，即百户长、首领之意——译者），他们带我去这边第一个真正的绿洲。

我将在依格孜亚尔的一个村庄过夜，他们兴奋地说该村就在附近。可我们却走了约8英里，累得疲倦不堪，但我并不太介意，眼前的景色一片凄凉。我们横穿过一块冲积扇，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匀称的冲积扇。碎石斜坡寸草不生，向北面和东北倾斜而下。我较幸运，没有碰到经常发生的龙卷风烟尘。远处一片片深色的

东西清晰可见，那是巨大的灰色山麓地带砂砾上零星分布的绿洲，可我们却找不到滋养绿洲的河流的踪迹。原来，水并没消失在石头和小圆石中干涸的土地里，而是被小心地收集在狭窄的沟渠中，用来灌溉。这里的山坡千篇一律，上面耸立着虽小却很陡峭的金字塔状的山峰，这是岩石山冈长期腐蚀的结果，另一半山冈掩埋在瓦砾堆中。远处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我看见了夕阳反射的一条条红黄色"波浪"，那就是真正的沙海。1900年，我从奥尔丹帕迪夏（Ordam-Padshah）的沙漠庙宇出发，曾横穿了那个沙海。

现在，这里一派塔里木盆地的典型风光，好像欢迎我的归来。离开几将倾颓的哨所，不大一会儿，到了偏僻的马达尔（Madar），小树林里飘出沙枣（Jigda）的阵阵清香，使我想起了在银色橄榄树下度过的孩提时代。在微弱的光线中骑马前行，一切在时空上仿佛出奇地相近，这些已非本文所能表述了。

我们在依格孜亚尔村百户长的农场短暂歇息了一晚，天气闷热。6月8日一大早，我们向去喀什噶尔的最后一段路程进发。虽然我知道这段路程是可以分3次行军才能走完，但为信守约定，我告诉队员要在当天抵达喀什噶尔，这是有点草率。结果，我们一口气走了60多英里。马鞍上驮上必备之物，带上年轻的拉达克人(Ladaki)，我便在早上4点30分出发了，行李则由奈克·拉姆·辛格照管，择易行道路运往喀什噶尔。尽管天还早，但天气又闷又热。我们行走了约10英里，越过光秃秃的碎石达什特（Dasht)，到了苏盖特（Suget)。苏盖特由绵延很长的村庄组成，正值桑葚儿成熟季节。这时，一座座小山消失在视野之外。

然后，我们顺着又一条坚硬的黄土地继续前进，因缺少灌溉，黄土地已被废弃，土质贫瘠盐质土地长满了库米什（Kumush，突厥语，即芦苇)。到喀拉巴什（Kara-bash）村，情况终于有了改观，喀拉巴什村的灌溉不仅有从依格孜亚尔（Ighiz-yar）河的沟渠供给，还有提供。喀拉苏（Kara-su，意即"黑色的水"）泉水渗入沙砾层

中，流到冲积扇才得以重见天日。

不久，离开这里的莎车人村落约3英里，我们碰见一条大路，此时还未进入英吉沙（Yangi-hissar）境内，前面出现一大队人马。小镇很繁荣，镇上住着20多个印度高利贷者。他们昨晚听说我要经过此地，于是就出城迎接。别看这里地处偏僻，可他们获利颇为丰厚。他们真诚希望得到白人老爷（Sirkar）官员庇护。天气闷热，光线刺眼，我们人困马乏，赫拉·拉尔（Hira Lal）——他们的阿克萨喀勒（Ak-sakal），即首领热情招待了我们。我的队伍骑在马上，昂首挺胸，英姿飒爽，看到这种情形，我却不禁想起坚强的Shikarpuris。他们被拴在这片土地上，不能离开，高利贷者像水蛭一样榨取他们的血汗。

赫拉满头白发，谈起话来很有意思。1870年，他取道布哈拉（Bokhara），来到英吉沙，成为放高利贷的先行者。从那时起，镇上的人口和耕地均增加至少一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平息了回族人的叛乱之后，人们生活安定。假使我很早以前没听说他给远在辛地的家人汇去几十万卢比，单从招待我的派场，我就能感觉到他从本地的经济发展中捞得到了多少好处。他在镇上的大巴扎款待我，有华丽的房间，美丽的花园。

但是，我待的时间很短，没有时间从这位印度高利贷商人的杰出代表这里了解信息。我在赫拉·拉尔那树木成阴的花园里待了1个小时，喝了点茶，洗了洗身子，更换了马匹，接着继续向喀什噶尔前进。这条路线对于我并不陌生，因为5年前，我从和田返回时走的就是这条路。与那时相比，可耕地持续增多。下一段路是去往亚普泉(Yapchan)，这段路过去是大面积芦苇覆盖的荒废土地或流动沙丘，而现在由于耕地开发，废地和沙丘已大大减少，一路上不时见到树木和田地。北风刮个不停，扬起沙尘，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视线，但却减轻了正午太阳的炙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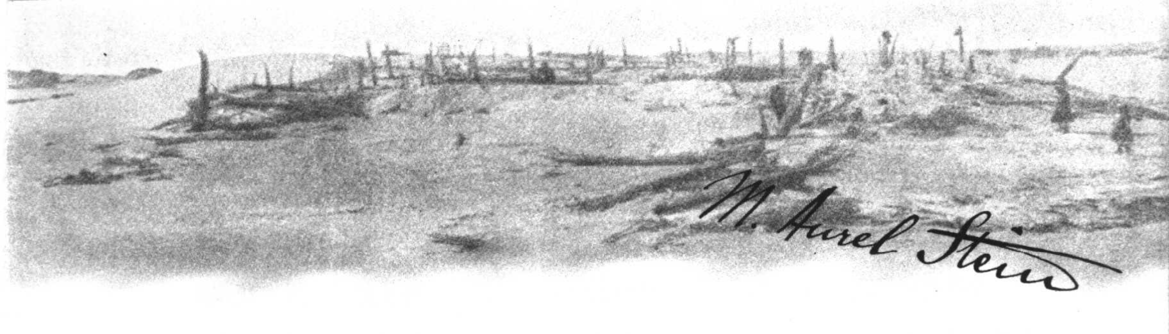
衙门的大老爷（Darogha）本来要和我们一起走，但我想尽早到达喀什噶尔，所

以没有等他来到，我们便离开了英吉沙。他虽官位不高，却能表明当地官府对我们的支持。由于没有大老爷跟着我们，亚普泉台站的伙计故意耽搁时间，迟迟不给我们交换马匹，浪费了1个小时；而且，交换来的马看上去孱弱不堪，还不如我从英吉沙骑来的那匹马。

接下来的20英里，大路上尘土飞扬，我们的进程又慢又累。风暴（Shamal）刮得越来越厉害，吹打着我们的面部，吹得人很难受。更糟的是，6点钟以后，沙尘暴大作，连眼睛都睁不开，大路虽然很宽，但我们却常常偏离大道。傍晚时分，终于来到了喀什噶尔新城的黏土城墙外，中国军队驻扎在这里。这时，行李队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继续走大路，这里距老城仍有7英里，我的朋友正在那里等着迎接我。大路绕过方形城墙，在幽暗的暮光中若隐若现。大风怒号，沙尘满天飞，搞得我根本没心思问路，于是，我弄错方向也就不足为怪了，我走的这条道与正确路线几乎是相互垂直。不大一会儿，到达了一片沼泽样的地方，发现一间茅舍，茅舍外景色不错，里面住着一位年轻的种田人。我让人问他如果他肯帮忙，我可以支付一枚闪闪发光的银币。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大路，天色时已大黑。

尘土齐脚脖深，马累得筋疲力尽，走起路来跌跌撞撞，队伍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有时和路边的树木迎面相撞，可是我需要这些树，正是它们的存在引导我们不偏离正道。偶尔遇见几个卖东西的货摊，微略的灯光从黑暗中透了过来。在白天，这条大路一片繁忙景象，来往于新城和老城之间的车辆奔流不息，现在却有点神秘，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安全走过克孜勒苏（Kizil-su）桥，在老城安静的郊区穿行，沙尘暴终于小了一点。夜里这么黑，我不敢再走小道，沿大路一直走到城墙边，谁知道却是离马继业夫妇住处最远的那一面的城墙。城门几个小时前已经关闭，城内寂静无声，我沿着城墙继续往前走，若没有狗叫，没准有人会以为这是座“死城”呢。

一天之内走了那么远的路程，又刮着令人窒息的沙尘暴，连人带马几乎都给累垮了。约摸晚上10点钟，我终于找到了去马继业夫妇寓所的小路，路两旁是花园和田地。当我看到那扇熟悉的其尼巴格（Chini-bagh）门还没关上时，我松了一口气。外院很大，我大声叫喊，很快走出来几个突厥仆人，他们还记得我。几分钟后，朋友们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他们等我等了很久，却不见我的影子，最后只好放弃。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掸净身上的尘土，然后坐到精致的餐桌旁。漫长的分别之后，朋友之间会有很多话要说。待我躺下来休息时，早已过了午夜。回头想想6个星期的艰苦跋涉，今天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我心里高兴极了。



第十章

在其尼巴格，在喀什噶尔

那天晚上，在沙尘暴中到达了喀什噶尔。在以后的那段日子里，老朋友悉心照顾我，给我提供了舒适的住所，日子过得十分快活。离开其尼巴格5年了，它还风采依旧，我不禁回想起过去在其尼巴格的那些日子，心中的遗憾久久不能抹去，这一点我已在有关上次探险的文章中写过。马继业先生（英国政府的代表）的寓所原是本地人家的一个不大的花园，经过他的悉心照料，花园现在变得非常漂亮，面积也大大增加，就像东欧某地的英国人家的家园。站在花园里，可以观赏到蜿蜒的水磨小河（Tümen River）、高高的黄土河岸边上肥沃的土地及其上面美丽的风景。道路两旁树木成阴，果树硕果累累。我回忆起了1900年8月和9月，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住在这里，宴请不断，应接不暇。

其尼巴格忠实地保留着古迹，它又迎来了一个新主人——一名叫埃里克（Eric）的英国小孩，我无法想象他能给其尼巴格带来多么大的光明。他是马继业夫妇的小儿子，刚满6个月时，他和父母千里迢迢，从伦敦来到喀什噶尔。他年纪虽小，旅途中却没有生病。我上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伦敦，夫妇二人正在为小家伙的第一次“旅行”做准备，他躺在一个奇怪的运输工具中，这东西既可做手推车，又可做雪

橇。现在，这可爱的小家伙满花园里跑动，一看到妈妈或保姆，他就会爬上小矮墙，不让她们发现，有时则尽情地享受这宜人的季节，在宽敞的庭院中自由自在地玩耍。

我不禁回忆起我的孩提时代，想起阳光照耀下的花园。在儿童的眼里，花园简直就是辽阔无边的王国。幸福的埃里克是喀什噶尔的少爷，他运气真不错，又有了刚满几个月的妹妹做伴，小姑娘是中亚腹地出生的第一个英国孩子。快乐的小公主很爱笑，脸庞红扑扑的，精神挺好。家人经常抱她到花园里，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一旦沙漠地区的气温降低，温度条件许可，我就想从和田出发，立即开始沙漠之行。我计划利用夏天这几个月，去别的地方看看，所以只能在喀什噶尔待上半个来月，我必须趁这段时间尽快做好准备。马继业先生的不懈帮助和深谋远虑给我减轻了不少困难，我过去的部下也一个接一个来了，各就原位，迅速组成了探险队，这些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筹备工作。马继业先生对我热情备至，他在当地很有影响，这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我就要向和田进发了。在到达喀什噶尔的头一周，我从一商旅护卫队那里购得了 8 头骆驼。这些骆驼体形高大，饱经各种风雨的洗礼和考验。它们本来是商队用来穿越天山、前去阿拉木图（Almati）的。商队每头骆驼索要 88 两（Tael）银子，根据当时的汇率，这相当于 220 卢比，价钱有点高，我心里不太情愿。不过这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1900 年以来，随着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里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有很大增长。作为与俄属突厥斯坦及南西伯利亚的商业和贸易中心联系密切的喀什噶尔自然尤其如此。我们接连几次去了每周开市一次的马市，购买的小行李和随从所需的几匹马价钱还都合理，从 35 卢比到 50 卢比不等。

奇怪的是，生活费用的提高并没影响喀什噶尔人悠悠然的闲适生活，说白了就是喀什噶尔人懒惰和游手好闲的习性依旧没有改变。他们在城外的果园里野炊，这是他们夏天唯一的享乐活动了，而其他的居民处在赤贫的边缘。在我到来的大约一

周以前，正值喀什噶尔收获果实的时候，有大量可口的杏子，好几种桑葚儿、稀罕的樱桃，这些东西人们只管吃，不需付钱。可是，要找全探险考察工作所需的皮革匠、木匠、铁匠和裁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马继业先生多方设法，良言相劝或施加压力之下，终于招了一些人来。然而，这些人有的工作时大多装模作样地磨洋工，有的则干脆干几个小时后就开溜，连声招呼也不打。直到经历了许多挫折失败之后，在市集和其他节庆时期不再提供杏、桑葚儿等不劳而获的食物时，这些人才慢慢变得驯服起来，开始按时工作，况且，工作本来就不复杂，收入也不菲。由此，我深深地感受到，当生存压力没有被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以前，人们仍会乐乐呵呵地生活；同时，我也可以想象，要建设其尼巴格这样一个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的家园，马继业夫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

设备需要做大量检修工作，还需订购些马具，可是，技工们仍然是悠然自得地我行我素，进度缓慢。若在更商业化的地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加起来也不过一两天就能办完，但由于这里令人苦恼的陋习，在突厥斯坦地区却需要几周的时间。这期间，我在花园的房子里，埋头校对拙著《古代和阗》。编辑每周都给我寄来样稿，只要见到邮差，就肯定有寄给我的样稿。然而，从白沙瓦边境急匆匆出发以来，我的体力消耗了许多，精力不支，难以校完稿，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些印刷精美的四开本样稿给我在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现在由于塔什干—奥伦堡铁路（Tashkend-Orenberg Railway）的开通，费尔干纳（Farghana）的俄国邮电所的邮政业务开展的更加快捷，这样，校对后的书稿可以迅速地寄回去。于是，我每周两次把一捆捆书稿送往俄国领事馆，再从那里发送出去。

我待在喀什噶尔的这20天时间里，除了腾出时间校读书稿，我还能和老朋友在远东地区相会相聚，实乃人生美事！在以后两年的旅途中，我的行程越来越远，从亚洲发出的邮包若只是简要地交流信息，则由俄国邮局寄送，如果涉及的内容较

为重要，为了安全起见，则经由罕萨和印度寄送，虽然路远了点，但全程皆有英国人负责。

在俄国领事馆，我受到最友好的接待。在我和俄国人的交谈中，他们都热切期望《英俄协定》（the Anglo-Russian agreemeat）的诞生。两年前，科罗克洛夫先生（M.Kolokoloff）接任彼得罗夫斯基先生（M. Petrovsky），成为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是个中国通，对远东事务也了解颇多。在日俄战争（the Japanese War）的第一阶段，他时任俄国驻奉天（Mukden）的领事，他向我生动描绘他的亲身经历，历史事件历历在目。我对科罗克洛夫夫人的英雄般的举动深感钦佩。那场战争刚爆发，夫人被迫抱着才出生了9天的孩子，离开奉天，去圣彼得堡。那可是近2个月的行程！所耗费的体力和精力也许不亚于漫长的探险活动。

1901年，我离开喀什噶尔时，俄国在其领事馆附近建立了俄中银行（Russo-Chinese Bank），现在又建好了欧洲式的寓所。宽敞的房间，宽大的玻璃窗，双开式弹簧门及其他西方豪华装饰搭配得很协调，但生意冷冷清清。步行在银行至领事馆的林阴小径上，路过俄国人的房子和花园，我感觉好像是在欧洲的某个地方，一个山区小镇的一隅却比印度更加欧洲化。这里和几乎所有的俄属突厥斯坦一样，宛如东欧一般，气候适宜，没有严格的种族界限。

我到喀什噶尔那天，这里刮了一场沙尘暴，所以以后的几天相对凉爽。6月11日，下了场小阵雨，清洁了空气，这样，我一整天都能欣赏到西南方遥远的雪山美景。这座雪山和帕米尔高原接壤，我在第一次中亚之行中曾目睹了它的英姿。慕士塔格阿塔综合了古典伊摩斯（Imaos）的特点，在喀什噶尔望不见它巨大的圆顶，但其北边冰川环绕的山峦却清晰可见。很遗憾，测量员拉姆·辛格不在这里，否则，这不仅仅是进行一次三角洲测量的绝佳时机，还能测出喀什噶尔的具体方位。

不久，夏季的沙尘又开始肆虐起来，气温逐渐升高，最后，晚上也闷热起来，

即使把帐篷搭在了大树下，也难消热浪。同时，准备工作以喀什噶尔人做事方式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进行着。我希望，旅行开始时带上中国的银币，少带些俄国卢布金币。于是，我把印度财政部拨给我们的供给金卖给印度高利贷商人。他们的兑换率是1卢比兑换6个天罡（Tanga，新疆制式银圆——译者）10个大钱（Dachin），虽然吃了点亏，但不像俄中银行经过圣彼得堡、伦敦、孟买协商的汇率那么黑。

先择定组成驮工的人选需要认真细致的考虑。我知道骆驼是运输工具的主要部分，但根据个人经验，照看和料理这些动物常常费力不讨好，因此，我必须认真选出一位可以信赖的行家里手。真正懂得如何照看骆驼的人必须来自于驼人世家，既有祖上传下来的学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中国新疆地区，符合这样要求只有那些往来于俄中主要贸易线上的大商人，他们拥有骆驼，也亲自动手驮运货物，因此，对于一个匆匆过客，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人选非常困难。

所以，当我的老部下哈桑阿訇（Hassan Akhun,）出现在我面前，说要再次参加我的探险队时，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年纪不大，擅长照看骆驼，生性好奇，口无遮拦，敢提问题，事实说明，他的好奇和问题对我的上次沙漠探险很有用处。除了优点之外，我也很了解他的缺点：爱抬杠，喜欢争斗，言语尖刻，导致人人与他为敌。但他精力旺盛，有主见，悉心照顾他深爱的骆驼。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凭我的直觉，正是他的冒险精神，才驱使他再次参加沙漠探险队，这种冒险精神在突厥人中是很少见的。我很快安排由哈桑阿訇掌管我的“沙漠之舟”，尽管骆驼还没有买来。虽然以后小麻烦不断，但我从不对这个选择后悔过，因为他给我们的旅行带来和睦与宁静，相比之下，那些麻烦就相形见绌了。

在喀什噶尔，最难的要算找厨师。“可敬”的奴尔汗（Nur Khan）跟着我们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可他属于印度北部兵营中怪异的罕萨玛（Khansama）那种类型的人。在白沙瓦，我是不得已才雇了他。再说，他的体力显

㊳负责照看骆驼的哈桑阿訇



然不能支撑长途旅行的劳累，做的饭菜也经常让人难以消化，哪怕是最简单的饭菜也做得很糟糕。他顽固地认为，他之所以做不好饭是由于我们缺乏举行烹调仪式的办法和手段，而根据印度军营的命令，那种仪式是正统的罕萨玛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无法满足奴尔汗这个要求，恰好因为马继业夫妇缺少一个合格的厨师，他们装备齐全的厨房也只能是马继业先生亲自下厨，所以，我倒乐意把奴尔汗留在喀什噶尔。

唯一可以替代奴尔汗的只有克什米尔人拉姆攒（Ramzan)。他年轻聪明，但不讨人喜欢。几年前，他曾和一队欧洲人来过新疆。在给瑞典传教士服务期间，凭着克什米尔人天生的多才多艺，他掌握了西方烹饪的实践技能，这足以满足我的需要。我经常去克什米尔地区，和克什米尔人有着长期的交往，我却总不愿意仅仅为了满足我个人欲望，而去雇用一个克什米尔人。克什米尔人普遍轻浮易变，脾气暴躁，天生不爱干净。在喀什噶尔，想到旅程的艰难困苦，他心惊胆战，不止一次地想打退堂鼓。在上次探险中，每个队员都从戈壁（Gobi）安全归来，现在，参加上次探险活动的队员热切希望参加这次沙漠之行，恐怕是这些人的事迹鼓舞了他，或许抱着一旦忍受不了，就中途逃脱的幻想，也许是为了可观的收人，拉姆攒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就我个人而言，我坚决要求他遵守合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遵守，并确保他能烹饪出可口的饭菜。合同的的确确履行到了最后，但他所带来的烦心事，现在我想都想不完。

其实，我熟悉的人中还有一个人选，他就是我过去的厨师突厥人萨迪克阿訇(Sadak Akhun)。看在旧日情分和他娴熟的烹饪技艺的份儿上，我本来应该再次聘他作我的厨师。然而，他养成了有害癖好，变得经常焦灼不安，难以胜任这项任务。他抽大麻，在塔克拉玛干时，他就常常因此心神不宁。1901年在奥什（Osh）分别后，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后来，他在俄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精神状况并没有好转，却开了一家鸦片铺，这可让他过足了烟瘾。他面容憔悴，目光呆滞，身体健康每况

愈下。因而，他几乎没有希望再一次完成沙漠之行，要么让他狠狠地抽，要么有一点刺激就变得狂躁，如果那样，在沙漠里我怎么可能有办法管理呢？

尼雅孜（Niaz）是我以前的中文翻译，他的情况与萨迪克阿訇大同小异。他是个回族（Tungan，也称作东干——译者）人，谈吐幽默诙谐。我一到达喀什噶尔，他就来找我，想再次充当我的中文翻译。我还清楚记得上次沙漠之行中，一旦我一眼瞧不见，他就去赌博或蓄意敲诈勒索别人，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不出我所料，在和田新婚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给毁了，很早便加入所谓的克麻孜巴兹（Kamarbaz，即“专门赌博组织”），这种行会在新疆的每个市镇都有。再次雇用他只会给我带来更多麻烦，所以我只能慷慨地送他一块银币，聊表安慰。当然，不久，他就拿这块银币去赌博，用一句古老的印度俗语讲是“为‘赌神’而牺牲”。本地一位中国官员把阿合买提阿訇（Ahmad Akhun）推荐给我，他是喀什噶尔人，会讲汉语，虽然不如麻烦不断的尼雅孜那样聪明和能干，但却谨慎可靠。

然而，最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找到一个合格的中文秘书。为了完成探险任务，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成了第一要务。此前，我的大部分活动都在印度，难得闲暇，我没时间来认真学习中文，以增加点语文知识，虽然我明白中文对我是何等的重要。这次探险，准备向东走得更远深入到中国版图，中文知识的缺乏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远在我启程以前，我就告诉对我最有帮助的朋友——马继业先生，让他帮我寻觅一位得力的中国助手，但我知道找到符合我特别要求的人绝非易事。

为了从中国文献和遗迹中寻找可能的线索，我必须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为了尽快掌握汉语初级口语、利用在山上或营地可以腾出的时间充分锻炼所学的有限汉语，找到至少熟悉突厥语或其他语言作为我们之间交流中介的老师就显得重要了。最后还有一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愿意且身体足够强壮，能经受旅途的艰难困苦，但这片新领土（New Dominion，指新疆——译者）是个流放之地，具有一定学术

造诣的人少之又少。那些师爷们（Ssŭ-yehs）大都居住在舒适的衙门里，期待着升官晋爵，谁也不愿意抛弃官府豪华的生活，他们中有人有望成为官员，飞黄腾达。

我到达喀什噶尔时，马继业先生告知我他已经找到了可能的人选，我既惊奇又高兴。这个人是英国领事馆中中国职员（Munshi，也译为“门士”，专门负责与外界交涉——译者）的朋友，马继业在莎车（Yarkand）时就听说过有关他的情况。我们马上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亲自前来。10天后，他如约而至。此人名叫蒋孝琬(Yin Ma Chiang)，或称其官衔“蒋师爷”（Chiang Ssŭ-yeh）。他举止落落大方，看上去真诚和蔼，通情达理。作为公务员，每月（mensem）收入达50两银子，约合120卢比，乍一看，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鉴于中国官员在边远地区报酬都很高，所以，50两也就不足为奇了。

见到我们，蒋师爷显得很兴奋，看上去已经为戈壁之行做好准备。他长着圆圆的脸庞，笑容可掬，步伐轻捷，个子不大却很健壮，这让我相信，即使面临艰难的长途跋涉和艰苦的沙漠营地，他也知道如何生存下来。马继业先生对中国人有深刻的了解，以其罕见的洞察力可以大体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蒋师爷聪明、坦率，有朝一日可以接任英国领事馆的师爷。毫无疑问，这个升迁的希望诱使我这个中国助手和顾问对我忠心耿耿，当然这没有明说，只能私下里暗示给他。

虽然在这里住了17年之久，但他掌握的突厥语非常有限，刚开始，他讲的突厥语听起来和汉语差不多一样难懂。由于中国人的口腔结构不同，难以发出突厥语的辅音组，也不会利用突厥语复杂的词尾变化，所以，他们发音时经常省音和变音，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方言。不过，我们不久就能互相猜出对方的意思。见面几个小时以后，蒋师爷就正式加入探险队，忙着帮我核查样稿中的中文名字。蒋师爷研究汉学多年，我则对梵语比较了解，我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若要是在克什米尔，我就能和博学的蒋师爷一起相互交流，那该多好啊！

在日常旅行的频繁交往中，不久，我就发现蒋师爷不仅是位优秀的老师和秘书，而且有工作热忱，为了我的科学研究甘愿面对任何困难，能得到蒋师爷确实是件幸事，我得好好谢谢马继业先生，感谢他这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在长途行军中，晚上早早搭好帐篷，利用睡觉前的空余时间，他就给我上课，而且，他性格爽朗，好说健谈，讲得蛮有趣味，而在过去漫长的登山途中，我只有自个儿枯燥地学习。当他教会我最基本的中文口语后，在以后几个月漫长孤独的旅程和考察中，蒋师爷就成了我一大快乐的源泉。

蒋师爷做事小心谨慎，举止文明礼貌，遇事机智老练，我打开始就确信他不仅是个忠心耿耿的助手，还是个绅士和真诚的伙伴。很快，以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深厚的历史学知识，他做起考古工作就像鸭子下水一般轻而易举。他对历史很有学术兴趣，对现在的人和事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不时做出幽默的评论，使劳累的工作变得轻松起来。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确信不疑他体质十分好，心胸豁达乐观，能忍受住任何不适和艰难的生活。我对此一直感到惊奇，后来，每当回忆起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光时，我就纳闷儿哪些特质使他如此卓越（也许是早产之故）？总而言之，我十分感激这位优秀的中国伙伴。

赢得中国地方政府对这次新的探险活动的支持也是我在喀什噶尔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马继业先生的个人影响力，他领导的机构的帮助在这个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新疆行政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扯皮”、“踢皮球”，我的中国官员朋友现在都不在台上，不过，上次在和田的考古成果对赢得支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喀什噶尔的头几天，我就拜访了中国官员，和道台（Tao-t'ai）及其他地方官员建立了联系。与往常一样，我皆由马继业先生陪同，所以在衙门里没有丝毫的拘束之感。

上一任道台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在5年前的那次沙漠之行中，他就对我追寻玄奘——我的守护神的足迹表示了善意的关注，但是，在我们分别后1年，他就去



㊴蒋师爷，我的中文秘书和助手

世了。他的继任者显然更会享受生活，但不像老道台那样愿意积极提供帮助。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和我愉快地共进午餐，参加的还有外贸事务负责人。尽管这只是一顿非正式宴会，却上了约18道菜，每道菜都制作精良，营养丰富。我原以为因习惯了简单的饭菜，还吃不消这些东西，结果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有燕窝，从中国内地运来的冻鱼和水果，还有其他昂贵的美味食品。这位道台知道如何聚敛钱财，据最可靠的消息，他今年已通过罕萨和印度给他在中国内地的家人汇去了价值100万卢布的金子；因此，他挥霍起钱财，眼睛都不眨一眨，并以此向人炫耀，让别人看看他的生活是多么奢华。

餐桌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新疆的中国官员对西方尤其是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离开这里才短短几年，可风俗和输入商品都有了变化。进餐时用洁净的餐巾，熨得平平整整，取代了原来的湿热毛巾。我这人有点保守，所以当看到桌子上白布时（过去，白色在中国的一切节庆场合都是禁忌的），我吃惊不小。进餐的人刀叉使用得非常熟练，筷子成了摆设，以示对古老传统的尊重。这些变化虽小，但对中国改良运动的意义非同小可，俄日战争（Russo-Japanese War）则对改良运动起了最后的推动作用。菜肴仍完全是中国式的，但马继业先生承认，就连他也搞不清某些菜到底是何物。

虽然有种种不利因素，拖延了沙漠之行，但我仍加快了准备工作，定于6月23日启程南行。6月21日正值夏至，为了参观我上次中亚之行错过的一处遗迹，我不顾天气炎热，去了位于喀什噶尔绿洲北部边缘以外的这处古迹。可能因为居住在喀什噶尔的欧洲人对这处古迹不太熟悉，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这个叫作“玉其买尔万”（Och-merwan，今名为“三仙洞”——译者），意即“三扇窗”的遗址。离开其尼巴格，沿着通往阿图什山谷（Artush Valley）和翻越天山山口的大路，到了一个叫做“恰马里克萨依”（Chamalik Sai）的荒凉砾石平原，平原位于阿图什河

的右岸，我们要找的遗迹就坐落在平原之上。佛塔由大块的土坯垒成，大部分结构已经坍塌。它建在低矮的黄土墩上，高约32英尺，也许正是由于风蚀降低了附近周围地的高度，这座佛塔才得以存在。宽阔的河床几乎干涸了，河床以外以及排列在河床南面的出口处是寸草不生的小山丘，山丘摩擦得非常平滑，这充分证明了沙漠之风的强大威力，即使在如此靠近大片耕作区的地方也概莫能外。

土坯表面遭风蚀特别严重，其中圆顶和基部的土坯与6年前我在喀什噶尔东北的莫尔梯木佛塔（the Mauri Tim Stupa）见到的土坯已根本不成比例了。但根据土坯的尺寸大小和佛塔的建筑结构，基本可以断定这两座佛塔大致属于同一时期。这座佛塔足以说明，围着西北边不远的、两座不规则的长方形小城堡的城墙也是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建筑，本地人称之为“可汗沙尔”(Khakanning-shahri)，意思是“大汗之城”。这段城墙建于狭窄的黏土砾石山脊顶上，高约40英尺，高出南部平原则不止40英尺，土石冈延伸到平原的北端突然中断，那里断崖陡峭，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城墙已经倾颓不堪，也用土坯砌成，其大小和佛塔的土坯基本一样，长15英寸，宽12英寸，厚约4英寸。城墙宽度从3~5英尺不等。这里地表缺乏起保护作用的流沙层，加之地处大盆地的西北边缘，城墙又有一定的坡度，经常受到狂风沙的冲刷，所以，没有留下值得发掘的遗迹，也没有多大指望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遗物，比如说文书之类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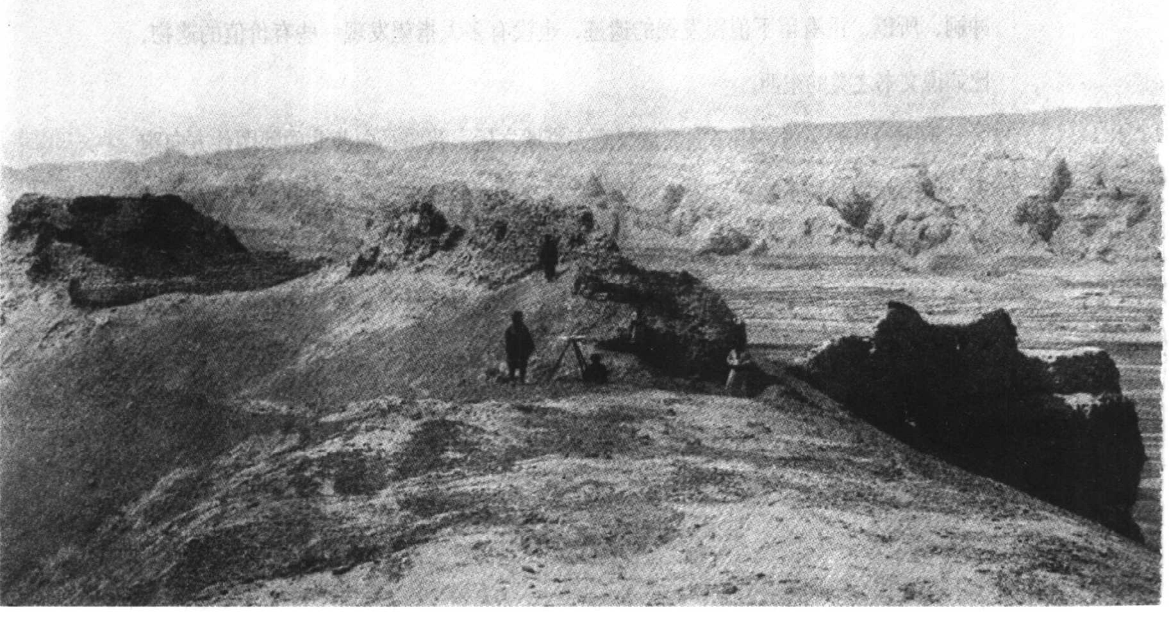
不顾烈日的炙烤，用平面测量仪测完废墟之后，我骑马向西北的阿图什方向跑去。路的左边是长长的砂岩阶地，阶地之下是平坦的河床，河床之上是几乎垂直而立的岩壁。阶梯底部形成堆满岩屑的岩坡，岩坡顶端之上约50英尺处有一块岩石凿了3个石窟，3个石窟成一条线排列，高悬在阶地边缘以下，它们被称作“玉其买尔万”。石窟的门凿得很精细，凹得比较浅，门壁略微有点倾斜，看上去大约有8英尺高、6英尺宽。在中间那个较浅的石窟里，我很容易辨认出了里面端坐的是一尊

佛像，头部被彩绘，有发髻和光轮，马继业先生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两侧的石窟看上去要比中间的深得多，表明后面有通道与之相连，可以绕着中央石窟中佛像右绕（Pradakshina）礼拜。在3个石窟下面，石壁上有规律地凿出了一些方形孔，以用来支撑出入这座小石窟寺庙所需的脚手架。我想从断崖上放下一根绳子，拽着绳子攀上石窟，结果证明是不可能的。我来不及临时编一个软梯，最先造访这些石窟的哥萨克人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去年秋天，德国考古队来到喀什噶尔，他们已经对这些洞窟进行了考察，所以，我只需用望远镜观察就可以了。

晚上的归程是令人愉快的。还没到达绿洲地带，不时碰见一队队从喀什噶尔巴扎回来的村民，炎热的灰色平原增添了几分生机。一进入灌溉区，各种感官都兴奋了起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满目是亮丽的色彩，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活力。骑马走在大白杨树的树阴下，弯弯曲曲的大路旁长着桑树，望着广阔的黄色的成熟的庄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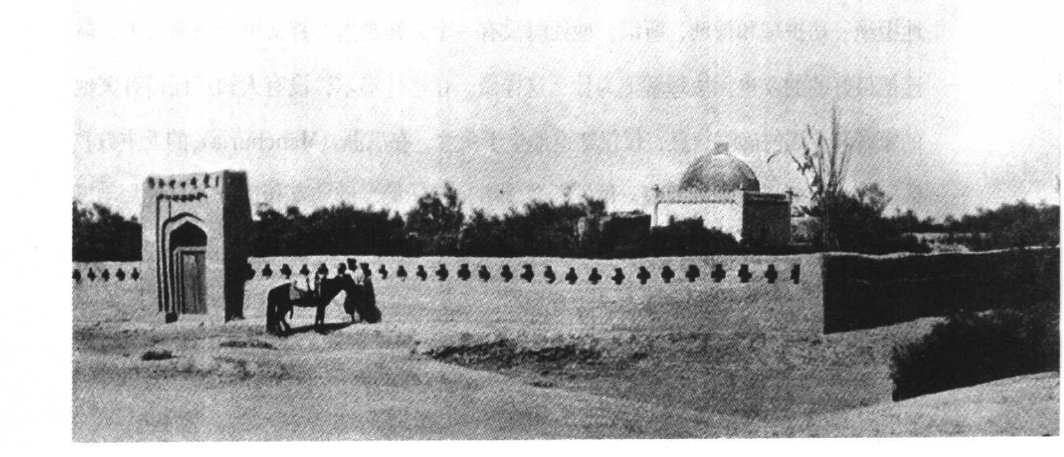
⑩阿图什河右岸的哈坎弄沙尔戍堡遗址



深绿色的果园和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废弃伊斯兰教墓地的圆顶点缀其间。村民骑着马和驴，高兴地往家走，人流滚滚，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路上黄土达几英尺深，黄土土质松软，车辆深深地陷了进去，道路简直成了给车辆特别发掘的沟渠。早上，吃苦耐劳、个头矮小的马和毛驴要给主人把很重的农产品驮到市集上，新疆人是能不走路就不走路；晚上，回家对牲口来说可是件喜事，因为驮的东西要比早上轻多了。

每逢集市是展示漂亮服装的好机会，所以，大部分赶集的农民（尤其是女士）不会失去这么好的表现机会，穿上好看的衣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本地经济的繁荣。喀什噶尔妇人喜欢穿鲜红色的宽松长袍，戴暗色、尖尖的毛皮帽子，全身搭配得既秀丽又端庄。但是，我禁不住同情起她们，这么大热的天还带着毛皮帽子。孩子们的感受显然跟我一样，我们每过一处沟渠，总见到孩子们在深褐色的水中嬉戏玩耍。在俄罗斯领事馆的路上，我们曾在这个水磨河涉水而过。这条河夜间涨水，形成一大片红棕色的区域。有人过河，有人洗澡，呈现出一幅快活的画面。在喀什噶尔待了二十几天，就数那天晚上最多彩绚丽。夜幕降临后，我和马继业夫妇坐在其尼巴

㊶前往喀什噶尔途中见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墓地



格阶梯状的屋顶上共进晚餐，凉风习习，天籁寂静，好不舒适宜人！

那天晚上是我和马继业先生共度的最后一个良宵。他说我是和喀什噶尔旧时代有缘的最后一人，我们对不久就要开始的探险活动并没有想得太多。虽然喀什噶尔和俄国中亚地区的贸易迅速发展，本地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但它的市貌和本地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这里欧洲人的组成已经完全改变了。当马继业先生第一次来这里考察印度古迹的时候，这里只有年迈的亨德里克斯神父（Father Hendricks），喀什噶尔欧洲人的联系工作基本由他一人负责。

大约18年以前，和蔼可亲的“阿贝”（“Abbe”，“神父”之意——译者）老人偶然来到喀什噶尔，发现这里环境宁静，人际关系融洽，于是便留了下来。然而，半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朋友和拥护者很快意识到，癌症正在吞噬着他的生命。然而，这位身穿半中式服装的神父，每天仍然不懈地给英国人、俄国人、瑞典人和中国人布道，从不厚此薄彼。可能因为习惯使然，也许是因为非常喜欢与人交流，他不辞劳苦，来到其尼巴格。虽然年迈体弱，却很有活力，可以说是喀什噶尔的一份“活报纸”。

但是，我们谁也没意识到这一切行将结束。在我离开的前几天，马继业夫妇一直没有见到神父熟悉的身影。于是，6月22日上午，马继业先生去位于城内离“水门”（“Water Gate”）不远“阿贝”神父简陋的住处，发现神父已经离开了人世，看上去像是患了神经性中风。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濒临倒塌的破房中，固执地拒绝一切护理和帮助，所以，他死时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神父可怜地离去了，就连他最好的朋友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在喀什噶尔，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关他的家庭和亲属的确凿信息，仅仅知道他生于荷兰，在满洲（Manchuria）的天主教教区工作了几年以后来到新疆。俄罗斯总领事是神父最老的朋友和拥护者，经与马继业先生协商后，总领事先生负责神父的丧葬工作，这在喀什噶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这里欧洲的传统仍很浓郁，可欧洲丧葬规矩所需的东西少之又少。

6月23日，天气非常炎热，我差一点被迫取消行程，但参加完神父的葬礼以后，我们还是出发了。天亮之后，我们忙着收拾行李，并和工匠等民工人员结了账。随后，我跟马继业先生一道前去参加葬礼，我们在木工店里找到了科罗克洛夫先生及他带领的一些官员，棺木马上就要准备好了。棺木本来应该在昨天完成，但活人的鞭策和死人的请求皆不能对喀什噶尔木匠根深蒂固的惰性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生性善良的领事先生也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坐镇监督，以确保棺木能够做完。我们在木工店里苦苦等了几个小时，不久，我们觉得里面的空气令人窒息，于是我们到了邻近萨拉依（Sarai）的凉棚里，谈起这段不平常的生活现在结束了，心情平静如水，未来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每隔一会儿，我们就回木工店看看，俄罗斯官员吃起了便餐（他们肯定很饿），在棺木旁抽着烟。在几个健壮的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棺木快要做好了。它仿佛一幅用明暗对比法画成的图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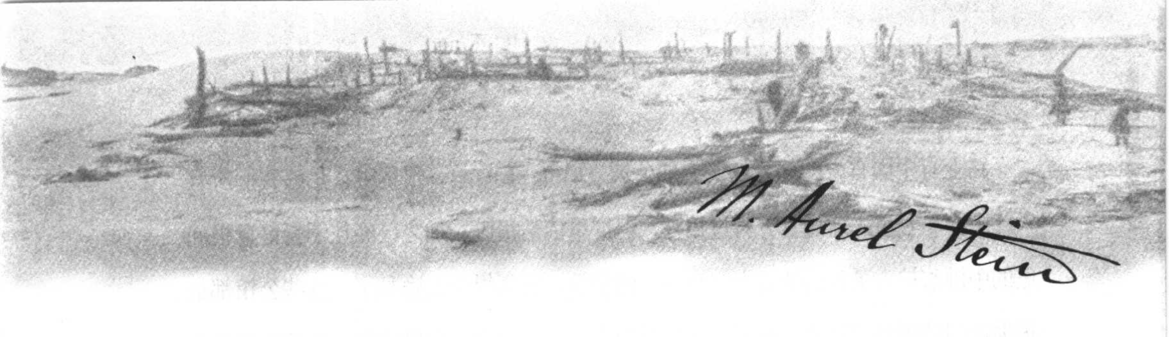
快到中午时，棺木终于做好了。从喀什噶尔的欧洲人居住区到神父简陋的住处，中间要经过尘土飞扬的狭窄小巷。作为表达慈善宽厚之意，中国官员把这所破旧的房子拨给了亨德里克斯神父，允许他在此居住多年。现在，神父的遗体孤独地躺在紧锁的房子里，但一位中国鞋匠（受神父教化的皈依者）在房里忠诚地为神父守灵，可怜的"阿贝"居住的两间房屋又暗又脏。书本、地图、各种各样的旧公文以及日常的家庭用具，连同酿造喀什噶尔酒所需的工具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屋内有一简陋的神坛，是他一个人做弥撒的地方，神坛不远是一扇敞开的活板门，通向一个挖得粗糙的洞穴，这是他酿造和做试验的地方，神父平日除了布道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酿酒。

经过10多个春秋，破旧不堪的房屋覆盖了层层尘土，我不会轻易地忘记它。它就像海边的一个岩洞，翻滚的海浪把遥远海岸奇异的岩屑带到岩洞，储存了起来。

由于长期间患病，神父的身体已萎缩变小。几个哥萨克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抬进棺材，这时，我想起了神父生前的生活处境，这种处境忠实地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的确，他学识渊博，见过各种人，去了很多地方，但如何有条有理地运用这些学识，就好比在这个乱糟糟的房屋里迅速找到一样东西那样困难。人际交往只能反映出神父有一颗像孩子那样善良的心，对他偶然相识的人热情相待。

从沃尔诺耶（Vernoye）来的奥伦堡哥萨克人人高马大，抬着棺材，慢慢地向前走，领事馆士兵走在前面，后面则是参加葬礼的队伍。大家脱下帽子，以示敬意。一小块俄国人的公墓大约在1英里之外，位于一条河与其尼巴格之间，神父的墓穴算是欧洲人在喀什噶尔所能提供的最大墓地了。晌午的太阳依然炙烤着大地，在某些方面，俄罗斯人在中亚显然要比欧洲人在印度更适应当地的气候。

抬棺材的士兵脸色红润，头发金黄，大部分人都具有东欧斯拉夫人农民所具有的特征，看到这些，我心里觉得欣慰。快要到公墓时，他们唱起了圣歌，韵律十分优美（俄国音乐正是因这种旋律而魅力无穷）。根据希腊教（the Greek Church），圣歌要由堂区主管神父来朗诵，但这里哪能有主管神父呢？所以便由这些人唱起了圣歌。在神圣的墓地，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不许瑞典传教士施行任何宗教活动，那样无疑会招致哥萨克人的反对。瑞典人参加葬礼仪式都是领事先生特批的。因此，我们不能说些什么，只能走在肃穆中向这位辛苦劳累、四处流浪的神父告别。不久，马继业先生将在其坟前为他立起一块墓碑。



第十一章

去莎车和叶城的途中

6月23日下午早些时候，我离开了马继业夫妇和其尼巴格，启程前往莎车，它是此次漫长东南之行的第一站。我最后看了一眼园子里炙热的阶地和整洁的白杨林阴道，心中并没有感到遗憾。我不能确定这次探险归来后，是否还再次光临喀什噶尔；毕竟，在中亚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下，两年的光阴也不算短了。尽管我整天忙个不停，但由于马继业夫妇的热情好客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在喀什噶尔的这段时光休整得依然很好。与他们说再见时，我感觉好像要和最后的联络处告别一样，在以后几年里就靠他们帮我同远在欧洲的朋友联系了。

我们沿大路而行，5天之后到达莎车，其中部分路段我在1900—1901年曾经走过，而且与那次探险活动一样，我骑的仍是从依格孜亚尔购得的马。然而，这次与上次有一点明显不同。第一段行程是从喀什噶尔到亚普泉，花了我们大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天气异常闷热，考虑到人和牲畜的承受能力，我意识到我们必须主要在晚上赶路。在白天，躲在像我的这样小的帐篷里避热是不可能的。上次探险活动中，我常在安静凉爽的园林里扎营，但现在我必须放弃这种想法，而去寻找更加坚实的避阳之地。

路上有中国官方的休息场所，即公馆（Kung-Kuan），很宽敞，足够我们所有人住下。尽管事先通过官方打过招呼，但这里依然很脏，加之已经住了喜好盘根问底的中国监护人员和其他行人，难得一刻宁静，更别提个人隐私了。这些公馆都是根据衙门的规划建造的，首要的任务是为来往的中国官员提供住宿。公馆有内外两院，中间被典型的双扇门隔开，只有少数重要显赫的官员才能从这两扇门进入内院，一般的人则须从旁门通过。正房3间，根据中国的传统，正房面南背北，朝向大门，却也因此处于太阳的暴晒之下。宽敞的院子里还好，有树阴，我的骆驼就拴在了树阴下。

在英吉沙休息场所待了一天，校对书稿。天气极其炎热，我更愿意找一户富有人家，以避炎热。我吃了一惊，这里的人家远比印度相似条件下人家住的环境舒适得多。在克孜勒（Kizil），我愉快地回忆起上次访问这里的情景，找到了我在百户长（Yüz-bashi）的住处，他家的果园在1900年9月为我提供了一块良好的宿营地。现在，果树上挂满了即将成熟的杏儿，白色和黑色桑葚儿散落一地，桑葚儿的个儿还挺大。空气的温度仍很高，树阴下达105华氏度，睡在室外，到午夜时分还吸不到一丝凉气。所幸的是，第二天上午，天空布满了云彩，空气中弥漫着黄色的烟雾。在上午9点以前，我们走了大约24英里，穿过了莎车绿洲北部边缘多石荒凉的科克罗巴特（Kok-robat）平原。瞥一眼绿色的田野，心里感到了一丝轻松。一整天，我都在一户村民家的凉廊（屋顶为泥土所覆盖）下校对书稿。期间，初期的沙暴送来了阵阵凉风，接着下了几分钟的雨，只不过雨太小，空气中仍然悬浮着尘土，但在这样一个严重干旱的地方，有这点雨人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26日，我们到达莎车城。这段行程很是愉快，出乎了我们的预料。在凌晨2点钟出发前，又下了一点雨，空气清新了。太阳升起时，绵延不绝的慕士塔格阿塔雪山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不久，穿过了叫做喀拉库木（Kara-kum）的广阔地带，

这原本是已故的精力充沛的按办刘大人（Liu Da-jên）所新建的一条水道，但现在又被沙尘掩盖。5年前，我经过这里的时候，拓荒者正忙着推平土坡，拦断引水的渠道（即Arik）。那时，除了开发较早的几处地方外，其他地方还都没有播种。而现在，目光所至都是一片嫩绿。令我感到惊奇的是，除了分布各处的一片片棉花和苜蓿地外，精耕细作的梯田及河道的两岸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

我的莎车随从帮我解决了这个疑惑，向我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新开凿的水道带来的河水使大部分低地的盐分渗透到地表上来。按办好心地强迫拓荒者认领土地，第一茬庄稼没种成，拓荒者就卷铺盖回家了，虽然他们知道盐性持续不了几年。耕种五六年之后，甚至任土地滋生杂草和灌木，地面的盐性就会耗尽；其实，这些田地现在正需有人来耕种。

在每个人口稀少的地区，人们大都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除非有持续不断的行政压力，垦荒的努力就难以坚持下去。在现行的中国行政制度下，官员不断更换，想把垦荒坚持下来是很难的。刘大人开凿了新水道，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拓殖荒地，但他离去莎车按办一职已经5年多了，其继任者认为继续垦荒对他们升官发财并无任何益处，所以这项工作就搁置了下来，为减轻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而开垦的土地很快便废弃了。

同时，野生植物和灌木在肥沃的处女地或者说冲积扇上迅速生长，路边出现了新疆道路边少有的景色。这个地区只有耕地和菜园才能有灌溉的条件，可我从未在类似地区见到过这样的景象。这里花团锦簇，野草丰茂。过去流动的沙丘被固定不动了，长满了亮绿色的芦苇，葳蕤繁茂，这种植物生命力强，沙漠边缘地带就有生长。条条水渠形成大水塘，由于没人清理，水塘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水生植物。各处的菜园的菜长势喜人。定居者栽的幼树茁壮成长，这些树本来是划分地界的，但田地已经抛弃了。路边的白杨和柳树的树龄只有三四年，却已是绿树成荫；若要在旁

遮普不太肥沃的土壤里，同样的树要长成这个样子至少要花费10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奈克·拉姆·辛格是这方面的权威，对树木的认识是有木匠一般锐利的眼光。

在离莎车更近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几英里地势稍高的地带，也有新水道灌溉。也许由于刘大人的努力，垦殖初期困难已经变小，或者被人们以更大的精力所克服。这里房屋宽敞舒适，木工活做得很精细，新建了整洁的萨拉依，这使我想起耶拉木（Jhelam）和其那普（Chinab）大水渠边开垦的土地。在过去20年里，耶拉木和其那普完全改变了旁遮普西部地区的农业状况。如果有一位掌握现代技术的灌溉工程师，按照他自己的意图自由发挥，并在一个西方政府的支持之下，那么，尽管气候如此干燥，塔里木盆地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

我又一次从比吉尔（Bigil）桥越过宽大的欧帕达里雅（Opa Darya），这是条古老的灌溉水渠，而现在已经有莎车河那样宽。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从桥头骑马慢跑过来，见到我急忙下马。他就是诚实的提拉巴依（Tila Bai，巴达哈商人后裔），系我上次探险队中最优秀的成员。为了摆脱小地主的枯燥生活，寻求更加刺激的探险生活，他接受我的邀请，沿莎车河上行，来参加这次探险队。他肯定不断感受到了沙漠的召唤。见到了他，我松了口气。他身材高大，步态轻盈，有时坦率无忌，我相信他勇敢坚强，绝对可靠。而且，他是马匹方面的行家里手，会把我的马匹照看得很好。

在莎车城外大约4英里，沿大道建有一处砖砌成的方形塔（即“炮台”，Pao-t'ais），作为里程碑的标志，每10华里（约合2英里）就有一座炮台，以潘迪特·布塔·玛尔（Pandit Butha Mal）为首的在莎车的全体印度人到此隆重欢迎我。这次来的都是可敬、勤奋的商人，没有高利贷商人，大部分来自霍夏尔普（Hoshiarpur），印度和英国通过喀拉库拉木（Kara-Koram）大部分出口贸易都是由他们进行的。就像1900年，一大队人马带我去尼雅孜·哈克木·伯克（Niaz Hakim Beg）的乡下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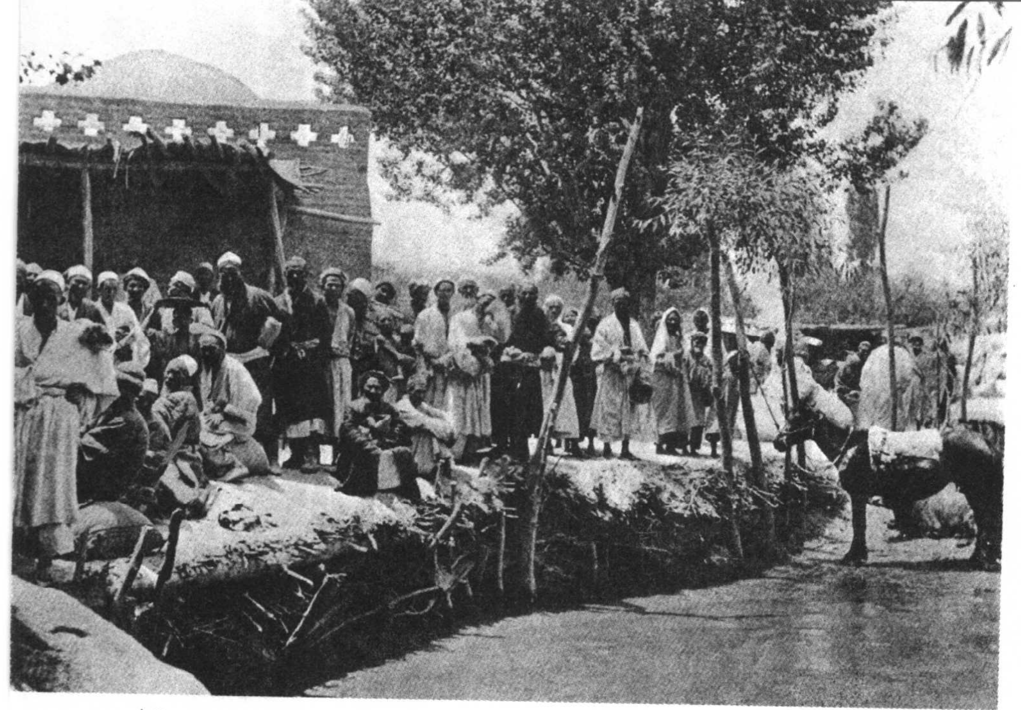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㊷比吉尔（Bigil，位于莎车）的印度商人为我举行的欢迎仪式

所一样，这次欢迎我的也是一大队人马，声势浩浩荡荡。我知道他们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宽敞凉爽的休息地，所以当忠心耿耿的旁遮普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绕道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大的集市时，我并不介意。在这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他们显然想借我们这些欧洲人炫耀，而且见到的人越多越好。

我发现莎车郊区比以前更绿了，长满茂盛的白杨和榆树，说明这里的气候比喀什噶尔的气候要好。我仍住在以前曾经住过的莎车其尼巴格，这里风光依旧。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常常回忆起这里宽敞的大厅，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的一切都一如既往。每个主要房间里都铺着和田的地毯，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一样。还像以前那样，房屋的主人、尼雅孜·哈克木·伯克的儿子对我毕恭毕敬，却不愿见生人。我唯一的遗憾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被迫将荒废的旧花园改造成了单调乏味的



|㊸叶城渠边的巴扎|

小麦地，但仍有高大的果树和高高的隔离墙。

我住的地方很气派，凉爽宜人，可敬的阿克萨喀勒（长老）潘迪特·布塔·玛尔关照得无微不至，所以，我可以好好利用待在莎车的这 4 天时间。经过多次试马和讨价还价，我们又买了一些马匹，其中一匹是具有巴达哈商马血统的红棕色的小骏马，作为我的坐骑。它忍耐力好，能够走最崎岖的路，已经习惯了没有牧草的沙漠生活，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尽管它不太合群，比不上小狗与我更加亲密，有时候还不情愿让我骑在身上，但这匹马仍然成为了我的生活伴侣。或许因为欧洲人比喀什噶尔人更爱劳动，或许因为莎车伙食不好，我们又招募裁缝、锡匠等。对位于南方的塔什库尔干河和英吉沙附近的喀拉塔什河（Kara-tash River）之间慕士塔格山脉（Muztagh Range）的东部支脉进行了测量之后，勘测员拉姆·辛格赶上了我们。经过艰难行程和测量之后，设备需要大修了。

M. Aurel Stein

蒋师爷学识渊博，性情和蔼。他长期在衙门里供职，有很多朋友，与本地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几天他忙得不亦乐乎，与朋友们辞行。流放新疆的中国大小官员习惯于出行带上所有家当，蒋师爷想带的行李也非常之多。尽管不便明着说，但我还是说服了他大量减少携带的行李，其中包括他所珍爱的很多书籍，这是证明蒋师爷通情达理的第一件事。我不需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沙漠探险的顺利进展，他显得更富有经验，进一步减少了行李。另外，我在莎车还给他弄了一个轻巧的印度帐篷，并安上暖和的内壳，以抵御冬天沙漠的严寒。关于旅行的现代化设备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我想说一说一个克什米尔小伙子，他是个裁缝，在我们招募的莎车工匠当中数他最能干，他生于莎车，曾去麦加朝拜，在斯坦布尔（Stambul）居住一年，在那里接受到了专业训练。

我与地位显赫的莎车按办彭大人（Pên Da-jên）进行了友好交谈。这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彭大人对历史古迹有浓厚兴趣，谈话很有启发性，使我获益良多。我让他帮我寻找玄奘及其他佛教徒著作中的本地区当时的中国名字，他没多久就回访了我。第二天，他按时来到。在小型餐会上，他向我展示了一套有趣的中国古币，以宋代（公元10~11世纪）钱币为主，是近来在莎车的新城（Yangi-shahr）附近挖地基时发现的。这些古币为说明莎车大致相当于古代莎车（So-chê），中国官方现在仍以莎车（Yarkhand）称呼此地。友好的彭大人设宴招待我和蒋师爷，席间我们并不全谈些考古话题。他告诉我关于他儿子的许多情况。他最喜欢这个儿子，曾把他送到日本留学两年，现在上海附近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当儿子还小时，彭大人就离开了他，爷俩一直到现在都没见过面。虽然相隔千里，但他们通过喀什噶尔的电报保持联系，若要通过中国官方驿站转送信件，那会花费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到。

尽管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按办大人对日本的成功发展充满了敬佩之情，但他

好像把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日本有坚固的儒家哲学基础。出于对我的中国守护神——高僧玄奘的尊敬，他并没有明说，从他的话音当中，我可以知道他认为佛教与各色迷信联系太紧密，不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听了这些，我心里有点不快。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从他这里得知，我在和田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潘大人刚调离乌鲁木齐，出任阿克苏（Ak-su）道台（Tao t'ai）。这样，罗布泊（Lop-nor）地区就将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就可以对我的探险活动有所帮助。所以，潘大人恰在这个时候出任道台，的的确确是个好兆头！

我拜访了瑞典传教士拉奎特先生（Mr. Raquette）。我们在喀什噶尔就认识了，拉奎特夫妇二人现在也来到了莎车。于是，我在晚上拜访他们。穿过了巴扎和老城弯弯曲曲的小巷，树木郁郁葱葱，路过一个又一个水塘，夜间的景色更加迷人，至少看上去挺惬意。莎车流行甲状腺肿大，马可·波罗就曾注意很多莎车（Yarcan）居民患有这种病，这里的水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静止不动，所以我怀疑可能水是患病的主要原因。

拉奎特夫妇的房子藏在一条窄巷的尽头，环境安静，内部却像欧洲房子那样整洁，设备齐全，这令我非常惊奇。刚到莎车一年半，这对瑞典夫妇就配备了欧洲家庭所需的简易设施，制作精良的桌子和壁橱，墙上挂着相框，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常见的鲜美食品。拉奎特先生与各阶层的人都有交往，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正在利用本地的资料，编纂一本突厥语词典。莎车蔬菜相对丰富，有大片的克什米尔人、伯尔蒂（Baltis）人、阿富汗人聚集区，就像在印度的某个城市。周围邻家房子的墙壁围着拉奎特家的小花园，坐在园子里，我感觉就好像和传教士朋友坐在旁遮普地区的某个人家一样。

4 天时间显得太短，我抽不出时间去寻找古时中国和新疆地区的艺术制品，这里的很多老住户保存有这种东西，但与过去相比，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不过，我还

是觅到了6个精致的阿普塔巴斯（Aptabas）铜器、一些盆子和带柄水壶等，这些东西曾在和田的手工艺品中盛极一时，属于精巧的黄铜工艺的典型遗物。有些账需要算清，我的莎车队员也要和债主理清债务（在莎车，只有欠别人债，人才可能受到尊重），而我的负责管账的人员还没习惯本地复杂的货币汇率；因此，在出发的前夜，我也难得挤出几个小时来休息。

我们眼下的目标是在7月2日天亮前到达叶城，这只需两次行军。我希望顺路参观一下克孜尔加依（Kiziljai）遗址。大约两年之前，在克孜尔加依遗址出土了一批用早期突厥语或回鹘文（Uigur）写成的书卷，有人将之送给了马继业先生。这点遗迹微不足道，但我觉得我应该去考察一下。我只知道它位于莎车河和提孜那甫(Tiznaf）河的东面，除此之外，再不知别的有关其位置的线索。所以，我们只得任由爱发号施令的伯克和欧拉哈斯（Oaroghas）这两天陪同我们，前去离遗址最近的村庄巴格吉格达（Bagh-jigda）。虽然只有16英里，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我们缓慢前进，也好，这样我就有时间领略这片肥沃绿洲和通往叶城的道路边土地上的美丽景色，我以前还从未到过这里。

第一天，我们越过灌溉区和莎车河，到了塔塔尔（Tatar）村，莎车河在这里变成宽度仅仅约0.25英里的小河床。我们住在了本地百户长的好房子里，我在这里向喀什噶尔寄去本应早就寄出去的大包裹。大片果树连成一片，绿叶成阴，诱人的黄杏和紫杏把杏树给压弯了，不熟的苹果散落了一地。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我切身体会到了阿依旺（Aiwan）的优点，阿依旺是新疆南部绿洲富人家房屋的重要特征。这是一种方形的中心大厅，称为阿特里木(Atrium）的是“中厅”，屋脊在中心处高高耸起，四壁的高侧墙凿有洞孔。有时，在一边或两边墙的高处安有格子木窗，以透风和透光。因此，在炎热的夏季，阿依旺不仅能够遮阳，而且有微风流动。外院的一两间房子是客厅，被称作梅合曼哈纳

(Mihman-Khana，即客厅——译者)，艳丽的棉制印花布作为墙裙围在墙上，地上铺着和田地毯，看上去给人以温暖而舒适的感觉。屋顶为泥土砌成，留有小孔，可以通气和透光，而且光线只有通过这屋顶的小孔才能进来，所以即使外面烈日炎炎，屋里仍旧是凉爽宜人。在阿依旺消夏美不胜收，沿墙壁建有平台，很宽，可以在此休息和工作，还可根据太阳的移动来转移自己的位置，以避开日晒。

我居住过的中厅面积大都在 30 平方英尺到 40 多平房英尺之间，很是宽敞。这种建筑适应了本地的气候，让人免受夏季炎热的折磨。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我多次在沙漠中发现了与此完全一样的建筑结构，根据个人经验，我确信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人的大部分在世的时候日常生活也都是在阿依旺中度过的。

无论主人多富，绿洲中的现代民居都很少或根本不重视居室的艺术性，墙壁用黏土砌成（如莎车那样）或用涂了灰泥的木材和树枝建成（如和田地区那样），这些民居简朴舒适，弥漫着迷人的空气，如以往一样，这表明这里的人们仍过着闲适的生活。在新疆，一般收入就能使人成为一个巴依。只要有饭吃，有好衣穿，这些贪求物质享乐的人就不会想什么过去、什么现在，更不去管什么将来。

7 月 2 日晚，天下了一阵雨，没有气象站测出其雨量有多大。伴随着清新的东北微风，我们第二天早上很快到达提孜那甫河的右岸。途经皮山（Kuma）、汗阿里克（Khan-arik）、玉其科克（och-kok）3 个村庄，田野非常肥沃，大路旁的柳树几乎和白杨一样高，令人赏心悦目。提孜那甫河很长一段距离与莎车河平行，在麦盖提（Merket）绿洲附近汇入莎车河。提孜那甫河正发洪水，河里只有 1 只小船，花了几个小时才把行李运到对岸。河道不宽，约 120 英尺，流速却很快，约 2 码/秒，水深从 10~15英尺不等。后来，在离此地近 1 英里的地方，有一处浅滩，驮行李的毛驴可以走过去，但是河底的泥很滑，骆驼走起来不太安全。

离开提孜那甫河，我们来到巴格吉格达，它位于提孜那甫河与东边的沙丘之间

的一条窄窄的可耕地地带，沙丘清晰可见。地带长约十一二英里，被归属为一个村，由纳斯尔伯克（Nasir Beg）占有。他是莎车一个富有的地主，知情的人告诉我说，他大约有6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都还没有开垦。穆萨·多哈（Musa Dogha）在他家里住处给我提供了一间舒适凉爽的房子，具有作为大地主的土地管家的派头。

7月4日，我们前往回鹘文手稿的发现地——克孜尔加依参观。它处于广阔流沙地带边缘，远离可耕区。上帝看在我考古心切的份儿上，夜里又下了一场雨，雨前刮了轻微的沙尘，空气变得更加凉爽，黄灰色的云彩直到晌午才散去。要不然，我们这20英里的行程会炎热难耐。凌晨4点半，我们出发。此时西边的天空清亮美丽，可以清楚地望见莎车河南面和北面的雪山，虽然雪山和我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也有足足50英里。

行程头5英里是可耕区，也就是长满芦苇和其他野生植物的大片土地，这些野生植物长得很茂盛。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水渠，覆盖了整个地区，这都是刘大人兴建水利的结果，但是提孜那甫河下游右岸的麦盖提各家却因水源分配发生争执。此地是叶城（Karghalik)、莎车、巴楚（Maral-bashi）三地的交界地带。于是，三地的按办组成一个委员会，决定新凿的巴格吉格代水渠每3年供水一次。边界上的炮台是巴格吉格代拥有的沙漠地区的界碑。由于分配的水量减少，许多新垦殖的耕地不再那么引人青睐，无人管理，任由河生灌木蔓延滋生。当然，话又说过来，这些灌木对防风固沙起了重要作用，对子孙后代是有益处的，他们将来可能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再来开垦这片土地。

纳斯尔伯克为了榨油特地栽种了托格拉克（Toghrak，即胡杨——译者）幼小的灌木丛绵延几英里，这里风景不错，但古迹却很少。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回鹘文手稿拥有者是巴格吉格代的一个佃户，他说手稿是在一个奇怪的圆锥形沙丘里发现的，沙丘上面长满红柳，这些圆锥形沙丘正是塔克拉玛干边缘地区的典型特征。实际上，

在马继业先生收到手稿时，手稿已经被发现已有10年之久了。手稿原来的所有者称手稿发现时在沙丘中所处的深度很不一致，这一点比较难以解释，因为圆锥形沙丘增大的相对较慢，不可能把同一手稿的不同部分掩埋在相隔几个世纪的沙层中。然而，在新疆，几乎所有发现都没有及时地进一步发掘，唯一可以责备的是收购者。

此地北面2英里、繁茂的托格拉克以外，是克孜尔加依麻扎（Mazar，即伊斯兰教墓地——译者）散落着泥土砌成的房子废墟，仍能看到灌溉水渠、梯田以及类似东西的踪迹，这说明弃耕的时间不会很久。今年早些时候，受发现回鹘文手稿的鼓舞，马继业先生曾来过这个叫做阔依鲁克阿塔（Koilogh-ata）的地方，并让人清扫了其中两间破旧房屋里的垃圾。他唯一的发现是一只皮制拖鞋，确定新疆这类遗物的所处的年代超出了考古学家的研究范畴，除非和其一起发现的还有具备日期的遗物，如货币、古代文献等。

7月5日和6日，两次漫长的行军之后，我到了叶城。沿提孜那甫河右岸南行，沙漠边缘凄凉的黄沙出现在视野之内。塔塔尔（Kona-Tatar）村的土地形成一狭长地带，长达17英里，可耕地田块之间的大片空地里长满了繁茂的芦苇和灌木，有时还出现大块的碎石“萨依”(Sai）和荒凉的黄土干草原。我们抵达一个富足的牧场，住的地方已给我们准备好了，我倍感高兴。这片绿洲不大，只有200英亩，看上去经营的不错。梅合曼巴依（Mihman Bai）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一直到现在已经年迈，他仍未曾离开过这里。他家有一间精美的阿依旺，外屋不可计数，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这是家境殷实的农户（Dehkan）人家的典型建筑类型，我不失时机地让奈克·拉姆·辛格绘制了一份平面图。

院子附近有一处果园，果实累累，树枝都给压弯了。在一个树枝上，我数了一数，一码之内就有45个杏子，像小小的橘子闪着琥珀色的光泽，让人垂涎欲滴。果园中心有个方形的凉亭，两排白杨罩住了凉亭。凉亭好似壁画中的宴会厅，又好像

是夏天里的户外卧室。不远处的清真寺看上去非常惹人喜爱，除西南方向（麦加方向）外，建造精巧的大厅每边都是敞开的，房顶系木制，柱子上雕刻着具有波斯风格的精致图案。

快到叶城了，乡下的景色越来越美。与新疆其他地区的绿洲相比，好像叶城的土质和气候更适宜树木生长。我们依次经过了人口稠密的苏勒堂艾日克（Sultan-arik），肖鲁克（Shorok），达弗达尔（Dafdar）3个村庄，路旁都是白杨、桑树和柳树，而且大部分都很高大，阴凉蔽日。晚上又下了一场雨，藏在云彩之中的山峦吹来习习微风，令人倍感爽快。地面开始变得崎岖不平，地块之间的阶地坡埂出现得愈加频繁，这表明我们快到昆仑山（the Kun-lun）山脚了。从伯尔蒂斯坦（Baltistan）和慕士塔格大冰川吹来的潮湿季风经过叶城，叶城的树木之所以繁茂，是不是因为潮湿季风使气候较湿润所致的呢？无论是什么原因，想起第一次走这条路时的各种情景都使我感到特别高兴。我喜欢故地重游，就像拜访老朋友一样，但我也喜爱换行新的路线，而不是重走老路。因而，经过在新的路线上漫长旅途之后，终于找到了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老朋友，见了面就显得格外亲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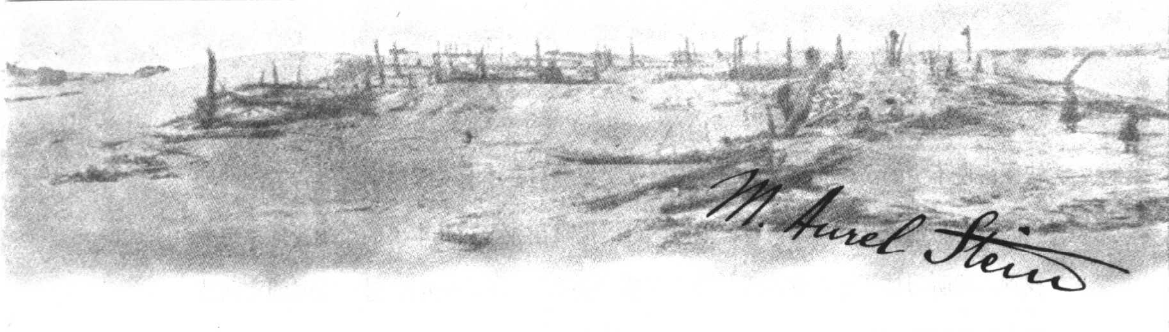
离叶城大约3英里远，一大群印度高利贷商人前来迎接我，说明这些精明的锡克普里斯人（Shikarpuris）经营的高利贷行业比以前更繁荣了。1901年以来，从事此行业的商人增加了约30%。这些“夏洛克”（Shylock）式的商人出身于印度底层，即使现在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人们依然能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无法言喻的卑微，还有那黏糊糊的尘土。因此，我对他们充满敬意，他们的勤奋和毅力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一看见这些身材细长而又孱弱的锡克普里斯人，我就会想起在英国完全统治印度、给予他们保护以前的12个世纪，他们的祖先不顾穆斯林的藐视和宗教狂热，千里迢迢，来到中亚谋生。

大约在1782年，福斯特（Forster）从孟加拉（Bengal）游历到里海流域（the

Caspian)。他发现锡克普里斯人人丁兴旺，显然已在阿富汗全境以至远到阿姆河北部扎下了脚跟。直到近期，他们在布哈拉（Bo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大片聚集区还很兴盛。是仅在穆罕默德时期到达以上地区，还是在亚历山大征服古伊朗最北部地区时，这些视钱如命的锡克普里斯人就到了粟特（Sogdiana）了呢？后来，锡克普里斯人正式组成一队，来我的临时住处拜访，其中有一长相古怪的老头，他于20年前从布哈拉来到叶城，一副贪婪的长相，比起突厥人的精明高利贷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他，我不由产生出上面那个疑问。他携带了很多从布哈拉带来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n）、阿萨息斯（Arsacidian）及其他希腊古币，还有他在布哈拉朋友帮他收集的古币，但大部分都是伪造的，而且老头出价很高，所以我没有买这些古币。

叶城按办去了喀什噶尔，还没有回来，据称他的前任造成财政亏空，他去那里接受质询。不过，这样也好，我就有时间休息一下，因为外务府（the Wai-wu-pu）给我颁发新护照是“大人”和“阁下”级别的，所以沿途大小官员都来拜访，为此占用了我不少时间。我住在郊区一座简朴的小房子里，离巴扎和衙门不远，很是方便，忙碌了一天后，可以有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住处主要由一个凉廊组成，廊前是木刻，花园虽小，可风景如画。在花园里，我发现了真正的欧洲花——旱金莲和其他熟悉却不知其名字的花。花园是典型的印度风格，微缩的灌木丛中间有一条长方形小径。

我的中文秘书去了衙门一趟，很快把我停留库克牙（Kok-yar）所需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库克牙海拔约6400英尺，我想在此找到一处凉爽、安静之所，以完成《古代和阗》的校稿工作。在通往喀拉库拉木隘口山区出口的夏季路线，有一个小绿洲，物产丰富，恰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且，附近的山区牧草丰足，骆驼和马能够在此养精蓄锐，为将来的艰苦行程做准备。



第十二章

在库克牙

7月7日黎明，我从叶城出发南行。我们在巴扎中穿行，这里的饭馆装饰华丽，还有一座有多彩木刻的清真寺和马德拉斯（Madrash）。也许因为叶城的流水多，大树多，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所以我再次想起克什米尔的某个小镇来。离城近2英里的地方，可耕地就抛在了身后，进入赤裸裸的碎石平原，这是一块从外围山上滚下的碎石形成的巨大冲积扇。路两旁有水渠，其水源来自提孜那甫河和乌夏克巴希（Ushak-bashi）河，沿水渠散落着一块块肥沃的土地，但因太远而看不清。这里本来就很凄凉，加之令人目眩的阴霾，显得更加乏味，不过却有利于用平板仪测量。

我一边行进，一边跟师爷学汉语，我已经非常习惯了这种学习方法。没有别的事情烦心，学习起短语、语法等显得更加容易。师爷不厌其烦地说出一连串汉语，然后用他那种最奇怪的突厥语解释一番，其实，他讲的突厥语几乎跟他讲的汉语一样难以听懂。中文的语音系统深奥难懂，又有可怕的升降调变化，让人捉摸不透，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是难以区分开的。尽管有这些困难，但他言谈活泼，手势富有表现力，语言上有共同的直觉感悟，这些都有助于我的理解。行路途中不必再做案头工作，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学汉语，加上蒋师爷良好的洞察力，我很

快便会说不少的汉语对话。可惜，没有汉学家编写一本有关汉语学习发音方法的袖珍图书，蒋师爷又有湖南口音，他教的口语很难在我身边几本书的正统音标系统中找到。我听习惯了他把他深爱的故乡发成“福南”（Fu-nan），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应拼写为“湖南”（Hu-nan），而“铂金”（Bo-jin）是“北京”（Bei-jing，中国北方首府，我们常称为Peking），于是，学习这点中文口语，就好像我和蒋师爷在说“福南”话。

蒋师爷好像完全喜欢上了他的新工作，轻而易举地适应了这种游荡生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值得称赞的是，他总是早早起床，准备好出发，尤其是逐渐减少了携带的行李。与他作为大人的秘书和辅导老师地位相称，他穿得整整齐齐，深蓝色丝织上衣，经常和赤褐色的上衣换着穿，与他骑马时穿的亮黄色罩衣很是协调搭配。但这种颜色的衣服不耐脏，一碰上灰色的尘土，就很显眼。他高高的马鞍很结实，底座是舒服的大红垫子，宽大的皮制黑色襟翼绣着黄色和绿色的花边，像乌金镶嵌的。每当看到沉重的笼头和大马镫，我就替他的那匹马感到难过，这两件古色古香的家伙每个重量均在3磅左右。有时，我把马队中最健壮的那匹黑马给他骑，马匹虽瘦但却保险。他常常在旅行帽子下面放上一块轻巧的蓝色丝布，把辫子固定住，替代藤制凉帽（Sola Topi）之用，以防热气。他用硬纸做成像帽舌一般的东西，不用时可以拿下，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给眼睛遮住阳光。

当蒋师爷代表我去衙门拜会时，他总会保持其应有的尊严和派头。他给按办的书信都是用平整的粉红色纸一丝不苟地完成的，并给我留下一份副本。旅途上，他愉快幽默，不计较住所的条件如何。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在他身上有我忘记已久的东西——不计较自然条件，又能认真钻研学问。他对印度随从态度和蔼，他们觉得他就像一位绅士。根据切身的体会，这些印度人很快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若是印度人作欧洲人的秘书，即使这印度人有用处或很重要，他也不一定受到尊敬和被人以

礼相待。

我们在拜什铁列克（Besh-terek）停了下来。这里有间简陋的土屋，路边是一小块耕地，特别是这里有泉水，绿色的芦苇地，看上去顿觉舒服。这儿有一狭小的洞穴，让人不堪忍受，可是，住在帐篷里又太热。于是，干脆睡在粗陋的、泥土搭建的凉亭（作清真寺之用）里。当然，在此之前，我征询了快活的老兰干其(Langarchi，即兰干客栈经营者——译者)，问他这会不会引起宗教问题。维吾尔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大都没有狂热的宗教歧视。

同时，我也没忘郑重警告“达什”，它不能跟我一起住在这个阴凉的加马特(Jamat)。这样，我就心安理得了。我一铺好床，这小家伙就跑了进来，钻在它习以为常的地方休息，我对此并没太在意。毕竟，清真寺还收容走失的狗呢。况且，这条狗已陪我走了千里迢迢，是我的亲密伙伴，作为乌鲁克梅合曼（Ulugh Mihman，即“贵宾”）的宠物，享受这点特权，和我一起住在清真寺，谁会介意呢？我不禁想到，在以后的很多场合，有这样一个对比鲜明的现象：教徒们对宗教礼节的不拘小节，却对神殿寺庙极端狂热，比如，有可能必定去麦加朝拜。几乎每个村都有其引以为荣的一两个赴麦加朝圣过的教徒——哈吉（Haji)。除了富人之外，其他人不惜耗尽所有的积蓄，经由巴库（Baku)、斯坦布尔（Stambul）和埃及，前去麦加朝圣。这些人一方面狂热地信仰宗教，一方面却极不愿施行先知的教义，这如何叫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人种史学者相信呢！

余下到库克牙的路程，我们尽可能走平地，哪怕景色更加荒凉。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越来越低，出现了布满碎石的冰河，南面最近的小山逐渐透过薄雾，展现在眼前。看见了远处的玉勒艾里克（Yül-arik）绿洲之后，我们向从西南延伸而下的山谷出口前进，并在玉鲁克兰干（ürük-langar）见到第一块耕地。莎车商人的大骆驼队正等着攀登喀拉库拉木山口，沿莎车河上游通往喀拉库拉木山口的道路已经

对交通工具开放，他们走的正是这条道。又向上走了两英里，到达了绿洲地区，这里是广阔的绿色田野，四周环绕着赤裸裸的黄灰色山峦，景色跟这里凉爽的空气一样宜人。过了果园和分散的农家房屋，我们骑马到了位于库克牙中心地区的小村庄。一个中国的小官吏及其同僚们在此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小官吏奉命守卫这条路线，他的同僚们则守卫从拉斯喀木山谷（the Raskam Valley）到罕萨的道路，但他却乐于住在奥坦苏（Otan-su，库克牙最高的小村子）。

后来，有人带我去了恰瓦什伯克（Chavash Beg）家，我的住处就选在了这儿。他家很大，有很多间房屋，柱子上、门柱上、横梁上有很多古老的精美木刻。住处的一边距村里的喧闹处所很近，起初我还害怕噪音会影响我。村里住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曾经去过麦加朝圣，百户长不在时就由他代替执行公务。在他的带领下，我访问了几户家境殷实的种田人，参观了他们的房屋和园子。我们的队员人数太多，我转悠了一圈，也没能给他们找到合适的住地，但我从中了解了本地民居的建筑风格。无论我们的拜访有多么突然，我们在各处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

参观了10多户人家舒适的房屋以后，我觉得恰瓦什伯克的房子是最好的，我心里倍感愉快。他家的房子宽敞，算来已经有些年头了，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稍加改造就能适应我的需要。这个地区的气候较为凉爽，所以这座宅院没有阿依旺，取而代之以大凉廊，仆人是不允许在凉廊里穿来走去的。于是，不到10分钟把土墙打通了，开辟了一个通向厨房的通道。园子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有成排的果树，几块苜蓿地。房子里黑洞洞的，凉廊早上日头正好晒着，因此我更喜欢待在阴凉的园子里，享受满眼的绿色，即使没有花儿开放，那也称得上是种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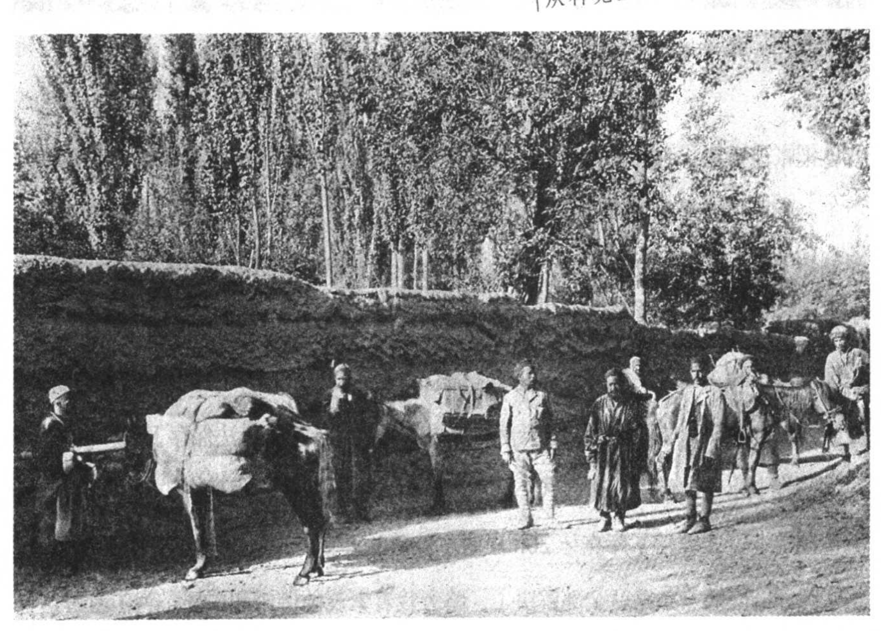
库克牙气候相对凉爽，我的住处比较安静，无人打扰。所剩的桌案工作还很重，在库克牙停留了15天，我就15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黄昏，才最终完成校稿工作，包括拙著《古代和阗》的各种附录、大约200幅插图的文字说明以及序言部分，并

做了副本，寄往牛津，出版社无私的朋友再不厌其烦地审查这些书稿。收到盛满各种所需资料的公文箱，我心中欣喜不已。

克什米尔和喀罕的高原宛如阿尔卑斯山的风光，环境宁静，我却无缘欣赏这美丽的风光，大量的工作把我累得要命。马和骆驼队就拴在附近，我难得片刻安静。于是，我把它们赶往山谷里的牧场，距此地约摸一个行程，一来这些动物可以吃好、休息好，二来我也可省点钱。测量员拉姆·辛格在附近地区进行了两天地形测量，一位经验丰富的达罗哈（Darogha）做我的向导，我对位于叶城与和田之间的昆仑主体山脉进行测量。在喀拉喀什河（Kara-kash River）大拐弯处内侧的险峻山区有一块不知名的地方，但我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只身独闯。

费了不少周折，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可以搭帐篷的地方。园子里的杏树栽得很密，

㊹测量员拉姆·辛格和贾斯旺从科克亚出发





⑮在科克亚做人体测量的帕赫普山民

我就把帐篷搭在了杏树下。树木成阴，我可以整天工作而不会感到太热。几乎每天下午，一股强风都会从旷野中吹过来，送来丝丝凉意，可是风停以后几个小时，悬浮的尘土就会落下厚厚的一层。我无法较为完满地解释清楚这些山谷肥沃谷底的黄土是如何积累起来的，飞来的尘土至今还使谷底土层不断增厚。库克牙绿洲内的绿色灌溉带长约 4 英里，灌溉带两边净是荒凉的黄色山丘，山脚下是宽阔的砾石斜坡，但因为没有湿地和植物，所以每天落在那里的肥沃黄土也就无法保存下来。

我晚上出来散步。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儿的可耕地面积很小，辅之以繁荣的毛毡制造业，才养活了库克牙 200 户居住分散的人家。这里最宽处不过 0.25英里，整个绿洲的交通一条路就全部解决了，路旁栽着繁茂的柳树和白杨。为了看看这里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我多次沿着田块之间用来输送水的小艾里克（Arik，即水渠——译者）旁的小路走走，这可苦了蒋师爷。他经常陪我散步，我可以借此边散步边学中文。他穿的是精巧的拖鞋，宽大的长袍，在狭窄的沟渠边、小路上和小麦或燕麦田边浓密的芦苇里走起来很不方便，但他仍是无所顾忌，跟着我一直走下去。但他小心谨慎地暗示我，作为有地位和有文化的人走大路才比较合适。

晚上外出散步时，我总是找些本地人谈谈话，因此，尽管我白天工作，不出来见人，但结识的库克牙人越来越多。从我的住处沿山谷向上行走约2.5英里，到达奥坦苏，沿途很多地方散落着舒适的农家房屋。房屋附近都有果树，果树被矮墙围着。几乎每个农户家里都建有凉廊，妇女和孩子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凉廊里度过。卧室里放着一摞摞折叠整齐的毯子、垫子、毛大衣，用以抵御冬天的严寒。库克牙以出产优良的毛毡而闻名新疆，也正是这一行业的繁荣才使得本地大多数家庭过上了较为舒适的生活。

在奥坦苏，高大的白杨随风摇曳，崎岖的黄色山峦耸立在山谷两侧，二者衬托起来非常好看。村子里的窄道像迷宫一样，杏树和桑树伸出土墙外，真有点“人在画中游”的味道。奥坦苏人非常热情，他们看到我徒步走着，就连忙把马牵出来，热情地邀我骑上他们的马。过了一会儿，人们平静下来，我又下马徒步而行（因为我喜欢走路）。奉命驻守拉斯喀木（Raskam）的中国小官吏李大老爷（Li Ta-lao-ye）私人寓所就在此地，而且，此公生活得快活优哉，从早到晚不理军务，寂寞难耐。于是，他就邀蒋师爷共进午餐和晚餐。我自己则经常借故不去，不过坦率地说，我却欢迎他给我送些新鲜的蔬菜（这些蔬菜是由李大老爷在叶城的朋友供应的），作为回报，我送他一些小礼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整天忙于案头工作，不知不觉园子里的果实已经成熟了。熟透的杏子落在帐篷周围，别看个不大，吃起来却很可口。树上黄紫色的杏子在绿

叶的衬映下闪着光泽，煞是好看。我只顾自己工作，以至于没觉到我的出现使得主人的孩子们失去了往年的口福，直到有一天，我比他们预想的回来的早，发现一大帮孩子正在树上狼吞虎咽地吃果实。从那以后，我安排他们每天打一次杏子。然而，就是这样，只要风一起，仍有杏子落下。不久，我习惯了杏子落在帐篷上的声音，看着杏子轻轻落到苜蓿中，我觉得我就像印度故事中的蛇，精心守护一个宝物，自己却舍不得享用，本来我想参加宴会，却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去。

但是，我在库克牙并非只忙于案头工作。几天的等待之后，一股股的帕赫甫(Pakhpu）人来到了。这些山民居住在提孜那甫河上游，很久以来，我一直对其所属种族的类型和起源很感兴趣。他们在山谷里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拥有5个牧场，山谷距大路很远，所以还没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考察。多亏达罗哈相助，通过他与在其克苏（Chukshü）帕赫甫的伯克联系，伯克派这些人前来接受测量。起初，他们极其不愿离开他们居住的山谷，把毫无伤害的测量和拍照想成像要他们的命那样可怕。叶城衙门为此发布命令，这显得我有很大的权力。这些人穿过发水的河流，对人类学测量怀有各种恐怖，这里的山谷比起他们家那边的海拔低，相对较热。为了缓和他们的紧张情绪，我热情地宴请了他们，并适当地付给报酬。

他们的体格特征和伊朗所属的帕米尔地区部落的阿尔卑斯人类型非常相像。大部分仪表堂堂，金黄色的眼睛和头发及其他特征清晰表明，他们这种与外界隔离的生活使得他们成为伊朗人祖先的最直接代表。由此看来，古伊朗人在远古时代就扩张至和田，乃至东部更远的地区。

有人称帕赫甫人的语言与众不同，这种说法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或者至少已经成为历史，不论是我提供报酬，还是我以去他们村做进一步的调查相威胁，这些都没有诱使这些帕赫甫受访者承认，他们除了“塔格里克”（Taghlik）即山地突厥语方言之外，对别的语言一无所知。不久，我开始观察他们面部的主要特点及其他

特征，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好笑，正是这些特征把他们与生活在平原绿洲的人区分开来。稍加练习，我就能把混在围观人类学测量的本地村民中的帕赫甫人辨认出来。后来，又测量了库克牙人。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具体测量工作交由我身边的随从来做，他像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极其喜欢机械性的工作和填写图表。不大一会儿，测量记录就记了不少，纸片和照片扎了一小捆。

在我确定启程去和田之前两天，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从喀什噶尔来的邮差，送来积累下的近一个月的信件。然后，我终于把费尽心血的序言写完了，标志着我的书稿业已付梓，我心满意足。在远方，朋友们不懈地专心工作，仔细审查我的书稿，我十分感激他们！7月24日，骆驼和马从牧场赶了回来，已经解开了两周的行李又重新装进骡子皮箱子，我抽出时间，举行了一场小茶会，回请在库克牙和奥坦苏的中国朋友。多亏了快活的师爷，在略显单薄的宴会上，他帮助对远道而来的博学之士与陌生的外国人之间的交流，让他们在衙门之外仍有宾客如归之感，我觉得十分愉快。

M. Aurel Stein

第十三章

昆仑山脚下

7月25日黎明，我告别了库克牙及其热情好客的人民。前一天晚上，我还惦记着要去向“大老爷”们辞行，谁知他们已在山谷之外的玉吉曼里克兰干（Ujmelük Langar）农场，设好了告别达斯提汗（Dastarkhan，即宴席——译者），按传统风俗在红毛毡上摆上茶水和鸡蛋，出了农场就是荒芜的平原。这些中国人生活懒散，原本不会这么早就起床，而今天却特地早起为我送行，因此我对最后受到的善意和礼遇格外感动和高兴。我也祝愿这些“大老爷”们能迅速升官晋爵，当上新疆地区的“府台”（Futai-ship）。

没有走从叶城沿沙漠边缘的大路，我决定走一条鲜为人知的路线去和田。这条路线穿过昆仑山主脉的外围山丘，我可以在那里做一些新的考察。第一段行程较易，景致美丽而富于变化。登上小萨斯坎霍加麻扎（Saskan Khoja Mazar）附近、向东走向的大山脊后，眼前出现了玉勒艾里克和乌夏克巴希山谷土质肥沃的出口之地，从喀尔里克达坂（Karlik Dawan）周围的雪山上流下了条条小河，沿河两岸是绵延很长的绿洲。我们依次走过了肥沃的玉勒艾里克，罗乌希（Rowush）、亚瓦希（Yawash）、乌夏克巴希（Ushak-bashi），其间是美丽的果园和丰腴的田野，令人赏

心悦目。玉勒艾里克及其邻近村子以杏、瓜、核桃而闻名，在海拔约5800英尺的高度，还可以利用大棚栽种葡萄。每个村落外都举行达斯提汗为我接风。我们斜插着向东走，水渠旁都是狭隘的地带，不到1英里宽，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常中断行程。

在到达乌夏克巴希以前，我穿过了乌鲁克奥斯坦（Ulugh-Ustang)。在乌鲁克奥斯坦，有一条宽约40码的小河，美丽的岩石河床深嵌在冲积扇上，水流得很快。在一小巴扎外，我发现有两家印度锡克普里（Shikarpuri Hindu）商号，它们是两年前创办的，看起来生意兴隆，因为以前这里的高利贷还未曾有人开发。穿过林阴的街道，我来到拉依斯阿訇（Rais Akhun）家里。这座乡下的宅子装饰得很漂亮，远离尘嚣，还有一漂亮的大果园。我很快在阿依旺安顿下来，开始工作。阿依旺前空地的中心是盘绕的长藤，沿走廊上的柱子向上爬了近5英尺，花团紧凑，形成一个“空中花园”。显然，主人很有生活品位，爱拾掇家务。我在梅合曼哈纳洗了个澡，换了件衣服。这里墙上井井有条地挂着彩色的花朵饰板，这是离开莎车后我看到的最精美的饰物，屋顶则是漂亮的万字符号（Svastika）标志。

第二天，我们东行约20英里，穿过了光秃秃的碎石萨依，与风光秀丽的乌夏克巴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实在是荒凉得很，若没有山脉南面的外围山丘和高原北部边缘极端荒凉的山脊（我们行走在高原上）清晰的轮廓，连测定平板仪的精确方位都很困难。烟雾太大，看不见南面高高的雪山。我们要在哈桑·布格拉汗（Hassan Boghra Khan）小绿洲停留休息，在要到绿洲之前，刮了一场小沙尘暴，附近的山丘盖上了一层尘土。

令我惊奇的是，哈桑·布格拉汗绿洲也非常漂亮。哈桑·布格拉汗是这里那个简朴的孜亚拉特（Ziarat，即伊斯兰教圣墓）的名字，只有一间礼拜（Sheikh）用房和两三间偏房，可果园都很大，绿草如茵，还有好看的古木，不愧是宿营的好地方。果园由一条水渠提供灌溉，水渠的水靠克里阳（Kilian）河的夏季的融水供给。在

我工作时，以及整个晚上，熟透的杏子不断落到我的帐篷顶上和周围。好几天都好像没人来捡这些果子，显然这个地方的家庭妇女不懂得贮存干果过冬。

天气凉爽，路也好走，我们于7月27日到达克里阳（Kilian）。饱受沙漠的炎热和耀眼光线之后，天空中云彩朵朵，从雪山那边吹来阵阵清风，大家心里感觉好极了。乌云时卷时舒，雪山的高大山峰在云中时隐时现。沿山谷再经过三或四个行程，就能到达克里阳山口（the Kilian Pass），这是去喀拉喀什（Upper Kara-kash）和拉达克（Ladak）的商贸之路（途经喀拉库拉木）的路线之一。爬上山谷出口处宽阔的砾岩山脊，望见了克里阳绿洲，我想如果爬上南边高耸的山口，再看风景会别有一番风味。

克里阳本身就很漂亮：两边是黄色的悬崖峭壁，绿色的田野和果园夹在中间，灰色的山脉成了庄严肃穆的背景。在大绿洲之下，我们涉水约2英里，穿过河流。常年不断的积雪融化给养着这条宽大的河流，水呈灰绿色。我选择一处果园作为宿营地，恰巧碰见正要出发的小商队，他们要去拉达克贩卖大麻脂，一种贵重而又有害的大麻毒品。搭好帐篷，我立即给我在西藏的合作者、驻列城的摩拉维亚传教团（the Moravian Mission）博学的弗兰克牧师（Reverend Mr. Francke）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将经过最短的路程送到牧师手中，想到这儿我心里很是愉快，虽然这样也要花费四周或更多的时间。商队的首领是个快活的莎车人，体形微胖。当我烦请他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收信人手里时，他以一个索迪盖尔（Saudagar，即商人）引以为荣的尊严向我保证万无一失。这好像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没有邮政业务，同远在异地的朋友交往就是通过我现在使用的这种方法来实现的。

由于有很多东西要写，我待在克里阳的这一天忙得不亦乐乎。期间，我只是晚上出去散了一会儿步。路上积了厚厚的黄土，到克里阳绿洲南部边界绿洲，我数了数，总共约有四五百户人家。第二天，整理完沉甸甸的邮包，我直到中午才向东出

发，去赶行李队。果然，这一耽搁出了问题。艰难地走了约17英里，大部分是荒芜的沙丘和从南边荒凉的山丘上滚下来的碎石，最后到达苏拉赫艾格孜（Sulagh-aghzi）山谷的一条泉水边，这是这儿唯一有水的地方，于是就此度过一晚。令我沮丧的是，因为手下人的错误，行李被运往了位于桑株（Sanju）至叶城商贸路线上的兰干，距离此地很远，我实在搞不清，除了吉拉喀什（Kirakash）的本性（这使得他们选择了熟悉的由喀拉库拉木起始的大路）之外，又会有什么东西诱使他们白走一天的冤枉路。

在苏拉赫艾格孜河源头附近的一个小绿洲上住着几户人家，我们抵达这里时，已是黄昏时分。我不顾天色漆黑，继续前行，顺着山谷向下走了约摸7英里，却好似怎么走也走不完。平坦的斜坡萨依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目的地的标记，这显得我的路程更加遥远。晚上10点钟，我们到达苏拉赫艾格孜兰干，结果只是些密密匝匝、破旧不堪的土屋，但也不得不在其中一间憋闷的大厅暂时休息一晚，令人感到窒息、闷热。

即使没有必要返回我天黑时所在的地方，单单是这闷热的空气就足以促使我回到我原打算穿越的山丘。于是，在行李由大路运往桑株的同时，我返回苏拉赫艾格孜河的源头，然后转向东行，地势越来越高。砾岩山脊绵延很长，山脊之间的黄土覆盖着广阔的灌木，找不到一滴水，骑起马来很是累人。微风吹来，顿觉凉爽，心中一阵喜悦。可没过多久，微风变成了沙尘暴，我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最后，通过烟尘，我终于看见了克孜勒巴什山，这个小山很奇怪，山顶是平的，其黏土呈红色，至此，我知道桑株山谷快要到了。

山谷地势突然急转直下，我们来到谷底。接着，又走了约摸一英里半，受到了宴会的招待，喝了点茶、吃了点水果，提提神，派人先去小兰干；然后，我急匆匆向绿洲出发。尽管烟尘飞扬，但在沿河两岸的田野和果园里穿行仍然令人愉快。到

达绿洲时，沙尘暴也停了。这条河水量很大，河床有60多码宽，河水约有3英尺深，呈灰绿色，流速很快，附近的积雪为河提供了水源。

桑株绿洲估计有1000户人家，由萨乌（Sawu）、萨依杜拉（Saidulla）、巴斯喀克（Baskak）、杜木巴克（Dombak）4个村子组成。但根据灌溉田的面积和从巴扎（每周举行一次）赶集回来的拥挤的人群来看，这个估计显然是太低了。人们通过桑株山谷去喀拉库拉木路线，因此，山谷中的大绿洲肯定能从过往的拉达克商队中赚得不少好处。我见到了从莎车来的几个印度商人，正要动身回印度，问他们有没有从印度方向来的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是从那儿来，这说明横穿高峻的喀拉库拉木山口的常规贸易路线开通的相当晚。为了减轻经由吉德拉尔和瓦罕艰难行程中携带的行李，我当初曾让穆罕默德朱的同伴穆萨（Musa）负责3匹马驮运行李，从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出发，取道拉达克来这里。这些行李包括新的沙漠之行用的水囊、富裕的摄影用具、测量器材及其他重要装备，如沙漠中用的筏子和运水的皮革。3个月过去了，穆萨还没有来到桑株，令我忧心忡忡。但想到幸亏我没走那条贸易路线，要不我也要耽搁好长时间，我这才心中稍有安慰。

官办的休息场所位于萨依杜拉坎提（Saidulla-kenti）巴扎附近，驻守此路线的中国官员也很关照，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住处，可人声喧闹，加上天气又热，我于7月31日毅然上路。沿叶城至和田的大道，一天行程就可到达藏桂（Zanguya）。但我想沿南边的路线进行考察，于是我去了杜瓦（Duwa）。杜瓦位于和田西部，昆仑山脚之下的最后一块小绿洲。路程很远，约有35英里，一天之内不能走完。于是，一小段行军之后，我们在普斯基（Puski）停留休息，因为它是这条路线上唯一有水的山谷。在一条小河的河床边，我发现了绵延约6英里一块块细长的耕地。这条河靠泉水提供水源，山上积雪融化时又可做泄洪的渠道。

不久，我听说向下走不远，有一处废弃土台（即Tim，汉译作“梯木”，指地面

较高的遗迹——译者），要不然，我才不愿待在只有40来户人家的小绿洲上，四周又环绕着极其荒凉的山丘。普斯基人估计废台距此地大约1炮台（Pao-t'ai）远，约等于2英里。可过了不久，通过望远镜，我认为真正距离是上述估计值的近4倍之多，在黄昏之前都不能到达。普斯基温度很高，晚上气温有90华氏度。即使距离这么远，我还能辨别出那是一座废墟古塔。第二天早上，我骑马去那里，弄得我又累又乏。

废塔已经被“挖宝人”严重破坏，系用土坯垒成，原来是圆形顶、方形基座。经过细致考察，根据其大小和结构，它和6年前我在皮山（Guma）和墨吉（Moji）之间发现的托帕梯木（Topa Tim）非常相似。它最下部的基座约有34平方英尺。奇怪的是，虽然表面已完全破坏，基座的大部分地方仍可寻觅到柳枝和红柳枝层的踪迹，这是用来支撑古塔的石膏线脚。我没有在土墩周围发现任何居住的遗迹。在赤裸裸的砾石萨依上，甚至连古代陶器碎片都没有（陶器碎片是早期人们居住的最持久的证物）。显然，像现在矗立在普斯基和藏桂之间的光秃秃的平原上一样，佛塔过去也是如此。佛塔以东半英里是普斯基河，河对岸有一座简陋的泥土建筑的麻扎，明显是继佛塔之后的又一圣迹建筑。

普斯基由几个小绿洲组成，江尕勒巴格（Jangal-bagh）位于其中最北端的绿洲，江尕勒巴格下面是长达0.75英里、岩屑覆盖的塔提（Tati，指有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译者），这说明这里耕地面积变化不太大。地表是柔软的黄土，上面有很多古陶器碎片，大都质地精良，异常坚固。12年前，新的居民点江尕勒巴格在这里建立。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塔提被开垦。这里有充足的水，能满足更多的灌溉需要，所以剩下的塔提再次开辟为耕地只是个时间问题，耕地区里积累下的黄土将会把岩屑盖上。

我从废塔回来时，发现穆萨和行李已经从桑株安全到达普斯基，酷热难耐的高

温也好像变得可以忍受了。穆萨和本年度的第一支商队一起穿越了喀拉库拉木，把行李从克什米尔运到和田，运货人每匹马索要60卢比，半数的马都死在了山口之上。费尽周折之后，他们才在苏盖特（Suget）的克尔克孜营地又雇了些马。快到桑株时，运货人已经累得没了力气，也正因为这样，我和穆萨正好在桑株相遇。这时，穆萨离目的地——和田还有5天行进的路程，但他已经是没有任何招数了。这件事充分表明，商贸路线喀拉库拉木是何等的困难。

8月2日，我们从普斯基到杜瓦，这段路对驮运行李的牲畜来说走起来十分艰难。大部路程是凄凉的、布满碎石的高原，一连串4个荒芜的山谷横切过高原，山谷悬崖峭壁，高达数百英尺。奇怪的是，这些山谷的西坡表层是沙地，而东坡却是险峻的岩石。最后一个山谷是库木阔依拉干吉勒尕（Kum-koilagan Jilga），我们走弯道而行，走了近4英里后，谷底窄成了一条裂缝。侧谷迂回曲折，红色的砂岩山脊（腐蚀的岩层）景色宜人。看到这里，往事浮现在脑海之中。1900年，我从托库孜达坂（Tokuz-dawan）第一次走近喀什噶尔平原，见到过类似奇怪的小山谷。

一路上，没看见一个人影。我在纳闷儿，这样的荒山野岭还要走多远。就在这时，我们从山谷顶点的山脊上（杜瓦绿洲的最高处），望见一个广阔山谷的谷底。我们在桑株艾格孜兰干（Sanju agiz Langar）找到了杜瓦河，河床宽约100码，但现在已经干了一半。河水流得很快，呈灰绿色，凉爽宜人。田野经过了精耕细作，小麦正在成熟。行了3英里，我们抵达一个小村庄的中心。河两岸是久违的绿色草地，穿过河，来到一家巴依的家里和园子，我们就在这里住下。附近的小巷里有很多茂盛的核桃树，很多房屋和清真寺雕有精美的木刻，这使我又想起了远方的克什米尔。巴依家的房子历史久远，大厅和大门的柱子和楣梁上刻满了图案，其中很多图案的内容和形式与我在和田沙漠中第一次发掘的古代居住遗址有些相似之处。这使我更加确信,现在距离那个属于我的考古世界——古代和田王国的西部边缘已经很近了。

M. Aurel Stein

杜瓦两边的砂岩山丘并不高，但凉爽宜人。在园子里高高的白杨和榆树下，我们度过了安静的一晚，精神倍增。8月3日，我们开始了迈向和田疆界的漫长征程。径直横穿从杜瓦到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Kum-rabat Padshahim）的斜坡萨依就足以花费一天。但当我让达罗哈给我们找了几个向导时，这些和善的杜瓦人摆出了各种困难。流动的大沙丘，许多陡峭的崖尔（Yar，即悬崖），没有水源，路程有25英里左右，他们对此极端恐惧。沙漠更是危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酷热难耐，动物和人都有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只好选择经过皮亚勒马（Pialma，杜瓦河的最后一个绿洲）到和田的大路，尽管这条路也同样炎热，路程更远。一方面骆驼已经十分劳累，另一方面考虑到本地人的风俗，我决定卸掉骆驼驮的行李，而另雇马匹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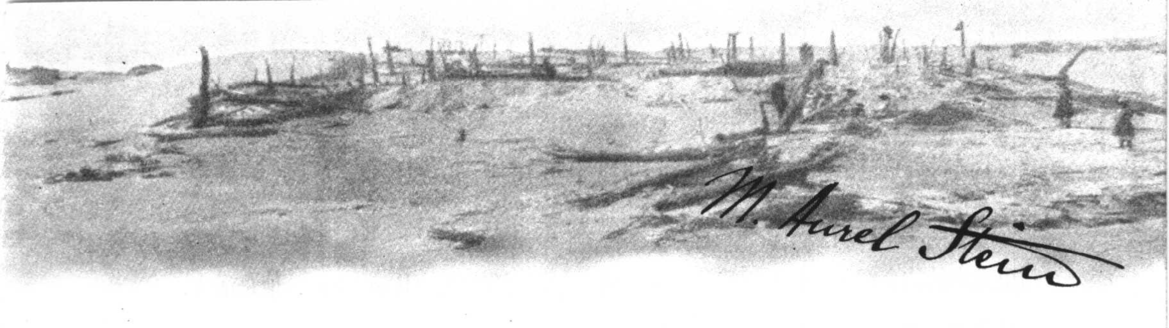
清晨，沿杜瓦河两岸走了几英里，让人感觉还挺愉快。河岸上一片片窄窄的绿草地随着耕地延伸。但不久，道路偏离了河流，河水在拉木斯（Lamus）的最后几块田地附近的陡峭岩石峭壁之间流出来，流向赤裸裸的平原，那里除了碎石和尘土之外什么也没有。皮亚勒玛是通向和田大路的最后一片绿洲，我们在中午时分到达这里。为了少走点路，我们绕向最东边的田地通过。村外的农场有一池塘，塘水为浅绿色，马儿饱饮一顿，提提精神。然后，冒着沙漠炙热的太阳，继续向前走，还有25英里路没走呢。一会儿是光秃秃的黄土干草原，一会儿是碎石和尘沙，但无论在哪里，头上的太阳都非常刺眼。多亏从塔克拉玛干不断吹来微风，通过不停地蒸发，总算忍受住了酷暑。我再一次踏上了玄奘、马可·波罗等古代旅行家去古代中国的道路，任凭我的思维回忆起6年前我第一次到和田时的情景，我心中甚是高兴愉快！

阿古柏时期修建了一座不错的休息场所——阿克兰干（Ak-langar），它仍和过去一样，那么破烂，无人问津，那口很深的盐水井还在。我们经过这里时，已经是夕阳西

下，微风也已停止，但地面依然散发着热量，天气还像中午那么炎热。牲畜在奇怪的红土地上慢慢地挪着步，红土绵延1英里长。尽管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的寺庙具有伊斯兰教的风格，可我觉得这可能是玄奘所说的神鼠之战的民间传说的根源。沙丘越来越高，我知道快要到沙漠驿站了，夜里可在那里歇脚。前面的沙丘之间出现了成片芦苇和红柳，我从中辨认出了鸽庙（Pigeons'Shrine，又称“鸽子塘”——译者）的大柱子和简陋的房屋，牲畜可以休息一下了，它们劳累了一天，在这样恶劣的地面上走了36英里。

现在，过路人不再崇拜佛教时期的神鼠，转而崇拜神鸽了。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这里，神鸽已经栖息。看见沙漠中这样安谧的场景，我就会想起在塔克拉玛干里度过的那个快乐的冬天，怎还会忍心打破这宁静呢。寺庙中只有两个年轻的阿訇(Sheikhs)。我从皮亚勒马先遣派出的达罗哈告知他们我要来这里，他们给马匹准备好了草料。洼地里有一口浅井，洼地边种了些红柳，这两位教长还从红柳树上采了点油。此时，天空中已经升起一轮满月，皎洁的月光让人倍觉爽意，印度诗歌中讲得果然不假。

又过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一批行李才运到。好几个杜瓦人把行李放在迅速冷却的地面上，他们实在太累了，顾不上照看他们的牲畜了。从皮亚勒马到这里，一路上，我的队员没有再给杜瓦人劳累的牲畜身上多加行李，这让我松了口气，一切人马均已安全抵达。那两匹小马驹跟着马，走这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它们这么小就受这样的罪，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但先前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第十四章

重返和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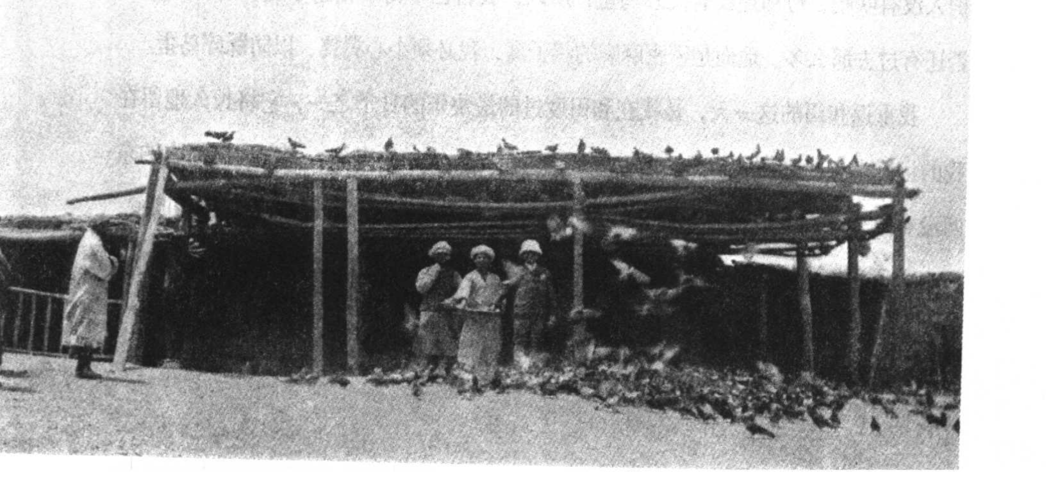
鸽子塘的夜晚非常惬意，流沙迅速释放出热量，温度降低，与白天的高温形成鲜明对比。快要午夜时，我们才算吃上了晚饭。我现在就在和田王国的边界上，提前享受着沙漠的宁静和自由，我心中是何等的兴奋！可是，为了这一天，我经过了多长的等待！第二天，我早上4点才起床，较以往起得晚。这时的空气依然很清新，温度计示数为60华氏度。队员收拾行李时，我去给“神鸽”喂食物。在年老的随行人员眼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另外，他们还喂给“神鸽”从皮亚勒马带来的谷物，期望这些“神鸟”能给我们未来的旅程带来好运。这些栖息在麻扎的“神鸟”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可我自己的早饭还没吃呢。已经是鸽子筑窝孵卵的时候了，看护人没有吹哨，母鸟还没有离开鸟蛋；所以，我自己不得不钻进小屋，看看数量是否还有过去那么多。地面是密密麻麻的鸽子窝，我必须小心翼翼，以防踩碎鸟蛋。

我重返和田的这一天，是我在和田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之一，它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能到朝思暮想的地方故地重游总是件快乐的事情，而发现记忆中的东西没有改变时，人们会感到更加快乐，我现在就是这样。前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一个人给我们捎来信，说我的营地已经安排好一个多星期了，和田人将在塔尔伯噶

孜（Tarbogaz）这个孤零零的兰干（和田西部边境的哨所）迎接我。所以，在我穿越鸽子塘以东奇怪的大沙丘时，碰见一大队人马，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是按办衙门里派来的伯克们及其仆人，我认出其中的一个是肉孜伯克（Roze Beg），他是潘大人最喜欢的译员，5年前曾奉命送我离开，而且走的正是这条路。

离开塔尔伯噶孜，路上的乡村风光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好像在向我微笑。我清楚记得，这里过去是长满灌木和芦苇的废弃沙地，现在修了条水渠，变成了可耕地。这再一次证明，绿洲的人民仍然可以战胜沙漠、变"废"为"耕"的，哪怕是干燥的气候。我问了他们很多有关我朋友的事件，大官、小官的都问了个遍。还没问完，我们就走过了扎瓦库尔干（Zawa-kurghan），这是一座奇特的四边形堡垒，在1864—1866年，哈比布拉赫哈吉（Habibullah Haji，和田王国最后一位国王）曾想利用它防御外敌的入侵。附近的巴扎一派热闹的景象，还像我当初告别我的沙漠向导、诚实的老吐尔地（Turdi）时的那样。也许上帝的安排，我再也见不到吐尔地了，听说这个老练的"寻宝人"已经在监狱里死了两年多！见不到他熟悉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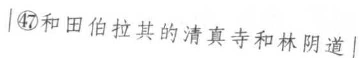
㊻在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清真寺给圣鸽喂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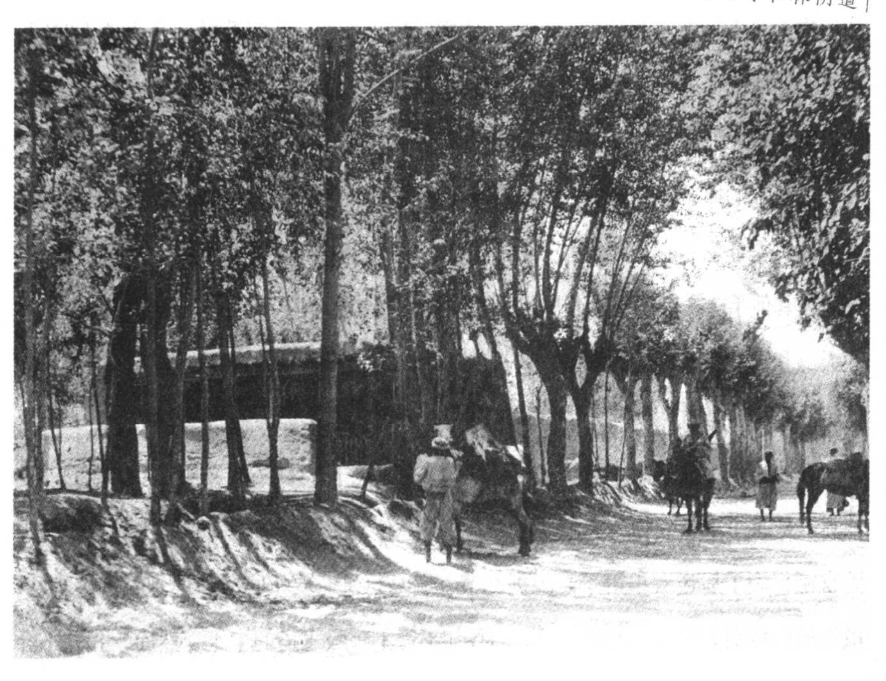
这是那快乐的一天里我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情。

在扎瓦（Zawa），路边官办的休息场所挂上了红布，院子中央的台子上摆着茶水和水果。按办格外关照，为马匹备了草料，为我们备好了食品，使我一进和田就受到殷切照顾。由于积雪融化，喀拉喀什河上涨，直接通往和田镇的大道无法通过。只有在距此地约10公里的喀拉喀什镇才有渡船，我们将从那里过河。这意味着我们要搁误一天的时间，但我并不太介意，因为我还没有走过从扎瓦到喀拉喀什这条路。结果，这里是富饶地区的卓越代表，喀拉喀什河平添了秀丽的乡村美景。

我们依次经过库雅（Kuya）、马库雅（Makuya）、喀亚什（Kayash）几个乡村，它们看上去就像个大公园，肥沃的田野代替了大草原。和田农民在路旁种上了树，一块块面积不大的土地被一丛丛成阴的树木隔开，这表明这里的文明史非常之悠久，



㊼和田伯拉其的清真寺和林阴道



对我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每一块地里都密密麻麻地种着东西，风景如画的村庄倍加值得我们注意。路经过人口稠密的地区，但因树木长得太密，我们只能偶尔看到小村庄里零零散散的土房子。库雅、马库雅、巴合拉木苏（Bahram-su）几条大水渠的河水在黄土河岸之间翻滚，混浊的水转向北方，出现了像山谷般、绿油油的地面，眼界变得开阔起来。

伯拉其（Borache）是座集市镇，肉孜伯克在恰先拜巴扎（Charshanbai Bazar，即周三巴扎）有座宅院。于是，他自然要用一顿丰盛的达斯提汗招待我们。路的上方用具有喜庆色彩的布搭上了天棚，成百上千的村民挤在棚前，他们显然在为将在这次接待会上吃到的东西而高兴。房子很新，阿依旺的屋顶是用白皙的白杨木做的，墙壁粉刷得很干净，是个凉爽宜人的休息之所。肉孜伯克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瓜果、桃子、葡萄，脏兮兮的队员们围着土台安顿了下来，好像买东西一样。我喜欢看人和动物大口大口吃东西的样子，毕竟这样的盛宴不多，所以我并不吝啬这点时间，让他们尽情享受这顿大餐。吃完后，他们从偏房出来，那饱餐一顿后快乐的表情真值得荷兰画家画下来。

巴扎上的摊子望不到边，大约有半英里长。尽管今天街上空荡荡的，但这仍能表明这里农业富裕，生产繁忙。当然，和田的工业也很发达，商队把丝绸、棉布、毛毡及其他手工产品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大部分由健壮的毛驴运输）。我想，将来有一天，和田建好了自己的铁路，通过这条繁忙的路线运送的货物就可以转由火车来运了。

在我快到喀拉喀什（墨玉——译者）的时候，陪行队伍中又加入了本地的一位伯克。他是个重要人物，气宇轩昂，身穿蓝色丝绸长袍，头戴一顶镶水晶纽扣的中国官帽，帽子后还有根辫子。根据礼节，骑马行进时要按官阶从前到后依次排列，虽然他们特别关照我，但走在稍后的我却不得不呼吸飞扬的尘土。然而，我并不介

意，毕竟通过艰苦努力，我又回到了和田，而且我也因对和田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这可能是我的弱点和虚荣心，但看到整个和田绿洲的人都还记得我，我心里十分高兴。按办今天上午还经过了镇上，他是奉命去扎瓦的一个村子查一桩紧急的谋杀案。预计他今晚回来，但近期建好的按办寓所，按照英属印度的说法，它是种“会场”（Sessions House)，可也无法解决我这个贵客——乌鲁克梅合曼的住宿问题。如果不是怕引起麻烦，我倒非常愿意住在卡日木阿訇伯克（Karim Akhun Beg）家。1901年，我就住在那里，他家在乡下，环境安静。

我应当体谅到主人们的难处。衙门模样的建筑物坐落在喀拉喀什西城门门外3条路交会的地方，路旁是成排的大白杨。我一进门，就发现这个国税局和地税局应改造成宽敞的寓所。房间很大，围绕内院建有凉廊，看上去都很整洁，设计得不错。但由于我来的时间太急，房顶还未来得及抹上黏土，格子窗也没安上，耀眼的光射了进来，所以我这座宫殿般的休息场所很热。达罗哈人、伯克的家人，还有聚集在外院和大厅里的人群，嘈杂声不断。这是本地人的习惯，没有任何恶意，两个戴着红帽、穿着红袍、温和的刽子手对噪音也无计可施，可伯克还想让这两人去衙门看守大门呢。

喀拉喀什本地的伯克是位重要官员，家境富足，对我们招待得非常殷勤周到。通过“王”（Wang，即地方首领)，他家和中国王室有着世袭的联系，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当然，这完全是种名义上的联系，尽管他家的成员之一每5年都要去北京一次（来回约要22个月)。我没能查明这种半附属性质的地方首领的有效统治是何时开始的，但知情的人员都认他的宫鲁克（Gung-luk)，即“王位”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哈比布拉赫篡权的动荡年代，有关其王位的旧文件丢失，后来对王室档案进行正式调查，其“王位”的历史再一次得到确认。这种解释让我想到了自5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编年史对来自和田的王子和贵族的记载，他们带领进贡使



⑱进入和田绿洲的伯拉其巴扎

团觐见皇上，皇室赐予他们在皇家卫军和宫里任重要职位，当然经常为哈非孜伯克（Hafiz Beg）的宫鲁克所谢绝。据说，哈非孜伯克每年的薪水达40马蹄（horse-shoes）银子，相当于2000 两，约合5000卢比，这在这些地区是笔可观的收入。

夜色已晚，我在喀让古塔格（Karanghu-tagh）和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k）考察时的达罗哈人伊斯拉木伯克（Islam Beg）到达喀拉喀什，使这短暂的停留更加快活。由于他具有的卓越才能及我的推荐，潘大人任命他为“明”（Ming，即千户长），也就是喀拉喀什地区的喀亚什伯克（Kayash Beg）。他很快得知我到来的消息，然后急匆匆赶来欢迎我，向我表达感激之情。在中国新疆行政系统里，因经济和个人原因经常发生辞退官员现象，但自他任伯克后，还没有被贬过，这超过了我们上次分手时的期望值。

M. Aurel Stein

潘大人离任5年来，和田已经换了至少4任按办。伊斯拉木伯克一直努力工作，对每任按办都毕恭毕敬，可他坚持认为是我的庇护给他带来了好运，或者进一步说，是因为我的举荐给衙门留下了印象。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他参加我们在山区的探险活动。他有上次的经验，无疑适合这项活动，但是他为此又要经受一次艰难困苦。他担任的职位很能捞到油水，还能从祖上传下的土地上获得可观的收入，可他并没长胖，体格依然很健壮，充满活力。所以，只要按办同意，我自然非常乐意他加入我们的山区探险队伍。

8月5日，我们走了约16英里，到达了和田的首府。天气很热，但令人感到非常愉快。恰巧又是礼拜天——喀拉喀什镇每周一次的集市，这里是和田繁荣的中心

㊾和田军事按办唐大人，及其孩子和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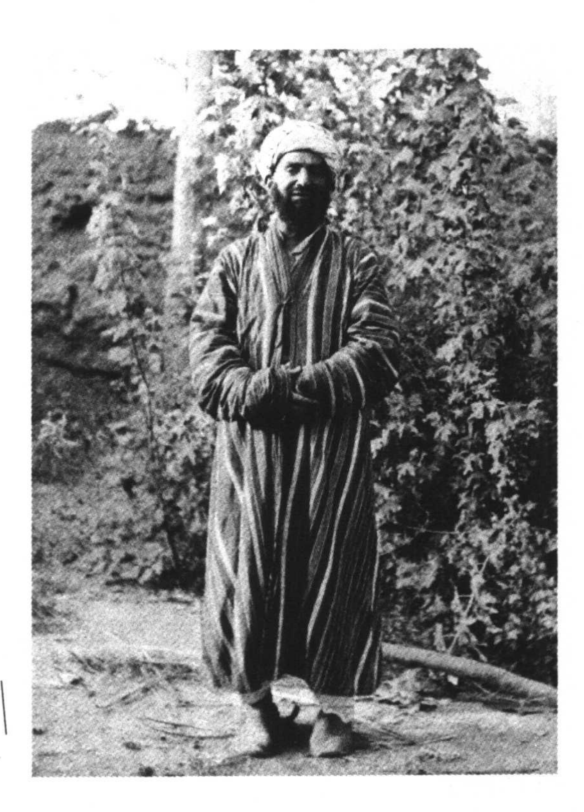


市镇。在通往喀拉喀什的路上人流滚滚，有骑马的商人，有带着商品和农产品的乡下人。小商人组成异常混杂，有巴焦尔人（Bajauris）、阿富汗人、安集延人（Andijanis）以及克什米尔移民的后裔。看到这种情景，往事又历历在目。

喀拉喀什河发了大水，尽管有两只大渡船，但河水流速很快，每秒超过1码，河两岸是沙滩，水手的技巧又欠娴熟，所以渡河花了好长时间。在镇以下，喀拉喀什河分成两支，分别有60码、150码宽，我们穿行了大约1.5英里。靠东岸的河中心水深达8或9英里，水流就在这里形成。穿过隶属斯帕（Sipa）地区的耕作区，到了汗艾里克（Khan-arik），接着是沼泽地带，然后向拉斯库（Lasku）进发，那里是巴拉马斯库木（Balamas-kum）的沙地和进入沙漠的入口，现在和田人正在进行着水利建设，慢慢地向沙漠进军。

在这片废地上，阳光刺眼，树阴下的温度计显示近100华氏度，我的老朋友巴德鲁丁汗（Badruddin Khan，和田的阿富汗大商人）和此地印度人的代表隆重地欢迎了我。欢迎的人很多，表明中国新疆经济的普遍增长使和田与现代社会更加接近。除了很多年以前的阿富汗商人外〔主要来自喀布尔、比欣（Pishin）、巴焦尔（Bajaur）〕，还来了两个印度人，甚至本地出现了一位托过世的喀什噶尔医院助理医师阿布杜·艾则孜先生（Hospital Assistant at Kashgar Mr. Abdul Aziz）之名行医的郎中。他从德里附近而来，一路征程，来到和田。他医术较高，为治疗绿洲中长期以来盛行的各种病症大展身手。但他对有钱病人的落后观念牢骚不已，这些病人慢慢地才意识到，除了感激和祷告外，他们还应给郎中以物质性的报酬。在我们眼里看来，这当然是再合理不过了，可和田人的观念并不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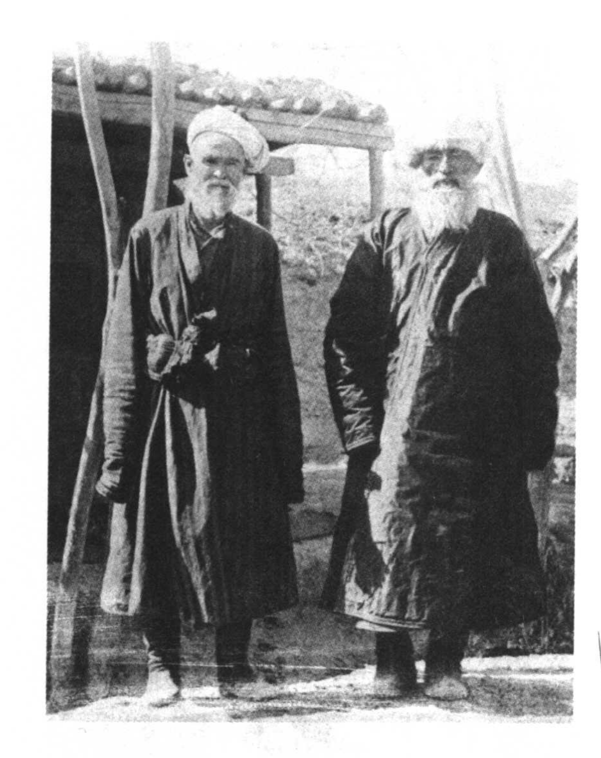
这个埃斯库拉普人（Aesculapius）穿着法属土耳其式的衣服，曾在麦加和布什尔（Bushire）居住过一段时间，英语讲得不怎么好。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可敬的昌杜（Chandu），他是第一个在和田从事高利贷的锡克普里人。高利贷在其他地方很盛



㊿和田的印度和阿富汗商人的长老巴德鲁丁汗

行，5年前，他奇怪地发现和田还根本没有这种商业活动。那时，在他看来这肯定是可以大捞一笔的，而现在这些精明的锡克普里人却一直愿意把这个行业完全让给中国同行。对此，我听说了各种解释。

走在拉斯库和吉沃斯（Givos）的路上，大队人马过后，扬起阵阵尘土，令人透不过气来。这样，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奉按办之命，在和田镇外约2英里处已经准备好了官方欢迎仪式。以前，我还未受到过如此的礼遇；我想在这种场合应穿上黑外套等得体的衣服，可行李还在身后好几英里的地方呢。我几乎妒忌起陪同的伯克，他携带了官帽，上有纽扣、红缨，他先让仆人给他戴上，而我却因为帽子盖得不严，引起了头痛。另外，我还撣不掉



(51)阿合买提·伊斯汗（安集延长老）和阿布杜拉汗（阿富汗商人），摄于和田

身上的灰尘。

在路边的接待大厅里，有很多身穿华丽丝绸长袍的中国官员，腰挎宝剑、手执长戟的士兵威风凛凛。各种人簇簇拥拥，跟在我们身后，我没办法更细致地观察。主持欢迎仪式的军事按办非常热情，在我左边的士兵首领身材魁梧，和蔼可亲，我和他们互致寒暄问候，其实在经历了漫长、炎热的旅途之后，我更想端起身边的清茶就喝。可按照中国的礼节，如果在这样的正式场合喝茶，表明仪式行将结束、大家要互相分别了。所以，我还得耐心等待。

巴德鲁丁汗已经为我在尼雅孜·哈克木伯克家古老的花园式宅邸里准备了住处，1901 年在和田最后的日子，我也住在这里。走过树阴下的阿依旺和大厅，走进花园中心熟悉的亭子，我此时才完全相信我确确实实已经到了我盼望了已久的这片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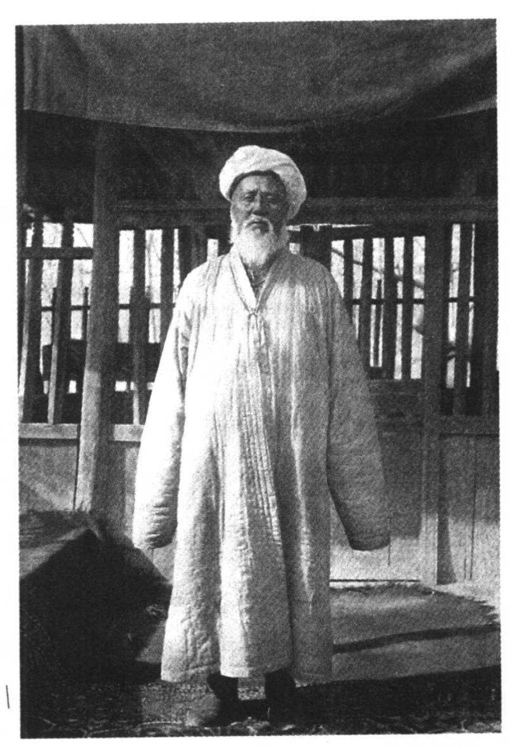
地。5年来，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些场面，克服巨大困难，我才得以今日故地重游，看着这跟我记忆中一样的东西，我却感到有点陌生了。我曾在亭子里长时间盘问伊斯拉木阿訇，这个精明的造假者最后供认不讳，现在，这座有很多窗棂的亭子什么也没有变。园子里郁郁葱葱，令人赏心悦目，只不过树叶和枝条的尘土比以前厚了。

重回故地与老朋友叙叙旧是件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第一天下午，我会见了亲爱的老阿訇伯克（Akhun Beg），第一次来和田时，我曾住在他家的园子里。我在克什米尔和白沙瓦曾遇见和田的朝觐者（Hajis）和商人，向他们打听了阿訇伯克的状况，他们把这事告诉了阿訇伯克，说我很怀念他。第二天我回拜他时，我发现这位矍铄的老人竟记得我住在他家时的每个细节，这令我非常高兴。

阿訇伯克多次盛情邀我再去他家去住，但考虑到天气太热，没法住在帆布帐篷里，为了避免可能影响到住在他家里的人，我决定从山上回来后再说。但我接受了他给我骆驼的盛情，赶它们去他在阿萨（Hasha）之上的山中牧场，这样奔波了几周的骆驼可以恢复一下体力。他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着他拥有的成群的山羊、牦牛、马匹等，这表明虽然年纪变老，但他仍然算记着如何赚钱呢。

在我到达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出去查案的按办车大人回来了。第二天早上，顾不得旅途辛苦，他就正式拜访了我。当然，我原本打算先去拜访他。我本来已经让蒋师爷先去通禀一下，并送上一架双目望远镜和一块中国人喜爱的“自由牌”（Liberty）黄色锦缎。可是，蒋师爷不知道这种事情的时间重要性，当按办大人来访时，他还在理发馆呢。

我高兴地发现，车大人非常和蔼可亲。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机智能干。他的首席译员曾在潘大人手下干事，对我上次在和田的考察活动颇为熟悉，对我再次考察的目标翻译得很清楚，速度也快，另外，《古代和阗》的插图对展示上



52我在和田的主人哈吉阿訇伯克

次考察的成果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按办谦虚，说自己没有潘大人那样博学，但从他提出的问题里不难发现他对历史也有着敏锐的悟性。

更令我高兴的是，车大人对地理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我这次去和田南部的昆仑山脉探险迫切需要他的帮助。1900年，我们沿玉龙喀什河（the Yurung-kash River）最高的河道向东走了很远，去了它南边的主要水源的冰川，但仍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到达玉龙喀什河上游的唯一道路是险峻的峡谷，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攀登上去。如果没有按办的严格命令，狡猾的喀让古塔格（Karanghu-tagh）山民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挠我们前往那里。玉龙喀什河上游还有很多地方没考察过，肯定会遇到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车大人很快弄

明白了我的用意、搞清我们如何来实现的方式，我这才安下心来。虽然他来和田上任才几个月，但他对这里及相邻东部地区的基本地形非常熟悉。我在地图上把上次的考察路线指给他看，他听起来毫不费力，并爽快答应在其职权范围提供一切帮助。

下午，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我去那熟悉的衙门回拜按办。车大人备好可口的点心，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表示敬意，还告诉我为确保能有效地提供帮助，他已拟好给地方各级官府的官文，正待我的秘书阅读一遍。毫无疑问，按办将热心地帮助我们。6年前，当我对潘大人提出这种请求时，潘大人要求我们小心从事，并做出了保留意见，想到这里，我更是对车大人充满感激之情。我不知道中国官员是否对西藏高地（Tibetan uplands，玉龙喀什河大致发源于那里）还是那样害怕，其中的缘由我也无从知晓。车大人答应我的请求，仅仅是因为他本人对地理感兴趣吗?

两天后，从库克牙开始做测量勘察的测量员拉姆·辛格安全抵达，我对在和田山区探险活动的成功进行更充满信心。我委托他的任务已经完全完成了，我以让他参加马上开始的探险活动的方式祝贺他们。他勘测了库克牙和克里阳路线之间的昆仑山脉部分，人们至今对这个区间了解不是很多，这其中包括位于喀尔里克达坂附近的玉勒艾里克河上游；接着，他越过覆盖着深深积雪的克里阳山口，到达喀拉喀什河的上游，然后翻越冰川覆盖的信度塔什山口（Hindu-tash Pass，海拔约17 400英尺），攀上高高的普萨（Pusha）山谷。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地图上，人们只知道在喀让古塔格和喀拉喀什河中游之间的空白地带有普萨山谷这么一个名字，喀拉喀什河在那里拐了个大弯儿，但对该山谷的具体方位、周围山区的地势一无所知。1862年，施拉更特怀特（Schlagintweit）从信度达坂（Hindu Dawan）北山脚下山，进入这个山谷，他是来过这里的唯一的欧洲人。可惜的是，还没等他把观察所得记录下来，他就在喀什噶

尔被杀害了。

北边耸起一座大冰山，阻挡住了通往信度塔什山口的去路，在喀拉喀什上游的克尔克孜人当中，测量员拉姆·辛格曾找到一个人，那个人十年前去过普萨。但是，他年岁已高，腿又瘸，只能凭记忆指出从分水岭顺冰川而下大致路线，冰川路面有6英里多长，很陡，又有很多罅隙。显而易见，从北坡下山冒有巨大危险，不过，拉姆·辛格生性沉默寡言，没有把他们下山的细节告诉给我，但我们一看便知，他及其克尔克孜同伴克服了多么大的危险。尽管我叮咛再三，让他过冰川时要用绳索，可是他没有听从，结果几次从冰川隐匿的罅隙中死里逃生。

在主体山谷的雪山后面，拉姆·辛格发现了一个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的山谷，水草丰美，从和田沿难走的山路可以到达。山谷鲜花盛开，普萨山里人（Taghliks of Pusha）的牲畜兴旺景象，给拉姆·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往下走，他遇见了散落的人家和耕地。然后，他穿过一系列陡峭的小山谷，这些山谷起源于普萨山谷东面的喀拉喀什河的右岸，山谷的所有河流都发了洪水，给人和行李造成巨大危险。非常遗憾，在库克牙我因工作和其他原因，没能参与拉姆·辛格的这次探险，所以在这里无法更详尽地描述给大家。委任给拉姆·辛格的地形测量任务完成得很彻底，他带回的平面仪图纸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弥补了我以前绘制的和田详图西南角的空白区。

为了给拉姆·辛格和其勇敢的家仆贾斯旺·辛格（Jasvant Singh）必要的休息、检修受损的仪器，我不得不在和田再停留5天。我利用这段时间，为山区的探险和9月份开始的考古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晚上也只能腾出1个小时左右，从繁忙的纳尔巴格（Nar-bagh）工场出来歇歇。在树阴处的一个水塘里，我们成功地试验了皮充气艇。巴德鲁丁汗经常差“寻宝人”上门拜访，打听有关开凿挖宝的地点的信息。由于1900—1901年，我在和田考古取得大丰收，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寻宝”活动越来越少了。

M. Aurel Stein

那年冬天，忠心耿耿的维吾尔老人充当我的向导。据说，他后来曾去过一次沙漠。大约3年前，他听从别人错误的建议，偷偷摸摸把和田的一位伯克从沙漠带到克里雅河（the Keriya River）下游，因为这位伯克惹怒了按办大人。于是，伯克不惜冒险，欲穿越塔克拉玛干去沙雅（Shahyar)，结果被追捕的人抓住，屈辱地带了回去，可怜的维吾尔向导因此招了祸。他有几个不干正事的亲戚，为此他牵涉到一桩捏造的偷牛案，他入狱6个月。如果他知道其中内情，他就会明白这种罪名是无法洗清了，因为这些地区的中国刑事并不依详细的文件为依据。出狱以后大约半个月，我这位诚实的“寻宝”向导就去世了。得知他死在简陋的家中，我心中稍有安慰。直到未来的沙漠之行，我为他寻了一小片地，他才得以安息。

年轻的肉孜是那位突厥老人的继子和助手，主人去世以后，他就在玉龙喀什定居下来，以种田为生，最远偶尔去邻近叫做塔提（Tati）的岩屑地区“寻寻宝”，不会再走远。这次，他跟我们到了丹丹乌里克废墟。他所能卖的古物只有那么一点，包括各种古币、石刻及其他小东西，不过他还带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赤褐色佛像，这是他从杭桂（Hanguya）之外的沙漠里的一座布特哈纳（But-khana，即寺庙废墟）里发现的。上次沙漠之行时，我还不知有这么个地方，它的藏物可能很丰富。我举行一场丰盛的巴赫西斯（Bakhshish）招待肉孜，想让他再次去废庙一趟，摸清当地情况，并带其他几个年老的“寻宝人”搜集类似的可以考古活动的遗迹，以备秋天开始的沙漠探险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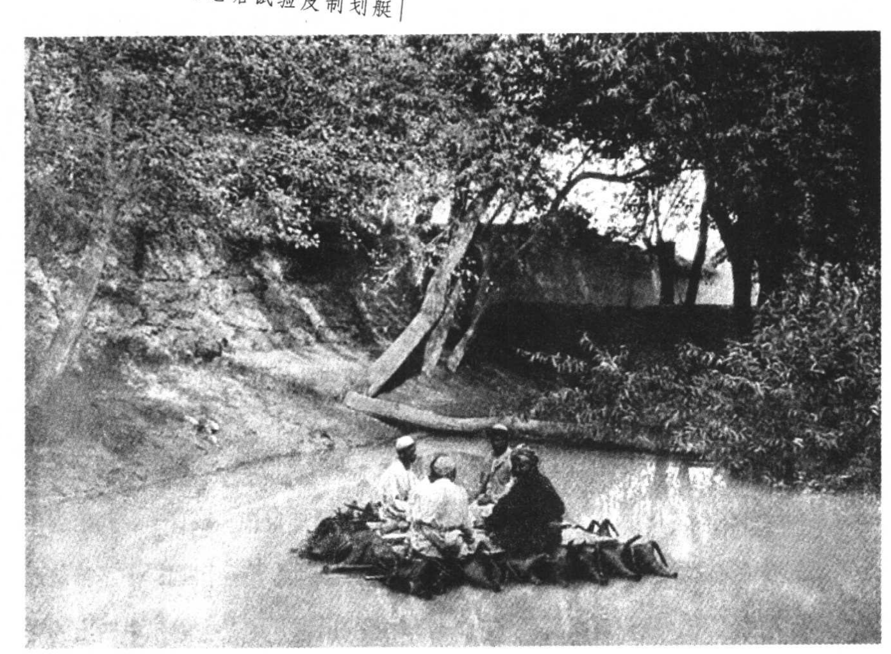
这段时期，和田天气很热，清楚表明这个季节不能去沙漠考察。于是，一旦“寻宝”队安排完备，我就可以上山考察了。那里人烟极其稀少，中国人对其一无所知，蒋师爷什么忙也帮不上，所以我把他留在和田，舒适自在一段日子。我把现在不需要的器械交由巴德鲁丁汗照看，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为了不中断拉姆·辛格最近在普萨的勘测工作，我们应从尼萨（Nissa）附近的山区开始。去阿尔卑斯山的居

民点的道路只有一条，即我在1900年9月下山、去平原时所走的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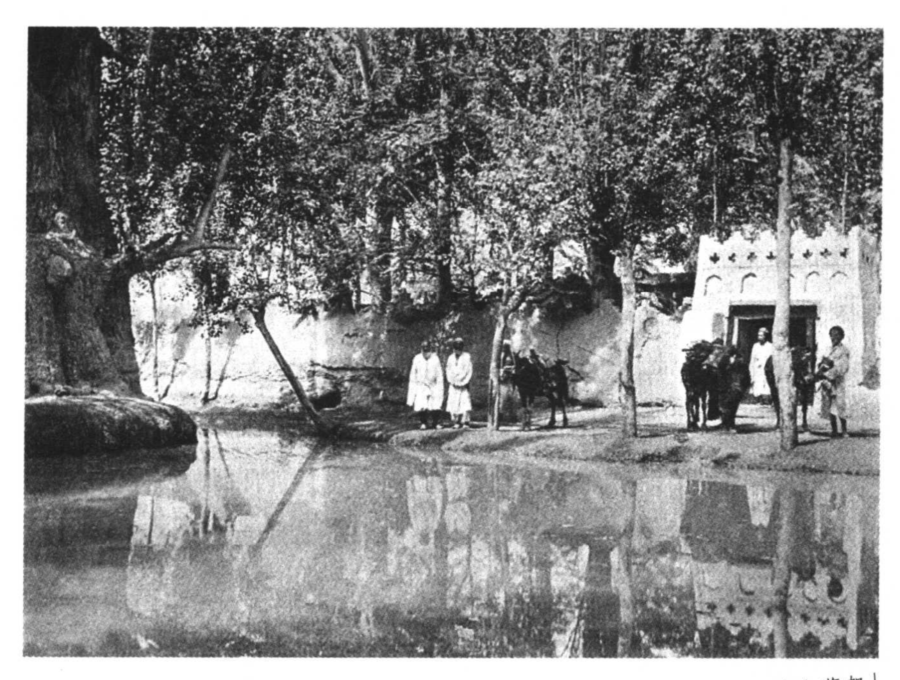
8月11日上午，我们从喀拉喀什河出口处附近的较大村庄兰格鲁（Langhru）出发，进入山区。在一天的行程中，我抽空儿重访了约特干（Yotkan）遗址。为了找到金箔和有价值的小物品，这片埋有古今和田首府文化遗迹的土地每年都会被"扫荡"一遍。很高兴见到这个充满历史古迹的村庄，果园树木茂盛，凉廊点缀在浓密的棚架之间，而1900年秋，我来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秋风萧瑟的景象。

约特干的百户长胡大白尔地（Khuda-berdi）隆重地接待了我。上次来这里时，我就住在他的家里。尽管命运之神给他的自然馈赠不多，但这些年来，他显然发达了。招待我们的达斯提汗在新房子举行，新房很宽敞，这表明他知道如何花钱、如何享受。园子比以前大了，果树上挂满了美味的桃子和李子，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

|53在纳尔巴格的池塘试验皮制划艇|



M. Aurel Stein



54约特干如克奴丁麻扎附近的池塘和藤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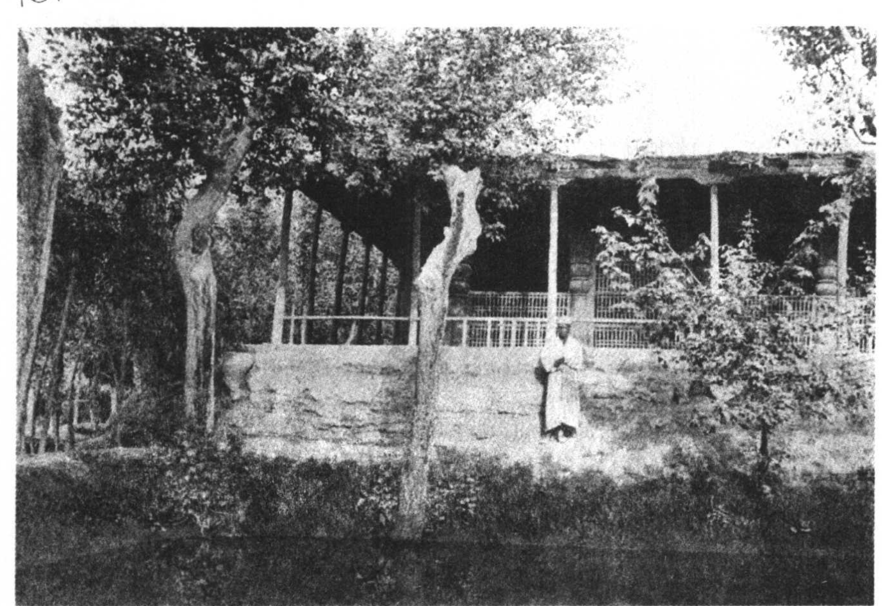
快要熟了。胡大白尔地从村民手中及时收集了他们去年“扫荡”时获得的古物——土陶器、古币、图章等。付款购买之后，我让人把这一袋袋古代陶器运回和田，作为我这次收集古物的第一笔收获。

我骑马从约特干到绿洲西南边缘，路上经过了和田的佛教遗迹，玄奘曾经到过这里，现在流行的伊斯兰教寺庙依然留有佛教建筑风格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宗教的变化，寺庙的地形特征（topographia sacra）仍然清晰可辨，遮住了太阳，使得晌午不再那么酷热。喀拉喀什河右岸是小山丘，荒凉的碎石斜坡从小山丘上延伸下来，我登上斜坡，再一次目睹冰碛砾岩悬崖，神圣的库合马里（Kohmari）石窟就在悬崖之上，此石窟在古代和田很著名，被认为是“瞿室梭伽”（the Shrine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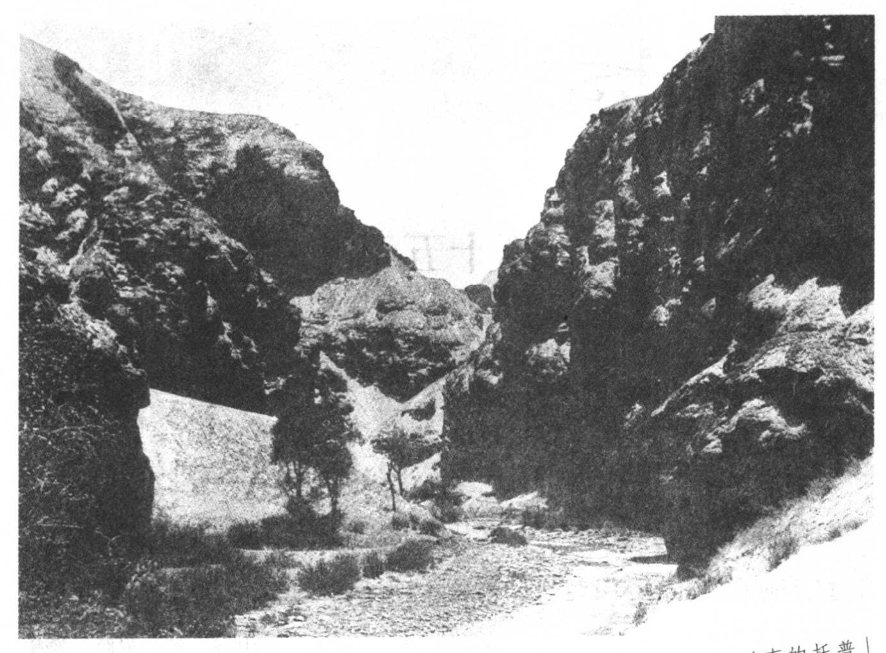
Gosringa，即“牛角山”之意），流传着很多有关它的传说。下面是翻滚的喀拉喀什河，由于源头积雪融化，涨了大水，与1900年9月我横穿时大不一样，那时它不过是条不起眼的小河。

接下来在萨依上行走，气温很高，光线刺眼。奴西亚（Nussia）和法伊札巴德（Faizabad）两村的田地组成了狭窄可耕地带，沿河左岸延伸几英里，走在这里要比在萨依上好多了。过后，路又变成了赤裸裸的砾石高地，一直到兰格鲁东部边缘的田地，在那里，我遇见到一座废弃的城堡遗迹，人们普遍把它与一个叫“昆煞士魔马”（Konsasmoma）的恶魔模糊地联系在一起。城墙颓毁得很厉害，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东北墙长约100码，为大块的土坯砌成。墙内和墙外没有建筑遗迹，所以无法对其年代作出推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城堡的目的是阻断从山区

㊺和田镇西门附近的池塘和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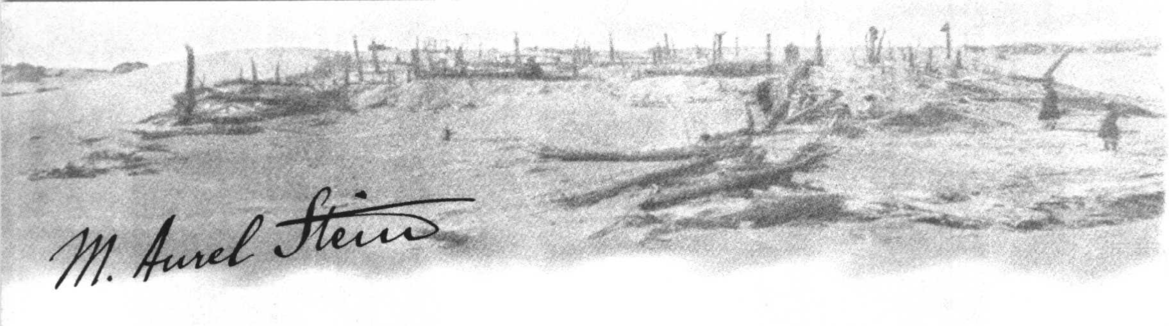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㊺乌鲁噶特（Ulughat）山口以南的托普查（Topcha）峡谷

过来的任何道路。我们到达兰格鲁一个舒适的农场宿营时，天色已晚。山谷周围是赤裸裸的砂岩峭壁，辐射出很大热量，虽然附近就是河水和茂盛的树林，但这也难抵酷热。晚上很闷热，可我仍然倍感兴奋，毕竟山地快走完了。



第十五章

赶往尼萨冰川

只有一条路线能到达玉龙喀河上游的最西端，它就是1900年我走的那条路线，不过与当时的方向恰巧相反。所以，有关这4次漫长行军的情况就毋庸赘言了。从兰格鲁出发，越过一个又一个高高的横断山冈，穿过不毛的山谷，到达尼萨。崎岖的山脉受到腐蚀，形状奇特，高处的山坡盖着一层岩屑和黄土，一切看上去一如过去那么荒凉，没有什么改变。山谷底部靠近雪线的地区在夏天能得到水，形成狭窄的草木带，比我6年前秋天经过此地时要绿。乌鲁噶特（Ulughat）是第一道山口，海拔近10 000英尺。运气不错，天气晴朗，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三角测量工作。以前，我在这里堆积了小土墩和栽种了小矮树，以作位置标记，我发现它们现在仍原地不动地待在那里，这再次证明这里的干燥性气候有利于小建筑物的保存。我们在山顶建造的炮台（Pao-t'ai）已经在塔格里克人中间声名远播，测量员拉姆·辛格在闭塞的普萨山谷就听见有人说起炮台。

如果说这些山区干旱环境没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么空气状况可是发生了变化。1900年，这里空气清新，所以我能得到摄影需要的空气透明度拍摄那套壮观的全景，这套图片已经由皇家地理学会另外结集出版，我现在身上还带有复洗的照片。

但是，现在烟雾状况一直不断恶化，已经看不见南面主体山脉的雪峰。不过，透过烟雾来看参差交错的山脉也别有一番味道，还可观察一下腐蚀得奇形怪状的岩石表面，把视野范围内以及从塔格里克（Taghlik，即山里人）向导那里得到的有关这块山区废地的地形全部记录下来。

第二道山口是亚干达坂（Yagan-Dawan）。接近山口时，我惊喜地在黄土坡上的稗草中发现了盛开的鲜花（coarse），这是我离开克什米尔后，第一次见到阿尔卑斯山生长的山花，其中有火绒草、蓝玲花以及我见过却叫不出名字的花。山谷的岩石腐蚀得厉害，山口上又是巨砾道路，人和牲畜走起来都很困难。不知是因为上次经过这些山区，导致这里开放，还是因为按办生性多疑，害怕外人入侵，发布了更加严厉的恐吓山民的命令，我们在米塔孜（Mitaz）山谷和恰什（Chash）山谷遇见12处小的半游牧的居民点，山民显得更加“驯服”。我们准时准备好了运行李用的牦牛，因此没有耽搁时间，于8月15日下午到达尼萨，也没发生任何事故。

从布林噶克山口（Bringak Pass）延伸下来的山谷出口处就是尼萨河，在往下不远，碰见大约20间土房子，它们是在这个海拔约9000英尺的山谷中放牧和种田的山民过冬的场所。我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天，以为日程里的工作做些准备，其中包括两大任务：第一，我想进一步深入1900年的考察，以对在小山谷山头看见的冰川的地形了解更加充分，那些冰川为玉龙喀什河南面的昆仑山脉提供了水源。但由于现在的季节为时尚早，缺乏充分的交通工具，我们一直没能到达那些冰川。

另一重大任务，是消除有关约翰逊（Johnson）路线的疑点，这条难走的道路已经废弃很久了。1895年，勇敢的约翰逊从西藏高原最西边出发，翻越喀让古塔格南边高耸的雪山，到达和田。在1900年考察过程中，我发现约翰逊路线的草图与本地区实际的地形有不合之处，让人颇感迷惑；而喀让古塔格的山民三缄其口，从他们口中得不到这条路线具体位置的任何线索，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的这种态度会

有实质性的变化。不过，经过长时间对米塔孜和恰什牧民的盘问，我们得知山后有一叫布林加噶（Brinjaga）的山谷，地势很高，他们说喀让古塔格的巴依们夏天就赶牦牛去那里放牧。听后，我们受到鼓舞。在上次探险活动中，我无法知道这个地方的任何信息，但在约翰逊路线草图中确有布林加噶这一地名，它是在约翰逊到达喀兰克塔格以前的一个山谷的名字。

喀让古塔格是塔格里克人主要聚集地与和田犯人的流放地，除了他们之外，这个荒僻的山区再也没有其他人居住。到达这里以后，我立即找来当地首领。1900年时，年老的百户长消极地阻挠我的行动，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世了，继任者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晚上，他准时来到我们在尼萨附近的驻地，可他却也像他的前任那样。我告诉他说米塔孜人已经把布林加噶说给了我们，让他明白如果他继续知情不报，我们势必在他的山谷里待上更长时间，那将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我的话好像起了点作用，他说他听说过布林加噶这个名字，可因为太年轻，他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他反复说他不知道任何一条往南走的路，倔强的牧民不服他管，他还对流放的犯人表示担忧。然而，他并不反对我们去尼萨山谷（the Nissa Valley）源头的冰川进行考察，我对此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因现在是喀让古塔格人休息的时间，心情较好之故吧。为了让百户长熟悉我的工作和工作方式，我决定带他一同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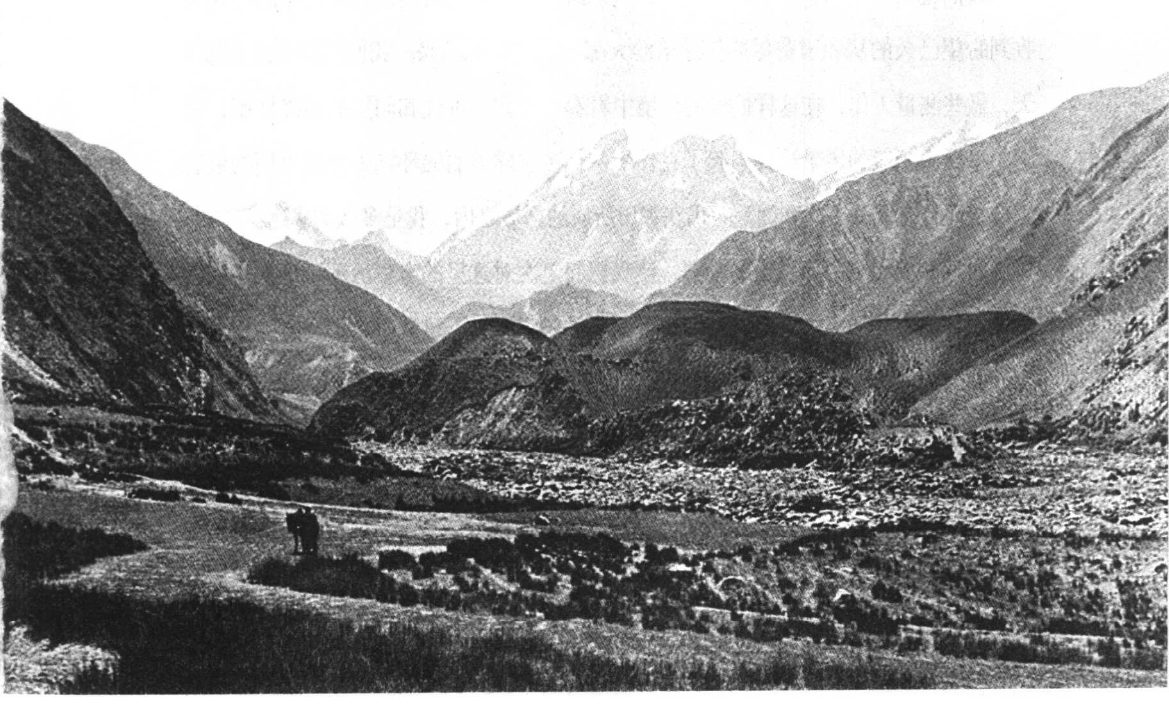
8月17日，经过短暂而愉悦的行军，抵达了尼萨山谷的源头，我没料到会这么顺利。从营地出发，上行大约4英里，山谷很狭窄，沿着谷底一条几乎不间断的田地。南边大量的冰山给这里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这一点从我们一次又一次涉水而行中显而易见。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精耕细作的梯田里种着燕麦。由于土壤贫瘠，也许因为劳动力不足，这里各家的耕地每四五年才轮作一次。

越过普西云噶（Püsh-ünga）最高的田地（海拔约1000英尺），正当从侧面山

谷光秃秃的岩石隘道走出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派阿尔卑斯山的风光，真没想到这种地区是有如此美景。南边的雪峰之间形成一块平地，从平地延伸出来了宽广的山谷盆地，地上是绿油油的草皮，中央是绵延高大的山脉，也长满了草，风光甚是秀美。顺着路登上这些山脉，我很快辨认出它们是古代巨大的冰碛形成的，冰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冰川留下来的，比山谷中现存的冰川形成得要早得多。但现在的冰川也很宽广，足可以给山谷最高部提供充足的水分和植物生长之用。

1900 年，我们在布林加克山口（Brinjak Pass）之上的观测站望见了冰川的全景，尽管距离很远，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我们成功进行了三角测量，结果表明在众多的高峰中，其中至少有一座峰在海拔 23 000英尺以上。但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山谷中，前方恰有一高 20 000 英尺的伴线（satellite），所以看不见那座高

⑰自塔木乌格勒遥望尼萨山谷的源头



峰。即使手头没有全景照片，也很易找到如此之高的冰川。果然，我们很快就从山谷源头的方向找到了它。

厚厚的黄土层覆盖了古老的冰碛，上面长满绿草，骑在上面令人舒适爽快。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光秃秃的沙地上和碎裂的岩石上骑马奔跑，我现在感觉像是回到了心爱的克什米尔高山草地之上。冰雪覆盖的山脉和高峰形成巨大的平地，冰川从平地上延伸而下，离冰川越来越近。但最后，我们只得在叫喀什库勒(Kashkul)的山冈上安营扎寨，山冈海拔约13 300英尺，长满青草，恰与一座大冰川的山鼻相对。冰川边缘颜色暗淡的冰墙高出砾石山坡至少150英尺，冰川的碎屑最终都会落到这个山坡上。大片大片的岩屑完全覆盖了冰川的顶端和侧面。在巨大的冰崩和罅隙间是宽大的冰河，把碎屑带到下面地区。因白天受太阳照耀，冰川表面松弛，到了下午和晚上，散落的巨砾砸在山鼻和冰川侧面的冰墙上，隆隆声不断。冰块融化形成的溪流从我们四周的山坡上倾泻而下，轰鸣声连续不断，而且声音更大。

我们就像在阿尔卑斯山露营一样，这景致在这些恶劣的山区难以奢望的。我又收到盼望已久的从和田费尽周折送来的大邮包，我倍加高兴。我们可以在此逗留1天，做些测量工作，在这样愉悦的环境中看看信件和《古代和阗》的最终样稿，像阿尔卑斯山一般的风景让我想起了克什米尔，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完成书稿的最后工作，而且完成《古代和阗》时仍在和田所属的区域之内，我是多么的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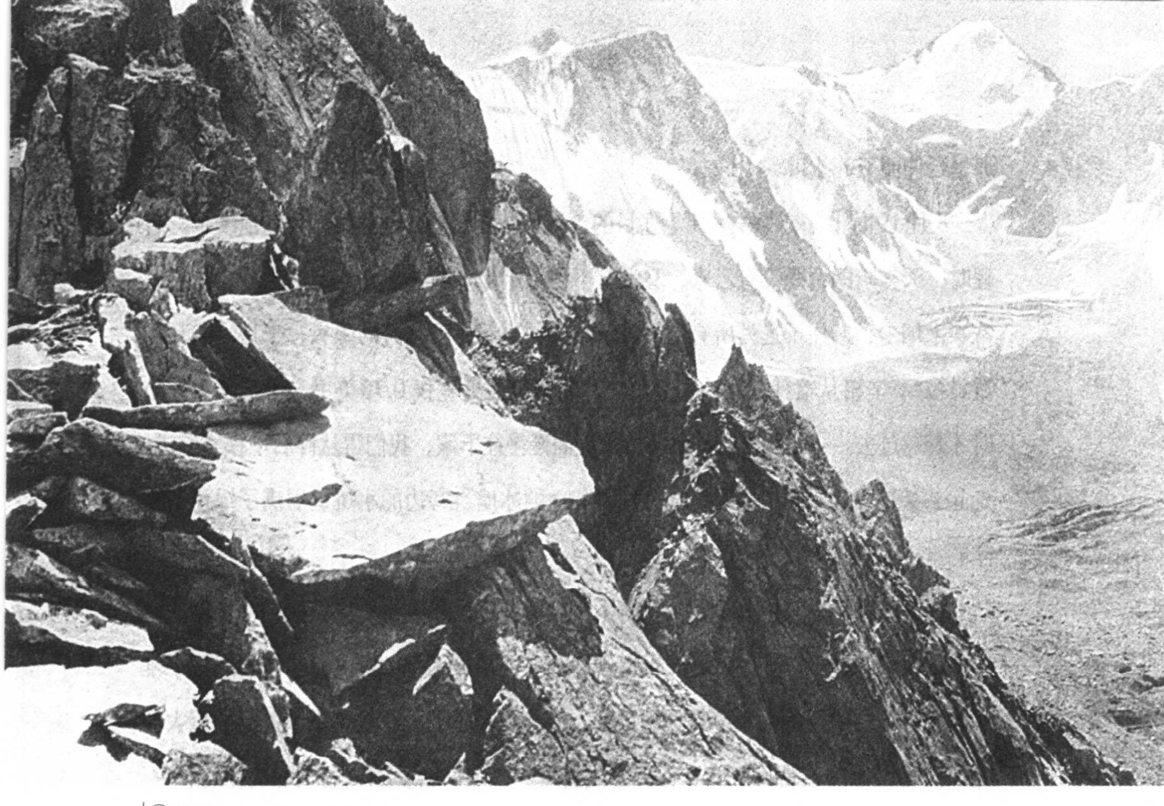
对尼萨山谷和南面高山的勘测，使我想起上次对这里的考察活动，那次完全依靠远观，在布林加克山口上仅用一台平面测量仪观测，不过看得也很清楚，视野也很开阔。为了获得更多准确详细资料，我们就必须登上山谷源头的某个制高点。在喀什库勒冰川以下约1英里，山谷分成两岔。其中一岔位于喀什库勒冰川东侧，是高耸的岩石山冈。只有爬上那个山冈，我们才有希望看见东南面更高的山峰以及从

那里延伸而下的冰川。

8月19日上午，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携带好所需的各种器材，我们出发了。启程时，天空晴朗，既没有云彩，又没有不祥的烟尘。而在前几天晌午时分，北边经常吹来烟尘，遮住了远处所有的山脉。我想顺道看一下冰河的源头，于是，我和测量员拉姆·辛格从喀什库勒冰川登山。冰川底部之处宽仅0.75英里，可花了1个小时才翻越过去。一团团岩石碎块从冰川表面慢慢往下滚，我们得从碎石中摸索前进，走起来甚是困难。冰川的终段部分像是陡立的冰墙，旁边的小坑里灌满了绿色半结冰的水，冰墙几乎成了黑色。

一越过冰山，我们就到了岩壁脚下，岩壁就像由巨大岩石块组成的一堵墙，它好像一场大爆炸后产生的，抑或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译者）用手堆积起来的。岩壁边缘的大小和陡峭程度，显著地表明剥蚀在这些山坡上起的重大作用，因为山坡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被冰或雪覆盖，表面会受到气温剧烈变化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座山冈的东坡却是许多碎石，岩石的分解作用形成了个镶嵌状的障碍物。在东坡，上午受到太阳的照射，温度变化频繁、迅速地发生变化，这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冒着炎热，我们登上了山顶，山顶高出我们在冰川边缘的出发点约1200英尺。跟我们同来的塔格里克人携带着平面测量仪、经纬仪等工具，他们不愿再走了。一旦登上顶部，像塔尖般的山冈顶点看上去好攀登多了。但我们很快发现这山脊只不过是一系列裂开的巨石，从西坡即使走直线都难以攀登上去，沿较易走的山坡攀登起来也很难，像做体操运动一样。攀登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看到了东西两边的雪峰，这是唯一让我们可打起精神的东西。最后，到达山冈顶部的第一处巨大的岩石山峰耸立的地方，结果发现山峰东西两侧都几乎是笔直的悬崖，根本无法对其测量。大致朝山顶的方向有一狭窄的峡谷，不仅极其陡峭，而且由于高处裂石上冰雪消融，



|㊿喀什库勒冰川的源头及其冰原地带|

松动的石块不时落入峡谷，很不安全。所以，我们只得在冰雪成锯状的山脊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处固定好平面测量仪，无液气压计显示它的高度近 15 000 英尺。

西南边是陡峭的山峦，顶部为冰覆盖，山峦之间是开阔的平地，万年积雪覆盖了山谷，喀什库勒冰川就在其上。西面是向北延伸的山脉，不像西南边的山峦那么高，但也是崎岖不平，西面的冰川融水和喀什库勒冰川的融水相汇。一座金字塔状的雪山引人注目，一堵巨大的冰墙与之相连，冰墙把拉姆·辛格最近测量地区和我们现在所在地区分离开来。我据此推断，金字塔雪山肯定是帕纳孜山谷（Panaz Valley）的源头，并为喀拉喀什河提供水源。我用望远镜观察冰块覆盖的陡峭山脊，想弄清山谷的地势。这个时候，我几乎没想到两年后，为探索约翰逊英达坂（Yangi

M. Aurel Stein

Dawan)，我会从南坡攀登昆仑山的主脉，到了金字塔雪山不远的地方。现在，就让我暂时和这里说声再见，告别这片粗犷广袤的昆仑山地区。

从冰墙下的冰原至我们营地对面的岩岬，行程约6英里，喀什库勒冰川就在我们脚下。紧接冰川顶峰之下是陡峭冰原斜坡，奇滑无比，一片雪白。再往下，从较低的、像肋骨样的山脉上掉下大团大团的岩屑，阻塞了冰河，冰河的表面看上去像是深暗的激流，本来流得很快，却突然在其宽道处放慢了速度，静静地流淌起来。

在我们所处山谷的另一侧，所能测量的范围更小，更不全面。我们的东面和东南是锯齿状的山脉，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横断山冈，把昆仑山的中轴山脉完全遮挡在视线之外。我们清楚地看到，河水从下面的山谷中流淌，远比从喀什库勒冰川流出的那条河更大，它源头的冰河也相应地更大，我们只能看见终端冰碛的一小部分，大约2英里，其位置较高，其余的部分则藏在我们脚下的岩石山冈之下。平面测量仪清楚表明，那座看不见的大冰山肯定是从东边或东北山坡的大拐弯处延伸下来的，根据三角测量，山坡所在山脉的雪峰高为23 071英尺，我1900年在布林加克达坂拍摄的全景图似乎证明了上述推测。为了勘测得更准确，我们有必要去东面和尼萨山谷的主要源头做进一步的考察。

从山冈上下来相对容易，绕过山冈靠近喀什喀勒（Kashkal）一侧的山脚，返回营地。路上不时遇上冰川河，阻碍了我们的归路。上午过河没遇见什么麻烦，但下午由于冰雪融化，河水变得汹涌澎湃，就连牦牛也难以站稳脚步。所幸这些牦牛已习惯了在河底崎岖的岩石上行走和在水里游。牦牛鼻孔里穿上绳子，有人先到对岸牵着绳子，这样就能牵着这些行动迟缓的动物的鼻子走，把人和仪器安全运过湍急的河水。河水没过了牦牛的腰部，人和仪器安然无恙。

M. Aurel Stein

第十六章

奥特鲁胡勒冰川

8月19日一大早，我们把营地移到以前推测为尼萨山谷真正源头的那座大冰川脚下。根据下面大牧场的名字，我们把它叫做奥特鲁胡勒（Otrughul）冰川。距冰川最后几英里的山谷底部非常开阔，以至于虽然距离这么远，可根据两边雪峰的交点，就能测出冰川大体走向。冰川的长度超过了12英里，但由于冰川边缘的山冈形成拐角，在下面的山谷里只能看见冰川的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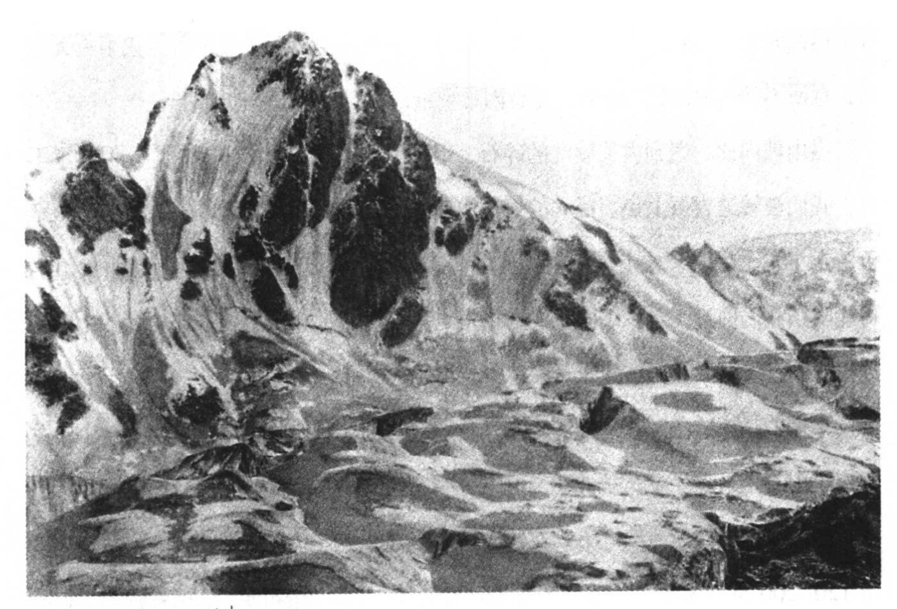
在冰碛终端往下的最后一块草皮，我们安营扎寨。我打算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我和穆萨及几个塔格里克人就出发。穆萨是吉德拉尔人的后裔，年纪轻轻，善于登山，这几个塔格里克人与他相比还显得略逊一筹。测量员拉姆·辛格留了下来，他患了重感冒，昨天登山把他的关节弄僵了。我们面前冰川的山鼻好似一堵新月状的冰墙，半英里多宽，高达200英尺，表面是黑色的碎石。山鼻镶嵌在巨大的冰碛终端之上，和冰墙两侧上面大片的碎石自然地融为一体。沿冰碛而上，可能到达冰川顶部。但根据昨天的经验，它表面大面的岩石和碎石很可能严重阻碍我们登山。因而，我决定沿冰川西侧面而行，这一侧面的冰墙和陡峭的岩石坡之间有一条大河沟，河水在山鼻附近流出。但骑着牦牛过这条河沟却不那么容易，哪怕出发得再早。况且，

晚上返回时积雪融化，道路难以行走，最终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在辛苦劳累了一天之后，竟回不到营地休息。然而，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只有坦然地面对。

沿山坡向西，遇到大片凌乱的碎石，但头1英里左右牦牛还能行走。但过了不久，我们被转道岩石上走，巨大的岩石像堵高墙，条件一如昨天的那么恶劣。辛辛苦苦走了1个小时，才走了刚刚1英里，这时又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陡峭的山冈，可能阻挡我们前进，至少一同来的塔格里克人不会越过那座山冈，在山冈的山脚和冰川之间有条河流，河水汹涌澎湃，冲击着盘旋卷曲的岩石。

幸运的是，这条河在下面的一个三角形状的小盆地中分成几条支流。这个小盆地由小山谷上冲刷下的碎石形成，山谷的顶端是冰川。于是，我们就从那里过河，到了对面冰川的侧面冰墙之下。在侧面的冰碛之上，耸立着许多巨大的冰块，高度由120~200英尺不等，河水就紧贴着冰碛流淌。这里挡路的巨砾相对较少，但有很多深洞。我们就在这些深洞间摸索着前进，多亏没有再下雪。否则，积雪掩盖了罅隙，那可就十分危险了。

在库克牙时，奈克·拉姆·辛格根据我给他的设计样式，制作了一把冰斧，碰见陡峭的小川，就用这把斧头铲出条过道，我们就这样前进了1.5英里。在远处，我们就能看见冰川之上巨大的结冰瀑布，上文提到的山冈伸出到冰瀑的底部。这些冰瀑之下很可能是个岩架，我心中对此感到焦虑不安。走得更近，我发现根本无法通过这些黑暗的巨大冰团。冰块混乱地排列在一起，阻挡住去西边的岩石山冈。我们小心翼翼地爬着，这时稍高处的地方又出现了侧面的冰碛。于是，我们沿冰碛而行，既无多大困难，又不冒多大风险。到了冰碛顶部，虽然路很窄，但走起来不难。这样，我们上行了近2英里，除了觉得呼吸困难，并无其他阻碍。经过4个小时不停地攀登，我估计现在所处的海拔超过了16 000英尺。天色已晚，我们该找个地方休息了。



|⑲奥特鲁胡勒冰川|

先前看到的绵延雪峰耸立在冰川东部和东北，轮廓很清晰，因此我们利用平面测量仪很容易测出现在的位置。我们所处的角度很好，周围风光如画。遗憾的是，冰川在前方约 0.75 英里处拐了个大弯儿，阻挡住了冰川后的那座做过三角测量的高峰和它旁边的冰原。那座高峰一直是我们的引路标志，冰川肯定就发源在冰原地区。山峰的东坡和东南坡及高悬的冰川都极其陡峭，险峻的景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地方像阿尔卑斯山那样壮观，以前很可能没人来过这里。由于在这里时间很短，我没能好好观察就在观测点南方高达两三千英尺的山冈开始工作，山冈顶部平坦，为冰雪覆盖。以前，我在那里绘制地图时，曾试图寻找主体山脉的高峰。山冈很低，各处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昆仑山脉分水岭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两年后，我横穿西藏境内的昆仑山区进行考察，这座山冈充分说明在尼萨山谷源头

和昆仑山脉之间存在着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高山谷，那座做过三角测量的山峰东坡（坡顶为冰覆盖）的流水正流到山谷里。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这座山冈的重大意义。

我们若是进一步向上攀登，也许就会发现这一点，况且再爬1英里也可能并不难，但天色太晚了。从山谷北面吹来一阵不祥的尘烟，说明从沙漠吹来的尘土可能使白天的时间缩短。所以，平面测量和拍摄工作一完成，我就下令往回赶，时间是下午4点。4个尼萨人一听返回，很是高兴，他们刚刚还躺在碎石里，抱怨说头痛及其他高山反应症状。这再一次表明，仅仅是生活在高山谷里远不足以使山民适应高海拔，我在叶城里就注意到这一点。尼萨牧民住在冰川脚下的牧场，从来没有爬过更高的地方。这次是因他们害怕贵客——乌鲁克梅合曼，他们才走了这么远。他们不明白，在这样一个无人来过的地方进行短暂的探险究竟会给我带来什么快乐。

|⑥⓪奥特鲁胡勒冰川|



登山时作了标记，我们照原路返回，回到营地，一路平安。下午，天空中布满云彩，加之吹来的烟尘，山坡高处的冰不再融化了。因此，河水虽涨了，但牦牛仍然可以过去。喝足了茶，尼萨人提起了精神，我远远就听见他们在营地篝火旁，给其他当地人吹嘘他今天的探险。

第二天上午，沙尘依然很大。在可攀登范围的任何高度，我们都不可能看到重要的地形细节特征。我揣测这样的空气条件可能会持续几天，于是就决定将营地东移至喀让古塔格和喀什河流域。返回尼萨途中，我没能见到壮丽的雪峰和冰河。对山谷和周围山脉的考察业已完成，而且黄色的雾霭使天气变得凉爽，我心中乐滋滋的。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安全穿过了尼萨以上的几条河流，虽然发了水，但并没有遇到大的麻烦。1 个小时以后，我的帐篷就搭好了，就搭在村子最下面一间小屋下面狭窄的草地上。一场小雨下个不停，帐篷几乎难以遮挡，这里好几周已经没下雨了。雨持续了约 4 个小时，听着雨滴敲打着门帘，心中异常高兴。我希望这场雨能冲刷净空气中悬浮的尘土，这样我才能望见山谷中远处的景色。

8 月 22 日，我们向喀让古塔格前进，我于 1900 年 9 月曾经到过此地。但由于季节的差异，景色前后显著不同。在尼萨之下的山谷高在 3000~4000 英尺，两侧赤裸裸的岩壁极其陡峭。上次经过这里时正值深秋，时已黄昏；现在，我发现沿狭窄的河床上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我上次沿河边而行，而现在的河水很深，约摸 5 英里的路程，骑起马来非常难走。所幸，经过伯里孜（Boriz）侧面山谷有条道路，牦牛可以通过。否则，行李不可能运过去，马也不能走过去。

我们越过波木塔格达坂（Pom-tagh Dawan）海拔约 11 500 英尺的黄土坡，进入喀什河河谷。喀什河是东面玉龙喀什河的又一条支流，遍地长满了稗草。显然，昨夜的雨使干旱的植物恢复了生机，空气中的尘土不见了。然而，由于天空仍然布满云朵，所以欣赏不到东面壮丽的雪峰和冰川，不过，我在 1900 年曾经过了把

眼福。

那天晚上，下山进入喀什山谷。河流发了洪水，阻挡了通向喀让古塔格的去路，我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越过这条河。从波木塔格达坂的峡谷走下来后，我们在一个叫乌什拉什（Ushlash）的小冲积扇上搭下帐篷。汹涌的河水从旁边流过，就连健壮的牦牛游过去都有困难。晚上，从喀让古塔格来的老人找到了我们，他们是过了一座步行桥之后才到达这一侧的。所谓的“桥”就在我们的营地之下，走上去摇摇晃晃，非常危险，以至于本来要迎接我的伯克没敢冒这个险。山民众口一词，说行李根本无法通过那座步行桥。显然，这次得用我从印度带来的山羊皮充气筏子了。多亏舍伍德少校（Major H.M. Sherwood）预见到这种情况，给我备了3/8英寸的钢丝。否则，我就不能使用这条筏子，因为没有这些钢丝，筏子或小船若在这样的急流中摆渡，必然会触到无数的礁石而粉身碎骨。

第二天一大早，奈克·拉姆·辛格查看了河床，说只有在下面的断裂处，钢丝才能被固定到河对岸，然后靠木苏克（Mussuck）筏子钢丝来回摆渡。在那里，河水两岸是陡峭的岩壁，再下行2英里就到了喀让古塔格村了。走出狭隘的河峡，平静的河水注入深池中，河水旋转个不停。我们就在这里发现了那个所谓的“桥”，给人以摇摇欲坠之感。步行桥两岸的岩面距离约有25码，3个用斧头砍下的粗糙的白杨树干横在中间。由于弯曲和其他原因，3个简单地并在一起的横木分离开来。仅有其中一根横木可容得下一只脚，可就连这条横木也向下严重弯曲，出现严重的裂缝。如果手不扶其他横木，过桥将十分危险。

看到这种状况，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些灵敏的塔格里克人不敢从步行桥上运货过去。筏子通过一个移动的滑轮挂在钢丝上，但在岩壁上找个固定钢丝绳的地方并不容易。所幸的是，我们用不着爆破，就发现了一处可以停船的地方。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了可做船锚的木头，到下午2点，奈克·拉姆·辛格牢牢地把钢丝绳固定了下



⑥1穿越玉龙喀什河（喀让古塔格以上段）的“桥”

来，准备好用滑轮引导筏子过河。两张防水布夹层之间铺好了草，捆在轻轻的竹子架子上做甲板。竹子做成的架子面积有8平方英尺，12只山羊皮缝制的气筏就捆在上面，筏子顶部高出湍急的水面仅1英尺左右。通过威逼利诱，勇敢的吉德拉尔人穆萨好容易才说服一位塔格里克人小伙子答应和他一起做试验性摆渡。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强大的水流打得筏子摇摇晃晃，拴在船头和钢丝之间的绳子比较短，造成船头高、船尾低，坐上去很不舒服。他们俩任凭风吹浪打，筏子被安全拉到对岸。

返回时，奈克·拉姆·辛格加长了引导绳索，以使船更好地在水上航行，可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极大麻烦。船刚一离开避浪凸出的岩石，大浪就拍打着筏子。我在想，若是这样，水浸泡着行李，那将会很危险，因为穆萨水性再好，但毕竟只有他一个人能驾驭这样的筏子。就在这时，我听见这边的人猛拉绳子，像一声枪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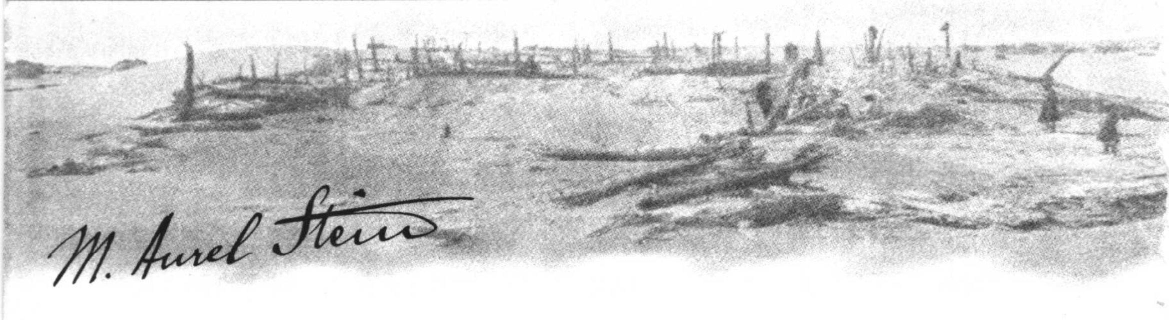
M. Aurel Stein

结果，扭曲的钢丝绳不堪水流冲击产生巨大的力量，就在停泊处断开了。

这边岸上的五六个人拽不住筏子，所幸钢丝没有伤着人。他们竭尽全力拉住钢丝绳，绳子都勒进了肉里，巨大的拉力几乎把他们拽进了垂直岩石河岸下约30英尺的河中，我们急忙跑去帮忙。事情的发生虽然只有几秒钟，却显得那么漫长，我担心穆萨发生不测。正在这时，系在筏子上的对岸上的绳子紧了起来。那边岸上的人意识到了这个危险事件，拼命拉住筏子。顺着流水的水势，经过几分钟的紧张战斗，筏子终于被安全拉上岸来。穆萨立即脱掉浸透的皮衣，跑到一块岩石上，一面晾着身子，一面嚼着燕麦饼，镇定自若，我这才松了口气。

根据经验，钢丝绳能承受的重量虽然很大，但也经受不住激流产生的巨大力量。尽管筏子设计得很牢固，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难以确保安全。手头还有一些钢丝，我们于是决定只用钢丝，把行李放在高悬的钢丝上运到对岸。原来固定钢丝的地方岩石极为陡峭，无法将行李安全取下，所以必须寻找个新的地方把钢丝固定下来，花了几个小时才完成了这项工作。先运了一块巨砾，做一下试验。这时天色已晚，我们只得在咆哮的河边再次扎下寨来。

晚上，狡猾的塔格里克人不停地问我，问在玉龙喀什河上游和南边的大山上是否有通往喀让古塔格的道路。对于所有问题，我一概说不知道，6年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对付喀让古塔格人的。他们假装不知道布林加噶，这肯定是有计划和预谋好的，因为就连米塔孜和尼萨人都提到过布林加噶。我们不知道那座山谷的大体位置，故也难以猜测出他们为什么假装不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通往西藏高原的山脉的道路之所以滴水不漏，是因为害怕这条很长时间无人走过的路线如果再次被发现，那么这些人迹罕至的山谷中的居民就会受到来往人马的影响，官方也会新增捐税和劳役。



第十七章

在喀让古塔格山区

8月24日上午，我们花费了3个小时，才用钢丝把行李逐渐运过了喀什河。这回我的狗也受了委屈，它被装进了袋子里，因为它自己无法走过这座“步行桥”，连塔格里克人都不敢抱着它过桥。然后，我们一个挨一个走上腐朽不堪的横木。靠近中间时，横木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而另外一根横木太低，扶上去不太牢靠。最后，我们总算都安全走过去了。

我们走了2英里，沿途经过的主要是梯田，到达喀让古塔格。喀让古塔格大约有40间小土屋，大多数牧民和部分有来头的和田流放罪犯冬天就住在这里。这里环境很恶劣，土屋跟我在1900年时见到的一样破败不堪。虽然季节不同，但山谷中陡峭的碎石坡和岩石坡一如过去那样凄凉。不过，这里毕竟有一片狭长的燕麦田，几株白杨树，增添了几分绿意和生机，这些流放犯美其名曰“小镇”。

村子里既没有给养，又没有运输工具。因此，我想继续再往下走几英里，去霍希拉什兰干（Khushlash-langar），喀什河在那里与从布萨特山谷（Busat Valley）流出的一条河交汇。1900年，经过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发现巴萨特山谷的源头是座大冰川，其形状像伸开的五指。我们在靠近冰川的地方发现了昆仑山主脉。山民

一口咬定没有道路可以穿越南面的大雪山。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使我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以判定山民的说法是否属实。6年前，我对约翰逊在1865年去和田的路线草图的地形特征产生疑惑。根据那张地图，约翰逊翻越一座非常高的山口，他称之为英迪旺（Yangidiwan），就是英达坂（Yangi Dawan，意即“新达坂——新山口”），越过了昆仑山主脉，到达水草丰美的玉龙喀什河，接着翻越了第二座山口，约翰逊称之为纳亚汗山口（Naia Khan Pass），到了另一个山谷，在这个山谷里发现了从喀让古塔格南面流过来的一条大河。

显然，我们考察中发现的这些山谷的实际构造与约翰逊所指的喀让古塔格的位置和其他地形特征不符，山民对喀让古塔格以南的山口的名字等一无所知，而有关约翰逊那次经历的出版物少之又少。但我有理由相信，约翰逊是从南边的喀拉喀什河上游越过昆仑山主脉的。我对寻找到约翰逊的实际路线非常感兴趣。

然而，约翰逊的地图和本地山脉的实际地形出入很大，我仅能靠猜测来找这条路线。首先，必须仔细地分析约翰逊草图的某些特征和我们考察所得结果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对所做推测作出解释。据分析，布萨特山谷最有可能通往约翰逊所说的纳亚汗山口。如果有可能翻越这个山口，到达山口东面最近山谷的源头。根据我们的考察，源头就是乔木夏吉勒尕（Chomsha Jilga），再从乔木夏吉勒尕西南端出发，就可能找到神秘的“新山口”。约翰逊称“新山口”海拔有19 500英尺，为昆仑山主脉中最高的山口之一。

出发去布萨特山谷源头之前，我遇到了不少麻烦。百户长和喀让古塔格的老人们并不否认那里有他们的一块牧场，通往那里的路也不难走。因为要随身携带些行李，所以让几个山民赶着几头牦牛一同前去。考虑到将要做进一步的考察，我让他们准备够用10天的口粮。这时，他们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一致高声反对。我召集了大约12个人，他们说连一天的口粮也找不到。这里的巴依们拥有很多牛，可他们



㊷流放在喀让古塔格库什拉什兰干的和田塔格里克人罪犯

说家里没有粮食，即使我出多高的价钱他们也不卖。最后，喀让古塔格的伯克答应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要帮我安排这些事情，让每个人带足口粮。这位伯克是在城里出生和长大的，性情温文尔雅。不难看出，他的权力不足以强制的手段完成这项收粮工作，想去挣点钱的山民一听要在高山上待上10天就吓傻了。我把伊斯拉木伯克和奈克·拉姆·辛格留下照看马匹和余下的行李。

第二天上午，牦牛驮上行李，它们不情愿的主人也行动了起来。果然，沿山谷向上走道路并不难走。我们沿着谷底陡峭的石道走了约摸5英里后，道路变得宽了，坡度平缓的高地一个接一个，上面的草虽长得不高，却很浓密。像在尼萨山谷的高处地带一样，我也发现了掩埋在黄土之下古老的冰碛。我们刚踏上第一块高地上长满草的斜坡时，压在山冈上的乌云便下起毛毛雨来。

M. Aurel Stein

现在看来，未来的天气与我们在山谷里的天气会很不一样。这些高地上的牧民居住的矮小的毛毡帐篷本来就脏，在雨中和阴沉的雾霭里看上去更加破旧。我们继续向这些阿尔卑斯山一般的草地最高处前行，这令赶牦牛的人感到沮丧。冰碛终端高耸的碎石壁在雾中若隐若现，我们在它附近扎下营来，此地海拔约 12 300 英尺。为了尽量减轻所带行李的重量，我没有带上我的小帐篷，而带来了奈克·拉姆·辛格正好 6 平方英尺的帐篷。我把我的小简易床放在了这顶帐篷里，所剩的空间连骡子皮箱子和最小的桌子都难以放得下。夜里，雨仍在下，帐篷还好，不漏雨。不大一会儿，我就习惯了这个十分狭小的空间。

第二天早上，云朵依旧很低。我知道山谷源头周围是崎岖的山冈，可现在都给云彩遮住，看不见了。巨大的冰碛地带从南方和山谷两侧一直向我们的营地延伸过来。其他东西都看不见，但我们单凭冰碛知道这里距大冰川不远了，6 年前从玉龙喀什山谷的主体部分曾看见过这些冰川。我原先决定，不论天气多么恶劣，我们都要出发寻找那条路线，但浓雾还是耽误了我们一会儿。在八点半，我、测量员拉姆·辛格和其他几个人出发了，沿着冰碛山坡向东南方向爬，我推测那里有一座较大的侧面山谷，上面为冰所覆盖。寻找的目的是看能否发现一条通往东面乔木夏山谷源头的可行路线。

刚离开覆盖着青草和苔藓的山坡时，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岩屑裂开了缝儿，堆砌得杂乱无章，昨夜的雨又使表面变得很滑。面对着陡峭的砾岩，牦牛行走变得异常困难，甚至连脚都站不稳。于是，我让牦牛停了下来，况且本来赶牦牛过来的意思就是试验一下，看它们能否走得过去。我们艰难行进了近 3 个小时，又下起雾来，这时我们几乎没发觉我们就在一条冰河布满石头的表面之上。

我们刚刚登上一座岩石堆积起来的横断山脉，无液气压计显示这里海拔约 13 600 英尺，这时我们来到了又一个山坡前，地表是坚硬溜滑冰面。由于大雾，只

能看几百码那么远，我推测这里就是冰川分支的冰原。我们带了冰斧，凿起来并不难，而且速度很快，没费太大的劲，我们就横向向上攀登了约500英尺。滚下来的石头和雪球挡在了路上，这表明这个山坡可能会发生雪崩。雾散了一点，我希望能看清周围环境的全貌。就在这时，我们头上轰隆一声巨响，松散了的积雪和冰块滚了下来，所幸没有一块从我们附近滑过，响声吓得搬运平面测量仪和相机的塔格里克人仓皇向下逃跑。在翻越冰碛的岩壁时，他们就说他们对这里一无所知，心里很害怕，现在加上这声巨响，再也无法动员他们继续前进了。所以，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跟他们向下走。在碎石覆盖的冰坡顶端不远，我们发现了盆地中的一小块平地，周围全是巨大的岩石。我希望在这里扎营，还没清扫完场地，塔格里克人就已经害怕得不行了，在这种地方过夜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离死不远了。

无奈，我们只得继续下山，不一会儿刮起一阵清新的微风，雾也散了。抬头看，东南方冰原覆盖的山坡间形成壮丽的冰斗，顶部是极其陡峭的光秃秃的岩壁，估计海拔在17 000英尺左右。虽是短暂一瞥，但这足以使我相信搬运行李的塔格里克人是无法翻越过去的。而当年，跟约翰逊一起登山的哈比布拉赫的人赶了很多牦牛，越过像这样冰雪覆盖的山坡更不可能。不久，冰川好几处出现了巨大的冰瀑，颜色暗淡，冰斗看不见了。这时候，毛毛雨又下了起来，我们急切地想找个地方避避雨。

下午，参加探险工作的马夫和民工在下面的喀拉奥依（Kara-oi）避雨，我意识到了白天的奔波已经使得他们心中很不高兴。听百户长说找些干的牦牛粪来（这是唯一的燃料），他们如丧考妣。于是，这帮人吵吵嚷嚷来找我，要求迅速返回。百户长和达罗哈与他们理论，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其中两个小伙子就要动手打百户长和达罗哈。不大一会儿，4个人就在地上打作一团，余下的塔格里克人摩拳擦掌，也想加入争斗。

我的队员闻声赶来，帮忙把打架的人拉开，把揍倒在地上的人扶了起来。我刚

认出挑头打架的人是谁，所有来找我的这帮人就走了，扬言要把牦牛一起带走。鉴于这可能造成没有运输工具，不久燃料也将用光，我于是先让百户长今天晚上离开，去劝说塔格里克人。别瞧这些塔格里克人脾气暴躁，可胆子很小。我警告他们，如果交出打百户长和达罗哈的那两个人，去和田衙门接受处罚，还则罢了；否则，其余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夜里，空气仍很潮湿。黎明时分，云彩稍微散了一阵儿，在旭日的照耀下，南面大冰川清晰可见。尽管景象也很壮观，但我仍没有身居雄山高岳之感，可能是因为离山峰太近，山峰显得并不太高。还没待我仔细观赏，天又下起雾来。早上8点钟，百户长带着一群山民，怒气冲冲地过来。在这个时间，只能看见冰碛终端的黑色岩壁，它横亘在两侧的山冈脚下，长约0.75英里。百户长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似乎在炫耀他的权力，已经忘记了昨天被揍的狼狈样。我要求惩罚那些出手打架的人仍然逍遥法外；可是我哪还有工夫计较这事，而是抓紧每一分时间，带上几个人勘测了大冰川。站在一座古老的冰碛岩壁之上，俯瞰脚下布满巨砾的平地，源于冰川的一条条小河如瀑布般从碎石石坡上流下，它们在那块平地第一次汇聚在一起。

冰川像一条巨大的黑色河流流向我们，河中布满了碎石和软泥，冰川终端的岩壁高度足足有200英尺。天空中乌云越来越多，看不见冰。周围洼地里是浅绿色的水，一条条小溪流个不停，这表明巨大的碎石层之下肯定是冰。尽管时间还早，但在越过冰川西侧的大河就遇到了点困难。那里的山谷覆盖着苔藓，对攀登较为有利。然而，我们刚绕过冰川走了大约半英里，从山下飘上来的雾霭越来越浓。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消散的迹象，我们于是不得不冒着淅沥不停的小雨返回去。显然，现在恰巧是从南面喜马拉雅山脉过来的后期季风雨到达了这里。

天气极其潮湿，只有小帐篷里几尺见方的干地，让人感到不舒服。从喀让古塔格来的伊斯拉木伯克到达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带来从喀什噶尔寄来的信，

那两个出手打人的家伙已经被抓了起来，胳膊被捆了起来，这与其说是防止他们逃跑，还不如说是表明犯了错误。我在小帐篷里忙活几个小时回复信件，我的思绪又飞到了远在西方的朋友身边，憧憬着即将在冬天进行的沙漠之旅。

雨到了深夜才停。第二天上午，山谷源头的山峰以及冰雪覆盖的山坡上依然是层层乌云。不过，前几天的探险活动足以证明，这个山谷不会是当年约翰逊和其牦牛所走的通向南方或东南方向的出路。我望见在冰川东南方向的山坡之上有不止一处山坳，只有训练有素的登山运动员才可能翻越过去。别说牦牛，就是携带行李的人也难以逾越。

我们在山里的时间比原计划长，这给生活本已清苦的喀让古塔格居民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在 8 月 28 日攀登过西边的一个小冰川之后，我便决定下山。真是"好雨知时节"，天偏偏这个时候又下起雨来，但我还是在下面的一处高地拍了一张塔格里克人的照片。他们背后是皮制的帐篷，烟雾把他们弄得污垢满面，他们的夏天就在这里度过。在几个喀让古塔格妇女中间，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位矮小的老妇人，她就是我 6 年前经过奥木夏（Omsha）曾经救济过的那个老妇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那点施舍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让老人难以忘怀。老人年岁已高，佝偻着背，可她竟全然不顾夏季路线的各种困难，想来此地寻觅一处好地方。夏季的河水暴涨，直接从奥木夏到布萨特山谷路线全部不通了，只有通过霍希拉什兰干下面的一座桥，才能横穿过玉龙喀什河。这位老妇人不得不沿着石路而行，据说就连不驮东西的牦牛也难以走过这条路。

下山过程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我从中明白了塔格里克人确实不再愿意在这些山谷里待下去了。东南面的踏实瓦尔（Tashwar）山谷在霍希拉什兰干以上约 4 英里的地方和我们的路线相遇，我本打算在这里停留下来，以便第二天考察一下踏实瓦尔这座小山谷。以前的考察说明它不可能通向主体山脉，但从侧面进入东边紧挨

M. Aurel Stein



⑥③布萨特山谷碎石覆盖的冰川岩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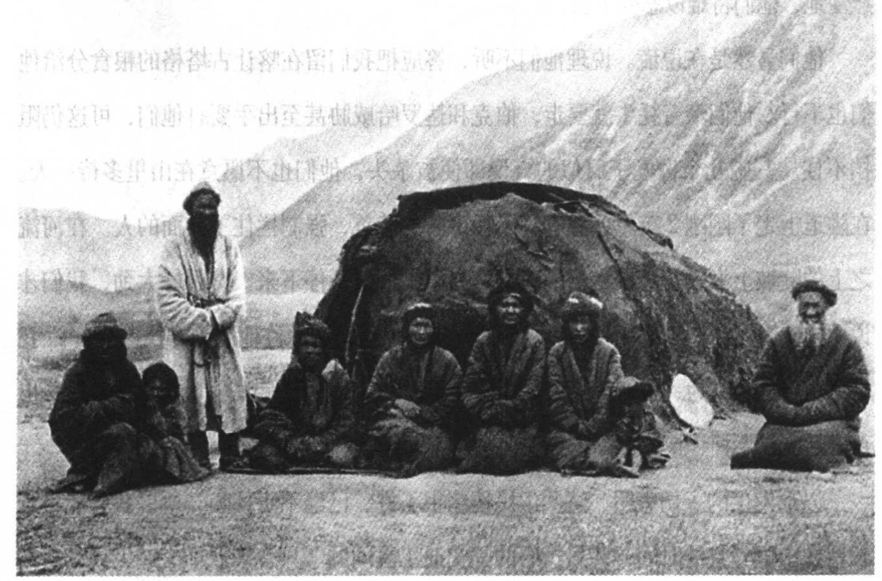
着它的大山谷，那大山谷可能就是约翰逊从分界山脉而下所走的那条路线。在踏实瓦尔山谷入口，我向赶牦牛的马夫把上述事情解释清楚，但等到驮行李的牲畜队到达，他们的头领强烈反对在这里停留。他们说已经饿了两天，如果再不回到快熟的燕麦地，他们将难以忍受下去。

他们显然是在说谎。说理他们不听，答应把我们留在喀让古塔格的粮食分给他们也不行。他们牵着牦牛就要走，伯克和达罗哈威胁甚至出手要打他们，可这仍阻挡不住。其中几个像发了疯似的，说即使被杀头，他们也不愿意在山里多待一天。在隘道上走了刚刚2英里，我赶到了牦牛队的队首，强制拦住了前面的人。在河流之上的陡坡上发现了可以宿营的地方，我急忙让队伍停下来。费了好大劲，我们才说服这些人，让他们把牦牛驮的行李卸下来。然后，我允许他们去寻找食物——我的队员将之戏称为“塔格里克人的草料”，因为他们看见这些塔格里克人从地里拔出燕麦后，既不搓一搓，也不煮一煮，塞到嘴里就嚼。

以上发生的一切表明，这些山民情绪很不好，已经不听使唤，所以我不能再延长留在山里考察的时间，我最担心的是交通工具问题。只有确保了交通工具，我们

才能去皮夏（Pisha，距离喀让古塔格北部最近的山谷），我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收集些当地的资料。与其说喀让古塔格人给我提供了什么信息，毋宁说他们故意隐瞒我们呢。上午，代表我去见巴依们的伊斯拉木伯克回来了。他把肇事者带到那里，让他们接受按办严厉的惩罚，此外他还负责把开小差的人找了回来。现在，这些山民的情绪稍微好了一点，不再那么暴躁了。牦牛四处乱跑，可他们故意不管不问。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才把牦牛从远处的山腰上赶回来。最后，我和其中的几个人出发去塔什瓦尔。昨夜下了大雨，若缺少了牦牛，我们就无法渡过涨水的布萨特河。足足等了几个小时，两头牦牛才姗姗而来。怎奈天色已晚，没时间对小山谷考察一番了。我相信他们是有意耽搁时间，以不让我们找到那条路线。威逼也好，利诱也

64 布萨特山谷里从喀让古塔格来的塔格里克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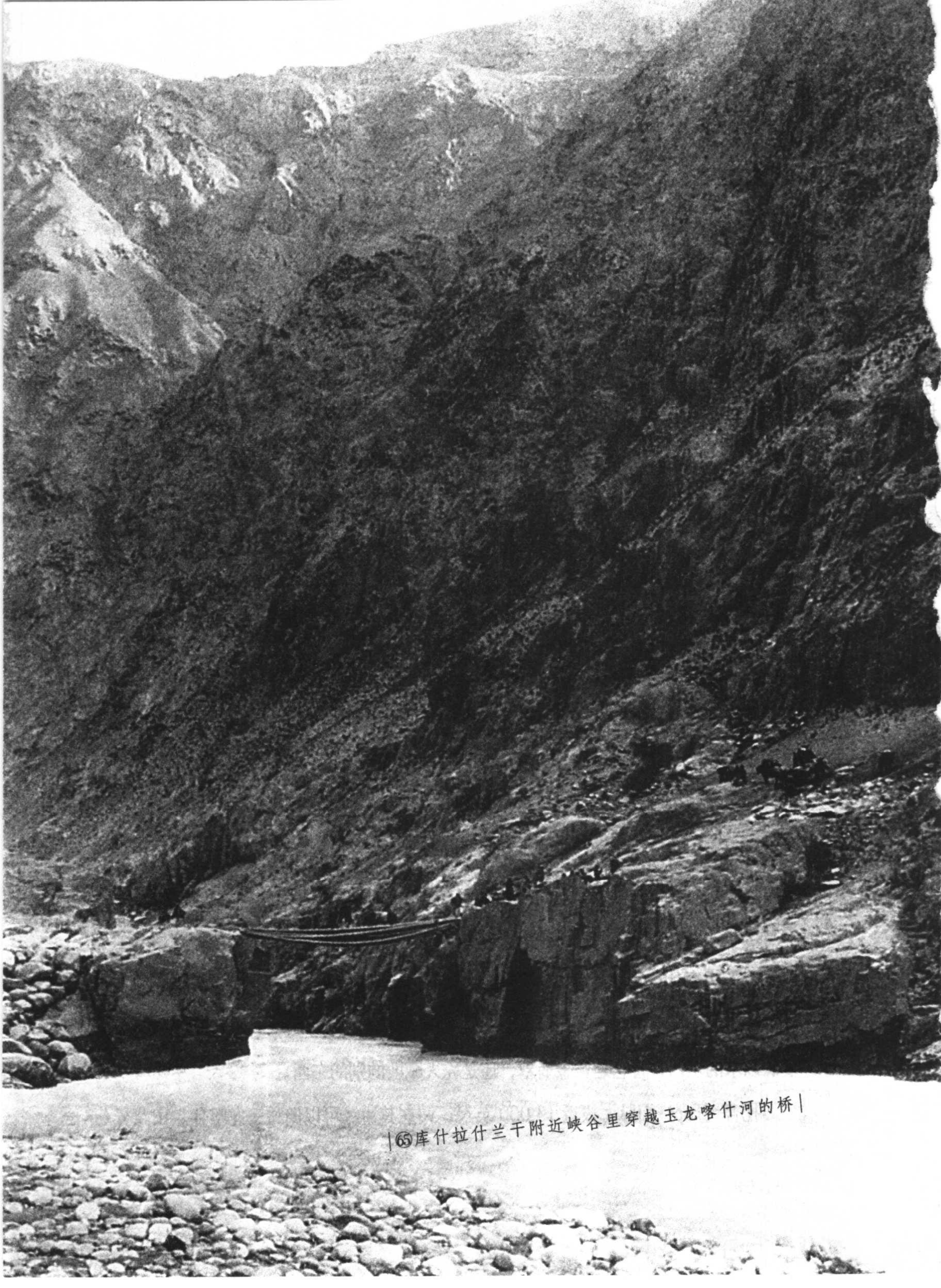
罢，塔格里克人就是不说出半点信息，装作像牦牛那样呆头呆脑，反复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皮萨（Pisha）前进，沿途所见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推测。晴空万里，沿玉龙喀什山谷上行，向它南面的山冈行进，这里的风光十分秀美。我第一次沿这条路线走的时候是在秋天，黄昏时分到达北面陡坡的尽头，从那里可以俯瞰到玉龙喀什河的河谷。那时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摸黑下山，走完海拔5000英尺的路程。现如今，经历了一周多的阴雨连绵的天气之后，太阳终于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在阳光的照耀下，道路旁风化的岩壁呈现灰褐色，心中感到暖洋洋的。几天前，我哪敢奢望这样的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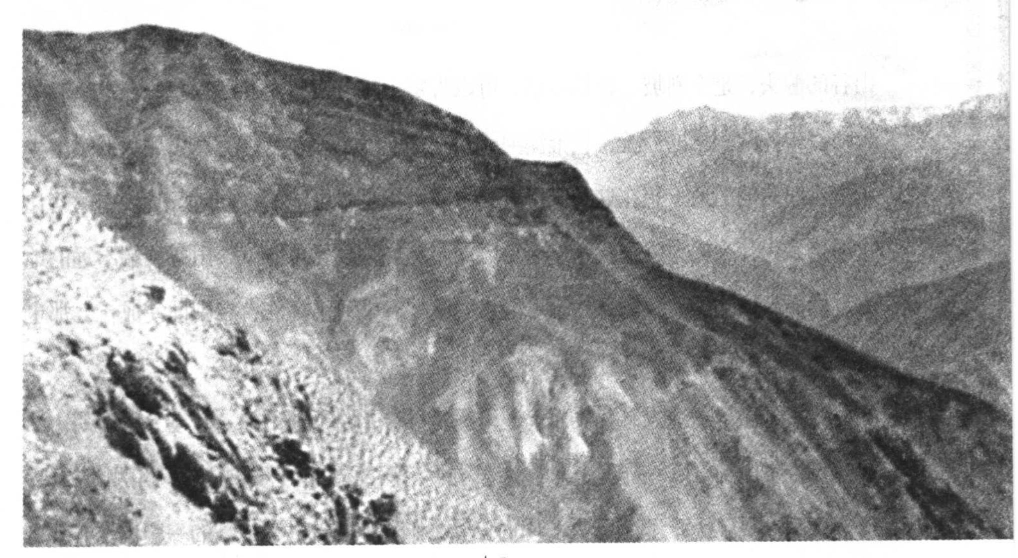
早晨，我们从桥上穿过玉龙喀什河，此时的山谷显得幽暗。那座桥位于霍希拉什兰干以下几英里处，离玉龙喀什河和喀什河交汇处不远。桥用树干简单搭成，宽仅45英尺。此处河道狭窄，两边是坚固的悬崖，玉龙喀什河携带的大量冰川水汹涌澎湃，流速将近4码/秒，因此我们无法测出水深。我想到了蒙古（Moghul）历史学家米尔扎·海达尔（Mirza Haidar）在他的著作《拉施德史》（Tarikh-i-Rashidi）里生动描绘的一段故事：独裁者阿巴伯克（Aba Bakr，也是米尔扎·海达尔的叔父）从和田逃亡到拉达克时，携带了大量黄金珠宝。出了喀让古塔格以后，道路变得极其艰难。为了活命，在过这座桥时，他不得不扔下所有的黄金珠宝。

从那以后，很多人来这里寻找这笔不义之财，但结果都是空手而归。河水很深，流势很急，不失为一个扔弃宝物的好地方，任何寻宝人也别想找见这些宝物。这个故事也许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可本地人却津津乐道，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否则，人们的想象力又有何用处呢？要知道，在像和田这样的地方，宝物一直是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东西，管它是黄金翡翠，还是先人藏匿的别的东西。

托普（Top）山脉海拔近13 000英尺，站在其边缘可以俯瞰玉龙喀什。山路异



⑥⁵库什拉什兰干附近峡谷里穿越玉龙喀什河的桥



⑥⑥自喀拉吉尔山嘴眺望玉龙喀什峡谷

常险峻，攀登起来非常艰辛，所幸前几天下了雨，要不然山坡表面的松动的黄土会使攀登更加困难。喀拉吉尔（Kara-kir）山冈高约 10 500 英尺，我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玉龙喀什峡谷，它绕过皮亚克 K.5(Peak) 高峻的崖壁，延伸到悬崖下深渊中的河流不见了，离那里不远就是这条河与尼萨河交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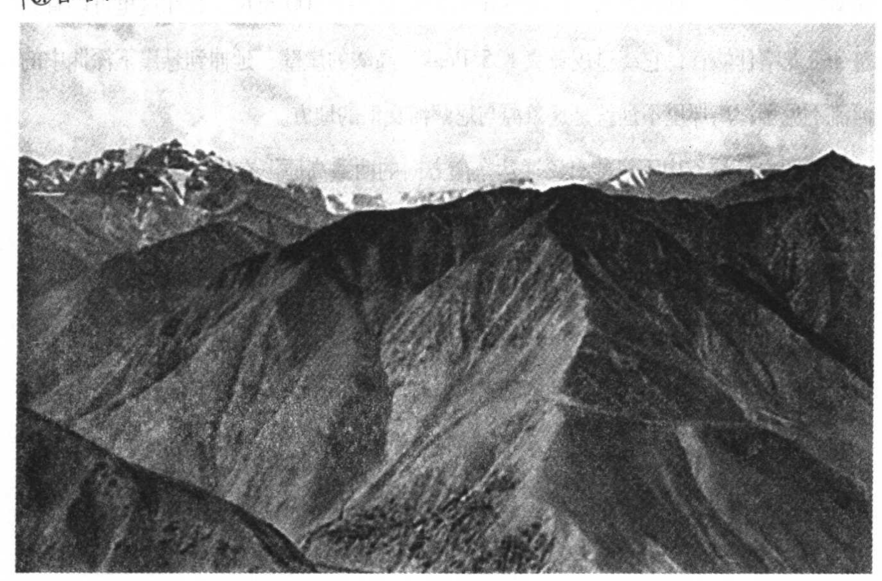
我明白，峡谷中不可能有路通达东南方向的西藏高原。在横穿玉龙喀什时，我认真地观察了陡峭的山坡，这些山坡向下延伸至布萨特山谷和乔木夏山谷之间的河流。数测量员拉姆·辛格的眼睛最尖，他发现山坡之上有条清晰的隘道，这条路从霍希拉什兰干上的伯依纳克（Boinak）桥一直延伸到乔木夏山谷的出口处。我用双筒望远镜进行了观察，发现路上可以走牦牛。这就是塔格里克人那条三缄其口的通往乔木夏山谷的道路吗？这条隘道本身就证明，的的确确有牧民去过乔木夏山谷。

我们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确定它是否通往乔木夏山谷，然后再弄清山谷中是否通达分界山脉的道路。这条隘道和山谷的连接处覆盖着冰块，那里好像是

山谷的源头，是个斜坡，根据观察，可以肯定山谷非常狭窄。另据我们在尼萨和喀什峡谷中探险积累的经验，我推测河流现在仍在涨水。在夏季，冰川融化的水溢满了弯弯曲曲的河道，想在这时候穿过乔木夏山谷是不可能的。同时，我明白了喀让古塔格人为什么竭力阻止我走这条隘道。布林加噶牧场可能就离山谷顶端不远的地方。然而，亲临这些牧场显然不可能，一则峡谷中河水高涨，二则即使成行，那也会遭致塔格里克人顽固反对。

为了不激怒这些人，我表面上还得假装对这条路不理不睬。好在天气晴朗，站在喀拉吉尔山脊可以一览喀让古塔格地区的全貌，心中稍觉安慰。据三角测量，K.5海拔高 23 890英尺，直上云天。南面分界山脉的冰峰耸立，最高的一座也是非常之高，刺破青天。1900 年，我用经纬仪照相机（photo-theodolite）拍下这些景色，但现在所处的地方观察的角度更佳。那一片高地最高处海拔约 13 000 英尺，四周

|67自喀拉吉尔山嘴眺望玉龙喀什河峡谷|



M. Aurel Stein

环绕着从皮萨山谷延伸下来宽阔的斜坡，这和过去弯曲的峡谷和高大的岩壁、冰壁形成鲜明的对比。离南面分界山脉越来越远，视线变得愈加模糊。我们在鞍状山脊里扎下营地，这里仍能望见分界山脉。我暗暗发誓，不论遇到什么阻碍，管它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我都要从东面或南面进入玉龙喀什河的源头。

大山好像不愿意让我走，山上乌云压城，大雨倾盆。下山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路并不难走。我已经决定在皮萨山谷停留几天，一来如果可能的话，收集当地的资料，因为喀让古塔格人一直守口如瓶，二来趁我还清晰记得有关这里山脉形态的每个细节，利用这几天给已拍摄的本地区的图片加上注解。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我到达皮萨山谷的第二天上午，有一个长相奇怪的人来找我，声称他发现有人知道去布林加噶的路线。可他的外貌和举止让人难以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说，他是巴达哈商人的后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四处流浪。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印度斯坦语，可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在哪里如何学得这么好的印度斯坦语的，也没有说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从我的邮差口中得知我正在寻找布林加噶，他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便来找我。他在东面的喀拉塔什山谷已经找到一个淘金工，那个人曾经到过布林加噶。作为回报，他只要求我能为他如何安全返回老家提点建议。

我无从知道他的话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不过一两个小时以后，确实来了一个喀拉塔什矿工。与巴达哈商人相比，矿工看上去更可靠。他给我讲了他去过布林加噶出口处的有关情况，与实际的地形非常一致。和矿工一起来的还有另外 8 个人，他们也都是淘金工。大约 10 年前，他们去了一个叫做库马特（Kumat）的地方碰碰运气。库马特位于一条河的河岸上，注入布萨特山谷以东的玉龙喀什河。他们当时的路线是从南面绕过俯瞰大山谷的山冈，显然就是我们在喀拉吉尔发现的那条隘道。然后，他们到了一座小山谷的出口处，他们听人讲那就是布林加噶。然而，他们并

没进入布林加噶，因为他们被告知只有在深秋或冬天才可能进去。不久，他们发现当地沙子的含金量并不高，于是便返回霍希拉什兰干。矿工的话简单明了，正确地指出了布林加噶就坐落在乔木夏山谷，而一直以来布林加噶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从霍希拉什兰干到那里只需一天的时间，名叫"多德"（Daud）的淘金工很乐意充当我们的向导。我想了想，觉得让他再当着喀让古塔格人的面给我们讲一遍才是上策。

然而，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喀让古塔格人仍顽固地坚持说他们对布林加噶一无所知，牦牛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他们宁愿把牦牛淹死，也不愿再登山了！我告诉百户长，要么他去劝服喀让古塔格人，要么回和田后，他会因不遵守按办旨意而受到惩罚。看到这么多人吵闹，原来准备充当向导的巴达哈商人变得心神不安。大约1个小时后，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不想干了，我理解他的苦衷。他匆匆忙忙地走了，本来可挣一笔钱，这下全泡汤了，自然觉得可惜。但他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从此再没有看见过他及其同来的淘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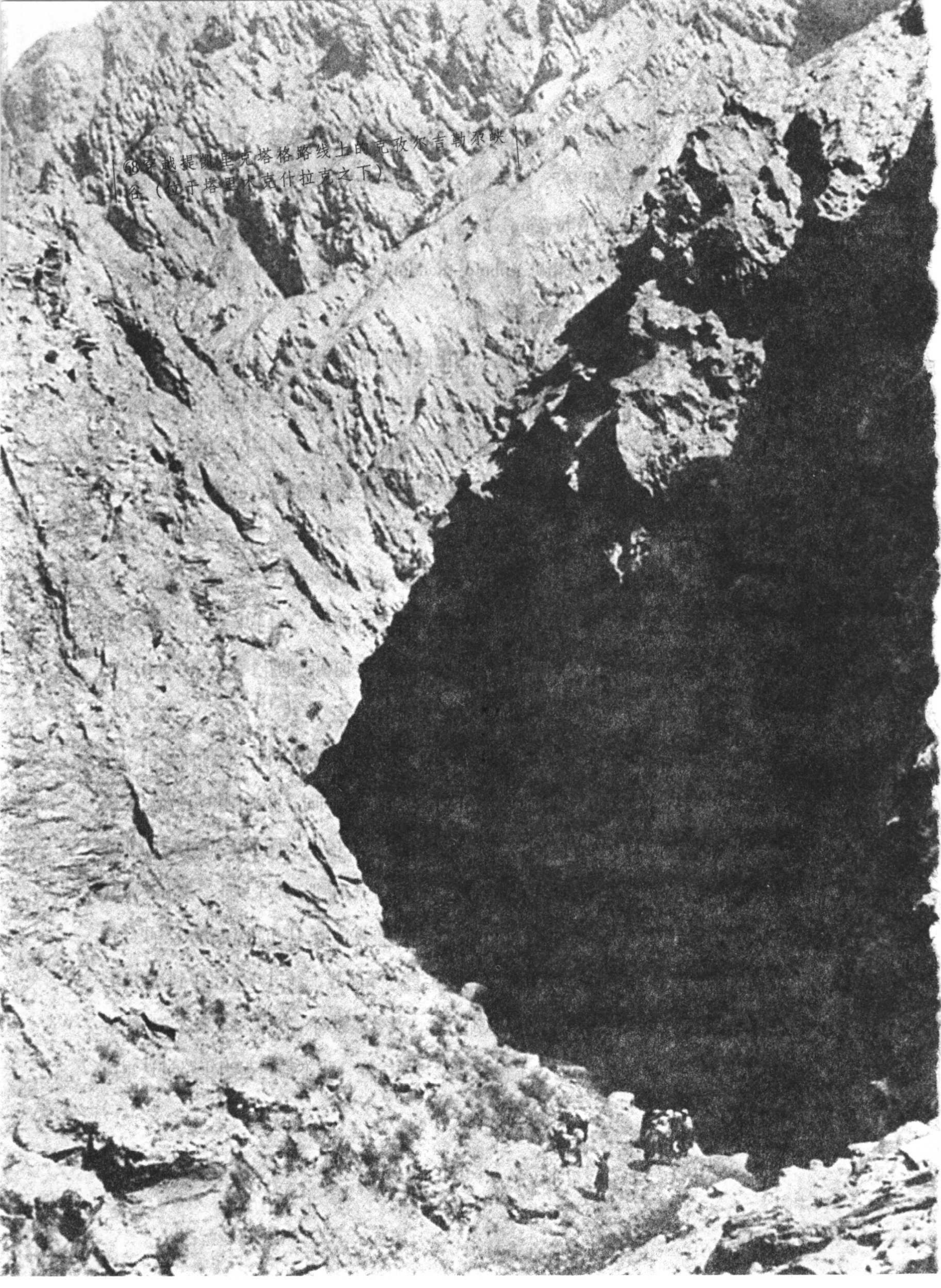
百户长没有迅速解决这个事件。他没能说服这些人前去乔木夏山谷的出口。让他再另找一些牦牛来，他一口咬定说根本再找不到一头牦牛了。因此，我只好派人把他监视起来，扭送到按办衙门。塔格里克人像疯了一般，他们先前几乎要动手打这位所谓的头领，现在却沆瀣一气，愿意和百户长一起被遣回和田，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不过，这并没惹出太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毁坏皮萨人的庄稼，皮萨长老出来干预，不久就把这帮人从我的帐篷附近赶走了。

虽然我知道了通往布林加噶的路线，但仍需当地人的帮助，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没能成行。我在皮萨住了4天，整天埋头工作。扎营的这片草地位于皮萨河边，山谷视野开阔，海拔约有9000英尺，不失为理想的工作场所。赤裸裸的山坡呈淡红色，看来此地离沙漠不远了，谷底仍是绵延不断的可耕地。山谷的东南端，冰雪覆

盖的K.5高耸入云，距离我所在的地方的直线距离只有20英里。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都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但我仍能望见壮观的最高峰，海拔近24 000英尺，看上去像顶佛里吉亚人（Phrygian）的帽子。我这次故地重游，在这片如阿尔卑斯那样美丽的帕米尔经纬仪照相机（photo-theodolite）拍摄了不少图片。皮萨为我给这些图片加注文字说明提供了绝佳场所。

山谷里的每块平地都种上了燕麦，山民们精耕细作。晚上，我沿着燕麦田散步，走出不多远。我还拜访了燕麦田边的人家，房屋比较简陋，各家相距很远。期间，我遇到了几户家境较殷实的人家，他们主要得益于饲养绵羊和牦牛。近期，其中两人不惜花大钱，去了麦加朝圣。这两位去麦加朝圣的信徒途经撒马而罕、巴库，由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进入红海，后经孟买、克什米尔、拉达克返回。他们在印度境内玩得很愉快，坐了火车。中国新疆去麦加朝圣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尤以和田为最。我心里在想，这些教徒不惜钱财去麦加朝圣，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开放了思想？享受一下西方人舒适的生活？据说，去麦加朝圣的花销在200~300卢比之间，数目不菲，可是，就连最穷困的清教徒也乐意花这笔钱。

两天以后，我派一名队员和达罗哈一起，把不服从命令的百户长押回和田，并让那位队员把我们在这里的遭遇禀报给按办大人。与此同时，我派测量员拉姆·辛格沿另一条通往和田的路线，即绕道东面人称提凯里克塔格（Tikelik-tagh）的外围山脉的山坡，因为我们以前绘制的地图这里标得不太详细。9月5日，我沿一条穿过提凯里克塔格西侧面山冈的径直路线，越过乌鲁克达坂（Ulugh Dawan），我此行的目的和测量员一样。我1900年时曾经走过这条路线，经过4次行军到达和田，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给大家描述了。从那以后，至今还没有一位欧洲人来过这些干燥的山丘和峡谷。几处散落的兰干仍与当年一模一样，我不禁想起当年路过这里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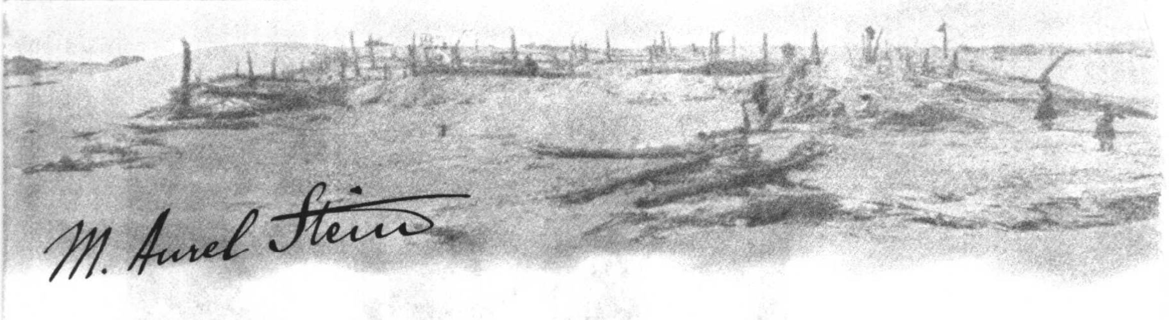


⑱穿越提凯里克塔格路线上的克孜尔吉勒泵峡谷（位于塔里木克什拉克之下）



⑥9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寺庙摆放祭品的大门

这里周围环境条件恶劣，水源极端贫乏，可是我发现一小块一小块的可耕地比当年显著增多。玉龙喀什河在比孜勒（Bizil）流出山区，形成和田绿洲巨大的冲击扇。9月8日到达这里时，当地人举行了隆重的达斯提汗，队员们终于能吃到好久都没尝到的水果了。玉龙喀什河的出口处仍然很深，所以我只好沿玉龙河右岸继续前进，穿过玉龙喀什肥沃的伯克希皮（Beg-ship），途经恰米亚（Chamia）、阿勒提拉（Altila）和一个接一个欣欣向荣的村庄，我们来到了渡口。快到和田了，我要寻觅一块安静之地，开始新的工作！



第十八章

和田盛宴

在和田，我把帐篷扎在了老阿訇伯克（old Akhun Beg）的城郊花园里，一个记忆中早在1900年秋天就曾带给我安静与庇护的地方。现在，我们再次受到热情的款待，可令人遗憾的是，主人的缺席又多少抹去了这种欢乐的感觉。在我8月访问期间，我的这位在和田最好的朋友对我谈起他要去麦加朝圣的打算。考虑到他日益严重的哮喘和肥胖，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能适应这么艰苦的旅程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劝他放弃这个疯狂的想法。这位高贵的老伯克盛情邀请，说真的，我宁愿拒绝他的圣洁的情义；因为知道他仍然天真地依恋着命运赠给他的这世间许多美好的东西，我已经很满意了，还有，就是他那份侍奉一位异教徒“黑大爷”（当地人对汉族人的贬称——译者）的工作同侍奉他的第一位主人——虔诚的神论者，贵族阿古伯的工作一样，相当不错。

阿訇伯克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还是坚决地踏上了行程。听到这个消息，我伤心极了。比我抵达这里只早两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其他6人一起从他的马哈拉或城郊出发了，他已经听说我早前要返回这里，很显然，同我一样为错失这生命中再见一面的机会而深深惋惜。可是他们已经用占星术求了一个出发的黄道吉日，而

和他同去朝圣的伙伴又不允许改动这个日期。阿訇伯克唯一的一个，也是比他大得多的哥哥含着泪向我传达了他临走前留下的欢迎之情。这位年长的老兄也同我一样担心我的老朋友——他的弟弟从成为哈吉（Haj）的朝觐之路返回的希望不大。

对于妻子和家人的反对，阿訇伯克总是坚定地回应说如果死亡真的降临，他可能就在通往那与自己的家一样美好的圣地的路上迎接它。依照他的观点，作为一位伯克，这么多年来侍奉那些现世的主人，也该到了终结自己的生命也去侍奉好真主的时候了。回忆着他和善的举止和不尽的仁慈，我感到自己很难相信他的良知能为任何需要这样的牺牲才能赎清的罪行所累，并且我的老朋友抛弃了所有的物质享受和财产使我看到了这种人格的伟大。

在他屋中通风的阿依旺（房屋的大厅）里，坐在他至爱的地毯上，四周围着从果园中采来的各式各样的水果，阿訇伯克曾不止一次地用他富庶的财产款待我：托撒拉（Tosalla）肥沃的庄园，伯拉赞（Borazan）的葡萄园，以及在阿萨（Hasha）山区放牧的数以千计的牛羊。同家中的这种令人荣耀的财富和舒适相比，去麦加的旅程对他真可谓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苦难，在这种苦难面前，无论是哪位怀有与他相似目的的现代欧洲旅行者，都不愿去面对。为了认清这样一个任务对老伯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回顾了中世纪时代和当时的巴勒斯坦朝圣者。在热切的希冀中，能捎去我对他的幸福和健康的衷心祝愿的机遇来了：一些晚去的朝圣者就要从和田出发追赶大队的时候，我让他们帮我捎去一封书信建议他在最后返程中在喀什噶尔和经过印度的时候多加留意。无论效果怎样，当我得知这封“亥特”（Khat）缓解了他的家人的忧伤的时候，感到由衷的满足。

即将开展的考古活动的准备工作纷繁复杂，自从我到了这，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这使我无暇联系我的中国朋友。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早晨，就去访问了车大人的衙门，那是一个既庄重又喜庆的庆典。为人和善的按办大人如同见到了老朋友，

用最盛大的礼仪和仪式迎接我。仪式活动准备得充分极了，通过内门时，我发现从穿着崭新的红衣的向上依次站立的刽子手就可看出所有的事情都按照等级的高低来组织。亲爱的潘老大人执掌和田衙门的时候还不曾有这样的排场。

然而，我得告诉他我在昆仑山中的详细经历，当然也不能隐瞒喀让古塔格人(Karanghu-tagh）为阻碍我们所设的种种诡计，就这点来说按办大人可谓是热情至极。车大人明了地抓住了那些乡巴佬的特点：虽胆怯却固执强悍，要处置他们还是十分棘手的。他自己则变得和一位敏锐的行政官员一样意识到在那里高压统治也许不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如果这种捣乱活动出现在做礼拜城区的任何地方，他保证即使出动军队也要坚决镇压。在城中可以这样，但在山区里该怎么办呢？想起曾经跨过的那些深峻险恶的峡谷，那些难以逾越的河流，我庆幸和平的中国兵士们不需经受这些苦难。

车大人执意邀请我出席他为我举办的有全区显要人士出席的花园盛会。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这个花园盛会是在按办大人于我停留的第二天下午回访后举行的。在巴德鲁丁汗的帮助下，阿訇伯克平时消夏用的开阔的凉亭被红色毡毯及和田绒毡装饰得富丽堂皇，为了让我的随从也露一露脸，我让奈克·拉姆·辛格穿着他那第一兵团的工兵和布雷兵才穿的红蓝制服站在按办侍者的旁边。他那高大结实的身躯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这种场合下，我送给按办一本法显游记（Travels of Fa-hsien)，这是克莱兰登出版社最早出版的关于一位去印度的中国佛教朝圣者的尚存的最早记录的正本，并且还有一位最近去寻找佛教寺庙的旅者的叙述——我自己的《沙埋和阗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按办急切地浏览和解释了我的书中的插图，而非古老法僧艰深晦涩的文字，这些插图令我的这些文学上的无价值的东西增色了不少。不过我不知道这种关注中有多少是出自礼节性的。

尽管宴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新鲜有趣的经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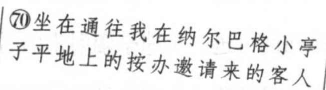
也算是对所耗费的时间以及给我的欧洲式思维强加的负担的一种补偿。现在我必须添加些大写意的描写了。车大人的款待实在是太盛情了，并且他尽其所能将那些各处衙门的伯克、恰兹（Qazis）以及其他贵族人物都请来了。宴席在纳尔巴克（Nar-bagh）的旧花园中的宫殿举行。现在，这里完全不像平常的样子！宽敞的外院挤满人，数不清的厨子和侍者匆忙地工作着，让人联想起尼雅孜·哈克木伯克（Niaz Hakim Beg）大驾光临的那些时日。花园的中央凉亭，前些天还是一个供我休息的清静之所，现在则成了按办为他的中国朋友和我布置的客厅。按办邀请了各衙门所有的市政官员，还有一个相貌和蔼的官员候选人，是他的亲戚，带着8个师爷刚从乌鲁木齐过来。

阿依旺到凉亭之间有一条覆满了藤条及果树的绿阴的长道专供那些穆斯林客人使用，伯克们分立在长道的两旁。我跟着肃穆的列队向前行进。从凉亭辐射出的另外两个林阴道上，不太重要的宾客在一起享用着宴席。另外我还发现几处隐秘的供某些有特殊需要的中国客人吸食鸦片的地方。要不是为了满足按办的愿望，给其拍照，在寻找适合拍照的地方的时候在别人的带领下来到这个僻静的角落，我还从没怀疑过他们也吸食鸦片。和田人的乐师们四散在林阴道的各处进行演奏。挨着凉亭的前廊，也就是我们这些按办的客人用餐的地方，还有一支演奏吉他、响铃和长笛的大型乐队，尽管各种方位传来的声响很大，但这些衣着破烂的人创造出的曲调中还是透着精巧迷人的韵律。这是我在和田看的第一场演奏，此刻即使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中，也能体会出和田音乐由来已久的魅力和美誉。

好客的按办大人为我准备的菜单内容太丰富了，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将其表达出来。而且我也没时间把这么长时间的宴席上发生的种种乐事都记录下来。只是有一件事我必须提提。此前，我曾向车大人客气地特别提到，随我去山中的伊斯拉木伯克（Islam Beg）应该得到奖赏一事。他曾当即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并将把我的这位忠

诚的杂工提升为喀亚什（Kayash）的胖伯克。第二天早晨，伊斯拉木伯克将这个好消息带给我，并怀着感激之情向我道了谢。现在他走到按办大人身边的宴会桌旁接受对他的新职位的正式任命，遵照中国礼节，行三叩首之礼，这种礼节同土耳其官员所采取的方式很类似。然而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正适合一个古老的和田民族的后裔，这种庄严的礼仪给最早一批中国观察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车大人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场面，他伸出双手托起这个年轻人，举止间充满了高贵的气质和父亲般的慈爱。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教堂中神父也许已研究过这种优雅的姿态。

当我为他们拍照时，一个小小的风波让我知道了温文尔雅的按办大人如何高效地让他的一大群伯克们各就其位。为他和伯克们排好队形，互不干扰是很容易的。



⑦坐在通往我在纳尔巴格小亭子平地上的按办邀请来的客人



但是当要把包括按办在内的一大堆人装进 1/4 英寸的胶片时，空间显然太小了。所以我建议至少让一些当地的官员坐在按办大人的椅子旁边的地上，其余的人站在后面以压缩队形。按办大人立刻表示反对，不同意让任何一位出席的本地官员坐到地上，我感到很有趣，于是丝毫不怀疑伯克们也同意这种“仁义”的观念。

经过长久的企盼，米饭上来的时候，天已经近了黄昏。这标志着宴会进入尾声。我很高兴中国通情达理的礼仪能让主客在开始清理饭桌的时候即刻离开。这样一个大型宴会结束后的短途骑行是令人愉快的。在城内巴扎和城郊小道上，沐浴着柔和的暮色，享受消遣后的快意，我看见到处都是崭新的有精美木雕饰面的舒适房屋，新的萨拉依（宫殿）等进步的变化，这些都是能够说明在和田城中甚至整个地区自我 5 年前的到访以来的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标志。

在我 6 天逗留期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躲避在阿訇伯克的花园中，干着繁忙的工作，难得抽出时间。8 月间我派出一队由肉孜阿訇——老土尔第的继子带领的玉龙喀什“寻宝人”，现在他们回来了。于是我举行了一个仪式，正式开始这次沙漠探寻活动，去搜寻可能发现的遗址。在我看来，这支于我抵达这里后第二天就出发了的队伍看起来破烂寒酸，他们中大多数人衣衫破烂，形容枯瘦，还是新手，就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的突击队。但他们带回的这些包括印度手抄本的断片在内的文物的样品就具有一定的保证性；并且依据我以前的考古活动所得的经验，我可以推断出相关的他们像我描述的地点的重要性和发掘它们的时间。我从黎明一直忙到了半夜，除了在长时间的详细询问后获得了有关距离、路线等准确的信息外，还得处理准备工作的账目，处理邮递信件的欠款，设备的维修等工作。天上的乌云令空气凉爽宜人，就在我们出发前，一场持续两天的断断续续小雨把弥漫连月的空气中的浮尘冲洗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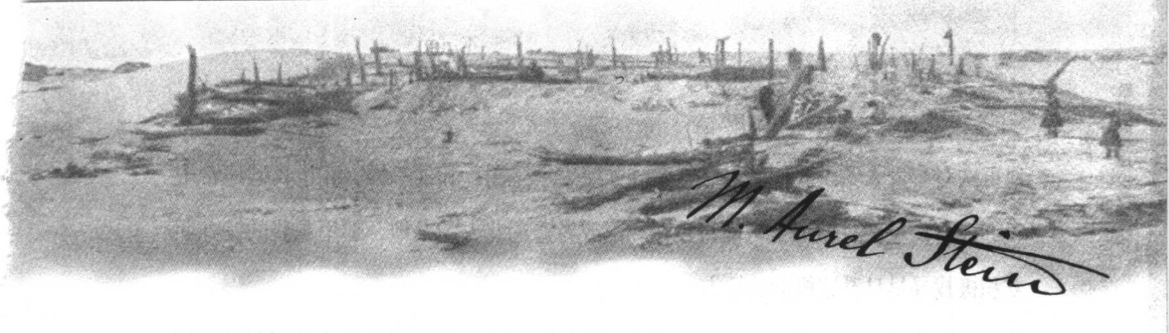
但是也有一股阴云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从喀什噶尔带来的一头骆驼，8 月份放



⑪和田按办车大人和当地的伯克

出去让它自己到山里休息吃草，现在生病了。当我的运输队在和田与我会合后，我沮丧地得知这头骆驼以及其他放出在外的骆驼已经死了，并且又有两头显示出虚弱的征兆。这些看起来不错的牲畜是由哈桑阿訇照料的，现在他既悲痛又内疚，并认为阿萨之上山中广泛分布的有毒植物是造成这些损失的罪魁祸首。骆驼惯于在北部山脉觅食,根本不知山上的毒草为何物。但是我很清楚包括我那精力充沛的杂役在内的托克斯坦的最有经验的养驼人，尽管他们熟知如何喂养出健康骆驼的秘密，却都不会诊断和治疗这种疾病。我有某种宿命论的倾向，已经听说和打听过很多尤其是在驼群中才会快速互相感染的疾病现象。不过我宁可相信它们真正的死因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天气闷热再加上从喀什噶尔一路走过来才应该是造成它们的数目急剧减少的，促使它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所有的骆驼都需要悉心照料,并且最终要放了它们。

M. Aurel Stein



第十九章

和田沙漠边缘

9月15日早，我从和田出发了。我已决定先去探访有趣的热瓦克大遗址，这是1901年我最后一次发掘的地方。其原因部分是为了查明它周围的沙丘后来有什么变化，部分也是为了探寻新近传闻的在其附近地区的遗迹。与此同时，拉姆·辛格也独自出发了，前往昆仑山脚下的南克里雅，从那里开始沿着山脉向东尽可能远地进行三角测量。还没破晓我就忙了起来。但是因为对行李进行分类，处理诸如账目等其他任务的负责人，以及当地人的漫不经心的拖延，迫使我推迟了计划，从而又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参加按办大人早就声明举行的盛大的官方告别仪式。

离开花园中的帐篷时雨刚停，高处的大路向东延伸，从云层中冲出的一缕阳光给周围的景物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我发现一整支中国军队的士兵沿路站成一线，有200人之多，身着红、蓝色衣服，扛着各种色彩的旗、幡，整个场面看起来有着东方式的喜庆。从一种很长的长号里传出响亮的吹奏，但是互不协调，相当混乱，甚至惊吓了我的巴达克什矮种马。好心的按办大人身着盛装参加了仪式，在他身边的是军队的官员们，我两次逗留期间曾和他们按照相应的礼仪互访往来。我和按办大人在路边装饰喜庆的迎宾大厅亲切地交谈着，内容不仅仅是纯礼节性的，我很高兴

地再次对车大人给予我们的友好帮助和关照表示感谢；和他一样，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但那很可能将是在和田或者遥远北方的某地，那里是我的按办朋友积极找寻早日升迁机会的地方。

在一支由伯克组成的大型地方武装团队的陪同下，我跨过玉龙喀什河到达新建立的农业区的边界，这个农业区由原先的靠河岸右侧的运河供水灌溉的几块绿洲组成。在那里，我向诚恳的伊斯拉木伯克作了道别， 通过他的眼睛我能看到他心中的那种不能陪我继续旅行的真切的遗憾。给我的中国助手指明了方向，让他带着厚重的行李直接去玉龙喀什巴扎以后，我自己踏上了北上的路程。骑马走了 10 英里后，我穿过吉亚地区富饶的村庄地带来到了苏亚附近的沙漠边缘地带。驮有行李和以后几天所需供给的矮种马队正在那里等着我，还有肉孜阿訇业已召集的两队民工，他们将同我一道，前去进行前景诱人的发掘工作。

离开了苏亚葱郁的树丛和依玛目·阿西姆的麻扎，我们又登上了有高大沙丘的裸露石砾戈壁。这里看起来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因为距上次我从热瓦克回到这里的时候已有 5 年半的光阴了，地上的路标已经完全消失。天空乌云密布，相当阴沉，这个现象在这一带相当少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的心情也变得和天空一样阴沉了。一条被称作阔纳达里亚（Kona-darya）的宽阔的砾石带标示出它曾是玉龙喀什河的古老河床。尽管不时有低矮的沙丘出现，这里相当好走。可是还没轮到我指望着能到热瓦克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我们在沙漠中的一条小型咸水渠旁安营扎寨，这条渠道是沃通其（Otonchi，即打柴人——译者）或前往北部远方的河滨丛林砍柴的人们沿着路边挖成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按照预期的设想继续往北行进，跨过了一个 6 英里长的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沙丘带后，我又一次看到了已成废墟的热瓦克佛塔的白色砖堆。

我的思绪一直萦绕在 1901 年发现的这堆雄伟的古老废墟和发掘出的一系列精

美的雕塑上。但是给我很大震撼的是四周第一眼看见的变化：当时有个雄伟的沙丘覆盖了巨大的佛塔基座的3/4部分，现在它已经向东移走得相当远了；西南墙，就是我挖出一些巨大但保存很好的神像的地方，现在几乎全部隐没在20英尺高的沙脊下了；东南面的墙和以前相比尽管又有一部分埋入沙中，但剩下的部分已经足够让我看到自我上次离开以来它遭到的人为的破坏；《古代和阗》图版记录的那些接连排着灰泥大浮雕的墙壁，现在已经裸露出内砌的土坯，我听说两年以前这里来了一大队从库马特（Kumat）来的汉族寻宝人，想试试发掘宝藏的运气，他们破坏了围墙的入口部分，直接破坏了那些易碎的灰泥雕像。事实证明，我在发现它们之后，又把它们重新掩埋的那份对文物的保护之举算是徒劳白费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沙丘的运动改变了佛塔自身的面貌：早在5年前，这个3层建筑的巨大基座除了东南面的部分几乎都被移动的沙丘掩埋了。现在，它最顶层的部分已经完全露出地面了。但是在这露出部分之下仍然有17英尺或18英尺厚的沙子填埋了整个大厅，而要把这么多沙子完全清除掉，没有与之相称的时间和金钱的花费，就正如我第一次时曾想全面发掘这个伟大的废墟一样是不切实际的。通过把这里的沙丘与我以前的记录数据进行细致、准确的对比，一个新的发现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可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那些我们在这片沙漠里观察到的高大沙丘是洪水过后沿岸留下的淤积和沉积物的直接产物，然后，它们再被相互交替的东风或西风吹向沙漠。

西边的那块风雨侵蚀后裸露出来的小片土地，原来曾是我上一次在4月份那些炎热又尘土飞扬的日子里安营扎寨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被掩盖在一个沙丘下面了。而在离小奴拉赫（Nulah）不远处又已形成另一个可作为营地安扎我的帐篷和随从们的地方。我把奈克·拉姆·辛格留下了，让他带领一队工人去清理还保存完好的佛塔基座的一角，并且让他测量那些仍起到装饰作用的精美灰泥模塑的高度。而我继续

向南推进，去一个从苏亚（Suya）回来的“寻宝者”报告说有梯木和一幢建筑废墟的地方。引起我兴趣的是，热瓦克附近仍存在着许多小型遗址，它们很有价值，对它们进行考察能增加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在超过40英尺的沙丘上，忽上忽下地走了5公里后，我们来到传闻的那两座遭严重侵蚀的砖堆废墟前。那是一个24平方英尺的基座，这肯定是一堆半埋在沙中的小佛塔遗址，遗憾的是，所有的建筑装饰都剥落了。向南移动的沙丘之间裸露的凹陷处有大量的碎陶片，这是古代居住地的标志，这些东西对一般看到它们的人而言就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在一次小范围的搜寻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虽不是传说中的，但看起来颇为古老的中国小钱币。方孔四周的圆边是我所见过的磨得最窄的一种，这表明它们流通已久。随后我们发现几条灌溉渠道的宽约8英尺或9英尺的清晰痕迹，我的向导卡斯木知道，新出现的几处地点是高大沙丘移动过后暂时留下的。不远处有一个小型储水池的痕迹，潮湿曾使这几条渠道的土制堤坝变得坚硬，所以尽管经受了多年的风蚀作用，这些堤坝现在仍高于四周地面的水平线。我甚至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被称作墩拜尔（Dombel）的土堆，在和田地区类似的遗迹至今仍有被村民们保留在储水池中央的现象。

我要找的那个遗迹就隐藏在向东不远处的两座陡峭的沙丘之间，一个奇特的海湾状洼地那儿，凭着我以前工作的经验，很容易就看出一个由木材和灰泥建成的寺庙内殿残留的遗迹，内殿的规模大概有27英尺×24英尺，四周围绕着一条丹丹乌里克佛寺式样的走廊。随行而来的一个民工小队很快展开了他们的清理工作，不久高出地面的墙壁显露出来，但它们的高度都没有超过2英尺。它们的木结构框架已经被地下水渗出的潮气完全毁坏了，但是原来的形状仍然明显。即使是这些已经保留不多的主要由红、黑色勾边的壁画装饰和建筑式样已经足够为我们提供判断它所存在年代的依据。

M. Aurel Stein



⑫肉孜阿訇率领的和田寻宝人

和热瓦克佛塔一样，一眼便知这是一种属于公元前4~7世纪的建筑结构。我在附近的“塔提”的地面上拾到的未刻铭文的中国古钱币帮我证实了这个推论。与之相一致，没有被遗址保护到的相邻地面被侵蚀的风力削低到相当的深度（10~12英尺)。因此下面的推论也就变得有据可依了，玉龙喀什河的右岸这片几英里范围内的地区一定在黄沙到来之前就成了无人居住的荒地，沙丘因此侵占了距东北方沙漠有60英里远的丹丹乌里克人的垦殖地。这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证据，这一地区干燥的气候本身不能为这片耕种地的所有这些变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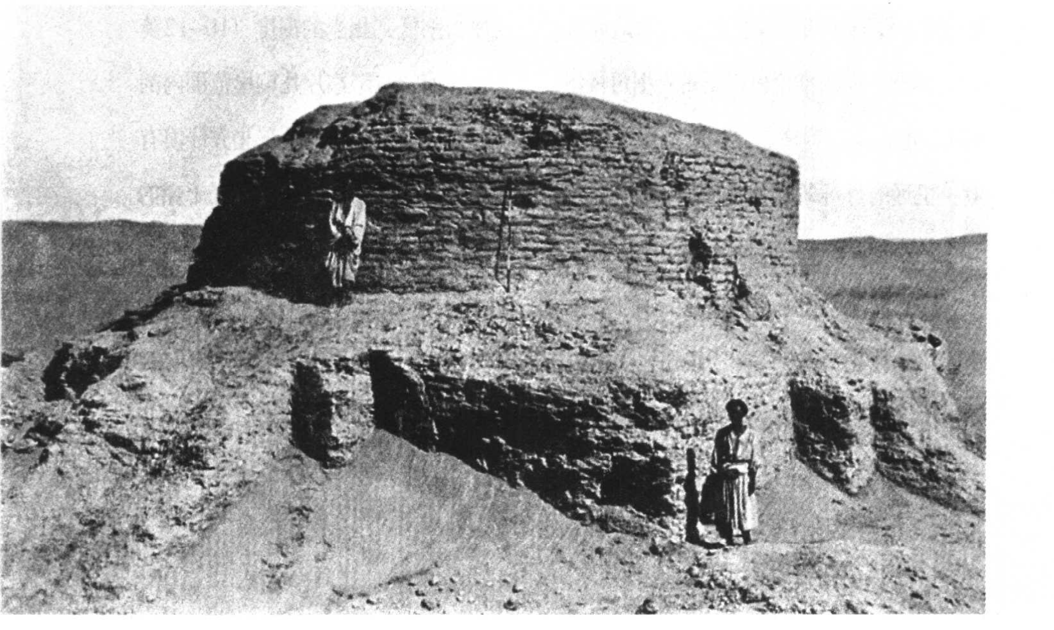
接下来，9月17日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来勘察与那些暴露毁坏的墙壁有关系的沙丘。然后就再一次离开了热瓦克。佛塔的大型四方院子及其周围的雕塑现在仍被深埋在沙丘之下，我衷心希望这些雕塑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我想知道，今后谁会

耗费数月的时间及巨额的资金来完成最终的开发任务。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肉孜的工人来和田时曾带来的装饰墙壁用的灰泥浮雕碎片的出土地点。要去那里，需要经受不同寻常的艰难险阻，同时还要通过在沙漠中长时间暴露于烈日风沙中可能造成的脱水的考验。

我们沿着在一个朝东北方向逐渐消逝的沙丘群走了仅仅3公里，我们就到达了可尼托克玛克的废墟，这里的情况与我此前根据那些不多的遗物所做出的推断正好吻合。那里有一些古代土坯墙的废墟，大约40英尺长，据此我推测它们是一个古庙的四方形内殿的从南至东和从南至西的墙面的遗物。这些墙壁废墟只比原有的地平线高出2英尺，风的侵蚀作用已将其他两边的墙壁磨成了粉末。曾是内殿的大厅部分现在看起来像是一片洼地，比墙壁废墟底部的土坯还要低6英尺。细沙从土坯墙的脚下流出，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风的侵蚀破坏力有多么大！木雕发白的碎片和灰泥浮雕的布满裂缝的小碎片，向我们展示了我所熟悉的希腊佛教艺术的花卉图案设计。工人们把它们从遭受侵蚀的地面收集起来，它们使我想起了古代墓地的遗迹。

|⑦③热瓦克佛塔|





⑭阔纳托克马克（Kine-tokmak）的寺庙遗迹

前两天，天空中还有云朵遮蔽着阳光，庇护着我们，欢迎我们的到来。现在却向地平线撤去了。尽管山脉的东南方向还依附着几片云朵，却再也不能缓和太阳的淫威了，所以我们得顶着烈日进行工作，在强烈反射太阳光线、令人目眩的沙丘上跋涉，寻找寻宝人阿合买提（Ahmed）所说的另一个“房屋群”。它们肯定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垦殖区的遗迹，房屋由木材和灰泥墙建成，先是遭到风沙入侵的破坏，后又被那些寻“宝”的人们掏挖得千疮百孔。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就是趁着沙丘移走后遗迹裸露出来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发财梦。在其中一间房屋废墟中，根据和着灰泥的芦苇墙壁的断垣，我们猜测这里或许是贮藏那些已经陷到泥土里的大罐子的地方，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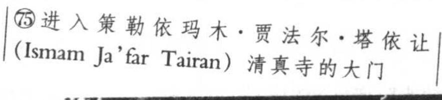
往东更远的地方，是沙丘渐低和彻底遭受了风沙侵蚀的地区。地面呈现出与

"塔提"地形相当接近的地貌。细碎的红色陶片将大片被侵蚀的地面也印成了红色，然而到处都是轻轻的浮沙，却也保护了更多的古代居住区的许多遗迹现象。房屋已经消失，但围绕在它们周围的果树树桩和杨树还在。在一个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排吉格代树（沙枣树——译者）或桑树，它们像是种在一个果园里。作为一个"塔克拉玛干其"—— 塔克拉玛干人，我能够轻易地辨识出杏树开裂的树皮，曾经多次通过那些种在古代果园四周树木发白、开裂的残片认出果树的种类。那晚，我们四处察看，拾到了一些小玩意儿，其中最完好的要数一片装饰精美的雕花玻璃了。通过它坚硬光滑的表面，我们看到了沙粒强烈的研磨琢蚀作用。

我们把帐篷扎在了向东3英里处的一个古河床上，那里长满了茂密的托格拉克（胡杨——译者）、柳树和沙漠类灌木。我第一次去热瓦克时就曾到过这里。夕阳西下，景色分外壮丽，一天的暑气终于退去。这时南边远处壮美的雪景好像经过洗刷一般，显得更加清新。夜幕携带着欢乐缓缓而降。第二天大早，从桑株（Sanju）到普鲁（Polur）的昆仑山脉清晰壮美。在双筒望远镜的帮助下，我清楚地看到了覆盖在远处山峰上的冰川，我曾亲自从尼萨和喀让古塔格的山谷攀岩而上抵达那里；还看到了我在1900年做过三角测量的雄伟山峰，以及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之间令人惊奇的锯齿状的外部轮廓线。我朝杭桂地区向南一路骑行而去，眼前那壮美的山河全景图的流光异彩始终挥之不去。走了大约10英里路程，我来到已毁坏的阿尔喀库都克梯木（Arka-kuduk Tim）一处佛塔废墟。1901年我曾来过这儿，并且在老吐尔地的教导下，能告诉肉孜它真正的名称。去阿克铁热克遗址是我的目标，尽管我知道它在向杭桂移动的沙漠边缘的某一个塔提那儿，不过找到它肯定得花上很多天的时间。所以我得完全相信肉孜，因为他知道路线。随之，我们又看到沙丘移走之后裸露出来的方圆几英里地表上出现了大量散布的陶器碎片，说明这一带曾是古代垦殖区。

翻越荒瘠的沙丘我们骑行了约有6英里，这些沙丘将近25英尺高，把四周围得密不透风。酷热将行程变成了一种煎熬，阳光极其强烈，毫无遮拦地鞭笞着我们，这样的环境在和田是很少见的。布满云母碎片的沙地的反光加剧了光的强度。不久，我回想起在达尔库特（Darkot）冰川上的经历，这种感觉让我意识到我的脸开始起水疱了。

当我到达阿克铁热克遗址时，我很快就忘记了这种不适的感觉。肉孜曾给我带来一些有趣的装饰用的浮雕，似乎是赤土陶器上的浮雕。现在，这块布满废墟的地面上，看不到任何建筑结构的残留部分。可是我们的一位穿破衣衫的工人拾到了大量同一式样的残片，它们可能就出自我的向导们预先留意标示出的一个小型沙丘的


⑮进入策勒依玛木·贾法尔·塔依让（Ismam Ja'far Tairan）清真寺的大门



附近。残片上有坐姿的小佛像，佛像周围是莲花叶，花状的涡卷型装饰，以及火焰文饰。还有其他一些残片，其上贴花式样的灰泥装饰与我在拉瓦克发现的环绕在巨大的佛像头顶上的光环贴花式样的灰泥装饰很相像。这些残片散落在一个“塔提”的陶器碎片中，外观看起来令人费解；至于建筑结构的残留部分，比如有相应装饰的寺庙墙壁，沙地的水平表面上根本没有它们的踪迹。四周的陶器碎片和这些属于一个装饰精美的古代寺庙的碎片除了脚下松软的不断遭受侵蚀的黄土之外无可依靠。

我要搜寻更多的圣坛的遗物，就像一次真正的探宝活动。这次，任何考古学上的指导，诸如我学来的应用在丹丹乌里克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开挖一系列的探沟来寻找古代建筑墙壁的可能位置，仅仅依靠肉孜手下那12个随着我们在炎炎烈日下走了这么多路的伙计的力量完全不够。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我让他们开始从沙丘北部的脚下开始挖，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赤陶碎片出现。超出我的头脑所能预料的范围，幸运之神眷顾了我们。在黄沙中仅仅挖了2英尺深，肉孜发现了一堵墙壁的遗迹，相当厚实，由红色的黏土筑成；它旁边还有剥落的墙皮碎片，这些东西把向下约2英尺深的石膏板盖住了；这之后，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描述相符的浮雕碎片。我让其余的人加紧清理墙壁，在黄昏来临前尽可能发现更多的东西。陆续有东西出土，就像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奖励一般。所有的出土文物都使我确信这的确是一堵寺庙的墙壁。

令人可惜的是，墙壁被发掘出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根部以及原有表面的全部东西都已经暴露，这个寺庙所有的结构性特点几乎都损毁了。

然而，如果我不希望把这里更大的雕塑和壁画都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比如丹丹乌里克或热瓦克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墙壁，而只想要一些丰富于装饰性的小雕塑作为回报，它们相当的硬度使它们得以完好保存。在热瓦克，同样的浮雕装饰是未经烘焙的黏土制成的，它们很脆弱，有很多在移动的时候碎裂了。只有少数，

被我奇迹般地把它们安全地送抵伦敦。

第一眼看去，我以为这里不会有什么，可现在，像是上苍赐给我们白天在这一带辛勤工作的奖励，发现可用以研究我在热瓦克发掘的雕塑艺术品的新鲜素材很有前景。我的发掘者们，用他们训练有素的双眼，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仍保留有细小金箔的雕塑碎片，毫无疑问它们应该是那镀了金的最了不起的墙壁装饰部分，随后一块镀金的墙壁饰块，让我第一次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它与我论证古和田都城时所引用的从约特干遗迹文化层中出土的器物是一致的。在那片镀金的墙面残块上，我认出了早期的中国资料记载的古代和田人喜好用黄金装饰他们神圣建筑物的奢华习俗痕迹。但是约特干至今还没有一个单独的镀金的建筑物品被发现，只有显然是单独使用的易碎的灰泥雕塑，其中大部分早已腐蚀分解在因长期灌溉而保持湿润的土壤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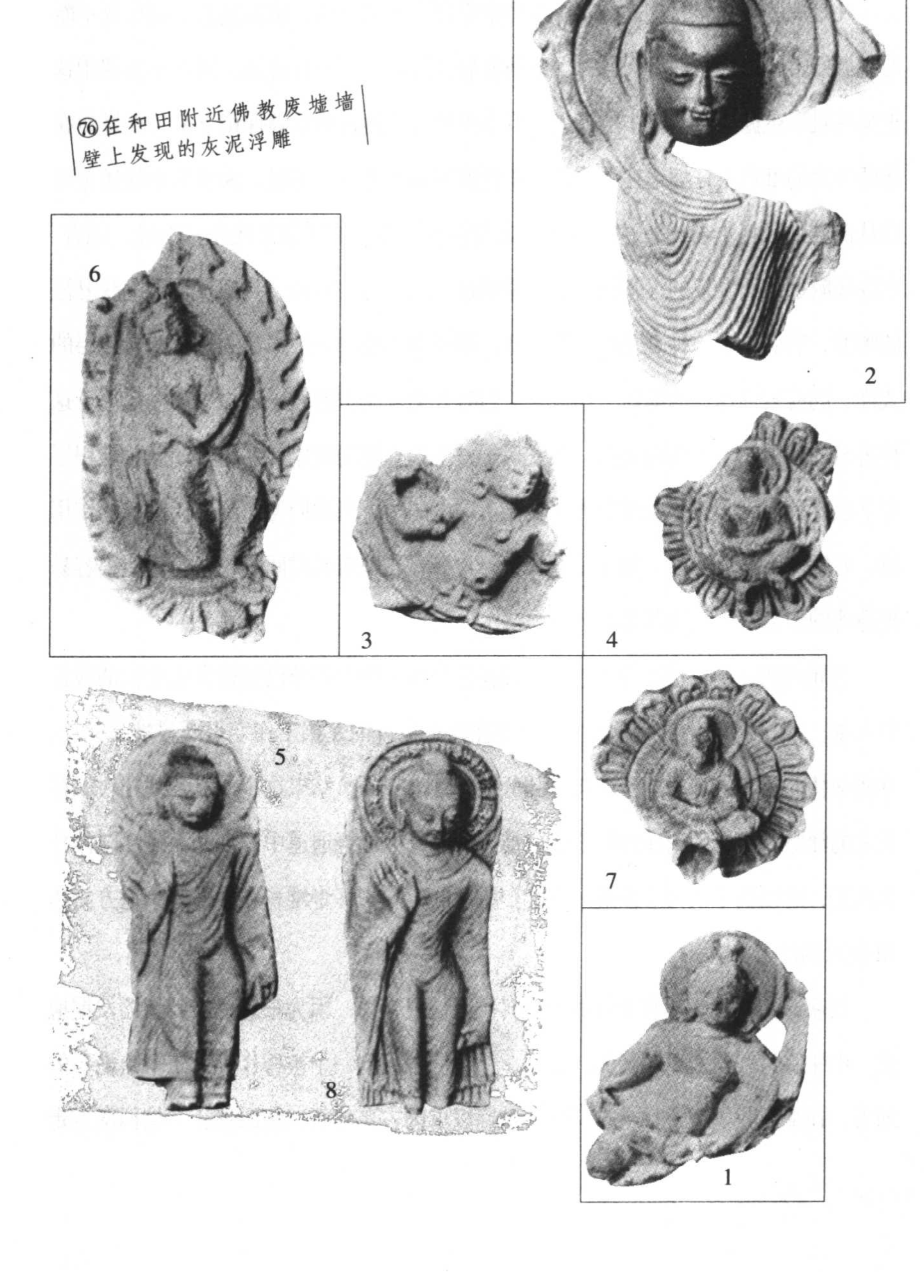
怀着一种新奇和愉快的考古经历，风尘仆仆地动身前去我的营地，它就扎在一个农场中，靠近阿克库勒村附近耕种区的边缘。尽管这段路只有 2.5 英里远，然而在途中我们仍要翻越高大贫瘠的沙丘让我感到好像再次回到了沙漠的深处。浮沙流动的区域被这里新近开发的耕地不断向后推移。差不多仅在 15 年前，阿克库勒的土地才被开垦出来了。次日清晨我回到了这里，搞明白了耕地是怎样逐渐扩展到几个世纪前被废弃的这片沙漠地域。大量的水灌溉在肥沃的黄土中，一贯沿着耕地边缘种植的白杨、柳树和吉格代树很快发芽了。因此第一眼就很容易注意到每年同沙漠进行拉锯斗争的成果。阿克库勒的水渠尽头，一条繁茂的芦苇和红柳灌木植物带已然正在向布满陶片的古代聚居遗址的一侧移近。所以我有时真的相信，尽管气候正变得越来越干燥，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人口和土地需求增长的压力下，绿洲有可能重新覆盖现在杭桂塔提大部分荒凉的废弃地上。

我很感激这种人类活动的进展，因为附近的耕地让我很容易地第二天一早就召

集了足够多的民工去探索古代遗址，同时不必担心没有足够的干粮和饮水。没用几个小时，我们就挖出了，可以肯定是一个寺庙内殿的北墙，14英尺长，就像丹丹乌里克的许多佛寺一样，与一个肯定绕内殿四周一圈的通道相连。这个通道的墙壁边沿有大量的赤陶碎片，并且它们被埋得越深，其上原有的镀金浮雕碎片就保留得越多。它们大多很可能是用来装饰环绕通道的巨大雕塑和墙上壁画的石膏饰物表面的，只可惜在地上厚达2.5英尺的雕塑碎片中镀金的并不多。就像约特干等级分明的社会阶层一样，用来制作这些雕塑和壁画的易碎黏土也都已经风化破碎了。

但是经过对那些碎片的仔细检查，有迹象表明还有其他的破坏性因素大大地加快了这种完全的腐化。雕塑碎片中的泥土好像和墙壁的残留黏土一样都呈红色，此外，还发现了被完全烧焦的小碎片，这和其他一些当时无法具体弄清的迹象都表明这个佛寺曾遭受过一次大火，由此产生的高热足够给那些墙壁上更小的原本仅通过阳光晒干的黏土浮雕类装饰物造成赤土陶片的颜色和更强的硬度，同时那些和实物同样大小的手指、耳部等的雕塑碎片也都被烧成硬陶了。但是这种常规的烧灼还不足以保护雕塑自身的黏土。除了那些碎片，暴露在外的已经完全毁于空气的侵蚀，以及耕地带来的土壤含水量增高的影响。佛寺最初毁损到它完全倒塌之间相隔了一段时间，这可以通过位于地面第一层碎片和较薄的第二层带有许多浮雕的两层堆积之间大约1.5英尺厚的黄沙层证实。

在这片过去的绿洲上农业灌溉过程中泥沙沉积的现象持续存在，并且，正如我先前解释过的那样，这一过程持续不断地抬高着地平线。沉积的泥沙上面覆盖了变硬的浮雕，当时人们把墙推倒好为稍后的建设或开发耕地腾出空间，这些浮雕从那些墙上掉了下来摔碎，幸运的是新的泥沙沉积又有效地覆盖保护了它们，直到人们扩充占地的行为最终停止，而那些土地也被遗弃了，并最终被沙漠中的流动沙丘所占领。当一个沙丘移走而另一个还未光临时，风化作用也在永不停息地进行着，风



76在和田附近佛教废墟墙壁上发现的灰泥浮雕

又开始把最上层的浮雕重新吹露在黄沙表面。正因如此，在广袤的“塔提”地区才能有古代遗迹，或者是较晚时期的陶器碎片能够被发现。

凡是那些从潮湿、热火的双重煎熬中幸存下来的东西，也必定遭受到反复不断的盗掘侵害，这种盗掘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居住区附近的所有古迹。因而不能期望这里那些最后被抛弃在沙漠中的遗迹中有多少有价值的古物能够保留下来。很显然在雕塑碎片的堆积中仔细地搜寻明显的年代痕迹是徒劳的。不过，大致的年代还是可以从浮雕的风格上看出，这个寺庙一定与热瓦克佛寺的使用年代相差不远，还有，在寺庙附近地面发现的汉朝钱币也能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些丑怪的雕像，它们属于一种真正的赤陶式样，即我很熟悉的一种来自约特干的文化层的式样，同有装饰作用的陶器一样代表了当时人类观念中的猴子，构成第一个关于这种古老的和田艺术繁荣的证据。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地面的碎片堆积层中下层碎片中完全镀金的浮雕碎片要比上层中的多。当我们考虑到白天刮风的作用时，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如果贴金雕塑碎片暴露在地表的时间过长，风就能很容易把薄薄的金箔一片片地剥落下来。

寺庙内的礼拜殿曾经位于这里，现在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已经被向南生长的沙丘所占据。沙丘的高度一天天增长，使寺庙内殿遗址的发掘工作变得既艰难又冗长。寺庙的西北角和内部北墙墙面的一部分被清理出来了，结果这里没有发现几块保存下来的浮雕，由于无论在内殿的任何地方都与外部环绕通道中发现的大量浮雕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不认为应该继续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移走堆积在内殿其余地方高达18英尺的沙子。

放弃这种消耗时间和金钱的工作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很容易找到新的发掘地点。中午我付钱给玉龙喀什的向导们，让他们带我到一个被称作小“布特哈纳”的地方，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带有我所梦寐以求的古典建筑风格的遗迹。朝西南方走

2英里，跨过一片低矮沙丘和广阔范围的“塔提”不断交替出现的区域，通过与四周被侵蚀的黄土平地差不多相平的黏土墙壁，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一个小型四边形佛寺的轮廓，大约25英尺宽，23英尺高。我们在地表发现了一些石膏浮雕的碎片，它们与更大的佛寺墙壁上装饰用的浮雕极其相似；经过我们的清理，更多的碎片就出现在比现在的表面要低1.5英尺的内殿原有的地面上。这个佛寺也有明显的回字形通道。

这个小神庙遗址完全暴露在一个没有沙丘的平地上，地面散布着各种碎片，据我的向导说它的名字叫斯耶里克（Siyelik）。在这里，很容易就能搞清造成遗迹现存外观的原因，内殿地面上的土层和土坯碎片上满布了植物的茎和根，它们能证明这个遗迹被废弃后一定被逐渐堆积的和可耕种的黄土埋没了一段时间，当这里不再适合耕种时，风化作用一定在随后的时间里继续起着作用。一些有6英尺高的小黄土丘平坦的顶部逐渐裸露出沉重的陶土碎片，这些碎片好像反过来保护了小小的土丘。这些土丘像一个个目击者，高出与佛寺很近的“塔提”的平均水平高度，标志着地表风蚀下降的程度。从遍布于毁坏的内殿里的陶片中夹杂着大量人体骸骨可以肯定，这里曾经是一片墓地，而掩埋尸骨的土壤现在已被风刮走了。墓地出现的时期，应该在当地伊斯兰化时代早期，这个推理无疑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麻扎是在其作为佛教神殿之后，现在仍然受到当地的崇拜。在我第一次发现的寺庙遗址附近，我也注意到在沙丘之间大片严重风蚀的地面上散布着一层厚厚的人骨，这个现象也应该同样适用以上推论。

这片平静的塔提区域从东到西贯穿约12英里，曾经有不少人到这里做考古研究，我感到高兴的是那些发掘出的有趣的遗物提供了很多资料，正如当我1901年首次开始考古发掘时时常希望获得的，那时我是在阿克斯皮尔（Ak-spil）和杭桂之间大片被遗弃的区域。烈日炎炎中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调查斯耶里克的房屋遗迹、

遗物和附近一些小土冈上毁坏的佛塔，而南方披雪山脉的壮丽美景构成了一幅清新宜人的背景画。真的，在和田平原上难得见到它们的身影，当我站起身视察一个大寺庙的发掘过程时，我很想知道戴着冰雪皇冠的昆仑山峰是否曾在意过像我这样的劳动者。

但是，没有时间让我沉浸在这种遐想中，也没有时间让我欣赏那悬挂在红色和黄色的荒凉之地上空瑰丽壮美的晚霞风光。因为成百个灰泥小浮雕需要分类、编号、打包，尽管奈克·拉姆·辛格和我的中国助手蒋师爷还有我自己3人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等到能返回营地时天已经相当黑了。蒋师爷从一开始就给枯燥的发掘工作带来激情和情趣。尽管烈日无情地鞭笞着我们，沟渠中弥漫着尘土，仍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目光敏锐、精力充沛的监工，他多才多艺，有着无愧于一个真正文人的明眼和快手，完成本职工作后又敏捷地拿起他的毛笔抄写印画在那些遗物上的特殊文字。尽管他无法看懂我们的英语字母和数字，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纯粹、完全的训练使他完全能够胜任将它们精确地抄写下来，当这些发现物在大英博物馆被开包取出时，我毫不怀疑他抄写的完美可信性。

9月20日，我们在阿克铁热克遗址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只有在下午，当所有值得运走的雕像碎片安全包装后，为了阻止今后那些寻宝人的盗挖行径，对发掘出来的环绕寺庙墙壁的壕沟全部进行了回填之后，我才跟在行李后面经过从杭桂到洛甫镇的富饶的农业区。在那里的3年前从和田绿洲的东部划分出的新区的总部，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在忙碌地做着最后筹备。一个按办，这里的尊贵人物，脑满肠肥，礼节繁琐，坚持要举行一个小型宴会款待我和蒋师爷，尽管佳肴的准备幸好还不十分铺张，可是比以往的都要冗长，且节奏缓慢的谈话耗费了大量时间。最初，我想提醒按办适当地注意时间，这可惹恼了我那生性善良并且通常总是和善的助手蒋师爷，他可是知道我们自己不愿意受礼节拘束的后果和随后要做补偿失礼行为的努力绝对

不会对工作进程有所裨益。

打好到喀什噶尔的一个大邮包后，我还要和我忠诚的朋友及听差巴德鲁丁汗一起处理账目问题。他坚持要跟着我一道来洛甫，给我提供实际的协助。我完全没有领会他其实是害怕这些账目。因为它们有假，我那老伙计唯一的书记和会计就是他12岁的儿子，他们必然会尽力……所以那夜我俩没睡多少觉。

第二十章

哈达里克的神庙遗址

9月22日清晨，我踏上了经过沙砾戈壁和沙漠前往策勒的35英里长的行程，当我们到达绿洲的第一个外围部分和克里雅区的边界时，天黑了。那里，依布拉音伯克和曾在1901年冬季的沙漠探险中无畏地帮助过我的老达罗哈为我举行了欢乐热烈的欢迎仪式。上次本地考察结束时，在我的建议下，他随后以米拉布伯克的身份被派去管理策勒的河渠，可这次我回来前他只在这个舒适的位子上待了几个星期，是什么让他失去了新按办的赏识呢？难道是那些策勒农民抱怨他管制太严抑或他的对手依靠贿赂放出虚假的谴责？依布拉音伯克的降职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一同接我的还有当地的伯克，大家一并骑马行进，我的朋友被允许排在我身边尊贵的位置。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年舒适尊贵的生活并没有给他那历经艰难瘦削的身躯增加额外的负担，也一点没有损害他简明地执行命令的能力，依布拉音还记得我喜欢在安静的园林安营，早已准备了一个远离策勒巴扎的合适地方，但是在那里我只能通过火炬的光芒来欣赏长势很好的胡桃树和柳树，并且每天将近在半夜时才能吃上晚饭。

我在先前的那次旅行中确定性质的那种古代写卷，后来又有发现，并到了巴德鲁丁汗的手中。当我在和田逗留期间，通过他和马继业先生打听到这些写卷来自于一个名叫穆拉·霍加（Mulah Khwaja）经营的矿区，而这个矿区恰好就在达玛沟（Domoko）绿洲附近的一个废弃的遗迹上。通过巴德鲁丁汗我自己搞到了穆拉·霍加发现的一些有趣的写有梵文的婆提（Pothis，是一种流行于中亚的古代写卷装订形式，主要用于经书的装订。用长条纸两面书写，叠放在一起，在偏左端处打孔，穿以绳索把整本写卷缀连起来，以便诵读不致凌乱—— 译者）书页，我把吐尔地的伙伴也派了出去搜集写卷，当我从昆仑山中返回时，我把他连同一些写卷样品一起带到了和田。

穆拉·霍加很显然不以寻宝为生，不是经常挖宝的“寻宝者”，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近年来官运亨通的乡村官员。带我去丹丹乌里克的向导买尔干·阿合买提（Merghen Ahmad）5年前曾教他出去寻找老“亥特”（Khat，古代写卷——译者），正如他已看到我发掘过的古迹那样。穆拉·霍加因为衙门方面的缘故已没有了收入，他正在考虑在这里寻一个机会以使自己摆脱债务危机。他运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成功地劝说那些习惯于在达玛沟北部和东部的沙漠丛林中打柴的人做他的向导去不远的“阔纳沙尔”（Kona-shahr，古城——译者），由于在被打柴人称作“哈达里克”一个小型遗迹的废墟中曾经跟随我做过发掘，他突然萌生出找寻“亥特”的想法。他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能在和田卖到些钱，在最近的大约3年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从事发掘古物的活动。一个真正的“探宝者”喜欢的是四处流浪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却没有这一点，也没有那种商人的狡猾伎俩和丰富的想象。所以，当我承诺给他报酬及在克里雅衙门为他说情时，穆拉·霍加便准备领我去看他在哈达里克及其附近一些小遗址中的发现物的出处。由于穆拉·霍加挖宝的缘故，这些遗址变得知名起来，被从策勒到达玛沟绿洲线上的当地官员和其他人所知悉。

达玛沟,1901年我就曾经造访过,这是策勒最北的居住地。我知道玄奘所说的媲摩之所在就应该位于其东面一带。我要去的遗迹据说就在只有相当一个半炮台远的地方或是离马拉克阿拉干大约3英里远的地方。我选择了一条远离商路的路径打算去马拉克阿拉干，当我沿着固拉合玛和波纳克绿洲北部边缘行进时，一路上我看到就在那些因长期废弃已变成沙漠丛林的土地上，新的垦殖区在向前推进着。骑马走过繁荣的策勒绿洲令人心情愉快，在新疆我还没看到还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林阴小道和茂盛的林带。穿行在林带中，我发现自己竟有些下意识地寻找金银花，就好像又回到了我在汉普郡常去的老地方。宏伟壮观的依麻木·贾法尔·（Imam Ja'far Tairan）麻扎和清真寺令我大饱眼福，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受朝拜者欢迎的地方，并且它很可能是我在策勒正北方沙漠中的乌鲁克麻扎探寻到的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媲摩佛教寺庙的“香火”继承者。

固拉合玛的北部地区，和策勒相隔了一片灌木生长的荒郊野地，这里的景色不那么令人欢喜，灌溉主要依靠地下的泉水，不过有时大量的水很容易流失进深深的亚尔（深沟）或是冲刷出的黄土峡谷。对此，村民们没有有效地解决办法，大量肥沃的土地无法耕种，任由繁茂的芦苇大面积扩散。可即使在这里，不断扩展的发展前景和人口压力也在不断将耕地范围向北扩大，我对朝着拉钦阿塔（Lachin-ata）自然显露的沙漠边缘地带漫步走去，仔细观察波那克（Ponak）的土地。有趣的是，在繁茂的红柳灌木中，有一片为种植玉米清出的土地，我注意到周围还留有大量长满红柳的沙丘，这块孤零零的耕地寂静地待在沙海之中，好似沙丘的守望者。

马拉克阿拉干是15年前从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在那儿我又把营地扎在了伊斯麦尔伯克的大庄园中。1901年我曾从克里雅达里亚来到这里并做短暂停留，这里的变化给人印象深刻，果树苗已经迅速长成浓荫的果林，发芽的白杨、柳树和吉格代（沙枣）树荫蔽着一条条林阴大道，马拉克阿拉干已经发展成拥有150家住户的中等

规模村庄。当我了解到他们的耕地还在不断扩展时，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耕地正在朝着"老达玛沟"（我在《古代和阗》中描述过其中的一个早期村庄）方向沙漠中的大片荒地扩展。

为了这次富有挑战性的发掘我新招募了20个民工，9月24日一早，我就轻装前往哈达里克遗迹，把那些笨重的行李都留在了庄园中，耕地的东部边缘离达玛沟亚尔很近，一条这个季节的活泼小溪顺着长满青草的宽敞水道欢快地流淌着。我又一次进入了远处由无数道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沙丘形成的迷宫，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沙丘上面的红柳灌木丛和上次我从希乌勒沼泽返回时所见的--样茂密。在这些沙丘间向东穿行了大约3英里后，我们来到一个开阔地，地面出现的陶片提醒我，我们已经来到了所要寻找的古代遗迹附近。

起初，这里的情形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考古热情，这是一片东西长约400码，南北窄于200码的平地，它四周都有高大的红柳沙包。部分地区地面上可以看出风蚀的迹象，其余部分则散布着低矮的沙丘，上面丝毫看不出有建筑遗址的痕迹。考虑到这个遗址和绿洲的距离很近并且处于长期不断的开发中，遗迹现象一定很早就暴露出来，并遭到破坏。因而，这里没有大沙漠中那样引人注目的木结构房屋和古代果园遗迹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令我担忧的是那个满目疮痍的低矮大土墩，它就是穆拉·霍加发现古代写卷的地方，看来很可能已经受过各式各样的盗掘和破坏了。

我没有让这种不安的感受持续多长时间，先简单迅速地对整个遗址做了初步考察，很快就弄清楚它的范围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我把人派到紧挨着大土墩南面的一个受侵蚀的凹地进行发掘工作。经过对斜坡的清理，挖出了一段明显属于佛教寺庙的绘有壁画的残墙，同时还发现用中亚笈多字体书写的写卷残片。半个小时内，从松软的沙土中挖出了第一个重要的"亥特"，为了得到这种古代写卷我曾许诺要给发现者特别报酬。它由3大张组成，15英寸长，5英寸高，应该是一个纸本写卷的

一部分或是佛教梵文经书中的婆提页，保存得十分完好。随后我们有大量更多同类的东西发现，有分散的书页，偶尔也有成捆的没人碰过的完整文书，以及许多破损的文书碎片。所有这些手稿都是用印度婆罗谜字体书写，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们应该是几种不同的文字，困难是梵文抑或是古代和田不为人所知的某种语言，对以前的发现所做的研究似乎说明这种语言的来源是东方雅利安人，在其中我们又找到了罕见的写有不是梵文字体的古代和田的简牍，直到晚上，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数量已经逾百了，在整理和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和它们的发掘者都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

灰泥浮雕残片和彩绘版画残片在这里发现的很多，它们的样式以及装饰图形和我 1901 年在丹丹乌里克的发现十分类似。然而，经过一个下午，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结构的遗迹，发掘继续进行，一直挖过沙层和石膏碎片层直到寺庙地面. 但是我对寺庙的整体形状和范围还是一无所知。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这个寺庙的规模很大，还有穆拉·霍加和他的同伙的挖宝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仅仅局限于个别地方，幸运的是，根据以前的考察经验我很快放弃了寻找建筑结构遗迹的努力。从发掘一开始，我就能确定这个遗址中丰富的古代手稿的分布范围，以及分布特点。它们大都位于房屋废墟地面或是在地面以上6~18英寸的松土中，很可能是来这里朝拜的最后一批虔诚信徒的手书。

我在距离达玛沟附近 5~6英里远的地方，很快招募到了一批补充民工队伍的生力军；所以第二天破晓前发掘工作得到了新民工的补充。发掘中抛出的土已经堆积很多了，需要较多的人来清理，令我满意的是，发现了第一个可以表明建筑结构的地方，是一排毁坏的低矮柱子，他们标明了一堵木骨泥墙的位置，很明显，它是四方形内殿的南墙或是外围通道的南墙，我很快就推断出它的高度大概有 74 英尺，这比丹丹乌里克最大的内殿墙还要高 3 倍。

当清理木骨泥墙的发掘工作紧张进行着的时候，手稿的发现变得十分频繁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对它们进行单独编号。放在地面分成了几部分，用纸袋分装的写卷残片到处都是。我力图亲自抽出时间在现场给所有大捆的书页和其他重要的发现分类和打包。但是，这项任务显然是太艰巨了，在前边工作的发掘者总是不断报告说有新的文书被发现。

白天的工作真的十分兴奋，但是就像剩余的发掘工作一样，它同时也意味着挑战，烈日炎炎，强光和灰土都让人难以忍受，中午我不得不让民工和我自己休息半个小时，简单地清除一下从头到脚覆盖满身的尘土都很困难。让工作尽快完成的理由太多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良好的体魄使我不用考虑健康和舒适的问题而承受这艰苦的工作，我也很感激那些健壮的民工们，他们每天连续工作将近 12 个小时还是那么愉快地挥舞着他们的“坎土曼”（一种掘土工具），显现出来的旺盛工作精力连我的那个受过训练的士兵拉姆·辛格都感到吃惊。依布拉音伯克也不知疲倦地喊着口号鼓舞那些民工继续努力工作。通过从整个夏天跟着我的肉孜阿訇的伙伴中挑出最有才干的人，我很快为每个发掘小组配备了得力的领班。

尽管我们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努力，一大群人持续不断地工作，这个寺庙的发掘工作还是持续到第三天晚上也没有完成——需要清理的沙土和文书残片多得难以计数，手稿的发现也十分丰富，灰泥浮雕碎片和木雕残件，还有石膏壁画碎片都需要仔细收集并做标记。根本没有时间对它们作具体、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在废墟中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让我疲惫不堪，晚上我还要继续工作，清理手稿上的积土（否则，手稿就不能安全无损地捆在一起）。还要记录所有重要发现的地点和详细情况等准确信息，我在现场看到令人惊奇的情景，在这里只能提到和介绍很小一部分。我时不时就会碰到用婆罗谜字体书写的文书书页，这些古代文书分布在寺庙的不同部分。有证据表明，一切都与 1901 年在安迪尔发掘出的寺庙遗址情景一样，信徒献上这

些手稿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供奉寺庙内雕塑和壁画所代表的神灵。

发现的2个保存完好的纸质写卷证明在这些虔诚的信徒中也有汉人，每个纸卷有36英寸长，10英寸厚，它们是相同的手稿的一部分，一面整齐地写着中国佛经，另一面用草体的婆罗谜文写着差不多等长的文字，当时我没有条件对它作进一步研究，我只希望它是正面文字的译文。随后，我的推测在我的一位合作专家的手中得到证实，他指出翻译这种和田未知佛教语言的关键，这个证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包括大部分保存较好的文书和收集起来的文书残片在内，经过标记、打包的手稿总数最后超过了230件。

第二天，我们发现了一个中央雕像基座，2个围绕内殿的四边形通道的壁画墙的遗留部分，证实了我在建筑结构方面所作判断的准确。大量的证据显示由于木工偷工减料，这些木骨泥墙墙壁很早以前就完全损坏了。大些的长杆和横梁一定来自别处制造运输设备的工场；因为我不时发现堆积的木片，木片上大多带有精致的佛教彩绘等，有了这些木片，柱子的表面及其他暴露的木质构件表面就能被覆盖，并装饰起来。

内殿的中央发掘出土了一个9英寸的正方形底座，但是曾立在上面的佛像已经无迹可寻，这就是长期暴露和遭受破坏性盗掘的见证。但是，在佛像背后由坚硬白色灰泥制成的精美浮雕背光装饰，由于是在内殿的墙上，大多都逃过了那些文化艺术破坏者的摧残。它们表现的是佛教菩萨或飞天（randhe）的形象，展现了当时艺人的高超技艺，不过当木骨架被抽去后，墙壁表面脆弱的胶泥面一定很快就完全被破坏了。

然而，所幸的是，墙上高达5英尺大的壁画残片在遭到破坏前就掉落了下来，埋在了未被破坏的地面上，它们的式样与丹丹乌里克的壁画十分相像，但是在设计和颜色上则相对要高明一些。大部分墙壁表面似乎布满了模板印刷出来的千佛像，

它们一排排地坐着，在色彩、粉饰和背光等方面变化较少，可是单独的壁画墙面大残片则刻画了佛陀的不同姿势——有讲经、宴请或是接受膜拜等。这些壁画残片终于重见天日了，颜色仍然十分鲜亮，如果我挑选出来的壁画残片能够安全抵达伦敦，我肯定它们所表达的丰富信息一定会让我的忠实朋友和伙伴 F.H.安德鲁斯先生训练有素的双眼饱餐一顿。

尽管，在一大堆手稿遗留物中并没有可以确定历史年代的文书，我仍然可以确定这个遗址的年代，所有的绘画和浮雕遗物清楚地指出与丹丹乌里克遗址神庙被遗弃的时期处于同一时间段，即接近于公元 8 世纪。前面提到的中文婆罗谜文两体写卷中吐蕃文的发现也符合这个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确切时间的证据在 9 月 27 日的继续发掘过程中，在废墟残留物中找到了。这是一个在西南 50 码处的一个废墟片堆。埋在这里的佛寺内殿显然小得多，边长 27 英尺，带有一个四边形的城墙，它的

⑰哈达里克佛教寺庙壁画，壁画上为模板千佛





⑱哈达里克佛教寺庙主庙附近一小住房的内部

墙壁并没有完全损坏，而且更具有艺术价值。

小的彩绘木板画和精美的硬质石膏小浮雕是在出口处的北墙附近发现的，无疑灰泥浮雕组成了围绕真人大小的肖像周围的部分背光，但是那些肖像却是用脆弱得多的石膏制成的，可悲的是只有手和头的一部分遗留下来。我们发现了反映制作技术的很重要的熟石膏模型，它们用来铸造小的浮雕像和譬如构成这些神庙中部分墙壁装饰的花状纹样以及大些雕像的部件，除了大量小型黏土雕像，我们也在背光浮雕附近或其周围还发现了一些精美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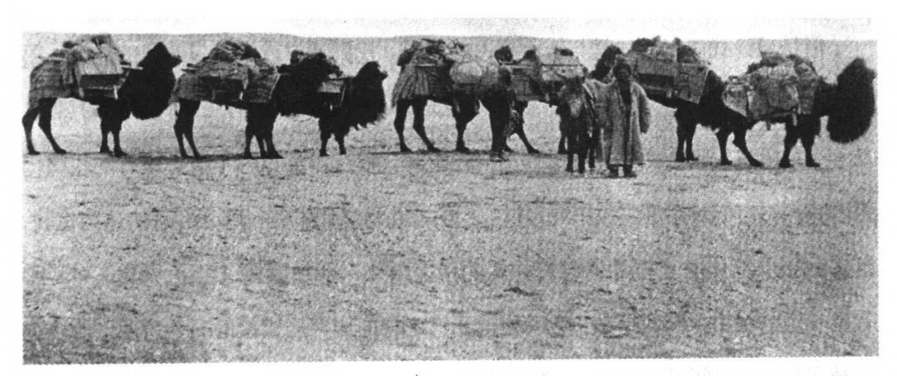
我很幸运地得到写在桦树皮上的一部梵文佛经手稿的大块残片，根据上面的古老字体判断，它应该写于公元4~5世纪。这些易碎的桦树皮经冲洗后变得相当鲜亮，就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虽然历经艰难，在干燥的沙土中埋藏了1200年以后依然如新。我就像欢迎从克什米尔来的朋友一样欢迎它们。有资料清楚地表明克什米尔

就是它们的发源地。在一些纸质手抄本上，可以找到一些曾暴露在炎热高温中的痕迹，还有一些灰泥雕塑残片被烟熏黑了，由此可见这个遗址曾遭遇了火灾。从这个小型神庙中，还发现了多种多样写有婆罗谜文字的木桌；写有婆提文书字体的木板，上面粘有残留的纸页和带有缩小插图的经文残片。

但是最让我高兴的还是与钱币有关的发现。挖到通过内殿入口通道的地面，第一次出土了一组中国唐朝钱币，然后好像是为了满足我寻找有关年代证据的热望，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完好无损的铜钱卷筒，数目多至20~50枚。原有的线绳仍绑着它们，它们最后的主人用绳穿过它们的方孔将它们串在一起，经过快速的检验，这些铜钱卷筒中除了很老的没有印文的钱币以外全部是唐代（公元780—783年）最新一版的钱币。因为这种贡物一定属于这个神庙废弃后紧接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神庙废弃的时间可以确定在8世纪左右。

⑲哈达里克佛教寺庙主庙附近发掘出土的柱子，雕刻有女性图案和花边





⑳穿着冬衣的7头骆驼，从于田购得

对于接下来的，让我持续工作到10月1日才结束的发掘工作，在这里我只能作最简短的叙述。在这个大寺庙的西边和北边有一些小型房屋，它们可能是僧人们的住处，这里的墙壁一部分是用土坯，一部是用木材和灰泥砌成的，它们仍有6英尺高，堆积的沙土高得既能够掩藏又能保护它们。我又能坐在一个古代壁炉旁的长凳上收集大量不值钱的家用工具，比如有趣的可移动锁齿的木锁和钥匙，这种锁从和田到埃及都有迹可寻；还有装着腐朽棉花和羊毛的布袋等。

我们从四周的沙土中费力地挖出一条探沟，我发现了另外一座小佛寺，它靠近主寺僧侣的住处。从这些地方找到了大量的残手稿和写字小木板。房屋的墙壁几乎完全毁坏了，但是涂了灰泥的地面和上面的手稿还是足以让人看出这些小寺墙壁的结构。这里也有令人兴奋的发现，比如大约20张梵文的婆提文书残片。它们几乎有2英尺长，就像写给方丈或寺院的经书那样是用美观的粗体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另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卷1
作者=（英）奥里尔·斯坦因著　巫新华　伏霄汉译
页数=248
SS号=11567824
DX号=
出版日期=2004年06月第1版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